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林伯渠传

 **BOOK**
网络图书·学校专集

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

——《林伯渠传》序

王 震

林伯渠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我幼年时期，他就已经是一位知名人士，著名的革命党人。一九三四年一月，我作为湘赣苏区代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瑞金第一次见到他，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林伯渠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已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之一。会前他向我们询问和调查了湘赣苏区的情况，而后又在会上作了《经济建设》的报告，会议结束后，还同我讲了他在苏联急于想回国参加斗争的事，鼓励我回湘赣继续坚持斗争。无论是他的报告还是个别谈话，都使我深受教益。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却银发满头，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林老”。

一九三六年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在陕北再次见到林伯渠同志。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一九三九年三五九旅从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我兼任绥德专员及随后任延安地委书记、延安警备司令和卫戍司令之后，与林伯渠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使我对这位革命长者的高风亮节，更加敬仰。

林伯渠同志一生的战斗生涯，是同中国革命在这个期间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他青年时代目睹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思想，赞成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成了保皇派，林伯渠同志东渡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蔡锷、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等革命家。一九〇五年八月，在日本听了孙中山先生讲演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革命果实很快被军阀袁世凯篡夺后，他又参加了反袁斗争和护法战争，反对封建军阀勾结列强复辟帝制，维护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林伯渠同志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因革命屡遭失败，政治澄清遥遥无期，而“时常苦恼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伯渠同志在他的好友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一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同盟会老友董必武、吴玉章，在此前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伯渠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是我党最早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者之一。陈独秀、李大钊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苏联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他大多参与其事，许多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直接间接同他有关。他不但帮助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为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作出了坚定不移的努力，同反对和背叛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与革命三大政策的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林伯渠的一生中，他总是顺应革命的潮流，不断随着时代前进，“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或者追随封建军阀去做官。林伯渠却毅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有人劝他脱离共产党，他断然拒绝，坚持走自己的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王明“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他又毅然踏上长征之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坚持党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在党内斗争中，林伯渠同志也总是站在党的正确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的利益，巩固党的团结。他逝世时，陈毅同志在悼诗中赞誉他“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他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林伯渠同志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在革命统一战线、财经工作和政权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林伯渠同志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非常尊重，总是以诚相待，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关照。对那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他始终不忘。所以，许多民主人士都把他视作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遇到什么事总是愿意找他谈谈。

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林伯渠不但一生非常崇敬孙中山先生，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一直到晚年他也还怀念着在台湾和海外的许多旧友。

一九五八年纪念孙中山九十二诞辰，在北京碧云寺，他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台湾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时，还对于右任深表同情和怀念，并步于诗“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原韵，疾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期望在台旧友与祖国人民一道，团结在中山陵树之下。

林伯渠同志留学日本时就攻读过经济学，研究过财政学和簿记学、统计学。护法战争他任湖南财政厅长，大革命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财务委员。后在南昌起义、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和初到陕北期间，他也一直在做财经和部队的供给工作。抗战开始，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及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期间，还同时兼任着中央财政经济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时，他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那时林老经常强调要克勤克俭，重视发展生产，关怀和改善人民生活。说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解决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耐心地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的生活，“欲取之必先与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关于发展生产，他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按：指资金）与技术”，提出在资金方面，“帮

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尤应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到边区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助。”在技术方面，除继续发扬职工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外，应“尽可能地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农业建设，他们来后，都给以必要的优待。”他的这些见解，至今仍给人们以重要启发。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了屯田政策，三五九旅一面保卫延安，一面到南泥湾进行屯垦，而最先踏勘南泥湾的却是林老。一九四三年，林老带着边区政府的礼物前来慰劳军垦战士，在报告时说：“八路军是无敌的军队，它既能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又能征服自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给了指战员很大鼓舞。

林伯渠同志从中央苏区时起就从事政府工作，后来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初期又曾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在政权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诸如正确地处理党政关系，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发挥政府各个部门的作用，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真正做到使他们有职有权，等等，他都可谓是典范。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上虽然是地方政府，但因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而国民党又拒绝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政府，它实际上却是各抗日根据地的首府。它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采取的许多措施，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在政权工作中，许多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都同当年林伯渠同志所倾注心血、树立的风范分不开的。

林伯渠同志不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高贵品德也堪称模范。

长期以来，林伯渠同志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延安，他多次跋山涉水，到各县进行调查研究，每次从西安或重庆回来，都要拄根棍子，挨个窑洞走走，与同志们进行亲切的交谈，了解情况，研究工作。晚年，他身体衰弱，也仍然是力疾从公。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体察人民的疾苦，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在日记中端端正正地写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印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林伯渠同志非常关心同志和干部，重视专家学者，重视知识分子。他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对同志、对干部，他总是强调看他们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而不是看一时一事。同志们工作有困难，他总是设法帮助解决。思想有长进、工作有成绩，他热情鼓励；有缺点错误，诚恳帮助，甚至严肃批评。他常说，“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他一贯强调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鼓励知识分子干部深入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他认为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当时许多人都把林老看作恂恂长者，好的导师。

林伯渠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瞒。他虚怀若谷，欢迎党内外外的批评。就象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对于个人生活，他一贯以淡泊自持，十分简朴，进北京以后，仍然保持着延安时的老传统。

林伯渠同志学识渊博，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和诗人。毛泽东主席就曾说过，他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他经常手不释卷，勤奋地学习，尤其

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六十寿辰时，他还向毛泽东主席请教：“象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教导，他多次向同志们讲述毛泽东同志同他的这次谈话，直到党的八大时，他还着重地讲了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在现在也同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挫折。”“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

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的百年诞辰，学习他的高贵品德，《林伯渠传》编写组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撰写了《林伯渠传》。它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的崎岖道路，从大处着笔，全面地叙述了林老光荣的战斗的一生，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对他的品德、风格着意地进行了刻画。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林老如何由一个学子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从他一生的战斗历程中，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部传记的出版，我想无论对青年或干部还是史学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的。

家世与童年

林伯渠，中国共产党内少数几个从本世纪初就投身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名祖涵，号邃园。一八八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湖南省安福（今临澧）县城北约十公里的凉水井。这里地处丘陵地带，是一个四面环山、泉甘土沃的小平原。一道清溪流贯中央，两岸繁星般点缀着村舍人物，鸡犬牛羊。

两百多年来，林伯渠的祖辈，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的家庭，人们说是个“书香门第”。曾祖林长槐，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先后任四川邻水、宜宾知县，后擢升为叙永直隶厅同知。祖父林山萃，是个廪生，早逝。父亲林鸿仪（1865—1906），曾在武昌博文书院肄业，一八九三年中副贡生。一八九六年经武汉、金陵、上海、烟台、天津赴京师，入太学肄业三年，并兼教读。他研究过天文、地理、数学、矿学和中国历史上的中兴之道，目睹列强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希望中国变法自强。他学养深厚，崇尚“忠义”、“真直”、“笃行”，主张士应“有忠义之性，怀真直之操”，“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燻而不可灭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他居京师多年，从不低眉折腰谄事权贵。在京完成学业之时，正值戊戌变法失败，他没有去做官，而是毅然回到家乡，教几个从学生徒。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一农家妇女，她在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的教导下，

思想开朗，秉性慈祥，操持家务，俭朴勤劳。

林鸿仪：《日记》（未刊稿），1896年农历2月13日。

林伯渠的家庭，自曾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父亲在世时，有水田八石。父逝分家，兄弟四人（伯渠居长）各分得二石，约合十二亩。

童年时的林伯渠，体弱多病。由于父亲经常在外，母亲家务繁忙，祖母须为长房其他幼孙分心，加以山乡小村，就医买药，路程很远，人力财力，都较艰难，因而对他的调摄护理，势难周到。这时，家里对他偏重静养，结果使他直至接近学龄时，还举止迟钝，言语不清，甚至心神恍惚，视听模糊。这一情况，引起家人警惕。他们认识到：伯渠的体质原是好的，一时体弱，让他长期静养，反而变得长期体弱。俗语说：“抠成的疮，晒成的病。”“坛里生豆芽，成菜不成材。”家人经过反复商量，决定由静养改为以动养为主，让他经风雨，见世面，在加强活动中增强体质。

年近七岁的伯渠，从家人的怀抱提携中解脱出来后，象大梦后初醒。他来到村里的儿童中，同他们一道，跑遍了周围的农田山林，辨认了许多草木虫鱼，甚至参加拾穗摘瓜和扒柴割草的行列。

伯渠在这个年龄来到家庭以外的小世界，天地万物都对他显得格外新鲜，他比一般儿童更加喜欢观察和思考，象太阳升降，月相盈亏，风雨作息，寒暑往来，以至迅雷斗阵，彩虹架桥等天象，一般人司空见惯，习而不察，而在少年伯渠的心中，却常常激起疑惑与遐思。

此时，伯渠尚未系统地识字，但他的几个年岁稍长的同伴，已入私塾念书。他常跟一个学童去玩，从旁聆听塾师教授《千字文》，看伙伴们描红习字。不久，他对识字产生了兴趣，便找出家里那本《千字文》，在大人和比他大七岁的从堂兄林修梅（名祖堃，1879—1921）的指点帮助下，自己学了起来。不出一年，他已读完《千字文》，开始读《三字经》，有不懂之处就去问堃二哥。

一八九三年冬，父亲应乡试后从省城回来，目睹儿子长高了，壮实了，异常高兴。

使他感到惊异的是，儿子竟能认识一千多字，能说出一些文句或段落大意，且能背诵。

此后，父亲较为注意开阔儿子的眼界，常带他走亲访友，到牌楼岗去祭扫祖莹，到凉水井周围一二十里的停弦渡等市镇上去赶集。每到一处，就把这里是什么岗，什么垭，什么湾，什么坪，有什么寺观庙宇、古墓、祠堂，乃至丛林老树，流水人家，都一一给予指点，至于带有掌故的，更是详细述说。伯渠边走边听，心旷神怡，兴致勃勃，流连忘返。他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后来在延安作的七律《梦返故乡》，就曾写道：

儿时心事浑难忘，梦里仓皇返故乡。

腊鼓停弦过闹市，牌楼驻马望阡冈。

山容淡远青还在，璧合无间色亦香。

最最后园风景好，百花如锦拂檐墙。

《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伯渠也如邻里的少年一样，爱在夏夜池畔、冬日炉边，听年迈的祖母和乡间耆老讲述民间传说和咸丰年间太平军攻打常德、澧州等地的故事，更爱听博学的父亲谈些英雄豪杰、墨客骚人的轶事奇闻。

一次，父亲给他讲起三十年前在本地发生的一件韵事。同治年间，一

位学政从省城来澧州主考童生和生员，特地赴新安访问咸丰进士、著名诗人黄道让（1814—1863，著有《雪竹楼诗稿》）。黄以上宾相待，引他游览数日，沿途宾主赋诗联对，唱和甚欢。只是主人酬应较快，而宾客却有时呐呐难出，私心怏怏，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尴尬局面。一天，二人畅游澧水，放舟而下，约十里，来到停弦渡一带。学政赞美山水明媚，立即邀黄道让联句属对。黄请学政先提出边，学政脱口而出：“河山图画烟作墨。”黄想了想，摇头说：这可不容易对，要咏的是河山，而“河、山”二字你都用了，我用什么呢？学政得意地催促：以你的高才，定能对好。黄说：迫不得已，只好遵命。他略加思索后说：你的出边是“河山图画烟作墨”，我且说个“风水文章桨打圈”，冒昧陈词，至希不吝指教。父亲讲到这里，便转身问伯渠：这出边和对边，哪一句为好？伯渠经过一番寻思，回答说：出边太明显，平常，好象一般人都想得到；对边，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说明，总之是同出边相反。父亲说：那就是含蓄，隽永，巧妙，把山河比作图画是陈词滥调，“烟作墨”无论在次序上或在形象上都有点不伦不类，而把风水比作文章，又妙手天成地用眼前事、口头语，很自然地承贯下来，用“桨打圈”来形容风水文章对山河的赞美，真是构思精妙，巧发其中。伯渠对父亲评述的一些用语，不能完全了然于心，但在当前景物和父亲态度的启示下，还是领略了一些意思，从而对吟诗联对发生兴趣。

父亲怀着期望儿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心情，除了督导伯渠继续锻炼体魄、注意身心修养和帮助料理家务外，开始考虑儿子的读书计划。他着手编辑一套课本，共计四种，每种都冠以“励志”二字，以便明确编书的宗旨和选材的主要内容。这四种书是《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和《励志曲选》，除“文选”以外，其他各种分量都不算多，但文、诗、词、曲都是撷取自古至今的精华而成。从一八九四年春天开始，父亲即逐渐教伯渠课读。这套课本，后来由于远近各私塾间辗转传抄，流行日广，直至辛亥革命前后，当地仍有一些私塾把它列入蒙学课本。不管编者是否有意，实际上它在当时当地，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却起了一定的驱旧迎新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九岁的伯渠正式进入父亲刚刚创办的私塾就读。主课是“四书”，先读《孟子》，而后《大学》、《论语》和《中庸》。《孟子》语言通俗，行文流畅，内容也能开阔心胸。在那皇帝至高无上的年代，伯渠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语句，感到非常新鲜。读《中庸》时，学到书中说的为学五个步骤，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感到很受启发。

父亲秉承祖父及老师彭菊泉的教诲，素来认为为学最忌空疏而不务实，只顾独善其身而不求兼济天下。他认为要经世致用，不仅在于礼乐刑政，尤要充盈府库。他最服膺管子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道理。相信贾谊的壮语：“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也悦服刘晏的深谋远虑：“理财当以爱民为先”，而爱民“当使之耕耘织纤”，“而不在赐焉”。因此，曾拟出一个书目，叫伯渠细读《史记》的《管晏传》、《商君传》，《汉书·贾谊传》，《唐书》的《刘晏传》、《杨炎传》，《宋史·王安石传》和《明史·张居正传》等篇，这些传主都是力主并坚持改革的人物。正处在记忆力旺盛时期的林伯渠，通读了这些传记，知道稼穡艰难，为人作事必须务实，这对他后来重视理财和善于理财，是有影响的。

开始接受维新思想影响

一八九六年三月，林伯渠与堂兄林修梅一起，来到设在安福县城的道水书院就读。

道水书院创建于一八四四年，九十多年来书院在教育事业上并无重大进展，它培养出来的人，大都是钻营仕途者，或年轻的老朽。但近年来开始有点变化。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初步发展起来。一八九五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创办湖南矿务总局，开采铅、锌、锑、锡、黄金等矿产。同时，对教育制度也作了一些变革。湖南学政江标，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对于八股文甚为鄙薄，岁考取士，凡文体奇特、不囿于八股格式的多被录取，从而使全省文风大变。这股清风也吹到了道水书院。

一八九六年初，林伯渠的父亲应聘为该书院山长，他把儿子和侄儿带来书院学习。到职后不及一月，他突然接到通知，去北京国子监进修。他的儿子和侄儿仍留在书院学习。

这时，道水书院设有四部（经、史、子、集）精选、四部专读、万国坤舆（地理）、万国史记、算学、格致初步等课程，还订有《申报》和《万国公报》，供师生们自由阅览，了解和研究国内外大势。

林伯渠从山村的私塾，来到这个县城的新书院，感到非常新鲜，抱有很大希望。可是书院改革伊始，困难重重，书院开的新课，是由几个中年教师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后才勉强讲授的，当他们把这刚刚学来的知识讲完后，便再也无法继续讲授下去了，新课大都变成了“空课”。林伯渠无可奈何，只好以主要精力研读古籍。

林伯渠在书院教谕的指导下，学习了王阳明的著作。他首先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大学问》，因为在私塾时读过《大学》等书，现在他从《大学问》中，得到了关于“格物”、“致知”等概念的新的解释，感到既在复习，又在新学。少年时代的林伯渠自然无力对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体系作出科学的判别，但他从王阳明的《大学问》、《传习录》中，却学到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他感到王阳明注重人心的作用，可以使人们在做人作事中看到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命运和神鬼，少依赖环境和条件；在自我修养中要严以律己，注重慎独，做到言行一致。这些，对他后来加强自我修养和启发教育他人，都起过积极作用。一九一三年流亡日本时，他就曾多次引用王阳明的言论以自责、自励。

林伯渠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继续滑行的岁月，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甚至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种种凄凉景象，同时也闻知太平军攻克常德、澧州等地的英雄事迹，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例如他就曾听人们讲述过，一八九一年九月，澧州哥老会首领廖星阶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率领会党二百余人携刀带棍，拥进作恶多端的团总、监生杜彩珍家，将他杀死。几天以后，又率众进袭澧州城，被反动武装击败，廖星阶避走不及，为巡缉营拿获。次年，他与会首徐树堂被押解省城杀害。被捕的陈启元、鲁详美、石盛旦等头目，亦先后被就地处死。其他会党分子有的被押往边疆充军，有的

在本籍监锁。林伯渠来到道水书院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凡此种种，给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云。

林伯渠开始伤时忧国，同情劳动人民，除了社会时势对他的潜移默化外，与其父对他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父亲林鸿仪是个思想与时俱进较为开明的人士。他在林伯渠将入道水书院肄业时，曾经慨然叹道：“日本国……历代以来，虽与中国启衅，而有害犹浅。乃去年一役（按：指甲午战争），涂毒我生灵，割据我土地，重耗我金币，岂其中政教之果有以胜人耶？抑中国之孱弱实甚耶？”他对自己的家乡安福县，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到处是鸦片烟馆，感到十分痛心，曾经写道：“洋烟之害人，至今日而益烈。吾乡前五年并无烟馆，今且累累相望矣。此殆于刀兵水火之外，又添一劫运也。”他自己衣食无虞，但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深感忧虑。就在应聘道水书院山长前夕，曾奉县命去考察邻县石门的雄磺矿和天门书院。他看到有上千工人的雄磺矿，名为官办，实为豪强所占，他们唯利是图，不顾工人死活。矿洞深暗、坡陡，工人偶有失足，便粉身碎骨，而劳动所得却“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因而书成一绝：

是谁凿破混沌天，石洞幽深百丈悬。

上下千人纷若蚁，生涯大半在黄泉。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3月2日、1月21日、3月11日。

林鸿仪这种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对林伯渠有很大影响。他诵读父亲抄给他的《磺洞七绝》以后，对矿工的同情心油然而生。

林伯渠到道水书院一年以后，书院的新课改变了过去形同虚设的状况，逐渐有所好转，他即以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新课的学习。在新课和报刊所传播的新知识的影响下，他的精神面貌也渐渐变得清新活泼，尝试着以新的眼光去接触自然，观察社会。一八九八年的一天，林伯渠登上了书院东南隅的奎星楼，直至顶层。他举目四顾，万象纷呈。东西是原野平铺，南北有岗陵起伏。近看道水，港曲帆翔；远望浮山，云遮雾掩。加上那鹰飞鱼跃，犬吠鸡鸣，他感受了万物的静态，也领略了万物的动态，而且与平时所感受领略的大不一样。他好象在经历着一次精神沐浴，恍惚身处万物之中，心超万物之上，总觉得在美好的江山中，有一些酸心碍眼的东西在那里扬尘鼓浪，窒息人们的呼吸。这书院外面，什么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还有什么祠、宫、坊等，咫尺之地，殿宇林立，里面供奉的各种偶像，无非是昭告人们要安分守己，劳而无怨，死而无恨。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天主造人物之说，殊太不经，然竟有信之者。”“风水之说，达者弗道。”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神道吗？

第二天，他把这些感触告诉了年已十八岁的堂兄林修梅和另一同学黄右昌。二人听罢，提出了首先捣毁神像的主张，林伯渠欢欣鼓舞，积极赞同。随后，他们开始结交对扫除迷信颇有见识的学友，还特意把学友中知县的儿子也联络进来。于是，一股捣毁神像的小小思潮，便在道水书院逐渐形成。

林鸿仪：《日记》，1896年农历5月7日、1月16日。

黄右昌（1885—1970），咸丰年间澧州进士黄道让之孙，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一八九八年夏末的一天，在林修梅的指挥下，林伯渠和几十个学友齐心协力，一举捣毁了城隍庙的神像。县署闻讯，立即派人赴现场勘察，到书院查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知县的“少爷”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且当众供认不讳。这使县署的差人十分尴尬和棘手，后来只得敷衍从事，不了了之。

事隔四十六年，林伯渠与黄右昌在重庆相晤，彼此互赠诗篇，他还记忆犹新地怀念在道水书院时“卯角交游”、“奎楼聚首”的少年英雄气概。

一八九九年春，林伯渠又回到父亲跟前就读，并接受了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影响。

林鸿仪在京师就赞同维新运动。他从北京归来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失败，湖南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组织的南学会被查禁，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等均被革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惜，但仍坚信“时无论古今，地无论中外，纵令处之危险之秋，苟有自强之精神以鼓舞一世，未有终于不振而甘居人下者也。”他认为乐于教人，善于教人，就一国言，为一种优良之世风；就一家言，为一种优良之家风。

为了作育人才，他从北京回到安福后，接受了澧州的聘请，到钦山寺举办新式学堂。

林鸿仪：《夏少康年四十以一旅致中兴论》稿，载1899年《日记》本中，无具体月、日。

钦山寺学馆于一八九九年春始业，就读的有澧州、安福、石门、安乡等县学生三十余人，林伯渠与林修梅也由道水书院转到学馆。

自从维新运动失败，科举、读经、八股文又颇得势，林鸿仪既鼓励学生读新书，求新知，作实用文；同时对以应科举考试为目的、注全力于读经作八股文的，也不强求他们改变意志。但他认为科举复盛，不过是回光反照；学堂兴起，却是势所必至。因此，他决定让伯渠为升入高一级的学堂作准备，新旧课兼修并读。新学以历史、地理为主，算学次之；古籍有《诗经》、《楚辞》、《易经》、《书经》、《礼记》、《春秋》、《老子》、《庄子》、《韩非子》、《左传》、《公羊传》等等，其中有的是继续肄业，有的是新开课程。父亲苦心孤诣、耳提面命地贴心教导，儿子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地勤奋攻读，几年时间的学习，使林伯渠在中国史地、古代汉语、诗词歌赋等方面，奠定了深厚的根底，并且长期受用，永志不忘。后来到了延安，他在《六十自寿》中还怀着感激的心情写道：“六十年匆匆地越过了生命的途程，回首往事，儿时聆受庭训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

林伯渠在学业上得到了父亲的教诲指点，在政治思想上也接受了他“随势前进，择善而从”和维新派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出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二书。《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搬出和附会了西汉时公羊学派的“三世”、“三统”说，为维新运动制造理论根据。林鸿仪非常欣赏这种理论，在钦山寺学馆期间，他就用了六个月时间，以自己的理解和见解，指导伯渠攻读公羊学说。

公羊学说的所谓“三世”，是说社会的发展按其先后次序，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由乱到治，越变越好。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每一个新的朝代的出现，都各自受命于天，自成为一个“统”。西汉公羊学派这种理论，是为了适应刚刚兴起的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制造出来

的，以便证明刘邦虽然出身于亭长的卑微地位，但他所建立的朝代却是受命于天的一个新的“统”，它同上一个朝代没有继承关系，却完全有存在的权利。尽管康有为、梁启超把西方的庸俗进化论塞进公羊学说的框架，但在当时条件下，它却有力地冲击着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根据。

林伯渠学习了公羊学说，联系当时的现实，在思想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而印象非常深刻。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他在日本东京听孔教会讲《公羊传》后，就在日记中写道：“忆儿时受经，先君子即以此书相督责，计六阅月毕业，颇解其义。”

《林伯渠日记》，1913年11月23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引此书简称湖南版），第30页。

向往富国强兵

一九一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可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为了摆脱窘境，她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旗手。一九一一年一月她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八月，下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这种变革，主要是废科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然而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毕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情况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是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它令湘西各县每县选送二人入学。十六岁的林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学堂所在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门户，交通方便，市井繁荣。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让他熟悉环境，带他走亲访友和游览城郊的名胜古迹。

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眼界大为开阔。

西路师范开办时只有百来名学生，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在这里，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诸子、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博物学、化学、物理、日文、英文、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较过去宽广许多。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湖南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风流人物、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希龄，非常敬佩，并且发为吟咏。原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几经兴废改建，早已不是昔日模样，遗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抱的石礅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

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

凤凰莅止鸣高岗，麒麟云集结新侣……

林伯渠青少年时的同学沈少卿回忆。

这里的“麒麟”是美喻弃科举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凤凰”当是指熊希龄。熊是湘西凤凰县人，曾有“熊凤凰”之称。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为了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材，曾于一八九七年冬从北京回湘，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筹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敛迹回家，改图在较小范围内兴学，以待再举。这次创办西路师范，他联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军头目黄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学堂的实际主持人则是他自己。

林伯渠这一吟咏，由学友而至师长，辗转相传，终于为熊希龄所知。熊问他为何要这样写，他说出了自己认为一个维新运动的斗士理应受到尊敬的心情。熊希龄一面告诫他：你自以为是含蓄，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你将张口难辩，一面提示他：学堂订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可在课余尽力去阅览，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发为言论，付诸行动，却要谨慎小心，不要给我招祸。林伯渠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却也是一片真心，特别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

在西路师范期间，林伯渠眼见国势孱弱，外侮侵袭，他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其所以如此，从一个方面看，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七年，林鸿仪对山东胶州的教案中，德帝国主义借故挟制中国，要督抚李秉衡、知州许颂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挟制”，将李秉衡革职，发往军台，逼迫知州自尽，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行动。一九〇一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光绪皇帝曾多次传谕嘉奖，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从这里也可窥知他对义和团的胜利是何等兴奋。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林鸿仪：《日记》，1897年农历11月8日、15日。

激起青年林伯渠热望“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时的许多进步书刊。那时，学堂附近有一个启智书局，经理唐承隋是林伯渠父亲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

书局经常出售一些港沪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他便将内容更激进一些的藏之后室。林伯渠凭借父亲的关系，经常在星期日上午去阅读或购买这些书刊。

当时在西路师范进步学生中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流传的进步书报，主要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译的《天演论》、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报》等，到了一九〇三年下半年，甚至还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林伯渠为了发动同学们阅读这些书报，联络一些进步学友，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由于音乐室设在学堂的东北角，幽深僻静，加之上课时间不多，门虽设而常开，学社的成员，常到音乐室去阅读或聚会。开始时他们是各自阅读，继而相互交谈，讨论问题，有时甚至高谈阔论。久而久之，引起了学堂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熊希龄对学生看进步书刊，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听到非议、责难时，他只好让庶务把音

乐室锁起来。林伯渠等学社成员只得分散开来，把书报拿到距学堂不太远的神武寺、祇园寺等僻静的地方去阅读。这个新知学社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对开阔同学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新书报中，林伯渠受影响最大的是《新民丛报》。该报是一九〇二年创办的一种月刊。它反对慈禧太后，支持光绪皇帝，因而遭到清廷严禁，但却受到知识界的欢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晓畅浅显、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人物，宣传种种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的政治文章曾尖锐地指出，列强要“保全中国”，正说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态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徒有虚名的“新政”，甚至说，“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新民丛报》的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阅读该报的人，固然有受它的影响而赞同君主立宪的，但也有很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林伯渠就是属于后一种人。

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

林伯渠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往“富国强兵”，不只是接受了进步书刊的影响，现实的反抗斗争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比如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就使他感到非常惋惜。唐才常是湖南浏阳县人，是谭嗣同二十余年的好友、维新派的激进分子。一九〇一年七月，他眼见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便以时局紧张、须力图“保种救国”为由，在上海邀请数百人举行“中国国会”，订立了三条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这些条款，虽表现了唐才常政治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但他希望拯救国家于水火的精神，却博得很多人的支持。召开“国会”以后，他又秘密组织了自立军，亲赴汉口进行部署，拟于八月九日，由他统一指挥，分别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新堤，以及西路师范所在地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不料叛徒出卖，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被捕，八月二十二日同时被杀害，起义失败，林伯渠痛心疾首，此事更加激起了他救国救民的热忱。

林伯渠后来回忆他在西路师范的政治思想状况时说：“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西路学堂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192页。

《林老谈辛亥革命》，《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清政府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为了解决师资和实行“新政”的需要，先后派遣一些官员和青年出国留学。一九〇三年冬，西路师范举行选拔留日学生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录取。随后，他结束了西路师范的学习，前往日本。当时清政府企图在留学生学成归来后，经过考查，赐予进士、举人、贡生等衔，使之变成为己所用的人。可是事与愿违，这些青年学生接受新知识，富有政治敏感性，大多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四年春天，林伯渠告别了家人、父老和师友，在护送官的陪同下，与本省数十名官费留日学生由长沙乘船出发，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轮东渡日本。置身于碧波无际的大海之上，只见晴空万里，白浪滔天，阵阵海鸥，随波上下，这在林伯渠还是生平第一次。他不禁为之心旷神怡，意气风发。船过马关，回念甲午战败的耻辱未雪，而今日俄两帝国主义者又在我国领土上为争夺东北而大动刀兵，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东北无数同胞在侵略者的枪弹炮火下，惨遭屠杀。多少人生离死别，多少人背井离乡，在林伯渠心中，忧国忧民之思又不禁起伏翻腾。

船到日本商埠长崎，经神户、横滨，改乘火车到东京。在横滨时，已有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和湖南留日学生会派员前来接待，林伯渠等一行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到了东京，很快就安顿下来。

其时，中国留日学生已有几千人，多数荟集东京，品流很杂，有的是为升官发财来镀金买文凭的，有的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宏愿来勤学苦读的，有的是因从事革命，被清政府通缉亡命而来的；也有借名游学，日事玩乐吃喝的。中国留日学生大都进速成学校或普通科。林伯渠在这年夏初进入弘文学院就读师范科。

弘文学院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于一九〇二年专为接待中国留学生创办的。院址在东京牛込区西五轩町，设有普通科和速成师范科，普通科三年毕业，教授中学课程；速成师范科肄业半年、八个月、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由于近年来中国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弘文学院发展很快，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间，在下谷、神田、巢鸭等地扩建了四所分校。林伯渠到校那年，弘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有六百零四人，其中湖南籍一百一十人。由于当时留日学生由各省保送，多为集体入学，乡党观念较深，学院亦往往以地名为班名，如称湖北普通班，湖南师范班等。陈独秀、黄兴和鲁迅都曾经在这所学院肄业。其时，日本的生活水平不高，物价较低。弘文学院每年收学费、食宿费三百日元。官费留学生每年可领官费四、五百日元，另有实验费和旅行费，一般说来生活还算是优裕的。师范科学习日语、修身、教育学、数学、理化、史地等科目。林伯渠在西路师范学过日语，对各部门功课都有根底，因此在学习方面并不感繁难。

中国留学生除了上课和复习外，课余时间大都用来跑留学生会馆，进书店，听讲演等。

从一九〇三年起，各省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好几种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以及湖南留学生出版的《游学译编》月刊等。

更早的第一批留日学生戡翼翬等，也在三年前组织了《译书汇编》社，从事翻译工作。

他们相继翻译了欧美资产阶级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以及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等人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历史等方面的大批名著，就地出版，广泛发行，使新来的留日学生林伯渠等大开眼界，耳目为之一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以半文半白的革新文体，

宣扬君主立宪，批评时政，过去在国内，就对林伯渠起过颇大的影响。来到日本后，林伯渠在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和留日学生激进派的影响下，日益倾向革命。他听到黄兴与宋教仁常常谈起日本义士宫崎滔天夸奖广东有个孙文多次组织反清起义，是当代人杰，早就心仪其人。但是，在一九〇四年，对于满清王朝“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险恶用心，他还不是一下子就认识的；对能不能联合清廷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这一重大问题，他和陈天华同样，还是动摇模糊的。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大批革命志士，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道一、姚宏业、仇亮、田桐、程潜、程子楷、覃振、白逾桓、吴崑、以及秋瑾等，都是在这期间认识或订交的。宋教仁自一九〇四年秋策动长沙起义失败后，于这年冬天逃到东京，不久即与陈天华等向湖南留日学生发动捐款，筹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林伯渠参与了捐款筹备工作。《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一九〇五年六月创刊，只出了三期，便遭到日本政府封禁，其后移交给中国同盟会，改出《民报》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

杨毓麟、姚宏业、田桐、白逾桓，吴崑皆弘文学院学生；除田桐、白逾桓、秋瑾外，其余皆湖南人。

一九〇五年是亚洲政局风云谲变，国家多故的年代，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时期、建立新型政党的年代。打了一年半的日俄战争，经过这年五月间的对马海战，俄国太平洋舰队几至全军覆灭。在我国东北领土上作战的四十万俄军，也抵挡不住日本军队凌厉的攻势，节节败退。俄国不得不在美国的斡旋下向日本言和让步。但实际上丧权失地的，仍然是挂着“局外中立”招牌，颀颀无能的满清政府。在一些中国人看来，这次日俄战争，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就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的胜利，所以这次战后，中国的立宪派又活跃起来。

这年七月，孙中山由欧洲回到东京，经宫崎滔天的介绍，找到黄兴、宋教仁等，秘密商议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政党的问题。七月三十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的筹备会，商定这一革命新组织的会名为中国同盟会，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等八人负责起草章程，并规定了入会仪式和誓词等。

林伯渠听到孙中山抵达东京组党的消息，心头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早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眼见到这位闻名已久的伟大人物。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决定于八月十三日下午在麴町区骏河台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文大会。林伯渠和弘文学院的中国学生满怀激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到会的群众达一千三百余人，远远超过了原定六百人的预计，把个小小的富士见楼挤得无插足之地。尽管这时天气炎热，汗流浹背，大家都不愿离开，以一睹孙中山的丰彩和亲聆他的言论为快。当孙中山缓步走上讲台时，周围掌声四起。孙中山首先叙述他的革命主张和经过，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势”，“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如国人发奋自雄，不难“突驾日本”，“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

最后，孙中山满怀激情地指出：“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孙中山的演说给林伯渠印象最深刻的是：孙“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他

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岂不是最愚蠢的事吗！’”

听了孙中山的演说，林伯渠“觉得很对”，心中豁然开朗，一下子他就解决了长期以来蒙混不清的问题。他感到孙中山有一种宏伟的气魄，视野广阔，比同时代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平时听陈天华称赞孙中山是“英雄中的英雄”，见章士钊《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滔天著，即《孙中山传》）的译序中颂扬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果然并非虚语。他拥护孙中山要救中国就必须革清朝君主专制的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并要求参加他领导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林老谈辛亥革命》。

林伯渠与陈瑾昆教授谈话1946年6月15日。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别庄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加盟的有留日中国学生一百多人。会上公举孙中山为总理，其下设执行、评议和司法三部，黄兴任执行部庶务（相当于副总理），陈天华任书记，程家桢、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推汪兆铭为部长，田桐、胡汉民、朱执信、吴永珊（玉章）、覃振、胡瑛等为议员；司法部由宋教仁任检察长，张继等任判事。会议正式通过同盟会章程，确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时成立各省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上述同盟会的负责人，后来大都和林伯渠发生过密切关系或者打过交道。

林伯渠原和黄兴、宋教仁熟识，他们两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起点，从此他便踏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

清政府得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东京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如芒刺在背，火灼油煎，便秘密向日本驻华公使要求共同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日本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颁布所谓《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中国留日学生称之为“取缔规程”），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公、私立学校入学或转学时，必须持有清廷公使馆的介绍书方准入学；中国留学生必须居住学校宿舍；凡因“性行不良”而被开除的中国留学生，各校不得使之复学。这样一来，清政府就随时可以以“性行不良”为借口，串通日本当局，开除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国留学生，断绝他们在日本留学进行革命活动的机会。中国留学生因日本政府剥夺他们的居住自由和入学自由，群情愤激，上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向日本政府交涉，取消该项章程。结果上书请愿无效，反受日本报纸讥为“放纵卑劣”。日本一国国会议员甚至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圆心，划成三个不同半径的圆周，第一个圆周，包括韩国等地；第二个圆周，包括中国东三省；第三个圆周则包括全中国在内。这些极端污辱我国留学生人格和国家尊严的帝国主义分子言论，如同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无比愤慨。他们决定以全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程”。十二月四日，首先罢学的是林伯渠所在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他们

分头写信给日本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敦促大家一致罢学归国，以存国格。第二天起来响应的是以秋瑾为首的东京近百名女留学生。秋瑾在青山女子实践学校肄业，为了坚持罢学归国，她动手殴打了学校翻译范源濂，并到处演说，痛斥日本政府的侵略和清廷的卖国，每每声泪俱下，感人至深。林伯渠对这位年龄比他大九岁的“鉴湖女侠”，十分敬佩。第三、四天，其他学校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成城学校等也都相继罢学。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正当罢学归国浪潮迅猛发展的时候，十二月八日，忽然发生同盟会的著名革命宣传家、《警世钟》和《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在横滨大森湾投海自杀的事件。陈天华有感于祖国的积弱，又慨于日本报纸对国人的嘲讽侮辱，诚恐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行动不能一致，反招人耻笑，因此写下遗书，以死劝勉大家“力学爱国”。

《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页。

陈天华蹈海自尽，更加激发了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决心。不到两个月，归国的达二千多人。当时东京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力主罢学归国，在国内自行办学，宋教仁、田桐、胡瑛、秋瑾、刘道一、廖仲恺、姚宏业和林伯渠等属于这一派。他们组成各校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处理一切罢学归国事宜，会长为胡瑛。联合会制定了四条自治规则，要求罢学学生遵守秩序，以免日警干涉，并派出纠察员持手枪、短刀看守各校校门，阻止中国留学生上学。另一派为胡汉民、汪精卫等，组织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他们被罢学归国派认为留恋个人官费，不顾公义。这派人数较少。两派在留日学生总会馆，争辩非常激烈。林伯渠与秋瑾、刘道一、姚宏业等于一九一五年底相继回国。其后孙中山由美国来电，表示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归国。原因是担心同盟会员回国后，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同时也怕动摇刚在东京创刊的《民报》的基础。宋教仁、胡瑛等接到电报后，于是终止了集体罢学归国的行动。日本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也对“取缔规程”的实施，作了让步。一些学业未完成的归国留学生，又陆续重返日本复学。

林伯渠已在弘文学院念完了师范科的课程。一九一六年初，他被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往湖南长沙办理振楚学堂，兼在西路公学任职。这两家学堂都是革命党人用以掩护地下活动的机关。他负责与潜往桂林策动巡防营起义的黄兴及在湘西联络会党的谭人凤通讯联系，兼管《民报》的秘密发行工作。这时，湖南早期留日学生禹之谟和陈家鼎等已在长沙成立同盟会湖南分会，弘文学院的湖南同学仇鳌、赵缭等也以学校为据点，在湘阴和长沙开展革命活动。林伯渠分别与他们取得联系，在工作上互相呼应。这年春夏间，恰值长江中下游淫雨成灾，衡州、零陵、长沙、常德四府洪水淹死群众三、四万人，受灾者三、四十万人，灾情惨重，为二百多年来所未有，因此民情嗟怨，暗潮四伏，湖南革命烽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年五月，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程”返上海筹办中国公学的同盟会员姚宏业，感于官绅的阻扼，收不到各地筹款，且见国事日非，愤而投黄浦江自尽。姚宏业是林伯渠在弘文学院的同龄同乡，同奉东京同盟会总部之命回国办学。对于姚宏业和陈天华的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和惋惜的。湖南同盟会为了表彰陈、姚二烈士的爱国精神，藉慰英魂，由湖南教育会兼商会会长禹之谟和陈家鼎、宁调元、覃振等出面倡议，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两烈

士于长沙岳麓山，以志纪念，并派苏鹏为代表，赴日本和上海，运陈、姚两烈士的灵柩回湖南。五月二十九日，长沙公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学生以及各界群众一万余人，身穿缟素，手执白旗，为陈、姚二烈士送殡。队伍长达十余里，轰动全城，观者路塞，军警林立，不敢干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领导湖南人民举行的政治大示威。林伯渠率领振楚学堂和西路公学的师生，积极参与了这次斗争。

湖南政府因禁阻陈、姚公葬未能得逞，恼羞成怒，于八月间逮捕了禹之谟，严刑逼供，数月后处以绞刑，禹之谟壮烈牺牲。宁调元、苏鹏等受通缉，逃亡外省。在这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等回湖南，运动军队和会党，组织萍浏醴起义。

萍乡、醴陵、浏阳三县为湘赣两省交界地区，向来是哥老会的别支——洪江会会众聚集的渊藪。自一九〇四年秋华兴会在长沙发动起义失败，洪江会首领马福益被杀害后，洪江会会众更加痛恨清政府，因此一经刘道一等号召起义，他们就风起云从，积极拥护，但由于会党山堂林立，互不统属，组织不严，容易泄密。一九〇六年十月初，起义日期还没有到来，萍、浏、醴三县交界处的麻石等地已受到官兵巡防营的袭击，会党头目数人被杀。十二月萍、浏、醴起义全面爆发，也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敌军势大，很快就失败了。同盟会的青年英杰刘道一不幸在长沙被捕，遇害于浏阳门外。

这年的重阳节，林伯渠和友人登临岳麓山，凭吊这天灾人祸频仍、刚刚经过水淹血渍的破碎山河，到处枫林红叶，宛如死难者的鲜血洒落万岭千山，黄酒茱萸，难招忠魂。

因念神州陆沉，何日重振？他不禁百感丛生，泪下如雨，归来写成《游爱晚亭》七律一首。诗云：

到处枫林压酒痕，十分景色赛天荪。
千山洒遍杜鹃血，一缕难招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锦绣，频将泪雨洗乾坤。
兰成亦有关河感，愁看江南老树村。

荪：香草，亦名荃。《楚辞·九歌·湘君》：“荪桡兮兰旌。”天荪：指天上的香草。

帝子魂：帝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均嫁给舜。舜出巡，死于苍梧（在广西）之野，娥皇、女英悲痛至极，死于湘江。

兰成：南北朝时梁朝人庾信，小字兰成，出使西魏，被留不放。梁亡，作“哀江南赋”，怀念乡关。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页。

后来他觉得这首诗的结尾，调子未免过于低沉，因又将它改成“不信沉沙戟已深”，坚信革命必将再起。

这年八月间，林鸿仪病逝。林伯渠奔丧回临澧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便回长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从事边疆革命

一九〇七年，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黄兴、宋教仁等，鉴于长江流域起义屡遭挫折，清廷在东北边疆统治较弱，而该处地广人稀，物产丰富，日俄两帝国均虎视眈眈，日谋侵夺，因而有“边疆革命”的计划。从一九〇五年起，宋教仁就关心东三省的形势，曾收集资料写成《二十世纪之梁山泊》，介绍东北“马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上发表。他从日本报刊有关记载中，了解到东北“马贼”不下十余万人。其中有个绰号“韩边外”的山东人，在延吉附近夹皮沟一带，聚众数万。韩死后，由其孙韩登举继承祖业，慷慨好客，曾为保乡卫国，组织“正义军”，与入侵该地的日俄军队作战，有可能成为反清革命的同盟者。这年三月，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决定由宋教仁、白逾桓与曾在东北“马贼”中当头目多年的日本退伍军曹古川清一同前往安东，联络东北“马贼”和发展当地同盟会的组织，中心目标则是联络韩登举，谋在夹皮沟一带建立边疆革命的根据地。在宋教仁看来，夹皮沟纵横数百里，韩登举的统治根深蒂固，如运动有效，最高理想就是掌握它的大权，兴办教育，振兴实业，训练陆军，广招人才，以图将来远大的发展；如做不到这一步，退而求其次，则要掌握当地的实业权，发展生产，兴办实业，以达到经济上富裕的目的；如上中两策都做不到，则采取下策，只要求说服他多多捐助革命资金。这一做法不须花很多时间，只要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人去就可以了。

宋教仁等于一九〇七年四月间到达安东（今丹东）后，即致函大孤山“马贼”李逢春、朱二角、蓝黑牙等，号召他们统集辽河东西、黑水南北两岸的义军，合为一团，共谋起义。他认为，如果起义军西渡山海关，永平就无法防守；如果南出喜峰口，北京就告危急。若要为革命干一番大事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而且南方有同盟会党徒“不下数十万众”，若“南北交攻”，就不难制清廷的致命。

《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249、356—357页。

与此同时，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通知在湖南的林伯渠，设法前往东北，共同策划边疆革命的进行；又派吴崑由日本赴安东，协助宋教仁等工作。林伯渠接到通知后，为将深入满清皇族的老巢干革命而感到十分高兴。这时正值江苏臬台朱家宝调任东北吉林巡抚，要找懂得办新教育的人才同往。朱是云南人，翰林出身，为人较正派。林伯渠通过在朱幕下当文案的亲戚汪德植的介绍，到南京见朱，很受重视，遂被任为随员，同往吉林。同行的还有一位姓周的同盟会员。他们两人的任务是调查东北边疆形势，联络绿林豪杰，配合宋教仁等，在东北建立据点，进行边疆革命。

林伯渠于一九〇七年春末到达南京，舟车劳顿之余，把酒临江，纵览石头城这座六朝故都，山环水抱，龙蟠虎踞，委实壮观。转念此次北行，深信同盟会虽然多次起义失败，今后革命必将如春草重生，终有推倒清朝反动统治的一日；值此千载难逢的时机，男儿大丈夫，正应擒螭斩鳄，为国家民族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岂可自命清高，甘老泉石！他想到这里，不禁壮怀慷慨，诗兴勃发，走笔写成《过金陵》七律一首。诗云：

冬冬更鼓逼岩城，露冷征衫酒微醺。
隐约山川龙虎踞，频频车马剑书轻。
乘时未许甘泉石，入海还期斩鳄鲸。
莫为六朝空叹息，行看原上草重生。

岩城：即石头城，指南京。

六朝：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都曾在南京建都。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2页。

这年秋天，林伯渠到达吉林省会后，巡抚朱家宝把他交给提学使吴鲁安排工作。林伯渠为了避免引起官方的注意，最初仅报了“湖南学堂学生”的学历，以“精通业务”被委派为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同时被委派的该所监督，是优级师范毕业生杨锜铄。

劝学所原是清朝末年停止科举考试后举办州县地方自治、为劝导民间兴办学堂而设的机关。由于吉林改设行省建制不久，县治多未分立，因特设省劝学总所为各府、厅、州、县办劝学所的示范，地点设在省城巴尔虎门内正黄旗官房，其中附设宣讲所、劝学宣讲员养成所、阅报所、教育研究会、绅董接待所等。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于十月初正式成立，林伯渠借办学为掩护，宣传革命，他与杨锜铄在给提学使吴鲁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兴办新学，作育人才的重要。呈文写道：

“窃维列强竞争，时事日迫，兵战、商战、实业战，要皆根本于学战。国势强弱，视学务盛衰为转移。东西洋学校林立，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下至隶竖、走卒，皆能手执一编而读之，灼知夫优胜劣败强存弱亡之机，故其国之兴也勃然。三省介乎日俄之间，森林遍野，矿产丰盈，土脉膏腴，沃壤千里，豺虎之俄，狼鹫之日，眈眈逐逐，各思攫为己有。三省殆，全局危。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兵战不可，商战不能，实业战则需时甚长，而有所不能待。推原其故，总由其士夫氓庶，安于固陋，罔知学问，仇视新学，逞言智识。学校不兴，教育不能普及，民智遂未由而开，长此浑朴，伊于胡底！是故学战之在今日，为必不可缓之图，而劝学宣讲各所，所由不可不立”。

这份呈文，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忧时的激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中肯的。

在《劝学总所兼宣讲所试办章程》中，林伯渠写道：“普及教育，传输文明，乃本所应有之责任。劝学则期吉林无地无学，无人不学而后止”，宣讲则除应讲有关教育宗旨以及停科举、兴学堂的政府文告以外，“举凡有关地方自治，改良社会，破除迷信之白话报纸，皆可随时宣讲。”“无论何人均准听讲，即衣服褴褛者，亦不宜拒绝”。

关于劝学、宣讲人员的选择，林伯渠在章程中规定：“皆须心地光明，志趣纯正，口齿灵便，声音宏亮，身无嗜好，通达时务者为合格。盖劝学宣讲，非通彻中外大势，时事利弊，我国积弱之原，富强根基端在何处，言之著著，切中肯綮，方能动听”。

清代吉林档案。

清代吉林档案。

劝学所设教育研究会，为当地中小学教员及有关教育人士共同商讨改进学校教育的场所。

其时吉林省会教育还很落后，新式学堂多未建立。城乡私塾五百余处，学童达七千余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亟待改良。在林伯渠主持下，将省城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区，各成立新式小学一所，同时在劝学所内设立便利贫民子弟半工半读的半日学堂一所，各小学和半日学堂一律由劝学所供应学童的纸、笔、墨。第二年春，又设简易师范一班，以培养小学师资。劝学所于各学区设劝学员，负责调查当地庙产、无益公捐、以及劝导商绅富户

捐款办学兼管理学校人事、经费等工作。又设调查员，周游各区，专门负责调查学校一切应兴、应革事宜，以资改进。林伯渠一方面通过办学，秘密宣传革命，培养革命人才，另一方面又常借检查各地办学的机会与当地的革命党人联系和发展同盟会会员。

正当林伯渠在吉林省会劝学总所开展工作的时候，宋教仁等在东北联络“马贼”起义的计划已遭挫折。先是，宋教仁等于一九〇七年的春夏间在安东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随后于八、九月间联络李逢春等绿林准备起义，派白逾桓、吴崑到碱厂招兵，不料古川清向清政府告密，致使白、吴两人被捕（后中途逃脱）。宋教仁逃往大连后，化名桃源宗介，与曾在《盛京时报》任主笔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徐镜心，前往吉林省会，组织木植公司，暗中与林伯渠等联络，密谋起义。徐镜心被安排在吉林高等小学教书，后来由于宋、徐被清政府通缉，无法立足，计划遂告流产。

同盟会辽东支部的重要成员张榕、吴禄贞等不赞成宋教仁依靠绿林“马贼”起义的策略，主张潜伏待机，在军界、教育界和联庄会中发展革命力量。因此宋教仁联络“马贼”起义失败后，林伯渠等同盟会员继续留在东北。

松本英纪：《宋教仁和间岛问题》，《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42—2546页。

这年九月初，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朝鲜后，妄图以所谓“间岛问题”为突破口，加紧入侵我东三省。日本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派遣陆军大佐斋藤季治郎率领日本军警和朝鲜反动组织“一进会”的首领金海龙等，进入我吉林省延吉厅境内，借名保护韩民，设立机构，滋生事端，阴谋霸占我延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获报后，以“延吉为三国势力角逐之地，东亚安危所系”，急忙奏请清政府委派原邮传部右丞陈昭常为吉林省边防督办、吴禄贞为会办，前往延吉厅与日人交涉。他还向清政府请准赏给夹皮沟练总韩登举参将衔，借以驾驭，以免为日本人利用。

“间岛”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出来的名词，指吉林省延吉地区。该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日本侵略者捏称“间岛”原属韩国，以此挑拨中朝关系，并为其出兵侵略制造借口。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

“间岛”问题的发生，使东北地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同盟会总部关于边疆革命的计划，一时不易进展。宋教仁、吴禄贞和林伯渠等同盟会员，都曾到过夹皮沟访问韩登举，受到热情的款待。宋教仁从韩的口中获悉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伪证，妄图侵占我延吉地区的阴谋，回到东京后，参考了大量图书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提供清政府，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间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协助吴禄贞收回了我国在这里的主权。林伯渠后来回忆访问夹皮沟的往事时说：

先是，一山东人混名韩边外者，光绪初年间到吉林南部挖药淘金，久而久之，在牡丹江南，延吉厅与桦甸县间，名南山沟子的一个区域（南北百余里，东西二、三百里），另立制度，类似一小王国（时日本报纸称为“东方秘密国”），有枪四、五千枝。日俄战时，双方都与之结好。我们寻到该地时，韩已死，由其孙韩登举继业，似已受政府招安。但他仍是江湖气概，招待我们住了几天，并介绍我们往哈尔滨、宽城子（长春）去找几个“马贼”头子接洽。

《林老谈辛亥革命》。

为了解边疆形势，林伯渠还到过长白山尾龙潭山风景区和敦化县境清始祖起兵誓师处的鄂达里台等地，他对东北边防的失固，清政府外交的庸懦，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延吉狗窃鼠偷式的入侵，感到无穷愤慨；同时对延边人民遭外敌的蹂躏，以及边疆革命的受挫，寄与满腔同情与惋惜。一九〇八年他写下了《游龙潭山》绝句三首和《游鄂达里台》律诗一首，充分反映了他当时忧国忧民的心情。

《游龙潭山》（录一）

龙潭铁锁久销沉，山鬼无灵扰夕阴。
眼见群芳消歇尽，何人重有惜花心。

《游鄂达里台》

故老争传鄂达里，登临却趁大寒时。
西来峻岭连天白，北走长江入海迟。
十里炊烟控朔漠，三边狗盗越雷池。
和戎尽有诸公策，满眼狐乌雨雪诗。

龙潭二句，指清政府边防不固，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清王朝在东北扰害人民。

群芳消歇：指东北进步势力受摧残。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页。

大寒：节气名，阳历1月20日或21日至2月2日或3日。

三边：指延吉地区，因与朝鲜、俄国接界，故称三边。狗盗：指日本侵略者。雷池：指国境线。

狐乌：指日、韩浪人。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页。

东三省的边疆革命虽然遭到挫折，但同盟会会员在东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吴禄贞出任吉林边务帮办，后又升任督办，握有一部分兵权，柏文蔚在吴幕下历任参谋及延吉厅屯田营标统。延吉厅地区原只有一所小学，朝鲜移民居当地居民的多数，他们的私塾常被日本军警和“一进会”强迫脱离中国，归附日方。延吉厅在林伯渠、吴禄贞的帮助下，成立了学务公所和劝学所兼宣讲所，并于晖春等地设（高、初）两等小学，于各乡设初等小学；将朝鲜移民所办的蒙养学校一律改为官立小学，对朝鲜移民的子女入学，给予特别优待，从而得到朝鲜移民的欢迎和倾心信服，加强了国防安全。

林伯渠办学优异的才能和对日本情事的熟悉，终于暴露了他留学日本的经历。一九〇八年清政府吉林省档案的记载，就改称他为“日本毕业学生林祖涵”。一九〇八年七月，朱家宝调职安徽，陈昭常升任吉林巡抚，林伯渠也被调到吉林提学司图书科当科员，名义上仍兼劝学总所会办。十月，又调任提学司普通科一等科员。普通科掌管各级师范学堂、中等学堂一切事务及通俗教育和博物馆等。

一九〇九年，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到东北进行革命活动，以任吉林巡抚陈昭常（与廖同乡）的翻译职务作掩护。林伯渠在东京留学参加同盟会期间，与廖仲恺已见过面，此次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两人同在省城，常相往来，或纵谈国家大事，或密商革命方略，志同道合，自此结成肝胆之交。这年九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由清廷作出某些让步后，收回延吉主权，保全了祖国神圣的领土。除了吴禄贞在延吉边防对日坚持强硬态度，功不可没外，宋教仁与廖仲恺、林伯渠等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

程度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一一年，林伯渠童年时代由父母指腹为婚的原配夫人司马殿英在家乡病逝。这一年他和吉林省会一位小学教师伍复明结婚。伍是南京人氏，随家到吉林工作。婚后一年生下女儿林秉衡。

一九一一年五月，长春府中学堂学生刘某，因清政府苛征租税与蒙租相差役口角遭殴，引起该校学生不平，三十余人奔往蒙租柜，捣毁门窗，与差役互殴，打伤蒙员数人。

为此吉林提学使屡电该校监督开除闹事学生，交长春府看管，听候惩办。该校学生不服，全体罢课。提学司委派省视学詹钰与林伯渠前往查办。林伯渠到长春后，极力保全学生，说服詹钰共同复电提学使，“力能转环，必求一完善之策以处之”，并嘱长春绅缙们出面向省方求情，结果使八十余名学生得以保全学籍。这次长春青年学生的反苛租斗争，在吉林全省颇有影响，其后东北人民抗租抗税斗争不断扩大，至辛亥革命时，发展为武装起义。这年秋初，林伯渠还为在吉林民政署工作的湘西留日同学程崇实编纂的《法学大辞典》作了校订。该书在吉林印行，对普及资产阶级法律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林伯渠在东北工作整整四年时间，同盟会边疆革命计划的成就虽不尽理想，却也为日后东北的光复，打下了基础，约于一九一一年八月，林伯渠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召，回到上海工作。

据清政府吉林省档案，吉林提学使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一日委派林祖涵为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一九一一年八月十日，双阳县呈报更正《管理教员一览表》上有林伯渠亲笔批语，可见林伯渠离开吉林在这年八月十日以后，前后整整四年。

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

中国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以边疆革命未著成效，中央革命又不易实行，乃转移注意力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认为该处天灾频仍，保路风潮叠起，官逼民反，人心思变，且有新军、会党可供利用，发动起义，较易成功。因此于一九一一年在东京召开十一省区同盟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筹画起义的领导机关。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陈其美、宋教仁等为总务干事，以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军队和会党，首先发动两湖起义。由谭人凤前往湖北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等在长沙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等组织四川分会。

林伯渠由吉林回到上海后，被同盟会中部总会派往湘西从事运动西路巡防营的工作。

当时湖南共有二十个巡防营，分五路驻扎各县。湘西驻有八个营，其中驻在常德的三个营。巡防营中上层军官受旧军队封建积习影响较深，驻守长沙的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尤其狡猾顽固。但在下级官佐和士兵中，却已有不少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

林伯渠和廖湘芸一道赴常德从事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各营文书等下级官佐多是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时的同学，一经接头串连和宣传爱国反清的道理，他们很快就同意接受白布条，准备届时起义。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心大为振奋。湖南首先于十月二十二日响应起义。起义军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很快就占领长沙，杀了顽固分子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湖南巡抚余诚格弃城逃走。随即成立以焦、陈二人为正副都督的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通电全省，号召各属响应起义，同时委派杨任为西路招讨使，带领同盟会会员和武装士兵首余人于十月三十一日抵常德。常德巡防营统领陈斌生见大势已去，部下不稳，只得同意起义，西路各县，就此光复。

湖南起义胜利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片新气象。人们纷纷剪掉象征满清统治的发辫，商民等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义师，长沙全城举行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经验，丧失了对潜在的旧势力的警惕性，革命政权建立不满十天，立宪派就乘湖南革命部队出发援鄂、长沙防务空虚之机，发动流血政变，于十月三十一日诱杀了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拥谭延闿为都督。谭将杀害焦、陈的责任归罪于乱兵，又以猫哭老鼠的手段，厚殓二烈士遗体，令各机关下半旗致哀，甚至扬言要为焦、陈铸造纪念铜像。常德旧势力的代表陈斌生，也于十一月三日杀害了西路招讨使杨任等十余位同盟会会员，杨等且被剖心祭奠黄忠浩；澧州会党起义反抗也被镇压下去。到年底，立宪派几乎攫取了湖南省各属起义取得的全部革命果实，革命党人嗟叹：“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林伯渠对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等人的被杀害，感到痛心疾首。他不能再留在长沙，便偕同几位同盟会会员前往上海。十二月初，江浙革命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转赴南京。

这个月底，孙中山由海外回到南京，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职。但是，孙中山上任不到五十天就被迫妥协，让位给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辛亥革命在湖南及全国的失败，对林伯渠震动很大。

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湖南独立时，“秩序较紊乱，军政府什么人都可进入。

一班旧派人，一方面看不惯，一方面眼红。于是以咨议局及教育会为中心，长沙的豪绅地主秘密集议，谋夺取政权。

新军五十标梅某阳虽赞成革命，但思想守旧，由他

诱致焦、陈‘会商要事’（纵火烧和丰火柴公司，讹言有奸细），要陈副都督出城弹压，于途中突然杀之，并杀焦于旧抚署前。

……谭延闿就做了都督。湖南独立，仅一形式而已。

这是革命初起时，不懂得迅速建立正规政权的一个教训。”

关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歧，对袁世凯妥协经过，林伯渠回忆说：

袁世凯当时拥有北洋重兵，实权在握，一面籍革命党之势迫清廷退位，另一面又挟清廷向革命党要大总统。

中山先生是不赞成向袁世凯妥协的，主张培养和扩张南方革命军力量，“犁庭扫穴”，打到北京去，扫除一切旧东西。但是宋教仁偏要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这套上层机构；主张国会竞选；同盟

会改组，扩大基础，成为国会内最大政党（民元春，由宋主持，将许多官僚党派合并于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同盟会成分遂起了根本变化）；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黄克强也看不透，觉得不应再起战争，糜烂人民，还是以培养干部，兴办实业为上策。而同盟会当时许多党员，都抱着帝制一倒，万事大吉的见解，或者“功成告退”，或者忙于做官。而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妥协，……极力主张将总统让与袁世凯。……反责中山先生不顾全大局，提倡所谓“六不做”（不做官、不做议员、不治产等），完全放弃了政权斗争。整个形势如此，中山先生以及少数赞成他的主张的人，被迫陷于孤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迄今回忆，仍令人痛心不已。

《林老谈辛亥革命》。

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由于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力图组织责任内阁，限制、分享袁世凯的权力。醉心独裁、日夜做着皇帝梦的野心家袁世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派遣刺客在上海暗杀了宋教仁，因此又爆发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

在国民党人的压力下，湖南都督谭延闿于七月间宣布湖南独立，暗中却向袁世凯、黎元洪表示“如湖南独立，即服毒自尽”。黎元洪则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救平”。当时国民党人犹以谭延闿为湖南讨袁军总司令，任命程子楷为讨袁第一军司令，蒋翊武为鄂豫招抚使，邹永成为湘鄂联军第三军军长，决定程子楷与邹永成率部进驻岳州。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他的堂兄林修梅也在这里任营长。

《黎大总统政书》卷26。

林伯渠对自己的入盟介绍人宋教仁的惨遭杀害，满怀悲愤。他和林修梅兄弟两人都是孙中山武装讨袁主张的积极支持者。但是，由于谭延闿就任都督后大量裁减新军，湖南兵微将寡，缺乏实力，加上南方各省对出师讨袁看法不一，岳州的军队只能采取守势，效法洪秀全当年在田家镇铁锁横江的故智，载石沉船，以阻北军的渡江进袭。

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二次革命的首要人物，相继于七月底、八月初逃亡日本，林伯渠也受到通缉，再次浮槎东渡。

林伯渠第二次来到东京，先后进入日华学校、中央大学、正则学校和东亚商业学校学习。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要到两、三所学校听课，午前上日华，午后去中央，夜间到正则。除了学习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社会学、统计学、簿记学、国际法、宪法、民刑法外，兼学日文和英文，还抽出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有些译文还寄回湖南在《沅湘报》上发表。

二次革命失败，使大多数逃亡日本的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林伯渠体弱多病，经常服药，且“心境恶劣、精神昏瞶”，也一度陷入迷茫之中。他在日记中写道：“抚今思昔，惶悚殊深。盖马齿加长，而知识愈陋；外感太棼，而德业不增。茫茫前路，直不知税驾何所也”。但是，疾病缠身和国家多难、山河日非的无限忧思，并没有把他压倒。他很快就警醒过来，努力进行自我鞭策。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横逆困穷，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交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勉励自己“从此前进、力戒悠忽”。不过，他这时仍然是向儒家学说王船山哲学找寻修心养性之道，自然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17页,30页,48、46页。

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为了继续革命,决定在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以图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当时规定,凡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党员,都要打手印,宣誓效忠于孙中山,许多老党员对此表示反对。廖仲恺和林修梅、林伯渠等少数同志为了革命能够进行下去,不拘小节,毅然打手印,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对林氏兄弟的忠心耿耿,极为感动,曾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大有所为。”从此对林伯渠、林修梅异常器重。

《朱蕴山回忆》(未刊稿),1979年。

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妄图独占中国。急欲爬上皇帝宝座的袁世凯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俯首屈从。孙中山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氏窃国的滔天罪行,号召各地革命党人起义讨袁。林伯渠被派回国,到“汉口长沙组织反袁机关”。其后,他又被派任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党务科长,从事反袁组织工作。同年年底返回日本。

其时,在东京有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湖南留日学生林伯渠、易象等人发起组织的反袁团体乙卯学会。两个学会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会员一百余人,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易象、容伯挺等为干事。李大钊比林伯渠小三岁。他于一九一三年冬来到日本东京,次年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是该校经济学教授、《资本论》日译者河上肇的学生。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间,他在早稻田大学担任经济学会责任干事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归国请愿团的文牍干事。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是当时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著名反日爱国文件。林伯渠对李大钊一见如故、结为知交。林伯渠特别重视经济学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李大钊的影响。由于神州学会反袁斗争的关系,他还结识了广东留日学生容伯挺等人。

《林伯渠自传》(1941年),《人物》,1982年第2期。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取消共和,悍然称帝。曾任云南都督的湖南邵阳人蔡锷,由北京出走昆明,与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程潜、林修梅等也于一九一六年初返国,召集旧部组织湖南护国军,于同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靖县召开有四十八县代表参加的湖南人民讨袁大会,宣布湖南独立,推举程潜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林修梅为参谋长。林伯渠于三月四日由日本启程返湖南。途经上海,因痔疮发作,不便行动,入医院割治,出院后即奔赴湘南,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部参议。

这期间湖南革命党和工农群众,纷纷起义,永兴、武冈、湘乡、保靖、新化、衡山等地,捷报频传,吓得袁世凯的走卒、湖南都督汤芑铭如坐针毡,急调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部守卫长沙。不料郭人漳野心勃勃,阴谋夺取省城地盘,与汤火并;后经日本领事调解,才停战言和,共同演出假独立丑剧。汤芑铭的假独立,虽然成了袁世凯的“送命汤”(袁世凯于六月六日活活被气死),却未能阻止湖南护国军对长沙的进攻。谭延闿趁机诱说汤芑铭拼凑原有湘军巡防营成立湖南护国军第一军,以谭的旧部曾继梧为总司令,赵恒惕、陈复初、刘建藩等为梯团长。谭随即率部与程潜合力于七月初将汤芑铭逐出湖南。

林伯渠在这期间，为反袁驱汤奔走各方，备极艰险。后来，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自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午后起行，“此后奔走湘鄂，迄五月二十九日汤氏在湘宣布独立及汤氏七月五日之出走，皆危险时代，故不记。他日有暇，当略编政态变状与就中艰苦情形，备观览焉”。可惜以后林伯渠政务频繁，这一心愿未能实现。

《林伯渠日记》(湖南版)，第111页。

窃国大盗袁世凯于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职务，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八月四日委派谭延闿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二十日谭到长沙正式视事，林伯渠于九月初往上海请示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共商革命方略，后回湘出任省长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不久又代理政务厅长。这期间他在长沙，主持召开湖南神州学会筹备会，同覃振、龙璋等组织正谊社作为中华革命党在湖南的外围组织，团结各方力量，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参与湘南护法战役

一九一七年七月，皖系军阀段祺瑞，一方面暗中支持张勋和督军团叛乱，推翻民国，解散国会；另一方面又装模作样，在马厂誓师，把自己打扮成“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封为国务总理，并让直系军阀冯国璋取代黎元洪的总统职位。

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为此通电全国，揭露段祺瑞演出“假共和真复辟”的丑剧，率领一部分海军和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九月初组成护法军政府。孙中山被举为军政府大元帅，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副元帅（陆、唐均未就职）。中国政局由此再次出现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

湖南省地处要冲，为南北双方军事必争之地。段祺瑞重新登台后，旋即委派亲信傅良佐为湖南督军。自称“中立两面不讨好”的谭延闿，在交卸督军职务前，预先安排湘军将领刘建藩为零陵镇守使，用重金把原来亲北方的零陵镇守使望云亭骗往北京。当谭延闿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商讨傅良佐来湘的对策时，对谭心怀不满的湘军第二师师长陈复初，表态欢迎傅良佐，使其余将领默不敢言，独有林伯渠的堂兄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愤起抗争；并于会后移师衡阳准备与粤、桂、滇等自主省份联合，响应护法，以武力抵抗傅良佐督湘。

谭延闿卸任湘督，同时辞去省长职务；军民两署各官佐纷纷跟着辞职。林伯渠也辞去省长公署总务科长兼代政务厅长的职务。他递上辞呈后，还未办交卸的谭延闿，却委派他和教育科长熊崇煦，交涉股长陈寅恪三人为研究员赴美国考察经济和教育。林伯渠表面上接受了委令，领取了出国旅费，还和熊、陈两人学了几天英语，暗地里却和林修梅、刘建藩、覃振、易象，以及林支宇等中华革命党人商定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衡阳、零陵发动起义。八月中旬，林伯渠先叫人把家眷送回临澧老家，自己在办完省署移交工作后，也回临澧省亲，以便就近了解湘西形势，等候衡阳、零陵起义消息。

后来林、熊二人均未出国，把旅费退还省署。

九月十三日，傅良佐下令撤换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并派员前往接任。刘、林二人遂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全国，宣布湘南二十四县自主，与段祺瑞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在通电中历数段祺瑞“阴怂张勋复辟”，“阳为讨逆兴兵”，“占据国家机关”，“借债诛锄异己”，“为国之殃，较袁尤甚”。通电还宣布湘南二十四县实行戒严，自后“一切军民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与此同时，刘、林二人还下令：湘南各县金融、交通，概责成县知事切实检查掌握，封存货币，不准外调。

衡阳、零陵宣布独立自主的第二天，林伯渠即由临澧老家束装就道，奔赴湘南。在广州处境艰难的孙中山，得悉林修梅、刘建藩起义护法，无比兴奋，即致电起义将领，表示嘉奖，并密派程潜、林支宇等由粤北入湘南，协助起义军作战。程潜被举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支宇为湘南民政处长，林伯渠为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不久，林伯渠又被派赴广州向军政府孙大元帅汇报起义经过，并请孙敦促粤桂两省，速即出兵湘南，支援义军作战。孙中山除力促陆荣廷出兵外，还于十月十七日委派林伯渠为湖南劳军使，到湘南前线，慰问起义将士，借以鼓舞士气。

傅良佐在长沙接获湘南起义的消息后，一面宣布长沙戒严，一面调派第一师代理师长李佑文，率所辖第一旅向衡山进兵。不料第一师官兵在起义军“湖南人不打湖南人”的宣传攻势下，纷纷倒戈，整营整营的投奔起义军。李佑文吓得星夜逃命，只身走向长沙。傅良佐闻前线兵变，仓皇调北军南下增援。九月底，傅又令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挟三万余人的优势兵力，向仅有五千余人的起义军发起进攻。义军零陵副司令黄岱不幸战死，衡阳、宝庆相继失陷。陆荣廷眼见北军快要打过粤、桂边界，危及他的统治，才于十月下旬下令出师援湘，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任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统领马济、韦荣昌等粤、桂军万余人分道入湘。起义军声势复振，接连收复衡阳、宝庆等地。

十一月三日，林伯渠与覃振、易象等由广州到达衡阳。林伯渠随即奔赴前线，代表军政府孙大元帅慰问作战将士，并于数日后致电孙中山，报告起义军近日作战连获胜利的消息，转达程潜、林支宇等将领感谢慰问之意。电文如下：

广州孙大元帅钧鉴：

祖涵江（三）日抵衡，晤程总司令、林处长（支

宇）转达尊意，极为感谢。我军由衡山、宝庆、攸县进攻，连战皆捷。商民安堵如常，特此电闻，林祖涵叩。

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6日。

粤桂军出师援湘后，湘南战局陷于胶着状态。这时直系军阀代总统冯国璋和江苏督军李纯等，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因主张和平解决南方战事，而与受日本帝国主义扶掖的皖系军阀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日深。在湘南前线作战的北军王汝贤、范国璋本属直系，见战局失利，不愿为傅良佐火中取栗，将所率部队从前线撤至株洲，企图借居间调停与南军和好，取傅良佐湘督而代之。因此，王、范于十一月十四日通电停战，声称“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此次湘南自主，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

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自应双方停战”。

《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365页。

通电发出后，吓得傅良佐汗流浃背，连夜与省长周肇祥等新任官员，由长沙逃往岳阳，而由王汝贤代行督军职务。当北军后撤时，起义军乘势进攻，北军溃不成军，不过几天，王汝贤、范国璋只好继傅良佐之后，亦逃往岳阳。国务总理段祺瑞也因此而再次被迫下台。

十一月二十日，程潜率起义军进入长沙。湖南省议会、商会、教育会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推举谭浩明为湖南省督军，程潜为省长，林伯渠为省署财政厅厅长，易象为政务厅长。时谭浩明仍逗留衡阳，不愿就职。不到一月，程潜即被桂系及谭延闿派排挤，辞去省长职务，专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出驻湘阴新市。十二月中旬，谭浩明来到长沙，以联军总司令名义兼摄军、民两政，决定不再设督军、省长，改行三厅制（军务、民政、财政），以桂系参谋长陈继祖为军务厅长，前国民党湖南支部长、亲桂系的刘岳峙为民政厅长，林伯渠仍任财政厅厅长。林伯渠在谭延闿督湘时，曾筹画全省财务，湘南起义之初，又协助湘南政务处长林支宇筹措军费，由商会发行一元、五元、十元货币，暂不兑换，军民一律通行，不得低折；通令部队保护商贾正常贸易，不准随意扣留非关军事物资。这些措施，得到商民的拥护，保障了市场的稳定和战争的供给。谭浩明原先想委任林支宇为财政厅厅长，借此分化湖南革命势力，因林支宇坚不接受，才留任林伯渠为财政厅厅长，林伯渠为顾全西南护法大局，终于勉为其难。

这时，湖南形势复杂，财政十分支绌。除岳阳以北的湘鄂边境，仍为数万北军占据外，南军又有湘南护法军、桂军、粤军以及湘西等地各种杂牌军之分，总数不下五万余人。虽号称联军，实则各自为政，除林修梅旅等少数护法部队纪律较好外，其余大部均自行就地收捐截税，强提银行、厘局存款，甚或勒索商民，打家劫舍。北军所过的战区，更是奸淫烧杀，十室九空，尸横道路，臭气熏腾，有些村镇不见人烟。在这种战争环境下，筹办财政，自然十分艰难。林伯渠在初任财政厅厅长时，曾写过一份呈文给省长程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困难情况。文中说：

缘军兴以来，人心惶恐，厘金则税源枯竭，田赋及各项杂税，商民亦观望不前；且各路军饷，往往随地取求，其间假借名义，勒索款项者，遂所不免，甚至地方痞徒，乘机肆抢，正供所入，损失弥多。近如益阳、安化、宁乡、石门、桃源等县知事公署，及益阳三汊矶、靖港、靳江河、壘、南华、澧、安各厘金征收局，并湖南银行之常德、益阳、安化等处分行支店，或被勒提，或遭劫掠，损失公款，警报纷来，其中由军队迳赴县局提用者有之，由县局已解银行支店或起解在途被兵提去者亦有之。似此情形，各县局即能多所征收，亦无补公家之毫末。如分行支店受此打击，多至不能营业，金融停滞，更觉险象环生。况查各县局相距银行支店较远之处，征存赋税，因道途不靖，未能起解者，尚复不少。加以各水警署向泊各厘局护卡巡船，近亦因故，纷离汛局，款尤旦夕可危。坐此各种原因，以至总行实收之款，日益寥寥，应付奇难，几等无源之水。

林伯渠同情劳动人民，关心百姓疾苦，生活朴素，廉洁奉公。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听母亲提到父亲当财政厅厅长，就是给她买过一匹省青布，

此外什么也没有。”送礼物来的客人准会倒霉，总是受到她父亲训斥一通，然后要听差抱着礼物随客人一起送回去。

在桂系谭浩明的干预下，财政厅长更不好做。当时报纸曾有这样的记载：“林君目睹湘省财政如沧海横流，沛然莫能御，光洋每元竟涨至五千左右，汉汇汉银一千两需湘纸一万一千两，现货来源断绝，货币愈发愈多，以至百货腾贵，农泣于野，商呼于市，补救乏术，坐视不忍，诚难乎其财政厅长矣，故亦提出辞职书，联帅亦予慰留。”

《湖南大公报》，1917年12月7日第7版。

上海《民国日报》，1918年1月16日第6版。

一九一七年底，湖南战场南北两军虽然暂时停止了战斗，但却没有达成协议。一九一八年初，皖系军阀张敬尧通电主战；军政府孙中山和湘军将领也力主进兵，把北军逐出湖南省境。一月二十七日，湖南护法军攻克岳阳名城。北军在撤退时，纵火烧城，死伤居民二、三千人，大部分店铺民房化为灰烬。

这期间，段祺瑞已向日本借得巨额款项，直系也不甘心于他们的部下王汝贤、范国璋在湘被逐，直皖两系再度合伙，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部署四路兵马，大举进攻湖南。

一路由曹錕率领吴佩孚的第三师等居中统筹；一路由张敬尧所部第七师进攻岳阳；一路由张怀芝率领杂牌军从江西侧攻湘东；一路由吴光新率领卢金山师和冯玉祥旅由沙市进袭湘西。四路北军号称四十余万人，而湘、桂、粤联军合计不过五万余人，众寡悬殊，势难抵敌。三月间，岳阳、长沙相继为北军占领。程潜、林修梅等退守衡阳，力图固守衡州，挡住北军精锐吴佩孚部队的进攻，而以赵恒惕、刘建藩部从右翼袭击北军的薄弱环节张怀芝部。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林伯渠随同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军务、民政厅长等乘船撤离长沙，经湘潭抵衡阳。在衡阳，他和民政处长林支宇、衡阳道尹陈焕南、前政务厅长易象，国会议员王恒等一道为部队筹措粮饷，策划守城工作。王恒是江西人，久羨衡州名胜和南岳山水，几次邀约林伯渠同游，终因军务倥偬，未能成行。四月二十一日，吴佩孚兵临衡阳城下，林伯渠等又撤往耒阳、郴州。

正当衡阳失守的时候，刘建藩部在攸县向张怀芝部发动攻势，连克攸县、醴陵、株州，前锋直薄易家湾，离长沙仅数十里。北军望风披靡，长沙旦夕可下。五月一日，刘建藩夜雨抢渡白石港，不幸落水身亡。起义军遽然失去大将，一时军心混乱，遂转胜为败。北军复陷株州、醴陵。醴陵经北军轮番烧掠，疮痍遍地，血肉成丘，湖南善后协会一九一九年编纂的《湘灾纪略》称：全县战事结束后“仅遗二十八人”，虽或言过其实，但也可见兵灾之惨重。

北军攻陷醴陵后，谭浩明退回广西，吴佩孚进占耒阳，段祺瑞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入驻长沙。吴佩孚以自己功高赏小，督军位置落给别人，愤愤不平，因而通电主和。

护法军也势疲力竭，难以反攻，六月以后双方达成协议，划界停战。

林伯渠于同年五月十五日由耒阳到达广州，向孙中山军政府汇报湘南战况和筹商护法军今后发展办法。这时，广州一部分国会议员和海军为桂系威迫利诱，正在进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在林伯渠到达广州的前三天，广东督军莫荣新还逮捕了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杀害了陆军次长崔文藻。孙中

山被迫向非常国会辞职，通电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为一丘之貉”，并于五月二十一日离开广州，经日本到上海。对于桂系军阀的反动阴谋和吴景濂等一部分国会议员的无耻行径，林伯渠感到十分愤懑，但在广州逆流汹涌的形势下，只好极力隐忍，等待时机，徐图打开新的局面。

恰巧这时王恒也到了广州，故友重逢，格外欢喜。林伯渠从东亚酒店迁出，和王恒一起住在名利栈。恰逢旅日留学生中华救国团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代表张有相、李大年来到广州，发动各校学生组织联合会，进行反日救国宣传。林伯渠完全赞同救国团关于中等以上学校成立永久性的救亡组织的主张，认为学生除了用功读书之外，还应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去唤醒民众，以救危亡。但王恒却认为学生本份是读书，读好书就是救国，临时做做爱国宣传就可以了，不必设立什么常设机关，免得影响学业。两人争论得很热烈，可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两年后王恒写文章还提起这件事，说：“后来经过年余，吾友伯渠的意见还是与我相反”。

王恒：《学生救国运动为什么失败呢？》，《革新评论》1卷3号，1920年6月1日。

在广州，林伯渠还见到了留日时代的老朋友，一九一六年在日本一起参加反袁组织神州学会的容伯挺。他正在主办一家对南方颇有影响的大型日报《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和编辑大都是留日归国学生，其中有杨匏安等人。他们努力于开展新文化运动，报道了不少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林伯渠为这次南行结识了一批热心救国和新文化运动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在广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湘南，协助程潜、林修梅处理政务，整军经武，以图护法军东山再起。

这时谭延闿正在运动回湖南。谭延闿自年前卸任湘督后，一直蛰居上海，傅良佐被逐后，北京政府曾派他重任湖南督军，他见谭浩明率军入驻长沙，为讨好桂系起见，却表示不愿就职。后来见谭浩明退回广西，便急忙向日本商人弄到三十万元作回湘活动经费，并亲自前往广西找陆荣廷，表示愿回湖南收拾局面。陆荣廷担心吴佩孚的军队打进粤、桂两省来，也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同意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以缓和南北对峙的紧张局面。一九一八年七月，谭延闿来到永州，很快就与吴佩孚搭上关系，彼此信使不断往还。

同年十月初，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派出他的谋士白坚武从南京来到湘南活动。他先到衡阳会见吴佩孚，传达直系头子和英美等国外交使团关于实现南北和议的意向。十月底，白坚武又来到永州（零陵）会见谭延闿。由于白坚武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时的好友，又是孙中山视为主要敌人直系的密使，因此，林伯渠连续两次访问白坚武，以便了解他此行的意图。白坚武到永州的第四天，谭延闿和林伯渠邀他同游城西的朝阳洞。这是唐代文学大师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常来游览的胜境，洞分上下两洞，泉声潺潺，十分清幽。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对这里的景色曾有过生动的描述。白坚武边欣赏风景，边念起他的《衡永道中口占》诗来。诗云：

径石崎岖逶迤峰，万山千曲穴中通。

北南人地天为限，竖子穷兵气尚雄。

《白坚武日记》原稿。

诗中讥讽湘南起义将领是穷兵黩武的“竖子”，自诩他使吴佩孚与谭延闿“万山千曲穴中通”的勾结。林伯渠见谭延闿和白坚武正谈得十分投机，再同他讲护法大道理也是徒然，便作一诗讽谕他们。诗云：

洞泉泠泠似清磬，危倚石栏恰可听。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2页。

意思是说，不要以穿穴千曲，一滴泠泠，自鸣得意；水总是要归大海的，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只有革命护法，才是光明正道。可是，官迷心窍的谭延闿和以纵横家自视的白坚武，哪里会省悟这首富于人生哲理的诗呢？几日后，白坚武接受了谭延闿四百元光洋的赠礼，踌躇满志地回南京复命去了。

湘南停战后，护法军困处一隅，几万军队麇集在一小块贫瘠的地区，不独粮食艰难，连食盐也供应不上。一部分桂军、粤军留在那里，全靠当地筹饷供给。除了少数部队军纪较严外，许多部队经常发生苛索百姓，甚或公然抢劫的事，弄得当地居民疑惧日增。

林伯渠目睹湘南人民曾以满腔热诚欢迎护法联军，渴望从此跳出苦海，何曾料到终于又重新陷入“匪过如梳，兵过如篦”的惨境。他和堂兄林修梅为此万分难过，不禁越来越怀疑依靠这样的军队，革命能否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中国训练新军几十年，却练成这个样子，是不是练军的根本方向存在什么重大问题？他们听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工农兵坐了天下，感到十分惊奇，十分羡慕，却又不知这个新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很想有朝一日能够亲自去看看。

这年十二月，南北议和的声浪，愈传愈高。林伯渠来到广州，访问了在广州的国会议员、老乡李执中和报界朋友容伯挺等人，调查了西南各方面对南北议和的看法，然后到香港和中华革命党的机关联系，在香港寓所跑马地霁东街A1三楼写信给寓居上海的孙中山，汇报谭延闿在永州与吴佩孚勾结的情形以及广州桂、滇等各派系对议和的态度。

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他复信，指出：“彼辈果不复稍存顾虑，竟借和议以遂其分赃割据之阴私者，此与国家何与？与人民又何与？而护法之旨又安在？吾党惟有竭力诛之，以求永奠此民国耳”。

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藏稿。

在旧历新年前，林伯渠又回到广州，除夕他还游览了著名的羊城花市。在香港和广州期间，林伯渠曾先后写下两首诗，抒发他的感想。一首题为《香江感事》。诗云：

去来忽复岁时改，月下寒螿犹有声。

对面青山非吾土，谁家锦瑟弄清音。

独怜湖海千行泪，解释人群一片心。

未必寓形同野马，高楼负手一沉吟。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页。

另一首题为《游花市》。诗云：

初到岭南地，果然天一方。

看人除夕晚，争市吊钟芬。

店悬三蛇酒，庙烧六祖香。

如何能惯习，运会早开张。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页。

前一首写他身临异域，有感于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以表示他爱国主义的情怀和护法起义受挫后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后一首则是叙述他初游五羊花市，看到的岭南风物，并希望广东早日打开新的局面。

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欧战结束、巴黎和会以及驻中国外交使团的影响下，南北两政府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但未有结果。三月上旬，林伯渠到上海谒见孙中山，面陈林修梅等郴州起义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护法的情况。三月十三日，孙中山给林修梅写了复信，信上说：

顷令弟伯渠兄来沪，备述近况，并奉惠书，甚慰。湘中频年苦战，皆兄与诸同志历任其难，而兄主义坚定，贯彻始终，尤为吾党坚贞之士。南望郴中，良深注念。此次沪上和议虽开，然以北方屡怀狡诈，对陕中义军，竭力进攻，故和议又形顿挫；如再事迁延，北方仍无悔祸之意，则战衅不免再启，吾人为主义而战，为正道而战，自非奠定真正之共和，不能自卸其责。望兄与诸同人互相策励，力尽救国天职，国事幸甚，一切除面告伯渠兄外，专此奉复。

《国父全集》(3)，台湾1973年版，第607页。

南北和会开始前后，主张和议最力的江苏督军李纯，派白坚武“慰问国民党”，仆仆于京、津、沪、杭道上，遍访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省军政要员。三月九、十两日，易象、林伯渠先后在上海访问了白坚武，纵谈南北各方对和议的动向。

十一日，易象宴请沪神州学会会员，并邀白坚武列席。

《白坚武日记》原稿。

一九一九年夏天，在湘南永州的谭延闿进一步和直系吴佩孚、桂系陆荣廷勾结，力图分裂湘南义军，打击拥护孙中山的程潜、林修梅等湘军将领。林伯渠和谭延闿有过一段同事关系，特地赴永州见谭，告以孙中山联段反直的策略（时段祺瑞已下台，直系在北方占优势），劝他应以护法大局为重，不可与陆、吴沆瀣一气。素以圆滑狡狴著称的谭延闿，却顾左右而言他。林伯渠被激得满肚子气，又不便发作，在临别前录了《诗经·国风》一章，请谭书赠留念。诗云：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缠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貍兮？

这首诗是说：不耕不种，为什么你要去取别人的劳动果实？不狩不猎，为什么你院子里却挂着野兽？意在讽刺谭延闿，你这个空头督军，既没有出过力，打过仗，为什么硬要来湘南争夺地盘呢？谭延闿看过之后，不动声色，提起笔来，从容挥毫，写至末尾，故意在纸上留下一块空白，用稍小的字，写上《诗经·国风》的另一段：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意思是说：湖南这个地方大得很，采桑的人却没有几个，你和我一起回去吧，反拉林伯渠一把。七月，谭延闿与桂系在赵恒惕的支持下，以通敌罪名逐走程潜。同年底，林修梅也被排挤离开郴州。湘南护法起义，苦战两年，至此失败。

林伯渠回到上海后，在孙中山事务所协助办理党务工作。后来他回忆说：“我自五四前后即与（孙中山）先生同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常往返于上海广州”，又说：“我在上海环龙路住过一两年，看孙中山写《心

理建设》、《有志竟成》、《社会建设》等几篇文章”。这期间，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护国、护法战役不断失败，使林伯渠内心感到十分痛苦，同时也促使他反复思考失败的原因，探求新的出路。同年秋天，他到了杭州，写下一首七律《西湖纪游》，表达了他对几年来国内政局烟云多变的感慨，和对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憎恶。同时有感于革命屡遭挫折的非计，壮志未酬，未免借酒浇愁。诗云：

《中国走向自由》，《新华日报》，1943年2月11日。

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1956年10月23日，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俊游如此才三日，山色湖光取次收。

到眼烟云纷万态，何人台榭足千秋。

艰难自笑宁非计，历碌看人共一丘。

犹有情怀消未得，聚丰园里酒盈瓯。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20页。

正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林伯渠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决心去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出路。

一个早期的共产党员

林伯渠世界观的转变，也和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开始的。但是，在此之前，却也有一些促使他思想转变的潜在因素。他第一次留学东京，正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澎湃的年代。一九一三年，林伯渠的湘西老乡赵必振把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译成中文，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一九一四年，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宣传马克思主义、轰动一时的名著《社会主义神髓》一问世，很快就被翻成几种汉文译本，在中国留学生界广泛流传。其后两年，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机关刊物《民报》，登载了朱执信介绍马克思生平和学说的文章：《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林伯渠的湘西老乡、好友宋教仁，也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记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创立和发展的经过。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中国进行的还是以推翻封建王朝为主要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林伯渠世界观的影响，虽然还不显著，但毕竟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有个著名的伟大人物马克思是主张共产主义的。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三天（十一月十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领先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为标题，作了简要的报道。长沙《大公报》于十二月六日的新闻栏中对“俄国政变中心之兵工委员会”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广东中华日报》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新闻中还报道了《李宁（列宁）取得胜利的原因》。这时，林伯渠正在战火纷飞的湘南参加护法战争。他风尘仆仆，奔走于衡阳、零陵、广州之间，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遭受挫折而伤透脑筋，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他大为兴奋，从俄国革命的成就中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他后来回忆说：

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

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似乎尽照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很难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李大钊是我二次到日本时最好的朋友，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对世界的伟大意义最早的一篇文章。其后，李大钊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一系列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报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林伯渠。

林伯渠后来回忆说：“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李大钊寄来的著作和书刊。使正在为革命屡遭挫折而苦思焦虑，寻求出路的林伯渠，如在苦旱的沙漠中得到一股甘泉，快读之后，顿觉耳目一新，郁结全消。

在好友李大钊永葆青春的革命精神的感染下，他仿佛自己也年青了许多。一九一八年春，他写的《郴衡道中》，就充分表现了这种重新充满青春活力的精神状态。

诗云：

《林伯渠自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藏；《林伯渠同志回忆录》打印稿。

春风作态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迹新。

垂柳如腰欲曼舞，碧桃有晕似轻颦。

恰从现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须趑行。

待到百花齐放日，与君携手共芳辰。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页。

一九一九年的秋、冬间，李大钊的名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杨匏安的力作《马克思主义》等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相继发表。不久，李大钊又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神州学会另一个会员王右木也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

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杜国库、邓初民、林砺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的还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些在日本的朋友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就是凭借这些零碎的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他认为孙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身家性命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已“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虽然在革命方略上，孙中山有过不少失误，因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在失败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随着时代的潮流而继续奋进。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屡遭挫折后，毫不气馁，仍然忙于总结革命经验教训撰写《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

“五四开始时他沉默”，及后，全国学生、商民、工人的三罢斗争，把北京政府的三个卖国贼赶下台，使他极大地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的认识，得出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的结论。同年十月，孙中山向青年学生演讲时指出：改造中国的方法“只有革命”，要“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正因此，林伯渠十分佩服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是世界上有数的伟人之一。这年十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

林祖涵：《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西北周刊》第5期，1938年3月10日。

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1956年10月23日。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50页。

一九二一年的春末，林伯渠年迈的母亲因病逝世。他接到家中的电报后，匆匆搭船赶回临澧老家。由于他终年为革命奔走，未能好好尽到奉养老母的责任，见老母病逝，不禁失声痛哭。他拒绝了乡亲们建议请和尚念经超度亡魂的作法，为母亲举行了新式葬礼。

安葬母亲后不久，林伯渠又回到上海。这时，他除了负担母亲的丧事费用外，还得负担两个弟弟在外的读书费，靠国民党党部发给的一点点生活津贴，是不够开支的。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馆买碗雪里蕻咸菜泡饭。

就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他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就在这年的初冬，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

话。一九二一年一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林伯渠便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而且是终生不懈。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林伯渠十分感激他入党的引路人——李大钊。在日本时，他俩曾结为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他一直无比怀念。一九五八年他在《题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还缅怀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丰功伟绩。诗中写道：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混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4页。

一九二二年底，林伯渠回到长沙，写信给在临澧老家教书的妻子伍复明，叫她把女儿林秉衡送来长沙跟他到上海去读书。当林秉衡跟着堂哥到达长沙那晚，正值长沙城发生流血事变，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巩固他在湖南的统治，杀害了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和政界名流李仲麟、易象等。赵恒惕是湖南的一条变色龙，他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望，无所谓革命不革命，反正有奶便是娘，只要利之所在，随时可以反颜相向。一九一八年他支持程潜反对谭延闿；一九一九年他拥护谭延闿排挤程潜；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又支持湖南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兵变”，迫使谭延闿下台。但当他当上总司令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又一次耍阴谋诡计，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捕杀了李仲麟和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等七人。因为赵恒惕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时林伯渠在长沙虽然刚见到女儿一面，但听到风声后，就只身出走武汉，到了林修梅处。

易象是林伯渠留学日本时的好友、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也是著名戏剧家田汉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一起在湖南省署工作，又一起参加湘南护法起义，可说是生死之交。田汉后来在追悼林伯渠的诗中写道：“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梅舅主沪报，振笔严伐讨。公时亦在沪，入党输公早。每访霞飞寓，启迪总深浩，偶同涉歌场，借以舒郁恼。梅园适长沙，倒于豺狼爪。公助孙中山，决策福亿兆。……”

这一段诗，就是记述林伯渠与易象的交情和对田汉本人的教导的。

梅舅：指易象，字梅园。管、鲍：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是相知最深的朋友。

《田汉诗选·悼林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175页。

易象被捕时，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一首绝命诗，诗云：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对于易象的惨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他得到易象这一绝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秉衡背诵。“丹心一片付浮沉”包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泪啊！

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了追悼会，并对死者的家属作了安置。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顾问。次年五、六月间，即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伯渠按照党的指示，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也前往广州工作。

学习马列，参加工运

一九二一年的广州，使初到此地的人有气象一新之感。孙中山自去年秋命粤军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励精图治，力树新风。一九二一年五月，他出任非常大总统，随即命陈炯明率军平定广西，准备北伐，在内政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劳动立法，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对工人运动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外交方面，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收回关税偿还外债后的余款，并秘密进行中俄德联盟。关于孙中山的反帝态度，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曾亲见（孙）先生为海关问题而痛斥当时驻广州某领事，谓‘关税乃我国应得之收入，不得为外人所有’……其时声色俱厉，使该领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见（孙）先生恨不平等条约对民族之束缚”。

这时身兼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野心家陈炯明，也伪装进步，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间邀请正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南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全省教育兼办大学。陈独秀来广州后，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来广州，与他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的组织，把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先后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刘尔崧、阮啸仙等知识分子和一些工人入党，在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以《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党的机关报，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

《林伯渠同志一九五六年谈入党二三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但是，在广州的开明气象下，却也隐伏着一股逆流，这就是野心家陈炯明当上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后，在暗地里组织反对孙中山的运动。他秘密唆使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通电反对孙中山当总统。他反对孙中山出师北伐，公然主张“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目的无非是与南北军阀沆瀣一气，力求分赃割据，坐地分肥。他虽曾勉强奉命出征广西，却抱怨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总之，一九二一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不过暂时未公开决裂罢了。

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时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孙中山的安全保卫和汇报军情、承宣命令、接待宾客等工作。兄弟俩人同住广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门前杨柳低垂，绿荫婆娑，是个环境清幽的所在。林修梅平素十分赞赏五柳先生陶潜的气节，由于自己寓所门前有杨柳六株，因此自号“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兄弟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乡，如程潜、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把女儿安置在附近小学念书，后来又转到执信女校寄读。

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介绍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期间，《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陈公博翻译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苏俄、匈牙利等国宪法、美国共产党党纲、列宁演说，还经常报道苏维埃俄国工农业文教设施等情况，也连载了不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广州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有一定市场，尤以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广。林伯渠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和林修梅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高蹈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至于某些人提倡在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条件下实行点滴改良的社会政策，其有利于资本家更十倍于工人阶级。他们兄弟俩“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俄国一样，同是以农立国，同是产业落后，十年以前同是处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

既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成功？有志者，事竟成。他们兄弟俩深信，只要“抱定决心”，效法列宁干下去，“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也许在再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有这样的机会。

《林修梅遗著》；1921年版，第6、100页。

一九二一年初，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题为《欢迎广东新军人》的文章，号召广东新军人不可做军阀私人奴役的工具，要学习苏俄红军，做从事生产劳动的军人，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军人。林修梅和林伯渠早就有感于中国训练新军多年的失败，想学习苏俄红军的办法改造中国军队。他们详细研究了各国军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军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所起的不同作用，结合中国以农立国的现状，制订出改造军队成为“农工军”的计划，由林修梅写成《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两文。文章说：大凡军队里的士兵是从平民阶级募来的，他们因受军阀、官僚、资本家的压迫，生活困难，才去当兵。“资本家可以利用私有财产的魔力，诱惑军队，作他们的护符；我们就可以主张财产公有的办法，使军队反戈相向，去谋社会主义的发展”

。文中主张寓农于兵，寓工于兵，使军队变成既能生产又能打仗的农工军，并制订了十三条农工军组织大纲草案，具体规定了军队学农、学工、学武的训练方法。

《林修梅遗著》第51、46—48页。

林修梅还打算资助林伯渠往游新俄，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不幸的是，正当林伯渠兄弟二人思想蒸蒸日上、孙中山对林修梅倚重至殷、准备偕同赴桂出师北伐的时候，林修梅却因牙疾误于庸医，感染骨膜炎，牵及全身，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医院病逝，时年四十二岁。他们兄弟二人在一起研究理论，总结革命经验的工作，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

林伯渠和林修梅自幼至长，长期朝夕相处，虽然秉性不同，一个英气内敛，韬光自守；一个才华四溢，性格外向，两人却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伯渠视修梅不仅是兄长，而且是严师益友，对林修梅的不幸去世，自然十分悲痛。他曾写了好几首挽诗，表达自己的哀思。他的女儿秉衡至今还记得几句：

六柳依然未改颜，谁怜零涕湿栏杆？
流传勋业方朝日，新涨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为盐米累，一棺犹阻道途艰。
卅年兄弟兼师友，审抚遗篇墨未残！

林修梅一生简朴，不治家产。死前一小时犹问孙中山大总统出巡日期，准备力疾随行。死后治丧和一家十口的生活，靠林伯渠竭力维持。孙中山在出巡桂林途中，闻林修梅病逝，十分悲痛，命令追赠林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并在首义地区铸立铜像，建祠纪念。十二月十八日，在广东省议会礼堂举行林修梅追悼大会。孙中山派总统府陆军次长程潜代表宣读祭文。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的逾万人。为了纪念死者和宣扬他生前崇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林伯渠和几个好友筹款刊印了《林修梅遗著》，在追悼会上散发，每人一册。遗著内容包括《精神讲话》、《社会主义与军队》、《社会主义的我见》、《战时财政计划草案》等篇。胡汉民、程潜等为该书写序，林伯渠作跋。跋文如下：

予与先兄浴凡，少同学，长共患难，朝夕相处之日多，常见其与友朋赠答，或抚时感事，亦间有叙述，若歌咏然，辄随手弃掷。及驻军拉萨，乃著《西藏游记》、《治藏策》。亡命日本时，作《中国交通政策管见》并其他译著数种，今俱存他友处，一时颇难收集。仅此数文，属其最近之作，故得都置行篋。二、三同志追悼先兄之死而悲其志，特为刊成此册，以为纪念。亦欲世之欲知兄者，得借此窥其梗概耳。予观兄年来志愿，在指导人群归于世界最新之趋势，其后此之精诚与毅力，已决心尽量灌输于社会革命事业。平生自奉俭约，衣履往往不甚完整，令卒遇者，略不意其在政治革命中负有盛誉之人。近欲资予往游新俄罗斯，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种种，以备异日参考。盖其希望理想实现之心事，至为诚挚而迫切。使不遽死，未必不能及身令其怀抱有所发抒成就。

予质蹇劣，虽与兄志同道合，自揣恐终无以补成兄未竟之志事。抚此遗文，更不禁悲思之横集也。

中华民国十年十二月二日距先兄死后四十九日识于广州市
林祖涵

办完林修梅的丧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广州。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过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中共广州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从事一些党团活动外，并开始同工人群众进行接触，参加了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经济学会和互助社等团体，在长堤广西会馆集会纪念著名的德国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林伯渠、谭平山、谭植棠等出席了纪念会并发表了演说。会后，他们还随工人们抬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遗像在市內冒雨游行示威，向群众散发传单。

四月初，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选出团委书记谭平山，文书部负责人杨章甫、杨匏安、谭夏声等，财政部负责人谭植棠。林伯渠和刘尔崧当选为财政部审计股负责人。

同年四月十六日，广州四十四个工人团体联合举行大会，追悼领导长沙纱厂工人罢工被害的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和因参加香港海员罢工回广州被英国警察开枪杀害的四位工人。到会群众五千余人，黄爱七十多岁的老父、湖南劳工会代表和谭平山、林伯渠等出席了追悼会，林伯渠为黄、庞两烈士致送了挽联。挽联是：

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
唯二君能以颈血洗乾坤。

《五四期刊介绍》第2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4页。

黄爱、庞人铨均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五四”时，黄爱协助周恩来编辑《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及参加京津爱国运动，是天津觉悟社的成员，曾两次被捕，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协助陈独秀做文书校对工作，不久回长沙与庞人铨组织湖南劳工会，有会员六千余人。黄、庞两人在毛泽东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下，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年关索饷斗争，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京、津、沪和广州都举行了追悼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为黄庞被害事件发表《对无产阶级宣言书》，声讨湖南资本家勾结军阀赵恒惕枪杀工人领袖的血腥罪行。广州举行黄、庞等的追悼会引起帝国主义者很大震动。林伯渠后来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工人罢工，湖南省纺织工人罢工及军阀赵恒惕枪杀纺织工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均以S·Y（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义做了热烈严肃的支援与抗议。因此，香港华文及外文报和上海申新报及《字林西报》均十分注意登载此事，惊惧地恶意地说：不得了啊！布尔什维克过激党在中国也搞起来了”。

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一九二二年夏天，广州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导致了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反革命事变。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孙中山出师桂林准备北伐起，陈炯明就停发饷械，多方阻挠；同时暗中勾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和直系军阀吴佩孚，伙同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鼓吹“联省自治”。一九二二年三月。陈炯明竟然暗杀了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回师韶关，改道北伐，并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内务部长职务，但仍留其陆军部长职务，冀其改过自新。

中共广东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内部，对待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争执，究竟谁是谁非，看法不一。大多数广东籍的党团员，如陈公博、谭平

山、谭植棠等，都偏袒陈炯明，归责孙中山。这是由于两年前他们回广州创办《广东群报》时，陈炯明曾予经济支持，而且陈炯明以省长名义邀请陈独秀来粤主管教育，并曾从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香港海员罢工，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和陈炯明较为接近，对孙中山则日形疏远。而且，他们对军事北伐，缺乏信心，以为孙陈矛盾主要是孙中山身边的气量狭小的胡汉民挑拨而起的。他们在《广东群报》上，发表了不少为陈炯明“联省自治”制造舆论的文章。这时，正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准备在广州召开。

陈独秀和张国焘于四月底由上海赶到广州，先召集中共广东支部的党员开会，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和中共中央另一代表张太雷也出席了会议。会上陈独秀报告了这次举行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大会的方针和重大意义，还谈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问题。广东支部的党员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的发言，大都对孙中山颇有微辞，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惟独林伯渠发言坚决主张支持孙中山。他认为孙中山过去组织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继之进行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和目前为打倒北洋军阀的专制而北伐，都是进步的，值得钦佩的。国共两党建立合作关系，自应尊重历史，与孙中山合作。至于陈炯明所标榜的“联省自治”，无非是假借人民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于老百姓绝无利益可言。最后陈独秀提出，对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应观察清楚后再决定我们的态度，目前仍应与国民党所有分子合作，避免卷入他们内部的斗争。驻在广州的远东共和国电讯社记者斯托诺扬维奇等，也把孙中山本人和他的政府描写得一团漆黑，而对陈炯明则表示好感。后来，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终于同意和孙中山合作。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斯托诺扬维奇在达林的帮助下，也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和达林一道，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合作。

参见《张国焘回忆录》第1册，第215—216页。《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105页。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2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后不久，陈炯明即于六月十六日发动反革命政变，炮击观音山（即今越秀山）总统府。孙中山事前闻讯出走，在永丰舰上与叛军作战两个多月后，才前往上海。在陈炯明叛军炮击总统府那天，林伯渠因他和林修梅素来对陈炯明持反对态度，恐遭陈毒手，连夜接回在执信女校寄读的女儿，并带着林修梅的眷属一起乘船赴上海。

国民党一大前后

林伯渠抵沪不久，就要跟随他多年的曾福将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送回湖南老家，而独自一人留在上海。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开始酝酿国共合作的时期。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始从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和世界革命潮流，改变了一大时那种对其他党派“断绝一切联系”，一概采取“攻击、排他的态度”，明确提出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指出党在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八月十二日，马林随苏俄代表越飞回到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后又在杭州西湖举行了特别会议。决定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7页。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6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的时候，孙中山也开始了他一生命中最伟大的转变。一九二二年八月初，孙中山离开永丰舰，经香港于八月十四日抵达上海。由于多次的失败，特别是他自己亲手培植起来的陈炯明的叛变，使他更加感到，中国革命需要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必须学习俄国，取得俄国的援助。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也有力地促进了他的思想转变，使他逐步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以，中共西湖会议之后，当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拜访孙中山，提出中国共产党员准备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时，他不但完全同意，而且还非常高兴，“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他并向陈独秀、李大钊等表示，可以取消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方法，按着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说“你尽可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几天之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即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狱中自述》（原稿）。

林伯渠十分敬仰孙中山的人格和革命精神，孙中山被陈炯明赶出广州，避居上海后，他仍然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同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上述陈独秀、李大钊、马林与孙中山的会晤，他大都参与其间。为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还经常“往返于上海广州之间”。一九二二年九月以后，苏俄驻北京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彼此多次派出代表进行商谈，也大都与林伯渠有关。

《边府林主席谈国内团结国共合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4日。

在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上海以国民党上海本部名义发表了改组宣言，承认中国已“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开始对其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即由过去的排满发展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关于民权主义，则由过去之“建设共和”，扩充为直接民权，“废除以资产为

标准之阶级选举”，“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关于民生主义，除“平均地权”之外，又增加了节制资本的意义，提出“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宣言还特别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1日。

一月二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党务会议，通过了党纲及总章，重申三民主义为党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党的组成体制，废除了原来入党誓约和打手模等入党手续。规定：“凡中华民国之成年男女，赞成本党党纲，并愿确守本党一切规章，有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入党志愿书，经本党给与党证者为本党党员”。孙中山在会上的讲演，还特别强调了改进党务的重要性。他说：只有改进党务，恢复以前革命党的精神，才能“有胜无败”。这次会议，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寻觅党务人材，不拘方式的推荐，重新推定了中央各部的组织人员，委彭素民、林祖涵为总务部正副部长，陈树人、孙镜为党务部正副部长，林业明、周佩箴为财务部正副部长，叶楚伦、茅祖权为宣传部正副部长，张秋白、周颂西为交际部正副部长。另委居正，孙洪伊、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廖仲恺、陈独秀等二十一人为参议；柏文蔚、蒋中正等十三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各部的部长大多数都是起用的新人。一月三十日，孙中山又委任谭平山为中国国民党广东工界宣传员，并要他先期回粤整顿党务。

《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1月2日颁布，《革命文献》第8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影印再版，总页第1049页。

林伯渠因事去广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当彭素民写信告知委任他为总务部副部长时，他立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祖涵频年相从，无补高深，独于三民主义以党治国之说，衷心研究，服膺拳拳，近察世界潮流，国际趋势，欲导中国于强盛，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均有赖于吾党之工作”。林伯渠不仅热诚拥护孙中山改进国民党党务的措施，并且表示愿意继续追随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大业。

转引自李云汉：《容共到清共》，台北1973年版，第158—159页。

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时，他与苏俄的关系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继一九二二年底马林赴桂林同孙中山商谈国民党与苏俄结盟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苏俄代表越飞经过与孙中山半年多的通信联系，又由北京抵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于一月二十六日发表了《孙、越联合宣言》。越飞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之最重要最急迫问题，为完成全国统一，并取得完全之国家独立。”“关于此项大业……俄国人民对于中国表最热切之同情，并愿予以赞助。”孙中山也再次表示，热烈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之帮助。这一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已消除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最终确定了联俄的政策。

随后，他又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去日本，商谈具体合作的办法。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月28日。

一九二三年初，留驻广西的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会同粤军许崇智把陈炯明驱逐出广州。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又回到广州，复任陆海军大元帅，并于三月一日成立了大本营。孙中山抵粤时，林伯渠尚在广州。因二

月二十三日谭平山还在给彭素民写信，挽留林“在此地多住几天”，帮助他整顿党务。大约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后不久，林伯渠即离粤赴沪，就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职。新委任的国民党中央总务部部长彭素民，系江西清江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曾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后流亡日本，与林伯渠等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林早就有交往。林回到上海，为加强总务部的工作，同彭商量又请了张太雷到国民党中央担任干事。

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按国民党中央总章规定，它的任务是：“管理本党机要文件、印信、统计及与国内外各部处之接洽，并办理不属于他部之事务”。因国民党中央还未设组织部，实际上，它还担负了组织部的任务，当时国民党中央发出的有关任免干部和组织方面的文电，都要有总务部长的签署。作为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除协助部长处理部务以外，按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的规定，他还担任着中央干部会议的书记职务，经常出席中央干部会议，参与处理有关中央文电的事务。

《中国国民党总章》，《革命文编》第8辑，总页第1050页。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1923年2月2日，《革命文献》第8辑，总页第1058页。

林伯渠回到上海，先是住在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中央党部，不久妻子伍复明和孩子来到上海，又移居到巨籁达路松鹤里。这时，长期跟随他的曾福也带着妻子和他们住在一起。据家人回忆，在这一段时间里，和他家来往的人很多，既有林的同乡朋友、国民党友人，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二七惨案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遭到通缉，中共中央由北京迁到上海，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相继来沪，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蔡畅、谭平山等人，都先后到过他家。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各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指示精神，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再次肯定国民党“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批准了党在杭州西湖会议决定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方针，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也要大规模地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

决议还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后，仍要保存和扩大我们的组织，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阻止国民党的“妥协倾向”及“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反对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中共三大这一决议，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对于中共本身和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第421—422页。

三大以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邓中夏出任委员长，党员也按居住情况重新编组，林伯渠被编到第三组即西门小组。为了贯彻三大决议，上海区委曾集中讨论了国民运动问题，决定全体同志于最短时间内加入国民党，增设“国民运动委员会”，以便与中央特派员和地方全体执委共同商定有关改组国民党的“一切应付方针、进行方法及实际参加人员

派遣”等问题，上海区委在改组后的第一次会议上，还指定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长，林伯渠、张春木、张国焘、杨贤江、陈其寿、黄让之、董湘、刘宜之等为国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指定林伯渠、张国焘等为区委的政治报告员，轮流到党的各小组或大会讲演有关时事政治问题。

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1923年7月9日会议记录。

因为林伯渠既是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又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国民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当时上海、江苏、浙江、湖南等地的许多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都直接或间接地同他有关。例如，有一次，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问林伯渠，有无办法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林回答说有办法。不久，林伯渠即找中共中央委员、当时任中共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商量，决定由毛泽东回湘进行组织。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就是说的这件事。信的原文是：

伯渠

素民二位同志：

第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

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二十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4页。

当时，正是湖南军阀谭延闿和赵恒惕互相争夺省的控制权，信中所说谭赵即指此二人。“北军”，系指支持赵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信中所说的夏希，即共产党人夏曦；苏中即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徐苏中。

毛泽东这封信，不但反映了他本人在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中的作用，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林伯渠在帮助孙中山改组与复活中国国民党，介绍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中所处的一种特殊地位。毛泽东这次回湘，直到年底才离开。他先后在长沙、宁乡、安源等地建立了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但国内许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国民党同林伯渠有

关，当时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八十多人加入国民党，也都同林伯渠的活动分不开。一九二三年六月间，国民党中央总务部接到旅欧总支转呈周恩来等意欲加入国民党的报告，七月，经林伯渠与彭素民商量，即以部长彭素民的名义复函巴黎王京歧，准其援国内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成例，接纳周恩来等加入国民党。随后，在改选国民党旅欧总支部时，还选举周恩来为执行部的总务主任，李富春为宣传主任，熊锐为政治委员会的会长，任卓宣为评议部的评议。其后，王京歧回国述职，周恩来并一度代理执行部长。周恩来等人参加国民党，这对后来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发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上海、广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三年十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党、团区委和中共中央与团中央驻粤委员又进一步讨论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于是，孙中山于十月十四日又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致电上海国民党总部，请孙洪伊密电北京，催促李大钊即日来沪会商。二十四日，孙中山在粤召开改组会议，委任胡汉民、邓泽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任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正式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十月二十八日，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分区整顿广州市党的组织，定于明年一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六人），筹办出版国民党周报，起草党纲。嗣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至上海，另组临时委员会上海执行部，令他全权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为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我们的同志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区“同志们为之创设”。关于矫正其政治观念，主要是“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使国民党的力量“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再次要各地同志立即全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在选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应尽力帮助比较急进的分子当选，以便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为贯彻这一通告的精神，中共中央还于此时派邓中夏到北京、保定、天津、济南，派李大钊到湖北、湖南，与各地同志预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他再次来到广州，一方面担任广东《革命评论社》的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他还为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

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与谭平山还多方活动，终于使这个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即由总理从在粤选出的十二人中选派获票最多的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三人为代表；而毛泽东等三人则按海外分部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另外，再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作为湘省的指定代表。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扰破坏，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谭平山等许多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并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这次大会，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随后，又推选谭平山为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民党自身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使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除仍旧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以外，又决定在汉口增设一个执行部，并委派执行委员覃振、候补执行委员张知本前往主持，以便就近指导湖南、湖北及陕西三省的党务。嗣后，因张知本坚辞不就，覃振滞留上海，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派林伯渠前往主持。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林伯渠秘密潜往汉口，并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这时，为接济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弟、四弟，减少家庭生活的开支，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也带着孩子回到湖南乡下。

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

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

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与此同时，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稟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

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于在武汉已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平民周报》1924年第8期，第6页。

《申报》1924年6月1日。

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5页。

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舁椁执紼，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暴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

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暧昧态度。在国民党中央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他还亲自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在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条件下，一九二五年六月间，广东革命政府消灭了盘踞在广东近郊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约二万余众，铲除了这个心腹大患。七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随后，又将党军（即黄埔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建国粤军和福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在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时，还决定成立监察院和惩吏院，并推举林伯渠、谢持、黄昌谷、甘乃光、陈秋人五人为监察委员。从此，林又投入了监察院和整顿广东吏治的工作。

国民党监察院的任务，按监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主要是监察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如查得有舞弊亏空及溺职等情，上诉于惩吏院惩办之。林伯渠在监察院的工作中，一开始就强调依靠民众和惩治贪官污吏，在监察院成立时，他即明确指出：“我们现以革命党人资格，服务于监察院，不仅倚民众为后盾，以承无过；并须立于民众之前，铲除一切贪官污吏，始能实现民众所欲求之福利”。林伯渠曾先后参加司法调查委员会、查办粤汉铁路积弊委员会，调查处理粤汉铁路局侵吞路款和电报局的罢工案件，并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审查古应芬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及军需总监时的全部收支账目。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坚决推行广东军事、民政、财政统一的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用卑鄙手段刺杀后，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和中央常委，又直接参加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廖仲恺遇难后，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的遗缺，国民党中央最初的决定，是以林伯渠补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以林森补其中执委常委。嗣后，因林森与邹鲁率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上，国民党中央遂又决定以林伯渠、谭平山代理林森和邹鲁的中央常委的职务。这时，由于在追查刺杀廖仲恺的凶手中，发现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国民党另一名中执委常委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魏邦平均参与了这一罪恶活动，牵连到胡、许二人，胡汉

民因而赴苏，许崇智去上海。而另外两名中执委常委丁惟汾、于树德又早已去北京。这样，留在广州的中执委常委就只剩下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三人。按照国民党总纲的规定，主持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秘书处，必须有三名常委兼任秘书。

因原定兼任秘书的三名常委，廖仲恺牺牲，胡汉民和邹鲁离去，所以在林伯渠被推选为代理中央常委之后，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又决定以汪精卫、谭平山和林伯渠兼理中央秘书处的工作。

林伯渠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后，除经常出席和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代表国民党中央参加群众各种集会以外，他还参预决定和领导了广东国民政府举行的东征和南征。

还在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刘叛乱、处理廖案的过程中，盘踞东江的陈炯明残部，就乘机占领了河源、博罗、河婆、老隆、紫金等县城，勾结广东北江熊克武部和南路邓本殷部，企图侵扰广州，于是广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遂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十月初，国民革命军第二、三两军首先在北江击溃熊克武部。中旬，由一、四军和攻鄂军等部队所组成的东征军攻下惠州，占领东江所属各县，消灭了陈炯明残部。十一月初，南路抵御邓本殷部的国民革命军，在第二、三两军的支援下，也连下高雷钦廉各州，消灭了邓本殷主力，迫使其率残部退守琼州。国民革命军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不仅基本上扫除了广东境内的反动军阀，统一了广东，并且为两广统一和准备北伐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又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逆流。一九二五年九月下旬，林森、邹鲁利用率“外交代表团”北上的机会，在沪与谢持、居正、叶楚伦、邵元冲和戴季陶商议“分共”，决定先由谢持径行入京，林、邹则溯江而上，去武汉等地进行联络。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邹鲁、谢持和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便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之党籍”、“解除俄人鲍罗廷之顾问职务”、“弹劾中央执行委员汪兆铭”、“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开除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九人之国民党党籍”等多种决议案，公开打出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和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西山会议。

林伯渠在得悉右派分子召开西山会议的消息之后，与在广东的国民党其他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立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通电，严加驳斥。他们号召全国及海外的全体党员，不要为右派的异说所迷惑，坚持先总理的主张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并宣布于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纷纷发表通电或函件，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共与分裂活动，要求广州国民党中央对其从严惩办，以肃党纪。嗣后，国民党中央还通电各级党部，撤消了邹鲁广东大学校长及北上外交代表的职务，查办叶楚伦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停止了上海执行部的职权。反对西山会议派的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维护革命统一战线，林伯渠出任国民党中执委常

委后，还积极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就决定要尽快召开国民党二大。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林伯渠在国民党第一届中执委第九十九次会议上，即提出组织重要议题委员会，“以便编订各种党务重要议题”，“通告各党员”。正是根据他这一提议，国民党中央才决定由中央常委、各部部长和监察委员邓泽如与林祖涵组成第二次代表大会重要议题委员会。此后，林伯渠曾多次出席或主持重要议题委员会，讨论各种议案的准备工作。十月间，他还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导广东建立国民党省党部，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十二月一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百二十三次会议上，林伯渠与谭平山、汪精卫还联名提出，请派吴玉章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刘棻（伯垂）为文牒科主任，许甦魂为议事科主任，并得到了会议通过。吴、刘、许三人都是共产党员。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3日。

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本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鲍罗廷曾商量，打算在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公开开除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应争取占三分之一。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都赞成这个主张。但是，这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连续给广东发来几封长信，要中共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及西山会议派分子叶楚傖、邵元冲大开谈判，请孙科、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大会，并向孙、戴等人表示，中共决不包办国民党，在中央委员改选中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人数。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去广州，直接推行这一方针。这就使国民党二大的准备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然而，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责难，国民党二大还是如期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开幕了。是日礼炮齐鸣，飞机翱翔天空，与会代表和参加大会开幕典礼的十余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欢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祝贺大会的召开，希望大会能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政纲，坚持联俄和党内合作的方针，支持工农运动，制订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的计划。宣言还回顾了国民党一大后党内旧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淘汰的历史，指出：“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反而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希望大会能对国民党内旧有的反革命分子及“假孙文主义、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采取坚决的态度，森严党的纪律，“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林伯渠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党团成员之一，他和毛泽东、谭平山还被推举为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在一月四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他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会议报告了大会的筹备过程，历述了第一次大会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内斗争的经过。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宋子文、刘尔崧、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毛泽东等，也分别向大会作了关于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人、农民、青年、商民、妇女、宣传等方面的报告。

由于这次大会是在五卅运动和广东统一之后，群众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压倒优势，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当时还属于左派的汪精卫等人，也都希望能排除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所以会议在就上述报告所通过的相应决议与大全宣言中，再次宣布了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重申国民党一大的政纲与政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发展革命运动的计划。

会议还不顾蒋介石和张国焘等人的阻挠，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伦等，要他们限期悔过，否则即开除党籍；训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对于参加“同志俱乐部”和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右派分子，会议也作出决定，对他们进行了纪律处分。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和分裂活动。

大会在最后的选举中，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反对增加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名额，甚至连汪精卫提出的全部保留一届中委中的共产党员的主张，他也极力反对，致使陈延年、周恩来等在会前提出的新选中委中共党员应占三分之一的主张落了空。相反，却使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等当选为中委。在监委的选举中，右派更占了绝对的优势。虽然如此，会议仍选举了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七人为中委；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韩麟符、邓颖超、许甦魂等六人为候补中委；高语罕、江浩、谢晋等三人为监委或候补监委。在随后的二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又被选为中央常委（共九人）。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各部部长与秘书的人选当中，共产党员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秘书谭平山、林祖涵，秘书处书记长刘葵；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罗绮园；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不久，宣传部长也由毛泽东代理）；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妇女部秘书邓颖超；海外部秘书许甦魂，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决定设立的财务审查委员会（掌管党务经费的分配）的五名成员中，也有四人是共产党人，即林伯渠、董必武、韩麟符与恽代英，而且林还是该会的主席。此外，谭平山、林祖涵还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恽代英是党务审查委员会成员，高语罕、谢晋是党籍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说明，在大会选举的中执委中监委和在其后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仍有很大的力量，右派分子在大会前所鼓吹的“分共”阴谋并未能得逞。

总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因陈独秀等人推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等所谓中派在中执委、中监委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给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它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所以如此，这主要是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许多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

国民党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于二月十二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参加大会的代表回到各地后，均应依照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及本党的政策，订出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痛斥国民党右派的错误，扩大“以C·P为核心”的国民党组织。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因陈独秀“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又集中地讨论了现实的政局和党的当前任务。会议针对帝国主义正加紧分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纠集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对革命策源地广东发动进攻的形势，明确提出：“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将广东国民党政权推广于各省。同时还指出，党的“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1926年2月。

《中央通告》第79号。

林伯渠在国民党二大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国民党二大总的精神，立即转入准备北伐、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运动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还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第一任农民部长时，他就聘请彭湃为农民部的秘书，制定了农运发展计划，提出应调查农民生活和土地占有状况，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农民“非有大联合的强健的团体组织”，则不能“扫除一切的障碍”。后来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就是以这个计划为发端的。国民党二大再次委任他为农民部长后，他首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张，亲自拟定了该会的组织大纲和拟聘请的委员名单，并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批准。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除林伯渠本人以农民部长兼任主席外，还有毛泽东、陈公博、甘乃光、宋子文、谭植棠、肖楚女、阮啸仙、罗绮园等八名委员，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共从事农民运动的著名党员。这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聘请毛泽东参加了这一委员会。当时林伯渠十分重视和尊重毛泽东。他虽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但每次开会都非常尊重各委员的意见，许多有关全国农运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然后再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下达的。本来按农民运动委员会组织大纲的规定，这个委员会是“由农民部主理”，“是辅助”农民部指导全国运动的，但实际上林伯渠却将该会变成了集体领导组织，而农民部倒成了具体的执行机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等当时关于农运的许多正确主张，才得以贯彻到全国。

1924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农民运动计划》。

1926年2月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通告第1号，《中国农民》第4期。

为了发展全国的农民运动，特别是中国中部、北部的农民运动，在林伯渠主持的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扩大农讲所的名额为三百名，将以往各届农讲所主要招收广东学员的办法，改为主要是招收广东以外各省的学员，并决定聘请毛泽东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所长，拟请汪精卫、林祖

涵、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肖楚女、熊锐、黄平、邓中夏、刘一声、高语罕、张伯简、谭植棠、阮啸仙、罗绮园等为农讲所教员。

林伯渠还为第六届农讲所的校址、经费和招生等问题花过许多心血。农讲所原所址在广州的乡贤祠、日新斋、节孝堂等处，因第六届招生名额扩大，农民运动委员会遂决定增辟番禺学宫为农讲所新址。但是，当时不但学宫仍为第二军官学校所占，而且广东大学校长还索要原有乡贤祠等处学生宿舍。后来，只是因为林向有关方面多次交涉，农讲所校址的问题才获得解决。关于经费的问题，当时仅开办费即要六千余元，另外每月经常费（包括办公费、教员薪水、学生活动费）还需要近八千元，而农民部每月的经费总共才有七千余元，即使全部用来办学，也还不敷农讲所的开支。这个问题最后也是经过林的多次交涉，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农讲所每月的经常费由中央财政中指拨。

第六届农讲所自二月六日农民部通告各省选派学生之后，三月底各省学生相继到粤，最后实际入学人数是三百二十七人。他们来自全国十九个省区，特别是北伐将要经过的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安徽和福建等省来的人比较多，其中广东省仅有二人。这些学员经过毛泽东等的培养教育，绝大多数后来成了各地农运骨干。

广州农讲所，不但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对动员农民支援北伐战争有很大的影响，对后来中共创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来说，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七年林伯渠参观广州农民讲习所，在回忆当年他与毛泽东等培养干部、播种革命火种时，还写道：

发轫于西南，事业新鲜。种播全国走将遍。辛苦事情算什么，义胆忠肝。

延安十四年，窑洞连山。培养干部有万千。抗日解放胜利了，预计果然。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6页。

林伯渠领导农民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所采取的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措施是，编辑和出版有关农运的刊物与书籍。为了宣传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和传播农民运动的经验，把彭湃等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扩大到各省，同时给各地同志提供有关农运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运动的材料，农民部出版了《中国农民》月刊（每期发行五千份），增设“编译干事”，编辑《农民丛书》、《农民运动小丛书》。先后出版了，《农民运动须知》、《孙中山先生对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与农民问题》、《农民国际》、《国民政府之统一广东政策与反革命势力》、《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第一、二次宣言》、《农民协会章程与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广东省农民协会拥护革命政府宣言》、《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农民合作概论》等文献。

这些刊物和书籍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既有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又有从事农运的具体作法和经验，深得各地从事农运同志的欢迎。毛泽东稍后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林伯渠再次主持农民部期间，还督促各省建立了农民部，确定并增加了农运经费。

国民党二大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

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为贯彻大会的这一决议，林伯渠多次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名义发出通告，要求各省市区党部尽快设立农民部，随时将各地的农民状况、农运发展及进行计划报告中央农民部。为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通告中还明确规定，“如不按时报告即将该省之农民运动经费停止发给”。

《政治周报》第6、7期合刊，第61页。

1926年3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通告，载《中国农民》第5期。

为了加强对各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央农民部派特派员百数十人到各处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于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召开了广东各路特派员全体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给特派员发了长期舟车免费证。

林伯渠：《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1926年7月出版。

在督促各地建立农民部以及加强各级农民部彼此联系的同时，林伯渠还利用他兼任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和国民政府预算委员的条件，商得国民党中央同意，每月拨付中央农民部经费七千余元（内中包括补助广东省农民协会六千余元），各省农民运动经费一万二千元，总计一万九千余元，如果把办第六届农讲所增拨的经费计算在内，每月的农运经费即达二万七千余元，在国民党各部中，农民部的经费是最多的。这一点对各地农运的影响也很大。当时，其所以能够出版农运刊物和书籍，选送学生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者农民运动的工作会议，任命专职农运特派员，都直接与这笔经费有关。各省农运经费，开始时由交通局按预算支付，因为常常不能按时或者如数支付，后来中央农民部又决定改为由部直接汇寄，各省直接向中央农民部报销。这从经济上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农民部同各地农民部的联系。

由于采取了上述重大措施，各省相继建立从事农运的机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农运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前，不但广东的农运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区也都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几个省还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近百万人。一九二六年五月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就是对全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检阅。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央农民部即向全国各省区发出通告：“广东农民运动两年来之成绩及经验，实可予各省农运以良好之模范及参考”；此次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是“各省农运同志与广东农民相互提携的绝好机缘”，要各省农民部负责同志准备来粤参加大会，并准备有关本省农民政治经济状况与农民运动的系统的、详细的书面报告，以便届时带来进行交流。农民部还筹措拨付了会议的全部费用，包括各省代表来粤的旅差费。

《中国农民》第4期，1926年4月出版。

这次会议，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大同时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的。到会代表，除本省二百一十四人外，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江西等十一省的十八名代表也都出席了大会。它实际上“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

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国民党农民部两年来工作状况》的报告，着重论述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他说：近八十年来，中华民族的革命，“首先表现的就是农民”，鸦片战争中的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及

最近几年来各地农民的反抗，都充分表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今日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国民革命，就是要解放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可以说，中国革命是为农民而革命”。今日中国之革命，必须“以农民为革命中坚”；“如果想得到中华民族之解放，必要有中国农民起来负革命的责任，才有办法”。他在报告中还详细介绍了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农民问题的政纲与政策，号召与会代表“引导农民有组织的参加国民革命行动”，“武装团结起来”，“负起国民革命的责任”，“铲除危害农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排除直接压迫或间接压迫我农民的“买办军阀”，做农运的同志无论何时都要“站在农民利益方面去做”。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洋溢着工农亲密团结的气氛。这次大会共通过了二十几项决议（包括与“劳大”共同做出的），充分肯定了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与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在这些决议中，特别强调要“争回为劣绅土豪所垄断把持之乡村政权”，“联合各革命民众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谋农民第一步解放之成功”。决议还明确提出：“现在全中国皆在反动政治势力之下，只有国民政府所在地之两广有政治自由。当今北方国民军败退，张、吴重兴，帝国主义嚣张跋扈之际，人民应立即起来拥护国民政府，立即出师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

《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国民政府现状报告决议案》，《中国农民》第6、7期合刊。

林伯渠再次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后，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共从事农运或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尽量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连续采取几项重大措施，把中国共产党对农运的领导和中国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有机地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发展。但是，正当林伯渠倾注全力从事农民运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却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排挤共产党人的逆流，迫使他离开了农民部长的职位，中断了他对农民部的领导。

六军党代表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依靠在建立黄埔军及东征中捞取的资本，在排挤广东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又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下令逮捕共产党人，派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迫使部分苏联顾问回国，强迫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接着，五月十五日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禁止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并得到会议通过，从而使许多右派分子占据了国民党中央的要职。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张太雷等都主张应立即对蒋进行反击。但因这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已去北京开会，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前往北京，库伦与冯玉祥进行谈判，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同谭平山已去苏联，汪精卫在事发之后的第二天就称病不起，第

二、三、四、六几个军的领导人虽对蒋不满，但无一人愿意或敢于率先进行反击，这一主张却未能实现。后来，陈延年回到广州虽又计议过此事，然而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特别是上海中共中央已决定对蒋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并赋予张国焘以全权到广州处理此事，因此也未能实行反击。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因张国焘多次以党纪相要挟，要中共党员与中央保持一致，强制出席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员执行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方针，以至在会上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被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称病不再视事，国民党中央决定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代理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汪精卫照管国民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时林伯渠的处境非常困难，他明明觉得应对蒋进行反击，可是碍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又不得不经常出席甚至主持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与蒋介石相周旋，在公众面前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有一段时间，他也象当时许多人一样，希望鲍罗廷回来后或者还有些办法，但这种希望也落空了。四月二十七日，鲍罗廷与谭平山、胡汉民由海参崴乘船同时回到广州，他不但未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反而多方设法想与蒋介石弥补关系，这不仅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就连胡汉民也很快去了香港，称病不起的汪精卫亦于五月十一日“秘密离粤”，赴法养病。所以，林伯渠的这种困难、尴尬的处境，一直延续到“整理党务案”之后。

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国民党中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长，林伯渠同时辞去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从此，他即集中全力从事第六军的政治工作。

六军的前身是程潜的攻鄂军。广东国民政府举行东征的时候，林伯渠就担任了攻鄂军及该军讲武学校的党代表。不过当时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特别繁忙，并未参加东征，他所作的一些政治工作，还只是指导讲武学校招生、帮助学校建立党团组织、支持进步学生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等。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任命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后，开始一段，林对六军的政治工作仍然过问不多。中山舰事件后，六军第十八、十九两师集中到惠州、博罗、石龙一带进行整训，原由吴铁城部改编的第十七师，因吴被免去广州市公安局长及被逮捕，由广州附近调至石龙参加整编，林伯渠曾于四月初去过一次惠州城，帮助程潜整编部队，建立起六军的政治工作，但那一次时间也并不长，又很快回到广州。

所以，林伯渠真正集中全力于六军的政治工作，还是在他离开农民部、第二次到惠州城之后。

六军是由攻鄂军、吴铁城的独立师、广东潮梅军以及收编的陈炯明残部翁腾晖部等杂牌军组成的，内部矛盾重重，如何把这样一支队伍训练成坚强的革命队伍，是相当艰巨的。林伯渠到六军后，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磋商，首先协助程潜调整了师、团干部，将原攻鄂军讲武学校第二期学生，全部分配到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官佐。

为了建立起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开展政治工作，林伯渠在军内整顿和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由于一时难以在各师的团、营、连建立起党代表制度，配备政治工作人员，他经过调查与李世璋等其他政治工作人员研究，先在各团建立了政治训练委员会，以便尽快地把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发现和考察政治工作人材。

六军团以下的政治工作，就是经过这样一种过渡形式才建立起来的。

还在一九二五年底，为了解决湘军的编余人员，为二军和湖南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广州曾以“湖南政治研究会”的名义创设了一个政治讲习班，林伯渠与谭延闿、程潜、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同为该校的理事。在通过各种途径招收的四百多名学生中，十分之九都是湘籍的，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张太雷、熊锐等都到该校授过课。林伯渠为了充实六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的素质，通过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李富春和其他中共党员的关系，从政治讲习班和黄埔军校调了三十名学生到六军，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开设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特别训练班，任命喻寄浑（中共党员）、王祯祥为该班指导员，请周恩来、邓演达讲授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还请人讲述了《本军沿革》。这个班的学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六军的政治工作骨干。

在开展六军的政治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军队同老百姓的关系。他离开农民部再次到达惠州时，六军正一面进行整训，一面在驻地附近参加剿匪。当时在博罗一带，有一股土匪三千多人，活动十分猖獗，经常从其老巢出来，掳人勒索，洗劫村庄，六军先后出动四个团才将其剿灭。不论是在六军的驻地，还是部队出去剿匪，林伯渠都特别强调要同老百姓搞好关系，注意保护和支助当地的农民协会。

林伯渠与程潜和六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合作得比较好，他所进行的这些政治工作，差不多都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程潜曾公开下令，禁止在他的部队中建立“孙文主义学会”，可是他却准许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正是由于林伯渠与程潜及苏联顾问等的共同努力，在六军中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军事工作，迅速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调整和改善了军队的内部关系以及军队与民众的关系，才使这支杂牌队伍很快成长为北伐战争中的一支劲旅。

随军出征

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方国民军在奉军和直、鲁联军的进攻下，撤离北京，退守南口。

冯玉祥赴苏，段祺瑞下野，北京政权重新落到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中。

在南方，湖南唐生智被直系军阀叶开鑫等赶出岳州和长沙，退至衡阳。稍后，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划下，直系、奉系等军阀又在天津、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扫除所谓“南北二赤”：在北方联合阎锡山消灭国民军；在南方联合湘鄂川滇黔豫赣闽八省军队，驱逐唐生智出湘，围攻广东、广西。

面对着这种形势，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遂决定北伐。五月间，首先派出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及李宗仁第七军入湘，援助唐生智。

六月，又决定将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稍后，蒋又被“推举”为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同时，邓演达还邀请林伯渠等各军党代表和周恩来、恽代英、陈公博等人参加，主持召开了战时政治工作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有关战时政治工作的问题。邓演达根据周恩来的推荐，并吸收了共产党人或倾向共产党的朱代杰、章伯钧、李合林、李一氓等到总政治部工作。七月，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发出北伐宣言和出征动员令，国民革命军总部和一、二、三、六各军即大举入湘。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林伯渠随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参加北伐。在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因六军一直作为预备队，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整顿各师的政治部。

在行军途中，他还多次召开军民联欢会或各界谈话会，发表演讲，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监督部队财务开支，过问部队经理处的工作，处理违反军纪的士兵，反对师、团长侵吞军饷。这些，对进一步提高六军的政治素质，改善军民关系，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引起了一部分军官和程潜本人的不满，以至后来竟出现了迫使林伯渠一度离开六军的插曲。

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底定全湘，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进至武昌城下。就在北伐军开始围攻武汉，六军奉命重返通城警戒江西之敌的途中，六军经理处党代表贺澍，将李某寄公款给程潜在上海的家属的事，报告了林伯渠。九月一日，程潜在林伯渠处发现贺的报告，大为嗔怒，当即要将贺澍撤职，“并谓唆使人毁坏其的名誉”，遂与林伯渠发生了“语言冲突”。因与程潜“意见相左”，第二天，林伯渠给程潜留一便筒，便去了长沙。

九月七日，林伯渠抵达长沙，将此事报告了李维汉、颜昌颐、夏曦等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并同他们共同研究决定：为顾全大局，暂以请病假为名，等候程潜态度的变化，如程潜诚恳地请林伯渠回去，则再回六军。当日，中共湖南省委将此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林伯渠也以“染疾到长沙医治”为由，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发了请假电报。不久，中共中央回电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嘱一方面应就此事向程潜提出警告，同时也不要对程“操之过急”。邓演达亦回电准假，邀林伯渠“到武昌一叙”。

林伯渠逗留长沙期间，看到湖南革命运动在北伐后有了蓬勃发展，非常高兴。他曾同各方面的人士作了广泛的接触，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遵循孙中山的遗嘱，“拥护革命的民权”，“巩固联合阵线”，“注意党务”，“拥护工农利益，统一工农运动”，“训练培植健全分子”，“肃清反革命派”，争取尽快使青天白日的旗帜插遍大江流域。在这期间，林伯渠还致电广东革命政府，索要现行的各种法规，以资借鉴和研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的内容：“1．应在汉口速设中央银行；2．财厅向商会借款五十万，有转向中国银行担借之说；3．此间商务系以汉口、上海为办货地，若在该二地无汇划所，以中央纸（币）及桂票皆不免低折”。这说明他此时已经注意到了革命政权和财政金融问题。

参见长沙《大公报》，1926年9月10日；《林伯渠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此书简称党校版），第14—24页。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18页。

在林伯渠赴长沙的途中，北伐军相继占领了汉阳、汉口。九月六日蒋介石命令一、二、三、六、七各军开始进攻江西。

由于战局变化及六军广大政治工作人员强烈要求林伯渠回去，中共军委王一飞等也通过其他关系做了程潜的工作，九月十四日，程潜便要六军政治部秘书李世璋、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李隆建、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张振武等，联名致电林伯渠：

我军出发江西，战事节节胜利，修水、铜鼓等县次第克复，现向南昌进击。奉军座手谕，请兄即日命驾，取道浏阳、铜鼓，赶上前方，回军襄助一切，是为至盼。李隆建、张振武、李世璋同叩，寒。

十七日，林收到这封电报后，当即回电：

寒电奉悉。我军进攻赣境节节胜利，邀听之下，不胜鼓舞。弟病渐痊，本拟克日前来襄助一切，适奉总政治部电召赴汉，本亦有此必要，准事竣即赶赴前线，并希转呈军座，藉纾廑念，至为感荷。弟林祖涵叩，

筱。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22页。

林伯渠与程潜的这场冲突，就这样算是得到了解决。林伯渠回电中所称赴汉一事，后来并未实现。因蒋介石入赣督师，路经长沙，邀林伯渠同行，他在九月二十日即由长沙径自入赣。

当时，蒋介石因他的嫡系第一军自出师以来，一直未能打好，两湖的地盘大部落到唐生智之手，很想在江西战场上大干一场，以显示一下他的声威。程潜亦不甘老是作预备队，处处随人之后，也很想在江西战场上显示一下他的拳脚。他们不顾苏联顾问的劝阻，贸然命令第六军和第一军王柏龄第一师，于九月十九日攻入南昌。但事却与愿违，这次战役中，不但第一师损失过半，第六军亦有将近半数覆没。第一次进攻南昌失败后，十月中旬，蒋介石又组织第二、三、六军再次进攻南昌，但仍未得手，而且使第二军也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蒋介石对于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北伐后“没有打过一次胜仗”，特别是一师在南昌的失败，自己也觉得脸上无光。林伯渠随蒋介石入赣后，就亲自听到他在给一师讲话时说道：“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名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36年版，第809—810页。

林伯渠在同总部行动期间，一方面设法同六军尽快取得联系，同时也经常借与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副官长张治中、军事总顾问加伦和总部的机要秘书蒋心荣、翻译王一飞的接触的机会，了解了不少情况，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工作。例如，当他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白崇禧对加伦有些不满时，就及时地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加伦，从而引起加伦的注意，使加伦同白的关系得到改善。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林伯渠行至江西奉新时回到六军。当时六军才从南昌退下来，部队伤亡较大，思想混乱，湖南派不满意广东派，广东派也不满意湖南派，而湖南派中的醴陵派（程潜的同乡）与浏阳派（参谋长唐蟒的同乡）之间的暗斗也相当厉害。十七师代师长、广东派的邓彦华，在战斗中表现不好，程潜想撤掉他，任命醴陵派的杨杰为师长，浏阳派则加以反对，想让唐蟒兼任第十七师师长。林伯渠回军后，首先在调整组织、任命干部、整顿财政、重新配备政治工作人员、巩固内部团结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在北伐军最后总攻南昌前，他还为六军制定了政治工作计划，拟定了

既通俗又能鼓舞士气的具体政治口号，如“为已死同志报仇”，“为南昌人民报仇”，“必须雪前次退出南昌的奇耻大辱”，“不收复南昌，不算革命军人”等。他还领导六军政治部动员奉新百余民众，组成前敌工作团，准备随军出征，担负输送子弹、抬送伤兵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六军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

《六军参加江西战争记》，1926年11月8日。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根据苏联顾问加伦拟订的作战计划，再次下达了进攻南昌、夺取江西的命令。这一次进攻南昌，由于总结了九、十两个月两次进攻南昌的失败经验，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把攻击的重点首先放在夺取南浔路；中共党员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在各军之间作了许多协调的工作；从湖北又调来第四军的两个师和贺耀祖的独立师；在长江以北的第八军，亦同时向安徽方向出动，以威胁敌军的退路，结果和前两次也就大不相同。十一月一日总攻开始，很快占领了德安、马迴岭、乐化、芦坑、涂家埠、九江，八日便攻占南昌，几乎全部消灭了江西敌军。

第六军在这次战役中的任务是，进攻对整个战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乐化车站和涂家埠。林伯渠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并在火线上开展了有力的政治工作。二日下午，六军第十七师由蛟桥越过铁路，与十九师夹铁路向南进攻，于四日占领芦坑车站。

五日拂晓，当部队继续向乐化进攻时，遇到敌人两个旅约六千余人的顽强抵抗，六军官兵阵亡四百余人，阵势顿形松懈。这时，林伯渠命令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前线督战，高呼“革命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第六军应该为南昌被屠杀人民报仇”等口号，六军的士气才又大振，奋起冲锋，将敌人的防线冲破，乘胜占领乐化车站，并于次日消灭了涂家埠的守敌。总计蛟桥、芦坑、乐化、涂家埠四役，六军共伤亡官兵千余人。四十九、五十五两团的连排干部几乎全部阵亡，每团士兵仅余二百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

在这次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亦有五人阵亡，三人重伤。五十六团二营营长、中共党员周保中，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色，被提升为该团代理团长的。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页。

在六军参加江西作战的过程中，林伯渠非常重视民众对战争的支援，对地方的民众运动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他在日记中，就记载了不少有关民众欢迎北伐军和热烈参战的事例。

九月二十日：“入赣境后，山川明媚，人民之希望与拥护革命军，不减于湘境。

九月二十四日：“当南军刚进袁州城时，而北兵又未退尽，居民以渴望南军之心理，家家阖户燃爆欢迎，并备茶水于门前。不谓北兵之尚未退出者，大触其怒，于是以枪柄乱打，并开枪向人佇立之门户射击，闻是役共死人二十余人云。

“新喻之战，有农民一千余人参加，纯以土炮轰敌，死农民可二百人。民众可谓充满革命性矣。

九月二十八日：“早四时四十五分由新喻行……至钱墟宿营。召集该地民众谈话，到者甚热心亲切。会毕后，该乡民等并且送来母鸡四只、大鱼五尾（初从塘中网起者）、蛋二十枚。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24、27、28、29页。

林伯渠差不多每到一处都要领导政治部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帮助民众建立革命组织和革命政权。十一月八日，六军政治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曾记述了在奉新组织民众、建立革命政权的情况。报告写道：

奉新在革命军未到以前，国民党人仅两人。政治部在奉新停留二十多天，组织临时县党部，加入党者约一百四十余人，学生分子最多。现在领导该党部工作的人，系左派，组织较强，现正设法令其组织农民。此次南浔路作战，奉新县党部组织一前敌工作团约百余人，担任输送前线子弹，抬送伤兵，很有功效……他们不怕炮火，不怕苦，显然表示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同时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

林伯渠在奉新还以政治部名义，扣押并亲自审理了奉新前县长贪官熊坤，委任王昌政为安义县知事，钟资能（六军的一个副团长）为靖安县知事。当时靖安前县长文倬（江西萍乡人），在北伐军进至奉新时卷款潜逃，其县长职务由张某代理。张凭借其子张国焘的名声，抗不交职。林闻讯后，派政治部秘书、中共党员李世璋率一营武装前往查处，扣押了张某，帮助靖安县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和工会、农会，发动群众审判了前县长和兵站催征官董纪宦。最后，林伯渠批准将董纪宦枪决。

再如，六军攻占涂家埠以后，林伯渠经过调查，了解到涂家埠所在的永修县有组织的农民约千余人，妇女协会亦有工作，即任命王怀心（中共党员）为永修县县长，周凤池为永修县警佐，王容为涂家埠警察所长，文若海为涂家埠统税局长。

六军政治部的民众工作，在入赣北伐军中是比较突出的。当时《民国日报》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第六军首先入江西后，各县民众在该军政治部指导下，均自动组织县党部、农民协会、工会等，且无不积极工作，一时革命空气，大见发扬”。

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随六军进驻南昌后，还参加了建立江西省政权的工作。当时，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的临时政治委员会，以朱培德、白崇禧、程潜、鲁涤平、李宗仁、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张国焘、李仲公等为委员，随后又成立了省的政务和财务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均作为省的临时政权机关。由于临时政治委员会代主席朱培德事事都听命于蒋介石，这三个委员会在许多重大政治和财务问题上，常与方志敏等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党部发生冲突。例如在财政问题上，财务委员会坚持要继续征收鸦片捐，并且美其名曰“寓禁于征”；而省党部则坚决主张禁绝鸦片，反对继续征收鸦片捐，提出可以开征殷富捐，以弥补财政的收入。遇到这种情况，林伯渠和李富春、朱克靖等总是利用他们与各军长以及其他委员的私人关系，多方做工作，争取那些人支持省党部的意见。

一九二六年底，林伯渠和李富春等还争取临时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支持毛泽东在武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解决了江西省农运经费问题。北伐前，林伯渠就曾与毛泽东计议过在中国中部创设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是年九月，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结束，毛泽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正式向中央提出在武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得到中央批准。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去武汉途中，到南昌再次与林伯渠筹商此事。林伯渠积极赞同这一主张，亲自陪同毛泽东访问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和该军党代表李富春，争取他们

的支持。由于林伯渠和李富春多方做工作，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作出决议：江西选派一百五十名学员送武汉农讲所学习，并负担经费一万二千元，即平均每个学员八十元。后来，湘、鄂两省选派农讲所学员及所承担的经费，基本上也都是仿照江西的办法。林伯渠、李富春还与毛泽东商量，在武汉组织农讲所筹备处，以龙式农，王礼锡为江西省的筹备员。稍后，江西省政治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决定，由通志局款项下每年拨十三万五千元作为省农协的经费，也是林伯渠与李富春等积极努力争取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相继发生英国水兵杀害中国工人群众的“一三”、“一六”惨案，在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中，武汉国民政府接管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第六军被调往九江，林伯渠又参加了收回九江英租界的善后工作。他在九江曾多次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坚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誓作政府后盾。由于六军担任租界的警备，林伯渠还到英租界视察，出席九江卫戍会议，会晤武汉政府委派的管理英租界委员会的委员，到市民外交行动委员会开会，研究加强警备和维持租界秩序，报告政府的态度与谈判进展情况，筹商有关调查惨案经过，救济罢工工人等各项问题。当时，九江国民党市党部的组织、宣传、工人、青年各部的部长及主任秘书，均为共产党员，林伯渠以六军政治部主任身份，还曾主持召开九江国共两党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党、政组织开展工作问题，决定将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公开。

六军在三次进攻南昌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兵源虽陆续得到补充，但部队急需整顿。

在九江期间，林伯渠还协助程潜对六军进行了整训，主持召开六军国民党代表大会和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成立了六军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

为了培养和补充各师、团的政工干部，他还假儒励中学校址，开设了一个特别训练班，并亲自授课。此外，他还经常到部队训话。后来六军在向长江下游进军时，表现得很英勇，就是同这一段的整训工作分不开的。

林伯渠在北伐过程中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是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当时中共中央曾要求各地党组织甘当“在野党”，就在林伯渠任命奉新等县县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曾指名批评林伯渠委任的王怀心等当县长是“腐败堕落”，充分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要中共江西党组织“急速纠正”，“立刻限期命令他们辞职”；并说“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对于林伯渠、李富春等以各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任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等虽然没有命令他们立即退出，但也提出要他们明白向国民党表示：“（1）政治部工作繁重决不能兼任政府委员；（2）暂时虽因体制不能退出，以后必须换人”。还提出要江西党的组织“注意物色举荐左派的人以为代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错误理论和行径，不但使中共丧失了参加地方政权的许多机会，限制了革命力量的发展，而且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

《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1926年12月2日。

再次到国民党中央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进入南昌后不久，便开始同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勾结，以“在宣传上抹杀蒋的功劳，且对一军有攻击之处”为借口，撤了随总部一起行动的总政治部秘书长朱代杰（中共党员）的职务，要邓演达将总政治部由武汉移至南昌。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程天放等右派分子建立“东湖社”和“AB团”等反动组织，控制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江西省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用“圈定委员”的办法（即由省党部和中央各提二十四名候选人名单，交代表大会选举，最后由张静江、陈果夫等根据选举的结果，圈定正式执行委员九人，候补执行委员三人），将原来主持省党部工作的方志敏等七名共产党人，全部排除在省党部之外，而段锡朋、程天放、王礼锡、洪轨等等九名右派分子却进入了省党部。此后，他们还勾结土豪劣绅，控制十几个县党部，排挤林伯渠、李富春、朱克靖等共产党人，撤消了江西省临时政治委员会，提请在南昌的所谓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烈钧、熊式辉为首的十一人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并以李烈钧为省政府主席。

《江西政治报告》，1926年12月。

为了研究对付蒋介石的方针办法、向中共湖北区委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汇报入赣作战和江西省的情况，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林伯渠专程到武汉，会晤了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张国焘、董必武、刘伯垂、李国焯、叶挺与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贺龙等，同他们商量，将北伐军总政治部留驻武昌，而另以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赴南昌，主持入赣北伐军的政治工作。这一决定，对后来武汉的反蒋斗争与江西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北伐军初到武汉时，为抑制唐生智，防止汪精卫回国控制党权和政权，蒋介石曾力主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但是，当一九二六年底第一批北迁人员，孙科、徐谦、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六十余人到达武汉，与在武汉的邓演达、吴玉章、董必武等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联席会议”，暂时“执行最高职权”时，他却又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十二月三十一日，当第二批北迁人员谭延闿、张静江、何香凝等到达南昌后，蒋介石又在南昌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反对武汉联席会议，作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并宣布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三中全会。

对于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公然推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东作出的关于迁都武汉的决定，武汉方面自然不能同意。二月间，武汉“联席会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暨国民政府开始在武汉办公，并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地中央委员，务必于三月一日前来武汉，准备开三中全会。蒋介石挑起的这场关于迁都及召开三中全会的时间及地点的争论，其实质就是要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妄图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北伐军完全纳入他的控制之下。

林伯渠在这场斗争中，开始因中共中央也反对贸然迁都武汉，以及他担心二、六军同唐生智的旧怨较深，怕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和唐发生纠纷，曾一度赞成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一主张。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早十时抵汉口，当晤张、张、鲍、徐、孙诸同志，谈次决定各件：

1. 三月一日以前开一政治会议，如顺利，应决定各件如次（否则俟三月一日）（须畏公速来为原则）：

A、政府及党部速移武汉（附政会改组）。

B、另组军委会，以一人主席，并以三人副之；关于军事，须三人署名。

C、在此会中，须决定与商务生密切关系（如农工政策）。

D、巩固党与政会基础。

E、财政公开，对各军须平维持。

F、军校须在党及军委管辖下。

指张国焘、张太雷、鲍罗廷、徐谦、孙科诸人。

指谭延闿。

《林伯渠日记》（党校版），第71—72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林伯渠不但完全赞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至武汉，赞成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主张限制蒋介石的权力。林这次到武汉，为争取唐生智等人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还去长沙同唐谈了三次，并会见夏曦与李维汉等人。

国民党二大后的九名中央常委，因汪精卫、谭平山在国外，胡汉民去香港、甘乃光、杨匏安留在广东，谭延闿、蒋介石在南昌，在武汉的常委只有陈公博一人。林伯渠这次到武汉后，参加“联席会议”的一些成员和鲍罗廷等人，还同林伯渠商量决定，请他速回国民党中央工作。因此，二月十四日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第二天便回九江交待工作，准备来武汉。

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这时已从上海来到九江，他的二女儿秉衡与侄女哲明也从长沙抵浔。林回九江，在向程潜报告武汉诸人的决定并对六军的政治工作进行了交待和安排之后，二月二十日即冒着雨雪，踏着泥泞的道路，携秉衡、哲明登上日本客轮凤阳丸，将家迁至武汉。这天，妻子伍复明亦离开九江，前往上海接其他子女。

林伯渠到达汉口的次日，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邀集吴玉章、邓演达、彭泽民、孙科、顾孟余、徐谦、王法勤、于树德、董用威（必武）、恽代英、江浩、许甦魂与谢晋等二十多名执、监委员开会，否定了南昌方面于二月八日提出的“中央全体会议俟东南战事告一段落另定日期召集”的决议；采纳了武汉联席会议于本月二十一日提出的“三月一日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建议，决定“用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监委员如期到会”。二十三日，武汉方面宣布结束“联席会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是日正式开始办公。当时武汉的实力派人物唐生智和邓演达等，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不高，有关三中全会的许多准备工作，实际上都落到了资深望重的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人身上。

经过斗争，最后蒋介石终于准许第二批北迁人员到武汉，同意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但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于三月七日开会时，他却又节外生枝进行破坏。三月六日谭延闿、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李烈钧等和到南昌“劝驾”的陈公博、谢晋离开南昌时，他特意要谭延闿、陈公博带口信，要会议延至十二日再开，并说：“他们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则虚伪可知”。后来，当武汉方面为照顾他的面子，将七日会议改为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改为十日举行时，他与张静江仍然拒绝到会。

陈果夫：《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北伐时期的政

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93页。

国民党中央不顾蒋介石的阻挠，于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

林伯渠在会上作了《江右军前方战况》的报告，并被推举为“设立特别党部”问题的审查委员。这次会议由于左派力量占压倒的优势，通过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和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并通过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党、国委员在汉临时联席会议继续有效案》，以及其他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会议还选出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九人为中执委常委。除这九人为当然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外，又选出了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和林祖涵六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也都进行了改选。此外，会议还撤消了中央军人部，决定将总政治部改为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均设主席团，国民政府委员中设常委。因为有了上述一系列的決定，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长的职务，撤销张静江代理中执委常委主席和陈果夫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这就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势力。

这次会议，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虽然还没有摆脱“整理党务案”的羁绊，改变中共党员不能担任中央部长的决定，但在这方面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指定谭平山、吴玉章兼任中央常委秘书（另一名秘书是陈公博），决定在汪精卫到职之前，以吴玉章代理中央组织部长，会后不久军事委员会又推举林伯渠为军委秘书长，国民政府任命苏兆征、谭平山分别为劳工和农政部长等。这些都与过去蒋介石一味限制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领导职务，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阴谋，使一些共产党员又重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出任国民政府的部长，这不仅是武汉地区反蒋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对陈独秀要中共甘当“在野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有力冲击。

在三中全会前后，北伐军在长江下游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南昌军事会议之后，北伐军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制定的《消灭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敌军的作战计划》，开始向长江下游进军。二月十八日，由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

三月上旬，程潜指挥的江右军和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相继入皖，安庆、宣城的敌军陈调元、王普率部起义。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旋即解放上海。二十四日，江右军攻占南京。至此，几乎整个长江流域都被北伐军所占领。林伯渠作为第六军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同前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除处理有关军委的日常工作外，还直接参与了北伐军新占领的一些省份有关党务和建立政权的工作。

还在江右军向安徽推进时，林伯渠就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的中共党员柯庆施，商量有关加强皖省党务和建立省政权的问题。柯庆施一九二四年由林介绍参加国民党，派至安徽工作，这时为做皖省的敌军工作，

同辛亥革命时曾任皖省都督的柏文蔚来到武汉。林伯渠邀请当时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同柯一起商量，决定由安徽省国民党省党部选派二人，随六军政治部行动，六军入皖后，首先由六军政治部与省党部派人共同组织审判反革命（土豪劣绅）机关。林伯渠并将这一意见，电告了在徽州和秋浦的李富春与李世璋（六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三月二十三日，林伯渠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安徽省应有一政治中心的机关”，要指定数人商量组织省政府的办法。这一意见为会议所采纳。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根据林伯渠、吴玉章、徐谦共同商定的方案，通过了由李宗仁、光升、常恒芸、朱蕴山、麦焕章、沈子修、李光炯、高语罕、朱克靖等组成安徽省临时省政府，并指定李宗仁为省主席。

江苏省的政务委员会，也是根据林伯渠和吴玉章的提议而委任的。三月二十三日，即二、六军攻入南京的当天，林伯渠与吴就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提出，应组织江苏政务委员会。会议根据他们的建议，当即指定程潜、何应钦、鲁涤平、钮永建、柳亚子、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十一人为江苏省政务委员。

二十五日，政治委员会又指定程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为了支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六军政治部进入南京后，还查封了蒋介石授意组织的南京市党部，和由青红帮、流氓组成的所谓“劳工会”，并在经济上给予省党部很大支持。

但是，随着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北伐战争向长江下游发展，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愈来愈猖獗。三中全会三月七日开预备会议，九日蒋介石就指使其爪牙惨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二日，蒋在江西省党部与A B团联合举行的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又公开提出我们“就是拥护江西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应打倒”。

十五、十六两日，他又指使段锡朋等封闭了南昌《贯彻日报》，解散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南昌市党部。因自武汉跑回的李烈钧向蒋报告了三中全会的情况，请他“速作移节之计”，十七日，蒋从南昌到了九江，又命令其爪牙，纠集流氓地痞，捣毁了九江的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查封了《国民新闻》，打死打伤多人，逮捕数十人。二十日蒋介石抵达安庆（当时安徽省会），二十三日，又指使流氓地痞捣毁设在安庆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及江右军政治部，打伤六人。

蒋介石这些反革命活动，大得帝国主义的喝采。为了促使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三月二十四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队和居民二千多人。蒋介石对于帝国主义的暴行不但不予揭露，反而卑躬屈膝地向它们表示歉意，污蔑“南京事件”是共产党人林祖涵、李富春欲使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故意煽动少数士兵及暴徒肆行抢劫造成的。

对于蒋介石这些摧残革命运动、反对中共、侮辱国民党中央、勾结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活动，林伯渠非常愤慨。在武汉政治委员会讨论蒋介石在南昌、九江的反革命活动时，他坚决主张改组江西省党部，惩办凶手，开除段锡朋党籍，恢复南昌、九江国民党市党部和其他群众团体。当时，吴玉章也坚决主张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加以制裁。由于林、吴等人的努力，三月二十六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否认段锡朋、程天放、周利生、王锡礼等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资格。决定改组江西省党部，派刘一峰、方志敏、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黄实、傅惠忠、李尚庸八人（一半以上

是中共党员)为江西省党部改组委员,并决定在正式党部成立之前,由改组委员代行省党部职权,筹设正式省党部。三月二十八日,林伯渠赴南京途经九江时,通过朱培德、唐蟒(原六军参谋长,时任九江卫戍司令)等人,进一步了解了江西情况之后,二十九日又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改组江西省政府。根据林伯渠的来电,三十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改组江西省政府的决议,免掉李烈钧江西省主席职务,任命朱培德为主席,黄实、王钧、刘棻、张国焘、刘一峰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

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对江西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是个很大的支持。免除李烈钧职务的决议四月二日到达南昌后,朱德、郭沫若、傅惠忠等,当日就发动南昌学生、工人占领了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逮捕段锡朋、程天放、洪轨等十余人,迫使李烈钧等逃往上饶。因有了“四·二运动”和朱培德任江西省长,朱德才得以出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此事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发动八一起义也有着重要意义。

在反对蒋介石阴谋叛变的斗争中,林伯渠直接参与了武汉方面打算逮捕蒋介石的谋划,并亲往南京与程潜进行接洽。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亟欲取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而代之。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便制定了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计划。关于此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

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廷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192页。

三月二十五日,程潜来电报告江右军已经占领南京,二十六日早六时,林伯渠便带密令赶往南京。因为事关重大,行前他还“访各友谈事”,邓演达、顾孟余、张发奎亦赶至林的寓所送行。

林伯渠这次赴宁,公开的名义是代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慰问前线将士。同行的,还有许甦魂、唐生明及随员多人。郭沫若本来也是慰问代表之一,因有事羁留南昌,未能同行。林伯渠对蒋的倒行逆施早就义愤填膺,这次肩此重任赴宁,其兴奋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密令了。

第一,“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料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交给程潜的。但是,就在武汉决定逮捕蒋介石的当天,谭延闿却要陈果夫给蒋带口信,表示一定要追随蒋,同蒋进行暗中勾结。后来,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的回忆》中即说到此事。他说: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全会闭幕后,共党正式攻击蒋先生和我……某日,蒋先生派人到汉口,命我赶快离汉,并囑于离去之前,应与谭先生接洽一次。这一天,正是我军克服上海之日。谭先生很忙,到晚上一点钟才回来,和我见面。他对我说:

“我的见解不及蒋先生，我初以为此间情形不严重，到此一看，才知严重性远出我理想之外。现在我已不能和你一样的自由了，要想离去亦不可能。但将来必定回南京随蒋先生，并且今后一切必能听蒋先生的话，请告蒋先生，不久必定可在南京会面。”说时，几至泪下。当晚向谭先生告别，二时下船。这时已经没有检查员在码头上了。

《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94页。

陈果夫在文中没有讲是什么时间把这一口信告知蒋介石的。但他离汉时，蒋尚在安庆，很可能在蒋还未去南京之前，他就将谭说的这一席话告诉了蒋介石，因而更加引起了蒋的警觉。

第二，三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已经由芜湖乘舰驶抵南京江面，并于次日驶向上海。

就是说，在林伯渠离开武汉时，蒋已经去上海。

第三，在林离开武汉时，蒋介石已电召程潜至沪，委任程为南京卫戍司令，并将帝国主义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给他的两千万反共经费调拨一部分给程潜。程通过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及与李济深、黄绍竑、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接触中，已经了解到蒋介石等人将要“清党”，同武汉决裂，他当时虽然还不完全赞成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主张，但主张“调和”，表示“愿赴汉劝合”。在这种情况下，再让他逮捕蒋介石，不论从客观上或主观上来说，都已是不可可能的事了。

因为有了以上种种变化，林伯渠虽然满怀希望赶往南京，但结果却碰了壁。三月三十日薄暮林抵南京时，正逢程潜、白崇禧、何应钦从沪归来，当晚他将“密令”转交程潜，出乎他预料的是，程却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为理由，拒绝执行，“主张商谋妥协”，并要林伯渠同他即刻回武汉去“劝合”。由于逮捕蒋介石的事已不可为，第二天，林伯渠在访问了白崇禧与何应钦，会见李富春及六军的一些人员之后，于当晚与程潜一起返汉。许甦魂、唐生明等则继续留下慰劳各军。

《湖南文史资料》第2辑，第33、17页。

程潜和武汉国民党要人，都未料到蒋介石会很快搞到二、六军头上，迅速控制南京。

程潜四月四日同林伯渠回到武汉，开始他还极力宣传应与蒋谋妥协，向人表白“不愿与蒋合作，但不合作又无钱”。因汪精卫回国后，四月五日在上海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公开宣称“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是谣言，“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此时武汉国民党要人和鲍罗廷，也都以为局势还不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想等待汪精卫到武汉后，再筹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6日。

《汪陈联合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第71页。

但客观事实很快就揭明了这种企图“劝合”与等待的思想，是多么的天真和愚蠢。

没有几天，就传来了上海国民党右派反对中共和武汉国民党的通电，接到二、六军的电报，说蒋要调他们离开南京，渡江去打张宗昌。只是到了这时，程潜才感到上了蒋介石的当，急电二、六军不要离开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亦感到蒋介石将要进入南京，危害二、六军，才决定派第四军、第十

一军支援二、六军，防备蒋介石进入南京。

但实际上这时已经晚了。程潜离开南京后，第六军代理军长杨杰被蒋介石收买，二、六军在蒋介石连续三道电令与两个参谋的催促下，已于四月七、八两日离开南京。蒋介石不但已进入南京，并且指使流氓捣毁了国民党省、市党部，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介石在南京得手之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公开举行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接着，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何应钦等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地，也开始大批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府，第一次大革命即遭到严重挫折。从一九二六年底开始的，包括林伯渠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因为缺乏经验，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加上一些同盟者的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最后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从此，林伯渠的生活和斗争，也就走上更加险峻的道路。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力量之间，出现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上海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武汉，广大群众无比愤慨，纷纷要求“讨平蒋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接连发出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他的总司令职。开始时，国共两党中央（这时中共中央已迁至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想继续执行第四军和第十一军的东进计划，协同第二、六两军和驻南京的其他部队，乘蒋介石在南京立足未稳，重新占领南京，先除掉蒋介石这个心腹之患，然后再继续进行北伐。

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反对。罗易认为“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之前”，都必须首先“巩固基地”。

他既反对东征，也反对立即继续北伐，主张应先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把武汉政府的影响扩大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加伦则从军事方面考虑，他认为：汉口到南京之间的距离，等于上海到南京的四倍，而且上海与南京之间又有铁路，蒋介石运兵至南京要比武汉快的多，东征并不会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顺利；现在主要的威胁是奉系军阀，而不是蒋介石的军队，因此，武汉政府的当务之急应当是继续北伐。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根据罗易的提议，放弃了东征的主张。提出武汉国民政府应“与冯玉祥建立紧密而有效的合作”，首先采取“防御性的军事行动”，立即占领河南南部地区，调已撤出浦口的二、六军“向北进军，占领安徽西部”，以巩固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革命基地”。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罗易赴华使命》，第176页。

四月十八日，由于张学良率十余万奉军越过郑州，沿京汉铁路南进，二、六军在鲁军张宗昌进攻下，已撤离浦口，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放弃东征计划，举行“第二次北伐”，即首先协同冯玉祥、阎锡山把奉系张作霖赶回

东北，占领京津，然后再解决蒋介石所谓东南的问题。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都赞成这个计划。随后，中共中央也撤消了十六日决议，转而赞成举行“第二次北伐”。

林伯渠本来是积极主张东征的，现在既然国共两党中央都已决定停止东征，举行“第二次北伐”，他当然也只好服从。那时人们对冯玉祥寄予比较大的希望。林伯渠当时也想先举行北伐，打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联系，或许可以更加壮大反蒋的力量，有利于将来的反蒋斗争。所以，一当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北伐的胜利。

四月十九日，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由张发奎第四军、朱晖日第十一军、贺龙独立师和唐生智第三十五军、三十六军等部队组成新的北伐军，在武昌举行誓师大会，开赴河南前线。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的林伯渠，从此以后，也就特别繁忙起来。他经常为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大量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电和军委日常工作而忙到深夜。这时，邓演达已去河南，后方的政治工作委托郭沫若代理，他还要协助郭沫若接待从上海及东南各省回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四一二”政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封锁与破坏，武汉在经济、外交方面越来越困难。长江航运锐减，资金外流，纸币贬值，物价上涨，财政极度困难。

不少工厂停产歇业，失业工人增至三十多万。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稳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上层分子与军事将领，四月二十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了“战略退却”的主张。他说：

所谓退却，就是要使外侨在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各地有不受限制的经商的权利。这个办法，不但于国民党及革命军的前途有莫大的利益，就是于工人自身也有相当的好处。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0日。

鲍罗廷提出“战略退却”的具体办法是：

（一）政府与工会合组一委员会，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中之革命纪律，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审判并处罚违反革命纪律的工人；

（二）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西至万县等处，都可以公开的贸易，并且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

（三）除得第二条所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

（四）政府应尽可能力量，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的价格；

（五）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

汪精卫、陈独秀完全赞同鲍罗廷的主张。汪精卫还提出一项包括“保护外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外人的商业”、“由外交部接洽太古、怡和公司”、“由交通部接洽招商、三北公司”和“集中现金”等为主要内容的四条十款的退却计划，并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通过。

由于前些时候湖南收回了长沙和岳州的海关，没收美孚公司煤油实行

公卖，江西的金融也很混乱，就在讨论采纳鲍罗廷提出的“退却策略”的过程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林伯渠、陈其瑗为中央特派员，分别赴湖南和江西“说明中央外交策略”。

林伯渠受命之后，经与在武汉的夏曦、谭平山和陈独秀商谈，于四月二十七日抵达长沙。他到达长沙的当天晚上，即向国民党省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外交方针。第二天，他又在省党部连续开了两次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方针，了解湖南民众运动的情况。林伯渠这次到湘，虽然只停留两天，却了解了许多情况，进一步坚定了他支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决心。

林伯渠回到武汉，除口头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以外，还专门就外交策略和农民土地问题写了两个书面报告，极力为湖南民众的革命行动辩护。他说：有许多事，确实是须立刻解决，“他们等不及中央的命令就自己处理了。例如，英、美、日各国侨民奉到他们领事的命令，全体离湘，所遗下的公司、行栈、教堂、学校等，只好暂由湖南交涉员设法保护。再如外商退出之后，美孚、亚细亚等洋行一律封闭，而湖南当地又深有使用煤油之需要，所以各团体就发起组织煤油公卖委员会，预备自行处置”。对未离湘之外国商人并未加干涉，如现在湘之德人“仍经商如故”；即使对已退出之英、美、日籍商人的财产物件等，“亦保存无损”。他还明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湖南自“五四”以后，民气勃发，素称激昂，中央在允许外商复业时，不要对民情“抑之过甚”。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2日。

林伯渠在报告中还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必须迅速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阐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他说：

土地成为问题，不是今日始，其在历史上，久已为多数学者所重视。如自汉以还，荀悦、董仲舒、陆贽、苏恂、黄宗羲之流，或主张均田，或主张恢复井田，或主张限田，意见虽各不同，要皆对于当日封建势力，所赖以生存之土地分配方法，表示深切之不满则一。

土地问题时至今日，遂成为政治之中心问题。非复

如昔宿学者之徒，著为文章，建为议论已耳。其在今日之湖南土地问题，尤形为政治社会民生诸问题之集中焦点。盖自鼎革以还，湖南农民几无日不在帝国主义及其直接间接所雇佣之恶势力下，保延残喘。军阀暴敛横征，土豪重利苛刻、竞相掠夺，层出不穷。一面生产减少，一面负累增加，是农民之困苦日深，则作求解放之心理当然益切。

自我革命收复湖南后，一般农运同志，尚遵照联会决议，皆在减租减息上宣传，以为土地问题，或须稍待，殊不知理想洽与事实相反，而土地问题，竟由各地农民热烈的，自动提出，其比较普通之处置办法，可分次之五类：

（一）曰分田。分田制，系由长沙附近之霞凝镇农民，自行提出。其分配之法以人口为标准，每男子一人，每年作谷八石，有妻室者倍之，有子或女者，每丁加谷四石，田地依此标准，被分者甚多。迨县农民协会派人前往说明，始停止继续分配。此外，湘潭醴陵县，亦类有此事发生。

(二)曰平均佃权。各县皆有此项要求发生，例不胜举。(原编者按：平均佃权系佃农互将租种之田平均耕种，不准有耕多耕少之别)

(三)曰清丈田亩。

(四)曰插标占田。如在益阳、衡阳、衡山、长沙、湘潭、湘乡、醴陵等皆有此项举动。

(五)曰分谷。此举亦各县多有发生，并有已见诸事实者。

以上是农民直接提出之问题，若夫一般间接举动，有关土地问题者，则随时发现，殆更仆难数。

林祖涵：《湖南的土地问题》，载《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1927年6月)。

在五月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林伯渠在口头汇报中，还列举了宝庆农民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例子，说：“农民收了两千多张田契，都用火烧了。闹到后来，不但农民要求分田，就是地主也自愿将田拿出来让大家分”。林伯渠在汇报时还指出，“湖南的土地问题，是一切困难事件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解决，不但农民的个人生计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亦将无法维持，财政困难也没有办法克服。湖南民众已镇压的四、五十个土豪劣绅，“办得不冤”。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

当时论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报告和文章不少，但象林伯渠论证的如此集中，如此迫切和势不可挡的却不多见。这不仅表明了林伯渠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鲜明立场，而且生动地记述了湖南农民在推倒绅权之后，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的历程。

如果把林伯渠对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和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人以及鲍罗廷、陈独秀作一比较，那么就更显出它之可贵了。在林伯渠此次去湖南前后，武汉土地委员会正在讨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曾连续开了十几次会议，国共两党的大部分负责人，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有一些军队的将领都参加了讨论。林伯渠从长沙回到武汉后，也出席过土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当时对于要不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及解决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解决，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土地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毛泽东、邓演达及出席会议的夏曦、彭泽湘、林伯渠等，都坚决主张应从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例如，顾孟余说：“解决土地问题时，农村秩序必将扰乱，耕种停顿，发生饥馑”；“在河南提出解决土地问题时，北伐士兵粮食的供给，恐要断绝”。徐谦也说：“这个草案(指毛泽东等提出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引者注)所提出的问题……不啻放一把火，不知烧到敌人，抑或烧到自己？”唐生智所属的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则说：“土地没收后，归到政府或党部，必起纠纷，如归到农民协会，则纠纷更大。”他还说“兵士及官长有许多是有土地的”，若没收他们的土地，必将“动摇兵士作战的精神”。

汪精卫虽然没有象这几个人说的露骨，表面上似乎还是赞成“耕者有其田”，但实际上他也是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如说：“必先问是否要做到‘耕者有其田’？如果是的，就应该根据客观事实，看是否已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不是，则再定其他办法”。他还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以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22日。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23日。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作为共产党人的鲍罗廷与陈独秀，与上述这些人的说法有所不同，而实际上也都反对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鲍罗廷说：“目前的困难，不在于讨论没收大地主及保护小地主这一点，困难却在于避免因此问题所发生的不好影响……故目前首先要实现以前所议决的地方自治”，只有成立了“农村自治机关”，“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陈独秀基本上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他说：“现在在革命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各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行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他还说：“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原则，但“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当前首先还是促进“农村自治之实现”，“订立土地改良法案”。这就是说，农民土地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方案也可以制订，但不是马上解决和实行。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26日。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因为有许多人反对，同时又考虑到全国的政治环境和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状况，后来，毛泽东、邓演达等人，又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最关键的一条，改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但是，将这一草案及《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公布时，仍遭到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例如，谭延闿就说：“没收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一概归公，政府还可以有笔收入”。他不但反对通过和公布《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甚至连《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也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9日。

不同意公布。他说：“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慰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

。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说：“土地问题的影响面大而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词可借。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

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决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

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汪精卫曾一度主张通过但不公布；有的地方如可以实行，则秘密通知该省党部试办。但听了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意见之后，他也改变了主意而反对通过。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19

27年5月12日。

因邓演达等人仍坚持应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会议只好付表决。

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共十一人，即汪精卫、谭延闿、王法勤、孙科、林祖涵、徐谦、宋庆龄、吴玉章、陈公博、陈友仁和邓演达，表决的结果，赞成通过的只有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三人。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开了十几次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讨论而制定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就被否决了。而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也竟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对林伯渠的思想冲击很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他对陈独秀、鲍罗廷所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也产生了更大的疑虑。

汪精卫、谭延闿等借口稳定局势，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使局势有任何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五月初，首先是张联升在鄂北自称襄樊镇守使，驱逐共产党，捣毁党部，扣留送给冯玉祥的军火及其押送人员。接着，四川杨森同驻鄂西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暗中勾结，通电拥蒋，率兵东下，相继占领宜昌、沙市，进至新堤、仙桃镇一线。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公开叛变，率部突然出现在咸宁纸坊，配合杨森部袭击武汉。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留守在长沙的许克祥部，又举行了“马日事变”，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在江西亦借口军中不稳，将在第三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并禁止群众集会。在这些反动军官相继叛变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加猖獗，各县连续发生了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与革命群众的事件。后来，夏斗寅的叛乱，虽然被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由武汉军校与农讲所学生所组成的独立师所打败，杨森的进攻，也被新从皖西调回的第二军和重新组建的第六军击退，但总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林伯渠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军官叛乱的斗争，当时许多有关军情的电报，都是经他报告给国民党中央的。他还参与了有关军队调动和组织武汉工人准备抵抗夏斗寅的工作。

夏斗寅等的叛乱，使林伯渠进一步“感到军队很重要”，这时他还参加了第六军的重建工作。六军原有三个师，第十八师，北伐开始时留在广东，早已脱离建制；第十七师，因蒋介石收买了杨杰，还在“四一二”前就已名存实亡；第十九师，四一二政变后，因程潜秘密潜往采石矶，打算把它调回武汉，事不机密，被蒋介石发觉，也于四月二十九日被蒋全部缴械。这样，第六军除了在九江还保留部分部队以外，就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拆散或者消灭了。为此，程潜从采石矶逃至湖口时，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纠正蒋介石的反叛，反被蒋把部队拆散，“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后因国民党中央去电慰留，他才回到武汉，重新组建第六军。为了协助程潜重组第六军，林伯渠曾多次接见从南京方面逃回来的原六军干部，调配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

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45年4月23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据李世璋回忆，在重组六军时，林伯渠与程潜在汉口友益街六军办事处，曾和陈独秀进行过一次密谈，商量如何把六军培养成工农革命武装，选派中下级指挥人员送往苏联海参崴进行培训等问题。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五月底曾指示中共：“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林伯渠想组织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同稍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上是一致的。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1页。

“四一二”以后，由于林伯渠的讨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和搞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接连碰壁，而客观的形势又一天天在恶化，这样他的思想就逐渐陷入了极度苦闷之中。

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或者方针政策，他感到有问题，或者有怀疑，但又得不到正确的解答。

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说，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汪精卫甚至谭延闿、唐生智都是左派领袖，即小资产阶级代表。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根据他多年对汪、谭、唐等人的了解，也很难使他相信这些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如，他在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时，听到汪精卫等人说，“除了买办阶级之外，凡是中国人自己包办的工厂或银行，不管他们的资本有多少，都是小资产阶级”；“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成天叫嚷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里有这一回事！如果真是无产阶级在领导革命，上海、广东、长沙各处的工农运动，也不会一下子就被军队打下去了”，等等，感到很不是味道，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批驳他们。正如后来他在中共七大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所讲的，那时有许多事“感觉得不对”，但因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就是“教条也很少”，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30日。

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林伯渠当时也象许多人一样，曾经希望“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后，将增强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力量，摆脱武汉的困境。但是，北伐军经过很大牺牲在占领郑州和开封之后，迎来的这位“基督将军”，却站到了蒋介石一方。尽管在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为了换取冯玉祥的支持，把河南及西北各省的军政大权全部交冯独揽。他还是在汪等离开后跑到徐州，与蒋介石进行密谈，随后并以通牒的形式，要武汉诸人“速决大计”，铲除所谓“用心之不良分子”，驱逐鲍罗廷，取消武汉政府，实现宁汉合作。

冯玉祥的这一表现，不但使林伯渠大失所望，而且再一次深深感到，依靠这些旧军人和达官贵人来革命，是毫无出路的。

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唐生智自河南回到武汉

后日益反动，汪精卫集团开始酝酿“分共”，邓演达秘密出走，中共中央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虽然又作出东征讨蒋的决定，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任命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将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调至九江及南浔路一带，但是这时的东征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林伯渠再也不愿为这些军阀政客互相争夺卖力，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东征的第四天（六月三十日），他便以“脑病触发”，向国民党军委主席团提出“请假休养”，决心与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道扬镳。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决定以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为临时中央常委。

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表示仍将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永远为工农和广大民众的利益而奋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背着兼有国民党党籍的共产党员召开“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最后遭到失败。

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再一次表现出革命者的本色。据吴玉章回忆，七月十五日那天晚上，他与林伯渠在林的寓所等候“分共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十二时彭泽民来，把开会的情况告诉他们之后才离去。这时，他同林伯渠都清楚地意识到，即将向他们袭来的是什么，但丝毫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信念。“七一五”过后，林伯渠即要妻子带着子女返回上海，而他自己则留下来准备参加更艰苦的战斗。当时，林伯渠的一位老友曾劝他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意保护他。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这些都充分地显示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

《林伯渠自传》。

参加南昌起义

汪精卫集团以“分共”名义叛变革命后，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险恶。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初步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随后，许多共产党员离开武汉前往九江，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七月十九日，奉中共中央之命，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召集在浔的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举行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政局和武装起义问题。会议分析了张发奎的态度，认为他已日益右倾，与他合作回广东，很少可能，甚至有被三、六、九军包围完全消灭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应当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南昌暴动”，“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会议并决定由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同瞿秋白商议，将上述主张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尽快作出决定。瞿秋白也完全赞同李立三的主张，并于七月二十一

日回武汉，向中央报告。就在李立三等在九江举行会议的当天，林伯渠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吴玉章等秘密乘船东下，驶抵九江。随后移居庐山。林伯渠在庐山出席了李立三召集的讨论武装起义的会议。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会议在他的厨房里举行。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十来个人。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页。

《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

差不多与李立三等在九江、庐山讨论武装起义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如果张发奎坚持拥护汪精卫的立场，即与他脱离关系，并在九江将其解决。因此，当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九江诸同志意见时，中央即表示赞成他们的主张。同时，中央还决定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代表党领导这一次起义。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向在九江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经过再次讨论，决定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派邓中夏携带暴动的详细计划，回武汉向中央报告。二十七日，周恩来同李立三、谭平山等同赴南昌，正式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周恩来等吸收贺龙参加，成立了公开组织暴动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这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已经发现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内部不稳。二十九日，汪精卫、张发奎等猬集庐山开会，决定严令贺龙、叶挺将开抵南昌的部队撤回九江，封闭九江市党部等单位，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被邀参加这次会议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迅速将此紧急情况告知共产党人，建议恽代英等火速离开九江。当日，恽代英来到庐山牯岭，约林伯渠、黄日葵、吴玉章、章伯钧等去南昌。他们立即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接应准备到南昌的中共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

在南昌，林伯渠下榻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这里是中共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前委书记周恩来曾在这里召开过前委扩大会议。林伯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徐特立一起利用旧友关系，去做争取江西省代主席姜济寰的工作。姜是湖南长沙人，随北伐军来到江西，先后任省政府财政处长、建设厅长和民政厅长等职。这年六、七月间，朱培德离开南昌，省主席一职由姜济寰代理。七月下旬，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

章伯钧：《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南昌起义研究》，第130页。

姜治方：《集邮六十年》，《湘江文艺》，1979年第8期至1980年第6期。

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当天，林伯渠与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不在南昌）、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董用威（即董必武）、于树德，夏曦、邓颖超、高语罕、杨匏安、许甦魂、谢晋、江浩和韩麟符等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

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共二十二名，联合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指孙中山）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的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最后严正宣告：今后将同一切假冒国民党革命名义者奋斗到底。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同日，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林伯渠是二十五个委员之一，且兼财政委员会主席，姜济寰仍为代理省主席，第二天下午在庆祝起义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参加了宣誓就职典礼。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急忙下令围攻。起义军决定南下回广东，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整旗鼓，再次举行北伐。八月三日至七日，部队陆续撤出南昌，沿着赣东山地向南挺进。

这时正值三伏天气，暑气熏人，赣东又多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而须发已斑的林伯渠同年轻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翻山越岭，跟着一群青年男女唱着“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上了年纪的人，歌声自然不那么优美，但他还是不停地唱着，用那不大成调的歌声来鼓舞士气，调剂疲劳。一位年轻而又顽皮的女同志，见了他那神态，笑着高声地喊起来：“喂！林伯渠同志，你应该唱‘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老年先锋’。”她把那个“老”字说得特别响亮，大家轰然大笑，林伯渠也乐哈哈地笑起来，还得意地摸摸自己的胡子。

部队向南行进，经过临川（今抚州）、宜黄、广昌、瑞金等县时，革命委员会均任命林伯渠为各该县县长。林伯渠分别用县长名义发出安民布告，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军队。

林伯渠任财政委员会主席，肩负着为部队筹款的重任。革命委员会刚诞生时，曾就财政政策问题进行讨论，决定在原则上要根本改变以往旧部队每到一地即行通过旧政府或商会提款、派款和借款的财政政策，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者阶级上去，并且决定立即废除厘金及其它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意见）。当时，财政委员会没收了江西中央银行的现金，连同其它共约有近三万元款项，可要供给一支近三万人的部队，却是管不了几天，到了临川以后，军饷和给养即发生了困难。纸币不能流通，急需设法筹办银元等现金。于是又展开了财政政策的大讨论。

黄霖：《从武汉到汕头》，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很多同志主张完全抛弃旧的政策，从现在起就对土豪劣绅和其他反动派采取没收和罚款等办法，如若不然，则不单与旧部队筹饷无异，并将动摇我们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根本政策。林伯渠、谭平山等鉴于当前部队在长途远征，军情紧急，地方情况不明，政治环境复杂，没收征发工作毫无经验，认为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不妨权且采用旧的办法，以利部队的行进。

两种意见争论的结果，决定采取新的财政政策。可是一到实行的时候，却又困难重重。因为赣东一带农民运动未曾兴起，谁是土豪劣绅、反动派，一时难以调查清楚，而旧的办法又确实可以筹集一些现金。因此，从临川到瑞金路上，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行至福建汀州，由于商会承认筹款，便放弃

了惩办土豪劣绅的办法，结果，商会在城乡各地大肆派款，连自耕农和小杂货店主也派十元、八元，而家财十万的富豪也不过出三、五百元。于是，革命委员会又决定完全摒弃旧的方法，并组织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广东潮汕，又放弃了这一作法。因为：第一，考虑到大规模的没收征发可能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岭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规模没收征发的结果，将使商业停顿，秩序混乱，反动派可能借此大肆造谣；“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还是采取林伯渠、谭平山等人的意见，暂时沿用旧的办法。战时经济委员会也从此夭折。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40页。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十月三日，撤至广东普宁县属流沙。随后，部队领导成员在流沙天后庙举行紧急会议，林伯渠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贺龙、叶挺、吴玉章、郭沫若以及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指示决定：武装人员要尽可能地集中、整顿，转移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战斗；非武装人员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由当地党组织物色好农会会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去香港或上海。根据党的这一决定，林伯渠与贺龙、刘伯承、吴玉章、彭湃诸同志，于七日来到海陆丰地区，然后分头化装潜入香港。

林伯渠从碣石港出发，坐舢板船驶抵香港后，见到了周恩来等同志。据照料周恩来在九龙养病的范桂霞回忆，周恩来是十月下旬到九龙的，养病半个多月后，即在香港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会议是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举行的，她先后见到彭湃、瞿秋白、林伯渠、阮啸仙、李立三等同志出席会议。

《广东文史资料》第29集。

林伯渠在香港不能久留。因为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厚颜无耻、颠倒黑白，把北伐军进入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一事，说成是第二军和第六军干的，诬称林伯渠是“宁案罪魁”、“国际要犯”，悬赏缉捕。

当时，共产国际有人在香港。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同志确定林伯渠到莫斯科去。为了等待去莫斯科的机会，他首先潜回上海。

在上海，他深居简出，等待时机。他的二女儿林秉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父亲常避居亲戚家中，我发现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表现出愁闷的样子。留在上海这段有限的时间内，仍按他的老习惯，不断阅读各种书报杂志，有理论的，文学的，还有那些左翼的刊物。只要是当时新出的书，从报上看到广告，就让我堂姐哲明去买。他自己是不能随便上街的。”

林哲明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冬在上海又见到叔父。他是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占潮汕失败后秘寄来到上海的。那时我们住在法租界里，郭沫若、蔡畅、张太雷和夫人、张国焘等人经常来家和叔父商谈事情。当时大家都是假装亲戚身份来联系的。”

林伯渠后来在自传中也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莫斯科）。那时交通困难，两次在沪上船不果，商定要我先试从日本走，我遂到日本西京。”

林哲明：《胸怀高洁淡素秋》，《广州日报》，1983年10月31日。

《林伯渠自传》。

一九二八年春林伯渠到日本后，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误以为他是唐生智，要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幸好得到两个世侄邓孝纯（即邓伯粹）和林定平的掩护，赶紧给他办好去欧洲的护照，在买好船票后，连夜护送他去毅贺港上船赴海参崴。林伯渠在海参崴等了两三个月，才到达莫斯科。

在苏联的日子里

林伯渠抵达莫斯科，已经是一九二八年的夏秋之交。在这里，他很快遇见了亲密战友吴玉章。吴是上年末与刘伯承等到莫斯科的。他们在列宁的故乡重逢，格外高兴，感慨万千。随后，两人一同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吃同住，开始了难忘的学习生活。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成立的，苏联人叫孙逸仙大学，设在沃尔洪卡大街十六号。当林伯渠入校时，学校已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是米夫。学校有个中国问题研究院，任务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基本问题，总结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研究工作分两大部门，一是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和文字改革等；一是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有关的最紧迫的问题。

当时，苏联的党和人民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准备农业全盘集体化而斗争的同时，围绕着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胜利的问题，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展开了激烈斗争。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围绕着谁对中国革命失败负责和中国的出路何在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林伯渠在研究院里，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参考书籍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努力研究中国革命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他和吴玉章合作写成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题为《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批判了卡尔·拉狄克关于中国社会的谬论。

卡尔·拉狄克是前中山大学校长，由于他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一九二七年底被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并撤销了校长职务。他曾写过一本《中国革命运动史》，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外国资本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因此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该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林伯渠与吴玉章不赞同这种观点，决定著文驳斥。于是，他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

上海新宙书店1929年出版。

《吴玉章回忆录》，第188页。

他们认为：“中国的地主，不是封建诸侯时代的地主，而是货币经济时代豪绅、商人、官僚等财产资本的地主，是高利贷变相的地主。”由于“官僚地主愈富则需要奢侈品日多，商业也要繁盛起来，商业资本又要大大地积累”。但是，“商业资本受了封建势力的反动政治的压迫，行旅毫无保障，多财反觉危险，所谓‘怀璧其罪’，因此使积累的资本不能投到工商业。恰好

因中国土地可以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于是资本就投到土地上面来，变成固定的自然的财产资本，使货币资本失去了很大的作用，回转到封建经济、自足经济。”

他们继续写道：“中国这个半封建的经济制度，保障了中国的封建的家族社会与地主阶级政治。而封建的家族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又反过来束缚了经济，因果相循，就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财产资本的土地经济制度，是阻碍中国经济不能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他们认为：“中国封建余孽不仅存在，而且还有非常顽固的势力。”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非推翻财产资本的地主阶级不可。”“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革命”，“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二月，林伯渠进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特别班。同在该班学习的，还有吴玉章、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叶剑英、夏曦、江浩、李文宜等人。他们比一般学员的年纪为大，同志们混称他们为“老头班”。这些“老头”都是受过较多教育，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战士，因此学校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比如，适当地减少俄语课时；配备水平更高、更老练的教师；又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导人，回国后还得继续肩负领导工作，因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领导方法的训练上。

林伯渠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

为了加深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学习领导工人运动的本领，他还经常同李立三等去听工人运动专题课。在学习中，他认真听讲，作笔记，答好课堂提问，积极完成作业。为了能直接听取俄籍教师讲课和阅读原著，他起早睡晚，坚韧不拔地攻读俄文。他按照对普通班的要求来严格要求自己，用“快速学习法”，投身于紧张的阅读俄文报纸、散文和俄语语法的学习，因而较快地掌握了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俄语词汇，大大方便了看书、听课和查阅图书资料。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程时，林伯渠特别注意理论上的思考和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他经常和“老学生”们交流学习心得，讨论疑难问题。平时，他好安静，独自攻读，潜心钻研，在讨论理论问题、特别是讨论重要原则问题时，他积极发言，声若洪钟，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楚。

他非常关心年轻的中国同志的学习和思想。原长沙女师学生刘英，经常去看望徐特立老师，同时也去拜访林伯渠。每次，林、徐都热情和她谈心，解释疑难问题，生活上也非常关怀。当一些中国学生向林伯渠请教有关中国革命问题时，他不厌其烦地回顾大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澄清模糊认识，鼓舞革命信心，并谆谆告诫他们：外国的事情复杂，最好不要插手；要多多联系国内问题，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把自己武装起来，将来好为中国革命出力。一些同志回忆与林伯渠相处的这段生活时，都说“他是非常正派、和善、德高望重的恂恂长者，在政治上有高深涵养，在学习上极其勤奋”；“对王明一小撮拉拉扯扯、鬼鬼祟祟的卑污行径，非常鄙视，不屑与之搭界。”

吴黎平：《深切怀念林伯渠同志》，《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

一九三一年春，林伯渠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了集体参观活动。他到莫斯科市区工厂和郊区农场，参加工人、农民的会议，倾听他们对苏联经济

政策的热烈讨论，了解基层产业单位的经营实情。他还到较远的列宁格勒等地去旅行，参观夏宫、冬宫，巡视工厂和船坞，并把见闻和感受写在日记里。这一参观活动，进行了三个月。在总结参观收获时，他滔滔不绝，深感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更加生动地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

林伯渠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党性。一九二九年秋，苏联共产党开展了清党活动。共产主义大学也进行了清党，开展了激烈的斗争。林伯渠后来在追述自己的感受时说：“我在苏联那几年，正是联共党清党的时期，这对于锻炼我的党的意识与健全党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无可否认地在国内时这方面注意得实在不够。”“一年多的学校生活，对于我的训练，如果说是理论方面的，还不如说是关于怎样把握党性恰当。”

《林伯渠自传》（原稿）

一九三一年夏，林伯渠被派去海参崴工作。当时，在海参崴地区约有十万名中国人。

苏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中国青年工人中加强培养做政治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干部。为此，苏联远东边疆党委将原海参崴俄国党校的中国部单独建校，命名为苏联远东边疆中国苏维埃党校。党校需要大批中国教师，林伯渠和吴玉章等先后被派去工作。

关于林伯渠在党校的工作情况，当时的教务主任兼列宁主义教员陈大刚（即张锡畴），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写的《回忆林伯渠同志》一文中，作了翔实的介绍、他说：

在接受访问后写的，系未刊稿。

（林伯渠）只要工作需要，他就勇挑重担，既教书又教人，诲人不倦。他教的主要是中国语文。鉴于学生语文水平参差不齐，他分几个进度进行教学，并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反复地不厌其烦地结合着课文的政治内容去讲解，直到学生完全了解为止。他还抽空到班里去进行辅导。有时学生也直接到宿舍去找他质疑。他教学很受学生欢迎，学生的成绩也比较好。……

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室，宣传中国革命。当时，当地

许多苏联党政干部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但对中国的情况却知之不多。这种情况，在党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也同样存在。为了加强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和研究，在吴玉章、林伯渠、杨松等人的倡议和参加下，学校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在那里集中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关研究中国问题的图书和资料，还向国内订购了中文报刊，绘制了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地图和图表，定期举行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会、座谈会等等。

林伯渠、吴玉章、杨松等，便是我们经常的主讲人。这些活动加强了人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逐渐使中国问题研究室成为学校传播中国革命信息、宣传中国革命的阵地。

协助党委书记工作。苏联办这种类型的中国学校，既缺乏经验，又有语言障碍，困难较多。按苏联的体制，学校的党、政是分开的。行政负责人不兼党委书记，但必须是党委成员。党校当时的党委书记，通常是从学生的骨干中挑选的。为了加强党委的工作，我们常固定一位教师协助党委书记。有段时间，林伯渠就担任了这一工作。他责任心强，党性强，坚持原则，常同脱离党的政策和路线的倾向的人和事作斗争。他除协助党委书记安排日常工作外，还给党员讲党课，找同志谈心，并结合自己的革命经历，向师生进

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

他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如去中国工人五一俱乐部、中国戏院参加某些大型的中国工人集会和娱乐活动。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向有关的同志了解在中国工人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扫盲工作的情况。当他了解到用汉字进行扫盲的困难时，深感扫盲工作的迫切性和改革中国文字的必要性。恰巧这时，苏联负责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拉丁化委员会，也决定在中国工人中试用拉丁化汉字进行扫盲。于是林伯渠和吴玉章便和一些苏联语言专家一起，以瞿秋白等人的研究成果作基础，制定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并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方案加以改进。之后，便用拉丁化中文出版报纸和书籍；在中国工人中用拉丁化中文扫盲；对每个中国干部进行拉丁化中文考试。这些措施，对在中国工人中的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瞿秋白是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首创者，主张中国的文字改革必须是革命，著有《中国拉丁化的字母》和《新中国文草案》。

林伯渠在党校时与吴玉章同住一间房。他们议论时局，研讨问题，互相切磋，彼此照顾，了解至深。有一次，有人利用吴玉章在编写一本中文教科书中的某些提法，向远东边区党委告状，说他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在远东边区党委要党组织讨论给予他处分时，有的主张给予劝告，有的主张给予警告。林伯渠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他在发言中说，党组织处分同志的目的，是帮助党员改正错误，吴玉章已经自觉地改正，就不必给予处分了，只需作一个决议，嘉勉他改正错误就行了。结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并嘉许吴玉章是党员的模范。

林伯渠在海参崴时，苏联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党校还没有自己的食堂，林伯渠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到普通的中国工人食堂用膳，他只是在非常需要时，才到中国餐馆去吃一顿便饭，算是改善一下生活。

他也和其他置身异国的同志一样，惦记着远隔千山万水的妻子，关怀儿女们的成长，在工作之暇的言谈中，多次地提到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准备把妻儿接去海参崴，但由于妻子办理护照找不到保人，加上中东铁路事件尚未了结，“九·一八”事变又已发生，中苏海运不通，愿望未能实现。伍复明在上海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秉益、秉琪）回到湖南乡下，二女儿带着妹妹秉佑去南京，求人谋了个小职员，姐妹俩相依为命。

林伯渠思念着他们，但为了革命，他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着。在学习上，他除了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继续学习俄语。为了满足他如饥似渴的学习要求，党校还从远东国立大学中文系物色了一名学生，来单独给他上课。这一学习，他一直坚持到离校时为止。

林伯渠在海参崴中国苏维埃党校工作期间，国内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工农红军连续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和红军都有了很大发展。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便急于回国参加斗争。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借去南俄养病的机会，专程到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请求派他回国。批准后，他迅速返回海参崴，交代好工作，即离开苏联。

当时，中国留苏学生回国有三条途径：一条是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新加坡到香港或上海，这条路很安全；第二条是越过东北中苏两国边界，由于中国边防管理不太严，我们的同志可以在夜间潜入国内，这条路也算比较

安全；第三条是从海参崴直接到上海，这比较危险，因为是坐苏联船，而且是从苏联来到上海。林伯渠“明知非常危险”，但他急革命工作之所急，为了争取时间，毅然“从海参崴搭舰回沪”。他“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林伯渠自传》。

他是扮成水手模样，乘三北公司的轮船到上海的。上岸以后，忽然有几个人走来围住他，一个说他是从苏俄来的，一个抱住了他的腰。他有点吃惊，以为被发觉了。幸好，这些人并非特务，只不过是一群讹诈勒索的流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不与纠缠，尽其所有给了那伙流氓，换了个安全脱身。

林伯渠到上海后，住在西摩路党中央一个招待所的亭子间里。这时，临时中央已迁往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组织部长杨天生（黄玠然），把决定他去中央苏区的意见告诉了他，要他不要随便出去，就在招待所里等船票，做好起程的准备。后来，中央局交通部主任刘作抚送来了船票，并护送他上船。他取道广东汕头，再经过大埔、茶阳和福建永定到了苏区的边境。在进入苏区时，由于敌人封锁很严，曾被搜山的敌人打伤了手，但他没有犹豫、畏缩，仍日夜兼程，闯过道道关卡，终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抵达了渴望已久的中央苏区。

为革命理财

林伯渠辗转来到中央苏区以后，首先肩负了国民经济部部长的重任。当时，敌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虽已被粉碎，但仍对苏区进行着残酷的经济封锁，加上党内的“左”倾错误，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面临严重困难。

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去专做政府工作。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以他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正式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并发布训令指出：“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随后，人民委员会任命林伯渠为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为副部长。

《人民委员会训令》第10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8日。

林伯渠到职后，在千头万绪的经济工作中，首先抓了粮食问题。因为中央苏区上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歉收，边沿地区的粮食不断遭受敌人抢劫和烧毁，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和根据地群众都迫切需要大量粮食。

他认为，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多种准备工作中，“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生活”。他除了关心、促进农业生产和纠正过去忽视粮食工作的错误观点以外，国民经济部成立后不久，他就发布了第一号训令。

一方面要求粮食调剂局从粮食较富裕的地区多采购一些谷物，另一方面，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召开区、乡代表会议，吸收贫农团、工会和妇女会的代表参加，展开讨论，以便采取说服、鼓励、竞赛等方式，发动群众在最

近两个多月内，每人设法节省一斗谷子卖给苏维埃政府，支援革命战争。在他的努力下，各地收集粮食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训令》第1号，《红色中华》，1933年5月20日。

在安排好解决青黄不接的粮荒工作以后，林伯渠立即把精力转移到夏收以后的粮食工作上。当时，田野里碧绿的稻浪，随着熏风的吹拂，很快就要变成金黄的穗浪了，两个月之后，新谷即将上市。他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认为苏区的粮食本来还是比较丰富的，但若没有全盘的、周密的计划，那就容易造成粮食恐慌。例如上年江西的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秋收后谷物跌至六、七角钱一担，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奸商、地主乘机操纵，将大批谷物偷运出境，或者大量囤积，待价而沽。有鉴于此，他于五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国民经济部第二号训令，将此情况告诉人民群众，并且指出，为了充实红军供给，保障后方民食，我们必须开展储粮运动。

《红色中华》，1933年6月4日。

如何开展储粮工作呢？林伯渠着重提出了两条措施。第一，“倡办粮食合作社”。

粮食合作社是集合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农村中的其他劳苦群众的股份（用钱或谷物交股金）而成立的。秋收后社员需钱用时，可将粮食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储存一部分，以供来年社员的急需；其余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较高的地方出卖或者出口（到白区）。这样不断余进菜出，既可扩大资金，又可使社员获得盈余。开办粮食合作社，可使苏区的粮价不至于过低或过高，从而保障民食，免受剥削之苦。训令要求务须在每一乡成立一个粮食合作社。

第二条是“建造谷仓”。林伯渠分析当时的形势说：“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公家将有很多的谷子要在各区、乡保存，如今年的土地税，决定征收谷子。红军的公谷，以及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都准备了现款在秋收后来收买粮食……还有粮食合作社，也有不少的谷子。总共这些谷子，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要把它集中于一处，是万难办到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此要分区建造谷仓，保存谷子，免致耗损，成为这一任务的首要条件。”

他要求“各县国民经济部，应帮助并催促各区、乡政府，调查旧有谷仓，加以修葺。

在还没有公共的谷仓的乡，要建造谷仓一处，至少以能容纳三百石谷子为限（由粮食合作社管委负责），以供粮食合作社之用。在每区要建造谷仓数处，每区谷仓容纳谷子的数量，要以规定该县储积粮食的总数量为标准，由各县国民经济部会同财政部，按照该县区数之多少估计建设各区谷仓的数目。”他还周密地考虑到，安置谷仓，须觅有掩蔽而交通较为便利的地方。随后，又领导建立了谷仓管理委员会，制定和颁布了谷仓管理规则。

由于政策正确，措施适当，又发动了群众，上下一起努力，到今年八月间，兴国、瑞金等县都建立了一批粮食合作社，仅兴国就有八十三个，瑞金壬田区有十二个。这年，中央苏区的农业生产比上年增产一成半。苏区的粮食储量大大增加，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展生产，均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动员群众参加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人民委员会于七月间决定

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八月二十日，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在瑞金叶坪开幕，林伯渠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第）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发出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伟大号召。翌日，林伯渠作《发行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的报告。十五日大会发言，就开展经济建设竞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日，大会就发展合作社、推销公债、建立和健全粮食调剂局、进一步开展对外贸易、筹款、加强新区和边沿地区的工作、培养干部以及开展自我批评等问题，作出了决议。林伯渠在闭幕词中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它将使苏区的经济建设运动获得迅速的开展。

紧接这次大会之后，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北部十一县（有三个县因故未能参加）在博生县（宁都）也召开了经济建设大会。两次大会的召开，大大地调动了各县的积极性，一个经济建设的热潮，在整个中央苏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经济建设大会召开的同时，林伯渠受命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原部长邓子恢改任副部长。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对因自己错误造成的财政困难束手无策，反而嗔怪邓子恢对克服困难没有办法。他们的批评是不客观的。本来，主力红军筹款自给，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确定下来的红军三大任务之一，实践证明，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敌大我小、打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运动战的时候，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没有根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保障红军物质供给唯一正确的财政方针。可是，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却死啃教条，认为这种方法不正规、不光彩。他们不待时机成熟，便于一九三二年七月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改由政府负责供给。

第二年初，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他们批评邓子恢的财政收入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意思是说，没有建立在可靠的税收上，而是建立在没收土豪的财产上。这一来，财政部就不得不提高税率，并且“日益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从而使财政重担全部落到根据地人民身上。然而，“当纸币发行达二百万元时，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斗争》上就发表文章，批评财政政策是‘向石印机瞄准’，发行稍一扣紧，而影响了前方需要时，就又批评发行方针是‘抓着怕死，放了怕飞’，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1934年初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后，专任财政部长。

曹菊如回忆，转引自《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第1169页。

在这极其困难的年月里，林伯渠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为保障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物资供应，解决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给养问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毛泽东认为，在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发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林伯渠领导财政部，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一九三三年九月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首先，他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确定副部长邓子恢兼管这一工作，并在地方和部队设立下属机构；提出向白区和苏区的地主、富农筹款六百万元的任务，规定在筹款中“对于地主富农要有分别，对地主是消灭他的经济力

量，对富农是削弱他的经济力量，因此，地主的钱应该筹个干净，富农的钱则只能捐他的一部分。” 然后，大张旗鼓地开展征发没收工作。

《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红色中华》，1933年9月3日。

《中央财政部土地部为筹款问题给乡主席、贫农团的一封信》，1933年10月19日。

其次，适当控制纸币的发行。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原则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至于财政上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林伯渠为了稳定金融，在《六个月财政收支计划》中规定，“国家银行应于九月起，在财政部监督之下实行独立，执行银行本身职务”，以便于掌握货币发行政策。

《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红色中华》，1933年9月15日。

第三，充实干部力量，整顿机关作风。对财政部所属的公债局、税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单位，增加工作人员，减少兼职，整顿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帮助政府和部队的后方机关建立和健全预算、决算、审计、调配、供给、会计等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开展节约开支、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并且亲自主持财政部机关工作人员会议，揭发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切实予以克服。

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一九三三年最后几个月财政困难情况有所缓和。

一九三四年一月，林伯渠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大会原安排他在二十九日下午作苏维埃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后来主席团突然获悉蒋介石已经调兵遣将，分三路进攻中央苏区，当即决定先由毛泽东作紧急动员报告，并将会期缩短五天。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扩大红军、实行赤色戒严、镇压反革命、作好运输救护工作、搞好经济建设等项要求和措施，号召军民团结一致，争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报告后，林伯渠接着报告经济建设问题。他首先回顾了两年来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成就，指出：工业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一般恢复到了武装起义前的数量，农业生产在短短的时间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建立了对外贸易机构，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打破敌人封锁的工作，改善了苏区内部的市场供应，粮食工作也有很好的成绩，发展了粮食合作社，动员群众收集了粮食。在谈到经济建设的意义时，他说：苏区的经济建设，既能“造成将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优势与前提”，又是当前“工农群众争取解放的重要条件”。现在的“经济建设工作必须和战争动员联系起来，反对任何把经济建设与战争动员对立的观点，及一切‘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必须“提高我们的阶级警觉性，加强经济建设机关的领导，坚决打击一切对经济建设阴谋破坏及消极怠工分子”。对于当前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应着重抓什么的问题，林伯渠在报告中指出：“今后必须尽量提高我们的土地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繁荣苏区市场，开展合作社运动，集中资本，巩固苏维埃金融，特别是收集粮食运动，在目前更要加紧去进行”。

《红色中华》，1934年2月1日。

他在这里强调粮食收集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既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反映，同时也对后来的财经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一九三四年初至十月间，“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他们只从需要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盲目地要求“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强调“正规战”，以堡垒对堡垒，使红军不能到外线作战和筹粮筹款，这样就造成财源枯竭和粮食困难，因此，解决红军吃饭问题，就成了财政部门艰巨的任务。

中央曾经决定：“土地税完全收谷子，不准折谷交钱，公债也须以收谷子为原则，使能充分保障红军给养”。林伯渠领导财政部遵照这一指示，把推销公债、征集土地税，甚至节省运动，统统转移到粮食的轨道上来。他核定了各地应交土地税谷子的数量，规定了公债折谷的价格，并组织干部配合有关部门有效地督促各地交纳。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到三月下旬，“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县份一般的已经完成或快要完成，收集到的谷子在百分之六十以上，现款约占百分之四十弱，相当（地）解决了粮食问题的困难”。

在中央苏区军事、财政等方面越来越困难的日子里，林伯渠联想到来苏区以后的亲身经历，感到“左”倾机会主义者那些“吃过洋面包的人的办法看来不行”，向毛泽东表示过自己的疑虑。吴亮平回忆当年的情景说：“当然，他也不起来公开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不坚决拥护。执行还是执行，但他对同志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他一不搞阴谋诡计，二不走极端，总是维护党的利益”。

《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供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1934年1月23日。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初步总结》，1934年3月26日。

吴亮平谈话记录，1979年5月8日。

同时，林伯渠也不惧怕排挤打击。在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子恢等由于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个个受到批判、斗争和责难之后，他仍然经常对人称颂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方法，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执行毛泽东提出的财政工作方针。

他经常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他们的疾苦。一次，他走入一个老百姓的家，进屋即闻到鸡香味，户主请他喝鸡汤，他尝了一口，没有咸味，经询问始知无盐可放。回机关后，他在人民委员会议上，提出了缺盐问题和解决的意见。毛泽东支持他的意见说，是啊！没有盐不好吃饭，即使有鸡也吃不下去。不久，一个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在苏区普遍地开展起来，暂时解决了群众的缺盐之苦。

他爱护干部，及时地指导他们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财贸训练班的学员姚名昆，被派往赣县江口，筹办江口对外贸易分局，并任局长。他带去会计、出纳、采购、保管各一人，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帮助下，选了一家大店堂，雇了几个帮工，招牌一挂，爆竹一响，就开张了。他们原指望开张鸿发，生意兴隆，可是一连三个圩期，都生意清淡，眼看无法开展营业。姚名昆着急了，跑回瑞金，找林伯渠汇报。林伯渠见他思想包袱很重，就边安慰边开导他说：“同志！困难是有的，总要坚持，想办法克服，‘直钩钓鱼’、‘守株待兔’是不行的。要走出店门，与白区商人主动‘搭桥牵线’，做争取他们的工作，这是关键”。他还进一步说明了对外贸易的意义，鼓励姚名昆做好工作。他听说姚名昆有亲属住在赣州，还特地叮嘱他要改个名字，以免连累亲属。姚名昆听了，愧感交集，信心倍增，回到分局，改名姚玉生，传达了

林伯渠的指示，与同志们一起研究。

他们收起招牌，关上店门，五个人穿起长袍，戴上礼帽，肩起钱搭，雇了脚客，扮成阔商派头，分头到储潭、大湖江、沙石埠、茅店等赤白交界的地方活动，主动同偷着与苏区作生意的白区商人搭桥牵线。于是，一笔笔生意在酒桌上拍板，业务大大发展了，一连几个月，营业额月月成倍增加。

姚名昆：《红色贸易》，《赣南文艺》，1982年第1期。

林伯渠身体力行，克己奉公。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个月内节省八十万元经费的号召，他除积极组织有关单位予以响应外，还同年轻战士一起，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一道砍柴、种菜、熬硝盐。在短短的时间里，各级党政机关团体的行政费用，平均“减少了百分之三十”。

林伯渠在中央苏区一年半，广泛地动员苏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着反“围剿”战争的庞大财政开支，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

《中央财政收入节省款项初步统计》，《红色中华》，1934年4月13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

长征路上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红军迭次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最后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先后派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闭（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任弼时、肖克、王震、张子意等领导的湘赣红六军团前往湘西同贺龙、关向应、夏曦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十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也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向湘西转移。

中央决定离开苏区时，确定项英、何叔衡、瞿秋白、陈毅、邓子恢等留下坚持斗争，林伯渠随军出发。临行前，何叔衡在住地梅坑，特备清酒、花生，邀请林伯渠作竞夕谈。

他见时将冬令，旅途艰难，便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与林伯渠。林伯渠心情沉重，思绪万千，作《别梅坑》诗一首，以表惜别之情。他写道：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3页。

当时，林伯渠到中央苏区后结婚的夫人范乐春，正在做月子，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她的心里非常难受。林伯渠安慰她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我们不要难过了。”说完，他又抱着小儿子深情地说：“孩子，不是爸爸不爱你，不是爸爸不带你走，这是艰苦的斗争啊，这是白

匪的罪恶啊！不然，爸爸怎能离开你们呢！”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妻子说：“你一定要和群众在一起……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有了老百姓，你就有饭吃，就能开展工作。”并鼓励她说：“你一定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到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金砂暴动，曾任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中央苏区红军优待工作局局长，是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她牢记林伯渠的嘱咐，后来，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病逝于闽西。

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新湘评论》，1980年第2期。

林伯渠和范乐春才生下二十几天的儿子，在敌人占领中央苏区时，范乐春将他和邓子恢的儿子（生下十几天）分别托给在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后来，林的小儿因范的堂兄嫂无力支付哺乳费，而其乳娘又夫死改嫁，遂被乳娘带至会昌的洛口。不久，由洛口卖到漳埠，复由漳埠卖到靖石，再由靖石人卖到洛口之下洛赖平旺夫妇家中，取名赖平亚。一九四九年江西解放，邓子恢请人将其子（时已取名范宜德）和平亚找到武汉。

当时虽有人告知邓子恢，范宜德是他的亲生儿子，但因平亚小时患病腿上留下残疾，邓觉得不便将跛腿的孩子送还林老。另外，邓子恢当时还不知平亚被卖的经过，对范乐春将亲生儿子交外人抚养，而却将别人的儿子交其堂嫂抚养，也多少还有几分疑惑。因此，邓子恢便托杨立三把范宜德送到北京林伯渠处，而将赖亚平留在身边，并给其改名叫邓苏生。一九五二年，范宜德（时已改名林秉苏）从其养母处知道了谁是他亲生父母时，邓子恢才将真情告诉林伯渠。但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二人仍决定“易子而教”。

直到一九五四年邓子恢调到北京工作，两位老人当面向两个孩子说明此事的经过之后，邓苏生才回到亲生父亲林伯渠身边。他为了感谢邓子恢夫妇抚养、教诲之恩，纪念两位老人崇高的革命情谊，至今仍叫邓苏生。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长征命令，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林伯渠被编在中央纵队，又名“红章”纵队。当时中央机关和后勤部门都编在这个纵队，共有一万多人。在长征的过程中，林伯渠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一起，经过千难万险，进行了艰苦的行军，同时他还担负着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的职务，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于江西安远、信丰间，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因为到了白区，不能再用苏维埃钞票买东西，过章水的第二天，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根据没收征发委员会拟定的文稿，发布了《没收捐款暂行细则》，提出：各部队在白区行动中，应发动所属士兵尤其是党团员在驻地附近调查地主、富农及反动分子，进行没收工作，将没收的金钱、军用品、资料等集中团供给处，送交没委会；米谷、衣服、日用器具等的分配，由没委会规定原则，“由供给处负责商同政治处，分配给部队及群众（应当特别注意分发给当地群众）”。细则还规定：“在我军新占领之城市，一切没收、征发、捐款等工作，均集中由进城部队之最高政治机关及其没收委员会统一进行，各部队不得单独进行，以免造成无组织的混乱现象。”

这里所说“城市”，主要是指一些县城。

长征途中，林伯渠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经常是每到一地，

就召开会议和找人商谈，研究部署筹集与分配粮款的问题。

十一月，中央红军连续突破敌人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和潇水，进至湘江东岸，随后，经过一周的激战，又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在红军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仍然保持着庞大的中央机关，舍不得丢掉坛坛罐罐，带着大批辎重，迫使红军不得不作甬道式的前进。过了湘江，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减至不足四万人了。接着，部队进入湘桂边境的越城岭山区。这里山高路陡，桂系军阀胁迫老百姓坚壁清野，不但行军日益艰难，部队的供应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部队的供应，有时林伯渠还要亲自带领战士和干部去打土豪。

由于这一带多是苗族、壮族居住的地区，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党的民族政策。他经常教育战士和干部：“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保卫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的，只能打土豪，不能伤害劳动群众和少数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次，他和部属一起去筹粮，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把粮食藏起来，人都跑光了。他们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坑里，发现了两百斤玉米。同志们正要往口袋里装，林伯渠却强调要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将没收委员会的告示放在此地；如果是一般老百姓，则按市价收买，并留言我们是红军，是帮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后来，经过调查分析，认定物主是一户中农，大家按林伯渠的指示，把信和钱压在坑边，才将粮食背走。

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为了严明革命纪律，林伯渠对部属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

十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打开湖南通道县城，十四日占领贵州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决定进军黔北，在川黔边境创建新的根据地。会上还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队伍，将中央纵队（红章）与军委纵队（红星）合并。一九三五年一月初，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方面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中国革命又重新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林伯渠热诚地拥护党的遵义会议的决议，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在遵义得到暂时喘息的时间，这里物资比较丰富，红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补充，但林伯渠的工作这时却更加繁忙了。进入遵义城的第二天，他就派总供给部杨志诚随一军团前往桐梓，协助一军团从事没收与征发工作，购买布匹、洋油、药品与通讯器材等。这时军委规定，各部队按规定的地区筹集到的粮食、现款和物资，除粮食留够自己部队一个月的食用以外，其他都要上报“没委”统一处置。一月二十三日，林伯渠以总没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和红星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联名发出《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办法》的通知，规定：谷子一律不作价，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每人每天发六分钱菜钱；取用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布匹整匹的照市价三分之一算价。当时总没委和总供给部，依靠各部队和地方工作团将各种物资现款收

集起来，然后再将布匹赶制成衣服、绑腿，按照新制定的供应标准，将各种物资和一些现款分到有关单位。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它附近的桐梓等县城的商业也比较发达。林伯渠在进行没收和征发的工作中，按照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十分注意保护工商业和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对城市的没收征发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要乱贴“空条子”；凡没收征发的事，均须经过没收机关的审查与批准，向商人捐款一定要极端审慎，没有明显证明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商店，不能没收；对于商人兼地主的，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不没收其商店。如果不没收其部分财产，采用罚款更有利时，其部分财产也可以暂时不没收，对于反动统治下的保甲长及在反动机关任职的普通分子，应根据其阶级成分及群众对他痛恨的程度，而决定是否没收，不能一般的认为凡是保甲长便是反革命，而立即没收其财产。

遵义会议后，部队进行缩编。二月二十日，总政治部决定取消各级没收委员会，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负责指导与计划没收征发工作。林伯渠仍然担负着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军委纵队的没收征发工作仍然由他直接负责。

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之战，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向四川天全、芦山一带开进。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山路崎岖难行，有的地方，根本无路可走。

年近半百的林伯渠，每天带上他的五件宝——棍子、草鞋、粮袋、马灯和军包，和同志们一起坚持艰难的行军。组织上给他配有一匹马，他很少骑，经常用来驮辎重或供伤员使用。夜晚遇到特别难走的路，他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拄着拐杖，照顾其他同志。正如老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在回忆中所说：“他的小马灯从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给大家。他不仅是在险隘难行的路上，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几乎都要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我们大家安全地通过。黄镇同志在长征中的那幅素描，画着林老提着小马灯，雄姿焕发，阔步朝前，就很真实地表现出了长征中老英雄的精神面貌。”

李坚贞：《手举马灯照万人》。

在进入四川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师的路上，林伯渠除了继续从事收集粮食和资材的工作以外，还参加了地方工作。他五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就曾这样写道：

早六时，由泸定行，行五十里，经口基到兴隆坝

（龙八埠）宿营。今晚开少数民族（夷民）会。博古同志意见：

- 1．夷民尚未形成一民族；
- 2．须要在阶级上侧重联络白夷。

我主张提出：

- A、民族自治；
- B、区域自治。

嫌说话中未将侧重白夷事加力说明。

这里不但反映出林伯渠在长征路上参加党的民族工作，而且可以看出，从这时起，他就不大赞成用现成的民族定义来解释民族的形成问题，提出了“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设想。

六月十七日，军委纵队翻过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了达维。

次日，又行九十里抵达懋功县城，与率领四方面军先遣部队来迎接中央红军的李先念会合。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实现了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全军上下都无比高兴。但是，这里是藏族地区，人口稀少，多是草原游牧地，粮食十分缺乏，部队的粮食供应却成了大问题。到达懋功的当天，林伯渠便召集叶季壮、李湘聆、吴东生、杨志诚等商议筹粮问题。红军在懋功停留期间，林伯渠领导供给人员共征集到五万八千余斤粮食，总算勉强地保证了红军的行动。为了加强筹粮和后勤工作，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和恢复总供给部，并确定由林伯渠统一负责。

六月二十三日，军委纵队到达两河口。这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等也到了这里。

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组织远征军，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还决定进行松潘战役，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以北地区，以便使主力能够顺利地向甘南前进。林伯渠出席了河口会议，并积极赞同党中央的方针。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8日。

为了帮助四方面军贯彻河口会议的决定，解决两军统一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代理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后勤方面总负责人林伯渠组成慰问团，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进行慰问。

当时，四方面军的部队大部分驻在岷江以西的理县、汶川（威州）一带。六月三十日，林伯渠等离开两河口，经过三天的行程，翻过虹桥雪山，于七月三日到达杂谷脑（即今之理县）。因四方面军后勤机关和中共川陕省委均住在此地，慰问团遂决定林伯渠留下慰问这里的部队，并了解有关后勤方面的情况，而由刘伯承、李富春继续前往四方面军总部驻地东门外沟，会晤张国焘、陈昌浩和徐向前，并慰问那里的部队。

林伯渠在杂谷脑慰问过程中，通过和四方面军的供给部、兵站部、财委、粮秣处、军需处、九军供给部和川陕省委的多方面接触，详细地了解了四方面军的组织、人员编制、所存现款物资与粮食情况，还协助他们进一步制定了筹粮计划。当时红军正准备进行松潘战役，军委划给四方面军的筹粮地区是杂谷河至马塘以东、黑水芦花以南地域。

林伯渠协助四方面军划分了各军的筹粮地段和筹粮数目，提出由川陕省委书记负责，找藏民作干事，尽快组成筹粮队，协助部队筹粮，由茂州运四百包茶叶到沙坝，由杂谷脑运四百包茶叶到马塘，以便换取粮食、羊皮、布匹和其他军用品。他还向驻卓克基的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发出一封电报，要他们再筹粮三十万斤，以补充这里粮食的不足。

然而，就在这时张国焘却提出要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由四方面军单独攻打松潘，并要中共中央速决我军“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而故意延宕攻打松潘的行动。他还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设军委主席和常委，由陈昌浩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策动陈昌浩向中央建议，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恩来以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在中央政治局确定的大的方针之下，“给军委独断决行”之权。

刘伯承、李富春在得知张国焘这一企图后，由李富春于七月六日一时，

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说因“此事重大”，望中央预先予以考虑。次日晚，刘伯承、李富春回到杂谷脑，林伯渠在知道这一情况后，也感到问题严重。当时，李维汉奉中共中央之命，正在杂谷脑准备接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林伯渠曾告诉李维汉说：你这个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

由于发现张国焘企图控制军委和改组中央领导，松潘战役一时还难于进行。七月十一日，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离开了杂谷脑，返回中央。这时，因中共中央和军委已由两河口经卓克基进至黑水芦花地区，他们便沿杂谷河谷，经马塘与马河坝奔向黑水芦花。

七月十六日，林伯渠抵达黑水附近的侧格。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准备经过草地北上，林伯渠又投入了紧张的筹粮工作。他亲自到罗坝街等地督促筹粮，调运黄金、白银与茶叶等物资，派人到各地购买或换取粮食，还同总政治部和四方面军傅钟等人商量，调集了五千人，专门从事运粮工作。

由于几万大军云集在这一地区，消耗了许多粮食，而很多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又把粮食埋藏起来外逃了，部队只好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来筹集粮食。为了使这一工作能够有组织地进行，尽量多收集到一点粮食，而又能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林伯渠在侧格期间，还起草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事的通令》，并同总政治部商议，用总政名义发出。

其原文是：

这里“番人”即指藏民，是沿用旧的说法。

为着统一与有计划的收集粮食，不引起番人反感起见，关于各部队收割番人的麦子事，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通令各部队一律遵照执行为要：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麦子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四）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他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五）收麦子时应连根拔起或用镰刀去割，应将全丘麦田割干净，严禁零星拔麦头，践踏田中麦子。

（六）麦子收割后必须多打几次，打干净，不许浪费、随便丢弃。

（七）严格禁止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

（八）各地所驻部队收割麦子，为统一收割麦子起见，由军团与师政治部作大体的分配，再由各团政治处分配麦田给各单位去割，分配机关应将麦田以丘为单位编成号数，并用册子登记号数。

（九）为着保证本通令的执行，责成各政治机关与指导员，向给养与割麦人员详细传达与解释本通令，并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违反本通令的事件之严重者，送裁判所解决。

总政治部 七月十八日

为了准备部队北上，林伯渠还领导总供给部在打鼓山（雪山）脚下的仓德，设立招待所和运输站，在大部队过打鼓雪山之前，就把一些银子和物

资运到那里。

七月二十三日，林伯渠随军委纵队由侧格经打鼓雪山到了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本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即决定分左、右两路军即刻北上，但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去的错误主张，于是，中央军委又不得不命令部队在原地进行休整。这样，原来费了很大气力收集到的准备过草地的粮食，又被吃掉了，林伯渠只好又作出第二次筹粮计划。

第二次筹粮比第一次更加困难。正如林伯渠在日记中所讲的，这时的筹粮与分粮都到了“极紧张时”。他多次同军委、总政和毛泽东、张闻天、聂荣臻、林彪、左权、李富春、何畏、傅钟等商量筹集和分配粮食的问题，请求军委将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二六六团暂时调归粮委，以便加强筹粮和运粮工作。他还亲自组织力量去金藏、卓克基等地运粮或护送银子，先后派出杨志诚、王盛荣、李湘聆、吴振城等，到小姓沟、卡力革、波罗子、格德、卓克基等地去协助筹粮。

为了解决军委纵队本身的筹粮问题，林伯渠不但多次召开会议，部署各单位进行割麦，组织纠察队，派出工作组进行督促与检查，还亲自参加割麦，检查割麦进度，处理割麦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因工作太紧张，这时林伯渠病了一次，但他仅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工作。

两次筹粮，第一次七月五日到八月十五日，筹粮七十五万斤；第二次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筹粮四十万斤，总计共筹粮一百一十五万斤。这自然是中央领导全军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林伯渠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粮食就是生命，多筹集一斤粮食，就可能多保存一个战士的生命。应当说，在筹粮工作上林伯渠是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的。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决定红军分左、右路两军北上，以便占领洮河流域，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同陕甘边苏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红军配合，“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第二天，右路军开始分批过草地。林伯渠是第二批和中共中央、右路军司令部、军委纵队及红军大学一起过草地的。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一不平凡的经历：

《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1935年8月20日。

八月二十三日，晷。早六时由毛儿盖行。行七十里，到腊子塘宿营。是日，兵工厂工人掉队十七人及其运输员二十余人。又工人家室数人。露营，雨。

八月二十四日，晷，时雨。行约七十里，到分水岭

西北头地区露营。夜雨。翌晨，据兵工厂管理员周科长报告，昨日傍晚，兵工厂行到红大后三里地区，被敌骑兵袭击，损失、冲散其运输员约四十余人。

八月二十五日，晷，时晴。行约七十里，到后河宿，露营。晚来雨，该地草浅，无从树。是日，掉资材一背，八六元。

八月二十六日，晷，时晴。是日，行约六十里，超过色既坝前约二十里露营，无雨。

八月二十七日，晷，时雨。是日，行约七十里，离

班佑四十里地区宿营。夜雨。

八月二十八日，曇。行约六十五里，到向包座方向的白舍宿营，有房子。

八月二十九日，晴。早起约至诚、傅钟到总指挥部开筹粮会会议。

a、一百一十二万八千斤。

b、三处粮区：巴西、阿西、包座。

c、时间：卅号——三号，共五天。

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它告诉人们，即使在过草地时，林伯渠也还是时刻关心和照管着同志们安全与红军的辎重。走出草地后，他不愿连日行军的疲劳，又立即开始了紧张的筹粮工作。

正当林伯渠在巴西地区积极组织力量进行筹粮时，张国焘又借故制造事端，拒绝率左路军向班佑靠拢，致电陈昌浩等，命令右路军违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南下，并企图危害中央，迫使中央不得不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因为是突然决定出走，林伯渠派出筹粮的干部和运输员，有五十多人未能调回，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九月十二日，林伯渠在甘肃省迭部县的俄界，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等人关于同张国焘斗争的报告和下一步战略部署的说明，他完全赞同中央改变原定的“川陕甘计划”，率一、三军团北上经陕北、甘东北打通国际路线，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创造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方针，拥护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他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行径，非常气愤，当时就赋诗斥责：

刚过草地到巴阿，无那西风日未斜。

且喜境界新耳目，不虞粮秣少胡麻。

巨猿解缆技殊巧，野虻射人事可嗟。

前路纵遥知马力，谁予便利敢分家。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4页。

俄界会议决定一、三军团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九月十七日，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接着翻过岷山，于二十日到达哈达铺附近的鹿园里。在这里中央决定取消先遣工作团，将财委改为供给处。林伯渠出席干部会议，听了毛泽东关于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第二天，林伯渠又率供给处人员经哈达铺到荔川镇筹粮。到达哈达铺地区后，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分别改编为一、二、三纵队。由于在这里中央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九月二十七日部队进到通渭县榜罗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举行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陕北到靠近苏联边界创造根据地的计划，而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随后，红军向陇东高原前进，越过六盘山，于十月十九日抵达陕北吴旗镇，与陕北苏区第一路游击队胜利会师。

林伯渠是十月二十日到达吴旗镇的，住镇前黄地沟台。经过饱尝无根据地之苦以后，他看到这里又有了根据地，有红军和群众的欢迎，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一样，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十月二十五日当他在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听到毛泽东在报告中讲“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今后党的任务就是要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之后，更是兴奋不已。他回

顾一年长途跋涉，越过无数雄关险道，瞻望未来，感到革命前途无限坦荡，遂写下了纪念长征的历史诗篇——《初抵吴旗镇》。

一年胜利达吴旗，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歧。

初到陕北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决定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到陕北，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革命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林伯渠的工作和斗争，也相应地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来到陕北，林伯渠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变，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时已临近寒冬，部队和机关都急需补充大批冬装，例如，他在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即写道：

早八时，趁毛招商被服及其器材问题，决定：

- (甲) (1) 羊毛衣 五千套(最急);
- (2) 羊毛短裤六千条(最急);
- (3) 羊毛风衣六千件(一千最急);
- (4) 羊毛帽子五千顶(三千最急);
- (5) 绑带五千双(三千最急);
- (6) 羊毛夹被二千床(一千最急);
- (7) 布军鞋一万二千双(六千急, 余次急);
- (8) 夹袜一万二千双(六千急, 余次急);
- (乙) 西药。
- (丙) 无线电器材。
- (丁) 兵工厂器材：

a. 设采办处于凤凰镇，以杨至诚为主任；

b. 拨款二万七千元交支队司令部。又拨三千交采办处。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5页。

指用羊毛絮代替棉花做成的冬装。

这里“毛招商”指应毛泽东之召，商讨有关问题，“凤凰镇”即凤凰寺，在吴旗镇东北约二、三十里。当时陕北地广人稀，地瘠民贫，物资缺乏，解决冬装的布匹、棉花，基本上都要派人到甘肃庆阳的西峰镇和黄河沿岸的韩城、朝邑、蒲城等地去购买，不要说筹集经费，单是这项组织工作也就相当繁重了。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和红军司令部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甘泉下寺湾，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不久前由鄂豫皖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时，红十五军团在反对敌人对陕北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才打罢榆林桥的战斗。两军会合在一起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从林伯渠做供给工作来说，任务也就更加繁重了。据林的日记记载，在下寺湾他曾找陕甘边区政府的粮食部长马锡五、财经部长杨

雨亭等调查，仅冬装一项，前后方即需棉背心四千件，棉裤七千件，短皮大衣九千五百件，共需棉布三千六百匹，棉花三千七百四十斤，羊皮三万八千张。可想而知，在当时陕北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筹到这些物资并且做成衣服，该是多么的困难。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以前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派来陕北工作的几位领导人，错误地进行“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使人、主要领导者、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和一大批陕北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当作“反革命”拘捕起来，前后错误地杀害了二百多人。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到达下寺湾后，中央就立即制止了这一错误的“肃反”，指定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组成工作团，前往瓦窑堡调查处理，要他们放人，从而挽救了陕北苏区和红军。在下寺湾，为了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决定中央对外面公开用西北中央局，对河北及白区仍用中央，任命毛泽东为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周恩来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中央还决定，后方办事处设在瓦窑堡，其任务是：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上武装动员和地方兵站，并担负军委委托指挥某些军区和军分区。

在下寺湾，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林伯渠为中央政府财政部长、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和国家人民银行西北分行行长。在这以后，林伯渠便将部队的供给工作转交给军委后方办事处，而专做政府的财政工作。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是西北的革命政权机关，同时也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它的各部负责人，绝大部分是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部的部长。林伯渠财政部长的职务，名义上是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却只有一个，它既是中央财政部，又是西北办事处的财政部，需要用哪一个名义就用哪一个名义。

十一月七日，因敌人继续对陕北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的地域，西北军委决定进行直罗镇战役。林伯渠随洛甫、博古率领的中央机关离开下寺湾，经高桥、安塞、蟠龙于十日抵达瓦窑堡。这里是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林伯渠等到达时，受到中共陕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林伯渠到瓦窑堡的第三天，即同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省苏维埃财政部长艾楚南商量，调拨陕北“苏票”三千元送前方，拨借大洋三百元交红军总供给部购买布匹，并就此事给前方的彭德怀和毛泽东发出“一电并一函”。

到瓦窑堡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西北办事处成立，公布办事处由博古（主席）、林伯渠（财政部长）、邓发（粮食部长）、王观澜（土地部长）、崔田民（国民经济部长，不久改为由毛泽民充任）、徐特立（教育部长）、蔡树藩（司法内务部长）、罗梓铭（工农检查局长）、邓振询（劳动部长）等人组成。十一月十六日，西北办事处发布的第一号训令就是讲的财政问题。训令明确指出：在革命战争时代，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主要是夺取敌人资财和对于剥削阶级财产的没收与征发，军队和地方政府必须注意加强对资财之夺取与征集，建立预决算制度，注意节省，开展节省运动。训令还提出了统一财政，统一发行票币，按累进的原则开征土地税的要求，“责成中央财政部、军委供给部明确的坚决的根据上列原则，定出具体的计划和办法，在财政上保障大规模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

根据第一号训令的指示精神，十一月下旬，林伯渠与毛泽民、马明方等，在瓦窑堡召开了陕北各县、市、区的财长联席会议，并领导财政部编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提交中央政府会议讨论。为统一财政、建立健全财经制度与机构，林伯渠还根据他多年从事财经工作的经验，领导财政部先后制定和颁发了《各级财政部组织纲要》、《暂行会计条例》、《暂行金库条例》、《暂行金库会计出纳细则》，以便各级财政部门有所遵循。

针对国民党政府“集中现金”(指银元)，只准用纸币、不准用现金，如有用现金的，查出全部没收的反动金融政策，十二月，林伯渠还与博古联名发出有关金融问题的布告，提出：

一、拿现金到白区办货，有被没收的危险。苏维埃国家银行为保障商人利益，特设法办到白票，有要出外办货的，可拿苏票和现金到银行换取。

二、苏区商人到白区买货，最好不带现金而带些苏区的货，如皮毛、牛羊、驴子、洋油、枣子、木耳等去，白区商人来做生意的，也最好是贩些苏区的货回去。这不仅免去携带现金的危险，而且一个来回，可赚两倍利息(润)。

三、如某某商人或群众有特别情形，必须运现金出境的，银行当可照数兑换，但为防止奸商偷运起见，须要向当地地区苏维埃或县市苏维埃登记，持有登记证及介绍信，才能兑取。

林伯渠再次主持中央财政部后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制定和发布的上述文件，对苏区各级政府建立比较完整的财经制度和工作秩序，集中财力支援革命战争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冬，刘景范去中共三边特委任军事部长，到中央财政部领款曾拜访过林伯渠。当时中央财政部就设在一间约二十平米的平房内，屋中除一张旧方桌，一条长凳，简单的办公用品和一张单人床与被褥外，别无它物。此时瓦窑堡已是大雪纷飞，朔风呼啸，林伯渠还只穿着两条单裤和一件没挂布面的老羊皮袄，在腰间扎着一条小绳。他接过领款的报告，叫会计如数将款取来，亲自点交给刘景范，还谆谆告诫说，现在苏区财政困难，要注意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尽量想办法克服困难。林伯渠这种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和蔼可亲的革命精神和作风，给刘景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二月间，红军东渡黄河，进行东征，五月间胜利回师陕北，不久又进行西征，进至宁夏同心、海源和甘肃靖远一带。这时，东线敌人汤恩伯、阎锡山等三十多个团，乘机渡过黄河，占领吴堡、绥德、延川等地；南线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亦沿肤施(延安)、甘泉、鄜县大道北进；北战国民党陕北地方部队高桂滋、高双成部也很活跃。林伯渠随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离开瓦窑堡，到了保安。

到保安时，由于红军在苏区内扩大了一万人左右，东征在山西扩大八千，西征又扩大一千余，另外在俘虏中还争取了三千多人，红军的军费开支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到一九三六年八月，仅前后方的经常费用，每月即需九万多元，再加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为他们准备粮食和冬装，所需的费用就更大了。比如冬衣，原计划做三万五千套，后来，为准备二、四方面军的到来，军委又命令再增做三万五千套，只这一项费用即达三十万元。所以，这时政府的财政也更加困难了。到了九月间，不仅政府的财政现款全部用尽，而且“苏票”已发行到八十余万元。

为了解决前方的军需，克服财政困难，在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的领

导下，林伯渠首先积极发展食盐和其他农产品的贸易，组织运输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陕北靠近内蒙、宁夏一带，有很多盐池，食盐资源非常丰富。六月间，红军占领盐池、定边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就电令红二十八军宋时轮、宋任穷注意保护盐池。随后，西北办事处又派毛泽民去统一领导食盐生产与贸易工作。为了尽快扩大食盐出口，林伯渠提出，靠近盐池各县区政府，都要帮助群众设立消费合作社或运盐合作社，组织各村庄附近所有群众的牲口，直接到花马池等盐池运盐。他还提出应加强贸易局的组织与工作，增设省贸易局与合作社，国家银行亦应特设营业部，以便有计划地组织食盐和其他农产品出口。

能否调动群众积极性，尽快组织大批食盐出口，关键是政策。林伯渠坚决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总想由国家垄断的思想，主张充分发挥商人和群众的积极性，放手让他们经营。七月二十六日，他与博古联名给红二十八军转毛泽民的指示中，就曾明确指出：“现时蒙汉合组公司不能实现，张司令亦一时不能出面”，“对于产销方面，不应采取垄断式之国家公司；不论在生产及销运方面，均应努力吸收商人资本参加。为此，必须利用定边之商人及商会，利用其经验及产业。”指示中还说：现在国家主要是设盐税局，收“盐产统一税”。即使设立盐业公司，其任务也只能是，“帮助生产动员，及代贸易局购买与运输公盐向南线出口”。“盐业公司必要时可投少数资本，大量垄断或投资是不适当的。应极大的吸收商人资本投资。”为了调动商人和群众经营盐业的积极性，指示还提出：“税率应轻”，可以“拟定以驴驮一元，骡牛（一驮）一元三角，骆驼（一驮）一元六角”；在盐的工本费方面，“至高只能增至原价百分之三十五（即驴驮六毛），不然妨碍商人的投资、销路及蒙汉关系。应严格的纠正工会方面之过高要求，这种要求客观上将破坏盐产销事业”。指示还提出应积极“发展并组织盐户合作社，出卖粮食布匹等”，以便促进盐业生产和运输。

应是指张学良。

后来，因有人仍想组织垄断性的盐业公司，林伯渠与博古再次致电红二十八军及毛泽民，指出：依靠国家大批投资组织盐业公司，“目前无可能且不应该”。过去，中央苏区的钨矿和陕北延长油矿组织垄断性公司，“均系失败之经验，应拒绝继续采用这种办法。”他们还指出，组织盐业公司，如不能出资，“想利用二百人（作）财力，势难管理就范，只能起牙行作用”，不如国家设局收税“更为正大简便”。

林伯渠到保安后，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设法提高苏区货币的信用，扩大其流通，活跃苏区的经济生活。当时苏区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拒用“苏票”的现象，这不仅直接影响苏区的财政，而且也给群众的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财政部参考过去中央苏区的经验，结合陕北的具体情况，曾想了许多办法。

第一，明令禁止国民党货币和现金在市面流通，规定到白区购物需用“白票”，须持“苏票”或现金到国家银行换取。

第二，与西北军委、西北办事处联合发出通令，命令红军收受罚款、捐款时，欢迎交纳“苏票”，所筹现金和“白票”，全部集中供给机关，并转送后方作为对外买货之用。

第三，在安塞、洛河川、宁条梁增设贸易分局，在吴旗镇设立人民银行分行，以便调剂市场货物，扩大“苏票”流通，加强金融管理。

第四，出口食盐、农产品换回来的布匹，留出三分之一，由国家银行批发给各合作社，供给群众。在苏区境内出卖食盐布匹等，无论合作社或私人，一律使用“苏票”。

第五，凡销售苏区的食盐和收取税金，一律收“苏票”；运输食盐出口的，虽然一般的仍应坚持收现金或“白票”，但亦可与商人协商，以布匹或货物作价交纳。

上述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提高了“苏票”信用，扩大了其流通量，而且进一步活跃了苏区的经济生活，为克服财政困难创造了条件。这种不用无条件直接兑现以稳定纸币的办法，还加强了“苏票”同“白票”斗争的地位，避免了“苏票”成为“白票”的附庸。这一经验，不论对当时还是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采取的第三项重大措施，是进一步加强财政统一，健全财经制度，集中财力，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八日，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发出的《关于筹款问题的训令》中提出：凡已成立地方政权的地方，没收工作由政府执行，部队可派人在该地方政府帮助工作。所筹之款，驻扎在该地的部队可提取一部分或大部，但所筹的多余之款，必须交总供给部并报中央财政部，以资调剂。对于所留下的款项，亦须按月报告转账，即照数打领条给上级供给部，作为领到之经费，以便在会计上表现出筹款及开支的情况。训令还规定：没收的物品亦要作价转送后方，作为缴解的筹款；留在部队使用的，也要作价转账，报告上级供给部和中央财政部；各部队都必须建立经常的预算制度，按时结算；总供给部下建立审计处，以便审核所属机关部队的收支。

八月二十五日，林伯渠与博古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地方财政的指示》，对省财政部的组织机构、收支范围及与县财政部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强调必须“在自给原则下，建立各省单独负责的财政制度”，有关财政方针与各省收支概算，均须经中央财政部批准。在概算范围内，入不敷出的，由中央协助解决；支出有余的，必须将多余部分缴解中央。

为解决财政困难，林伯渠到保安后还积极提倡和支持发展生产。当时保安已划为中央直属县，新调来该县任苏维埃主席的刘景范提出：保安县人少地多，可以同时发展农业与牧业，奖励垦荒，垦荒的土地两年免征公粮；禁止宰杀和出境幼、壮与母畜；向农民购买和借用一部分余粮，用来榨油、生豆芽和做豆腐，以便解决中央机关和部队到后的吃菜问题。林伯渠完全赞成刘景范的意见，提出办事处各有关部门都应该给予大力支持。由于他的赞助和推动，办事处很快批准了保安县的意见，并通知中央有关部门给予财力、物力上的支援。这样，保安县的农牧业与副业生产便发展起来，缓和了机关、驻军供应紧张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由保安迁至延安。这时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开始转向抗日方面。中共中央为了准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边区或特区政府，再次实行国共两党合作，二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观澜亦调出另行分配工作；同时决定将政府的土地部并入国民经济部，粮食部划归财政部。林伯渠在会上提出：“暂时政府名义上不变动，实际上我可负责，等省政府确定后再改变。”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此事直到这年四月中旬才对外公

布。

林伯渠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后，为适应时局的变化，四月二十一日，他与中央审计委员谢觉哉联名发出通知，通令各单位在“时局由战争状态转到和平，由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转到合作”的情况下，财政上必须更加注意“健全各种制度”，发展“种菜、养猪、养鸡、做鞋袜等”生产事业，注意“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省的传统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通知中还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出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

四月二十六日，林伯渠还以代主席的名义，发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布告》，对以前逃跑的地主豪绅，现在又纷纷回家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置办法：

（一）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的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的租债，不许再索取。

（二）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但去年以前的欠租，应宣布取消，不准索取。至于债务：甲、利息已超过本或等于本的，不再付利；乙、利息尚未及本的，可酌量情形付给微利。

（三）地主豪绅回来，可与其他群众一样受到苏维埃的保护，但同时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得有欺压群众、反抗政权机关的行为，违者依法处办。

四月间，林伯渠还主持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会，并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刘少奇、张国焘、凯丰、林彪、杨尚昆、聂荣臻、肖克、郭洪涛、傅钟、彭真、马明方、蔡畅、贾拓夫、刘长胜等一起，被选入大会主席团。这次会议共到代表二百二十余人，另外还有六十余人列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讨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博古《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并致闭幕词。他热烈拥护毛泽东的报告，着重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体会。

这次会议，因为同时还有红军和白区的代表参加，因此又称“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第一，他认为“十年苏维埃斗争奠定了实行民主共和国的基础”。他说，十年来我们作了一些大事，如创造群众武装，创建根据地，领导群众从事经济、文化建设，同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就是连白区报纸也是不能不承认的。这些成绩与经验，不但“应该表扬”，而且可以在抗战中运用，成为“民族解放的支柱”。

第二，他认为，在我们党内应该向大家解释清楚，我们争取民主、抗战，但前途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他说，“历史前进不是直线的，应该有迂回，我们这个迂回不是小路，而是大道，有各种条件能够使我们走上大道”，“使革命走上非资本主义前途”。

第三，他说，我们党的不断进步，“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后来国焘路线的克服”，遵义会议纠正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巴西的决定，十二月决议，这些都说明党是有力量的，“能纠正自己错误”，“能拿出主意来”，“担负起解放民族的责任”。

在讨论博古的报告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代表们的发言对“博古同志报告有很大发展，都是很好的”，同时也讲了自己对于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意见，提出了创造抗日民主模范区的六条措施：一、集中军事力量，在一个月肃清土匪，安定民生；二、制定选举法，实行民主选举；三、紧缩政府机关，加强财政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四、增加文教经费，切实地把教育组织起来；五、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六、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加强干部教育，发挥党的优良传统。他还提出，希望各位代表及与会的其他同志，今后对政府工作多加以督促。

林伯渠代表主席团所致的闭幕词，主要是说：对于大会的几个报告，大家经过十几天热烈的细心的研讨，一致表示同意，这是大会的伟大胜利。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以后，就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指出救中国的方向，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见，同时也是全民族的胜利。

“我们不仅看着这些成绩，而今天更切实讨论了我们具体的方针——民族革命的明灯”。“现在各代表团，应拿着这一方针，作广泛的深入的解释，要传达到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儿女中去。”我们决议已通过了，我们也一定能够负起责任来，开展未来的伟大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还主持召开了特区党代会，到会代表八十四人，选举了特区党委，他以几乎是全票当选为特区党委委员。

林伯渠到达陕北至抗战爆发前这一段，由做部队的供给工作，再转到政府的财政工作，直到最后全面主持政府工作，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特别是财政经济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实现党的新的战略转变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酝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

自从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确定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林伯渠即开始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方面，他不仅积极拥护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建议，还直接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

一九三六年初，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国广大民众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中共的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在继续调集重兵“围剿”红军的同时，开始试探同中共进行接触，指示南京政府驻苏使馆的邓文仪，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谈判，希望中共能派人回国同南京国民党进行联络；在国内，则示意陈立夫等设法同陕北中共中央建立联系，进行秘密谈判。

一九三六年二月，宋庆龄受宋子文、孔祥熙之托，请董健吾、张子华

前往陕北递送南京方面密函时，第一个站在瓦窑堡城门口欢迎他们的便是林伯渠。这时红军东征，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已去山西，周恩来在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所以接待他们的工作便落到了林伯渠和博古等人身上。林伯渠与宋庆龄多年失掉联系，现在见到她派来的使者，分外高兴。董、张到后第二天，林伯渠即陪同他们会见博古，转交了南京方面的密函，详细地询问了南京和上海方面的情况。

董健吾又名周继吾，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秘书长。张子华又名王祥绪，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员。任中共豫鄂陕特派员时，曾到过陕北。

博古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前方的毛泽东、张闻天等。毛泽东、张闻天曾打算要博古、董健吾、张子华、周恩来等同到前方商议此事，后因董急于回上海复命，遂于三月四日与彭德怀联名给博古转董健吾一封电报，请董转告南京。其电文是：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毛、彭

四号十二时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在董健吾返回南京时，林伯渠特意交给董三枚江西中央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和一套纸币，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以资纪念。

在董健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前后，中共与杨虎城、张学良的统战工作也有了进展。

为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与南京当局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问题，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山西石楼附近召开了扩大会议。林伯渠从陕北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赞同张闻天、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与军事战略方针和外交（指与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并讲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一，为了尽快打开局面，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完全赞同“以发展求巩固”的观点，拥护中央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的口号，以便尽快实现红军直接对日作战。他说：“现在应用发展求巩固”，“东下是大家同意的，如毛（泽东）所定，应把力量用向矛盾的集中点去”，“到河北更可扩红”，扩大我们的影响，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还详细列举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收支情况，提出即使从筹款的角度来看，也“非向东不可”。

第二，他在会上还提出，为了领导抗日战争，应尽快地把我们的力量

搞得大些，“扩红应为十万”，批评李德反对红军东征，害怕红军东征会“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他说：“李德提议，不能赞同。他不动，不扩大……对敌我力量估计不对，恐怕红军行动替苏联惹祸”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说，我们现在“已是主体”，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各方面的工作都要做扩大的准备”。为此，他积极赞同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到北方来”的观点。说“一、二年前各处去发展，现在已渐入合综之时”。红军主力集中到北方，行动“则更可合拍”，增加我们的威望，便于打开同各方面的联系。

第三，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抗日新局面，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特别提出培养干部的问题。他说：“形势甚好，干部非常要紧，经过锻炼者已不少，但还应及早多为培养。”

方法，除加强原有干部的培养，加强政治工作以外，还要在工会中及其他革命群众中找些人来。红校应成为二千人的组织，还有各系统的教育工作。”为了改进和加强干部工作，他还提出对过去在干部工作中“有些不应有之事”应该加以解决，恢复一些人的原有待遇，甚至提得更高些。使用干部要“知人善任”，对“工农干部，如张国焘那样胡乱的捧是不对的”。对他们也要进行“理论的培养，工作的检查，不要乱戴高帽子”。

林伯渠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彭德怀、杨尚昆在发言中，就曾明确表示赞同林伯渠关于扩红和干部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也说：“扩红，同意伯渠精神。”这次扩大会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批准了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的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从这次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实际上就已经正式确定了与蒋介石直接进行联络与谈判的方针。

三月扩大会议后，与董健吾同到陕北的张子华，同冯雪峰一起去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联络。不久，中共北方党组织还指派周小舟和吕振羽，携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信件，到南京同国民党指定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五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从另一条线也开始了同南京国民党进行接触。在这期间，林伯渠也给南京覃振等国民党内的老朋友写信，以促成国共两党的谈判。这样，六、八两月便又有了南京的“两次来件”，和八、九两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两次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对南京的方针”问题。在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过程中，中共中央还先后发出了《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遇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许多政策作了重大调整。

林伯渠出席了八、九两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完全赞同中央关于“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的估计，同意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并准备改变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形式及党的土地政策，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共同抗日。为了使全党和干部了解这一新的形势，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他还向党中央建议设立经济、国防、抗战、外交等各种专门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作出有计划的有次序的解释；提出应进一步改进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指名批评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这方

面的缺点和错误，并说“我们是中国党，同时是国际党，我们应创造很多的经验，(使之)成为国际的经验。”

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特别是《致中国国民党书》影响很大，何香凝、张学良、杨虎城等及天津《益世报》记者看后，都深为感动。此后，因全国民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内战、要求一致对日的呼声与日俱增，蒋介石虽仍力求与日本妥协，想通过军事压力逼中共就范，但难以再继续其“剿共”的政策。后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林伯渠完全拥护中共中央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事变的第二天，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这一事变，一方面应避免敌人造谣，使我们的朋友相信。同时，我们也不应袖手旁观。我们应多做些事，特别对群众组织上，更要多做些。对群众联系，我们应负责任。我们应多动员些干部到西安去……对西安报纸，应积极帮助，争取公开宣传。”后来，周恩来、博古到西安，使这一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坚决的拥护和平，停止内战，我们一贯的方针是对的。现在事件趋向结束，重要的是要有保障。现在我们应想一想，西安事件不比两广事件，我们忠诚抗日，蒋介石也晓得的……现在的解决，虽然有些缩小，但精神还是存在的。”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此事应在红军中“好好的解释”，说明一方面要“求得和平的保障”；一方面“还是要时时准备着，对张、杨的部队也要同他们商量做两方面的准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要帮助张、杨有办法解决”。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前提。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提出只要国民党接受中共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日等项要求，中共则将改变国内两个政权对立的状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执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将工农政府改为特区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随后，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也基本上接受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原则，表示要和平统一，扩大民主，开放言论，释放政治犯，由内战转向抗日。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也基本上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活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初步形成了。作为曾经是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党员并且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的林伯渠，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浮想连翩。在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比较系统地讲了对当时形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看法。他说：

(1) 对于(国民党)三中全会特点，我觉得有两个须提出：第一，和平初步实现，基本上结束了国民党十年错误政策；第二，国内战争的形式，现在不是成败的公式。

在这过渡时期，我们要加紧工作。和平是实现了，但实现民主的任务更重要。

(2) 国共合作的问题。现在的合作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形式是不同的，我觉得党内合作是不可能的，将来的形式是党外合作。对于群众工作的方式，我们要更加活泼的运用。目前最主要的是民主，有些形式，如读“遗嘱”(按：指孙中山遗嘱)，(宣传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可以做的。

（3）领导权问题。这就是怎样来教育群众又组织群众的问题。所谓领导权是实际领导权，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军队工作。在军队中要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批评与抑制这一工作，对农民、工人运动同样采取制止的行动，这是不对的。我们以后应在实际工作中取得领导权，在实现民主上应做许多工作，要在各方面进行工作，不是口头上争取领导权。（4）因为要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第一，干部问题，派出去的同志，必须是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他的路线要和党一样。第二，在苏区党的工作、小组会、支部会等要加强起来，有些支部很久不开会，部长不参加支部生活是不对的。第三，发展党组织要多吸收产业无产阶级，对党员成分的调剂要特别注意。第四，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使党员懂得现在所采取的政策道理，要懂得我们为什么要退让的大道理，在活动分子会、小组会上要很详细地讨论。这次大会的决议，要清楚地深入地传达。第五，对党外作解释应有宣言，关于左派问题应有说明，应该广泛地传达。第六，为得要实现这些事，我们应办日报，在西安办一个报，至少要办三日刊。还有些小事情，要注意节省，不要同化于白区；要尽量扩大民主，会说话的同志要缓说。

林伯渠的这些意见，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有些意见，如重提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重新教育干部等问题，还被随后党中央发布的文件所吸收。他提的这些意见，即使是所谓“小事情”，如“不要同化于白区”等，也都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为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七月，林伯渠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上海、庐山，与国民党中央直接进行谈判。六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周恩来再次见蒋介石时增加博古与林伯渠，“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开国防会议问题”。七月初，他们抵沪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动芦沟桥事变，蒋介石上了庐山。他们经过与蒋鼎文、宋子文交涉，于七月十五日又到了庐山，并于当日开始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进行谈判，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这时，国民党正在庐山召开所谓第一期谈话会，蒋介石对日的态度有了变化，提出芦沟桥事件的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他对日仍存有幻想，希望能以和平外交的方法解决芦沟桥事件。在这次谈话会上，何应钦说，中国武器不如日本，若开战，七日之内中国必亡；孔祥熙也说，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还向蒋介石提出所谓“十四字箴言”，即“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正因为蒋介石等对日存有幻想和缺乏抗战信心，他们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扣住不发，在谈判中仍然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直属行营，在三个师上不准设立总指挥部，师参谋长由南京政府调任，师的经理（即供给）和教育工作须直属行营，政治部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且不同意中共提出的有关政治部的人选。本来，一些大学教授和国民党地方政府县长以上的官吏都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蒋介石为限制中共公开活动，却不准周恩来等出席。由于蒋介石等不肯让步，七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遂决定暂停与蒋介石谈判。这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便又离开庐山，“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

在赴沪途中，林伯渠在南京见到了多年失去联系的女儿秉衡、秉佑和

秉元。九一八事变后，他夫人伍复明回湖南老家时，秉衡为分担母亲的负担，通过林伯渠的老友覃振在南京谋了一个出纳的差事，独自带领两个妹妹生活。一天，秉衡突然从堂弟秉德那里获知父亲已到南京，便带着两个妹妹到处去寻找，终于在程潜公馆见到了分别近十年的老父。姐妹三人顿时热泪盈眶，林伯渠也老泪纵横，说不出话来，紧紧拉着她们。但他们这次会见，没有说上几句话，林伯渠便又同程潜匆匆去了火车站。家中之事，直到他在上海见到老友于若愚（哲士）之后，才略知一、二。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7年6月25日。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16页。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新潮书店1951年版，第172页。

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洛甫、毛泽东电，1937年7月21日。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电党中央，报告他们已到上海，并向中央提出无论如何须着手进行下列各事：

一、立即自行改成三个方面军六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各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地方经费须尽量减少。

二、前后方经费须尽可能节省之。

三、请准备“八一”前后召集政治局会议，彭、任、贺、刘、肖、张到会讨论大计，我们按时赶回。

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无重大原则问题需要讨论，而且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有的在陕西云阳镇，有的在甘肃庆阳，来延安开会往返需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上，影响红军迅速改编与出动抗日，因此，没有接受周恩来等关于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七月二十七日，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西安后，中共中央要他们“即去云阳商定改编”。

在这一指示电中，中央还提出，可以将下列各点请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达蒋介石：

（一）八月十五号则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

（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队正副司令，高岗为正、肖劲光为副，军饷照给。

（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

（五）担任绥远方面之线。

（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稍后，毛泽东、张闻天还指示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去云阳商定改编时应一并商定我军之作战原则，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点，给日寇以相当打击”。并告知他们，以上原则，在与前方各同志商定后，可以转告国民党。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月初，林伯渠随同周恩来、博古前往云阳红军

前敌总指挥部。

在云阳，他们与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多次讨论，并几乎是每日同毛泽东、张闻天进行电报，迅速确定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和出动抗日的具体方案，商定了红军在抗日持久战中的作战方针，和准备面交南京政府的国防计划，确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八月六日，林伯渠与周恩来、博古、朱德、叶剑英回到西安。九日，周、朱、叶去南京，不久博古因事返回延安，林伯渠则继续留在西安，筹集红军经费。他与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季壮、李涛等，同蒋鼎文等各方面进行交涉，很快为红军筹集了八万元经费。八月十六日，林伯渠还就部队军饷和红军改编后的遣散费等事向党中央建议，请周恩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就近商呈蒋委员长核准，将八月份经费，按照新编制即日一次拨发，并将善后款六十万元一同交下，俾得便利一切。”

由于周恩来等再次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平津失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军民迫切要求抗战，八月二十二日，南京政府终于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林彪、贺龙、刘伯承分别为其下辖的三个师的师长，但它仍拒绝发表中共提出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宣言。同日，周恩来回到西安（朱德已于十六日乘飞机抵西安后去云阳），林伯渠即与周恩来同去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和国共两党合作及军事战略等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彻底战胜日军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之前就向中央提出：“关于边区问题如人选、经费、武装等，须于本期会上讨论，明确规定与南京交涉妥当，免致部队行动后发生窒碍。”

在这次会上，他还就军事战略、军委组织、培养干部和经费等问题发了言，提出：红军在抗战中，负有复兴民族的责任，要使我们的力量使用得更广泛些，能够在全国的战略上发挥作用，以满足全国的仰望。我们既要组织全国的抗战，又要注意敏捷与机警些，巩固后方。他还提出，部队应设补充团，积极培养干部，扩大“抗大”。现在经济、粮食困难，可以将“抗大”分为两部分，在延安只训练高级指挥人员，而连长等军事干部则可在前方进行训练。

林伯渠于西安致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8月21日。

洛川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先后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二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国共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样，就最终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正式形成。

林伯渠从一九三六年春开始就赞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为争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奔走于西安、南京、上海与庐山之间，现在看到国共两党终于重新合作，感到无比欣慰。

他坚信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必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伟大的前途。

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

在林伯渠出席洛川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三日决定由林伯渠、董必武、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长江沿岸的中共代表，调伍云甫去西安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

九月六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宣布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下设民政、建设、教育、财政四厅和粮食、税务两局。

因已决定林伯渠任长江沿岸中共代表，中共中央决定，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由张国焘负责。自洛川会议以后，林伯渠就集中全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经常驻在西安。

当时，西安是进出陕甘宁边区的门户，国民党西北行营的驻地。中共和八路军对外交涉，领取分发经费、弹药，各地人员往来，运送各种物资，都要在此地进行或者经过此地。中共在西安的机构，除八路军办事处以外，还有中共陕西省委和中央社会部（对外称农委）等部门，中央决定各部门的工作都“由林老负政治上的指导责任。”此外，林伯渠还兼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凡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需与行营交涉者”，都由他统一处理。

林伯渠在西安的任务很多，但中心是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他到后没有几天，接到湘鄂赣边区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的来信，报告他们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一、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军第一游击支队，武汉行营派副官主任和军需主任各一人；二、以嘉义、长寿两处为集中地点，本月底为第一期点验，十月底为第二期点验，点验期内伙食一元，点验后照国军一样待遇；三、湘鄂赣原有红军根据地改为特区的问题未解决，行营称由双方中央去解决为宜。林伯渠鉴于不久前闽西红军何鸣部一千余人被骗缴械的教训，感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将此事报告了中央。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毛泽东很快给林伯渠回电，要他迅速通知湘鄂赣边区代表停止谈判。

电文是：

林并致董老：

（甲）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

（乙）董老已在中部（即现在的黄陵县）途中。

（丙）请告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

（丁）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

（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

（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争驻大地方。

（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

（戊）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

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周恩来、彭德怀等电，1937年9月1

0日。

毛泽东致林伯渠并董必武电，1937年9月×日。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还联名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林伯渠、董必武发出一电，通报了湘鄂赣代表与武汉行营谈判时的错误，并询问鄂豫皖边区的郑位三是否已到南京，要博古、叶剑英“严嘱郑位三”，必须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进行谈判，“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区之覆辙”。这封电报还提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后来，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林伯渠虽没有直接参与，但在抗战初期他及时地将湘鄂赣红军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报告中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林伯渠初到西安时，还接待了陈独秀派来的代表罗汉，一度参与处理托陈取消派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陈独秀出狱后，罗汉在南京找到叶剑英等，说陈独秀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叶剑英认为此事重大，应与中央商议决定，要罗汉去延安接谈。

九月初，罗汉与李侠公到西安，向林伯渠转告了叶剑英的意见，林便打电报给张闻天，说叶剑英介绍罗汉、李侠公要去见你，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并给他们以工作。九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林伯渠，准予罗、李去延安一谈。后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九月九日，林伯渠将罗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拍发延安，罗电的主要内容是说：仲甫等已经出狱，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敬劝他们回党工作。九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告林伯渠，提出对托派分子几条原则，并要他转告罗汉。这几条原则是：

（甲）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考虑。

张闻天、毛泽东还将这一电报内容，转告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和在上海的潘汉年、刘晓，望他们在同陈独秀及其他托派分子接触中，掌握上述原则。此事，虽因陈独秀拒绝公开发表声明而未获解决，但中央提出的“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却有着重大意义。林伯渠后来就接待过许多犯过错误或因其他原因离开中共，但又愿意抗日的人员，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

林伯渠在西安还就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问题，多次同西安行营蒋鼎文进行交涉，与南京政府指派的代表彭昭贤、谷正鼎、郭械媪等谈判。当时国民党不但拒绝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而且坚持要委任一九二七年即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丁维汾为陕北行政区主席，并极力企图缩小边区的范围。林伯渠在同他们交涉、谈判的过程中，坚定地坚持了我党的立场，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出席第一次参政会期间，他直接找蒋介石交涉，迫使蒋核准将此问题“交孔祥熙解决”。九月间，他还拟定了《陕甘宁边区改省计划案》，提出援照四川成立西康省的先例，将陕甘宁边区改

为河套省，下辖三省边界地区四十五县。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边区人民的利益，一九三九年一月，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保证民主制度，争取早日解决，但须不伤原则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民主选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政府委员和法院院长，以回答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取消边区的企图。此事，后来孔祥熙虽当面向林伯渠表示：“允许陕甘宁边区定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区域之一”，行政院并一度承认以十八县为边区政府的管辖范围，另外五县为八路军河防部队之警备及补给区，然而国民党政府故意拖延，一直未正式明确承认边区政府。

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都必须发动群众。林伯渠在西安期间，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民众，他初到西安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就提出：“现在大多数群众团体与有些左派、甚至非左派分子，其爱护八路军、共产党主张之热烈情绪，真有与爱护自己的分子一样。”建议中央应充分估计这种形势，利用时机，“加速地提高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尽量将干部派在（各）工作战线上”。一九三七年十月，他与中共陕西省委支持和领导了西安各民众团体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和游行，批评国民党“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错误政策，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众运动，给民众救国抗战的自由。他还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和西安行营商定，由徐彬如作为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络人，经常与国民党省党部接洽，解决有关民众运动的问题，以避免误会和纠纷。请求中共中央速派徐冰来西安，以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借口“未经合法登记”，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逮捕救亡团体的负责人。林伯渠协同中共陕西省委进行交涉，动员社会舆论和社会人士，迫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释放了被捕的五个青年，使十三个抗日救亡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并引导救亡团体深入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林伯渠致毛泽东、张闻天电，1937年9月5日。

林伯渠在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还利用他广泛的社会联系、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主动地对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统战工作。当时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孙蔚如，原是杨虎城的部下，林伯渠对他就做过许多工作，不但使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到处说共产党确是政党的风度”，而且使他对待民众运动的态度也较陕西国民党省党部有了明显的不同。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是林伯渠初到西安时的主要谈判对手和工作对象，为交涉办理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粮、被服、军械等给养事宜，谈判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林伯渠经常与他晤谈或书信来往。为了影响蒋鼎文，他还广交蒋部下的厅长、秘书和处长等，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九三九年程潜继任行营主任（番号为天水行营，驻西安），当时，他对政治局势不甚了解，对中共虽无成见，但被假情报所蒙蔽，却说共产党好起事端，扩充势力，对有田六十亩以上的均要没收，等等。曾劝中共从政治方面向全国发展，不应该在军事上“满天飞”，说他个人很苦闷，只能尽技士作用，对西北问题无权处理，但对抗战一事，愿尽个人责任。林伯渠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过事，私交尚好，便与他促膝倾谈，义正词严而又耐心细致地加以解释和疏导。程潜的态度因此迅速好转，并答应批准发放子弹，放行五部车床，负责解决八路军办事处的其他困难问题。

林伯渠、伍云甫给中央军委的电报，1939年11月15日。

与此同时，林伯渠也极力在民主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多次在西安接待爱国知名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汉三、杨亦周、刘治州、高崇民等，同他们恳商抗战大计。西北地区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以后，积极拥护中共的主张，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林伯渠在政治上对他十分关怀，一九三八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刚出版，即亲自送他一本，后来又多次同他交谈读后感，着重讲了第四章第二节和结束语的重大意义。这对杜斌丞提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有极大的启发和促进。他们互相学习，也互相尊重。杜斌丞曾说，他与林伯渠之间是“心往神交”，林是他的“良师益友”。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辞去陕西省政府委员。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几次电召甚至派飞机接他，他都不为所动。一九四七年杜斌丞被国民党杀害，林伯渠在悼念诗中称赞他为：“桥陵间气挺人豪，秋水襟怀松柏操”，“誓将热血培民主，唤醒睡狮吼怒涛。”

林伯渠对陕西省以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也做过许多统战工作。抗战初期，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八路军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影响下，想学习八路军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经验，在他的部队中建立战地工作团，林伯渠和他的秘书赵荣声（中共党员）一起，即帮助他招募人员，动员准备赴延安的学生和抗大毕业生到他那里工作。后来，卫立煌派赵荣声到西安询问他能否参加共产党时，林伯渠在听取赵的汇报后，还要赵转告卫立煌，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同样可以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并叮嘱赵，此事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以防不测。据赵荣声回忆，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刘少奇路过河南时，约他到八路军绳池兵站谈话，还通知他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挖蒋介石的墙脚，并说中央已经决定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中共秘密党组织，中共党员需要留下继续工作的，可以保留党籍，但要停止组织生活和组织联系。一九三九年卫立煌移驻洛阳，林伯渠奉中共中央指示，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向豫西特委书记、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刘子久传达过中央对卫立煌工作的指示，研究如何做卫立煌的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对抗日比较坚决，对八路军的态度比较友好，在蒋介石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中，不愿将事态扩大，甚至采取中立态度。这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同林伯渠的上述活动也是分不开的。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93页。

一九三七年九月大同失守后，郭春涛由太原经西安去四川刘湘处，因郭曾在大革命时同林伯渠共过事，林便请他做刘湘的工作，并介绍当时准备入川，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与郭会面，请郭帮助罗在四川开展工作。随后，刘湘即派代表至西安会见林伯渠，要求延安给他派几个军事干部，“籍资助理与联络”。这年十月底，郭春涛再次到西安，又向林伯渠汇报刘湘的情况，并提出加强刘处工作的意见。十月二十九日，林伯渠在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中，曾详细地报告了他这次会见郭春涛的情况，提出蒋介石已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的态度近来已有改变，倾向于我，希望我方派懂得游击战术的干部，充任他的顾问或参谋。郭春涛准备去第七战区作政治工作，也提出希望我方派干部协助他工作，并供给他有关政治动员的材料。刘湘处的工作，后来虽因刘湘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武汉病故，第七战区旋即被宣布撤销，而未能按原定计议进行下去，但从此中共在川军中

的统战工作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初，西安“八办”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专门从事川军的联系工作，并掩护中共川北地下党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刘湘旧部潘文华的起义，都同这个时期所进行的统战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林伯渠在西安，或利用去武汉和重庆的机会，还作过许多团结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工作。一九四一年三月，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等一行五人飞抵重庆。林伯渠与叶剑英、董必武专程到嘉陵招待所拜访，就国共两党磨擦事同陈诚恳地进行交谈。中共中央南方局还为陈举行欢迎会，林伯渠、叶剑英和陈嘉庚相继致词，互道友谊。陈嘉庚是华侨的著名领袖，十分敬佩中共的抗日主张和作风，他在动员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尼赫鲁在重庆作国事访问。林伯渠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等前往会见，就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中国反帝民族斗争与内部阶级关系、国共合作及各党派合作的情况，以及苏德协定及其对欧洲和远东的影响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做统战工作的时候，林伯渠总是满腔热忱，不卑不亢，因人而异，深入细致地做各种人的思想工作。他经常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打败它。不然，不管你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无党派，都得当亡国奴。

他还经常引用历史掌故，如讲述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等，来说明只有团结才能抵御外侮的道理。

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

抗战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林伯渠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期间，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1、385页。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叛逃时，林伯渠就同他进行了斗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和反党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尽力挽救他，等待他的觉悟，仍然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要他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但张国焘却不肯改正错误，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提出把蒋介石解到保安，主张杀蒋，怀疑和反对党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抗战开始后，他又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回到边区的一部分地主富农，利用统一战线政策、强迫农民交还已被没收的土地，完全采取放任态度，“使地主收回了很多土地”

。直到一九三八年发布了毛泽东写的《陕甘宁边区、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之后，才制止了部分地主富农收回土地的行为，纠正了这种右倾错误。

林伯渠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去中部县祭扫

黄帝陵。扫墓之后，他托词“要到西安去找林主席”，叫秘书和警卫班先回延安，自己带着警卫员张海直奔西安。可是到西安后，他却住进了国民党的西京招待所。当林伯渠得知他已到西安，要他来八路军办事处居住，他不但拒绝来，而且拒绝同林伯渠会面。直到四月七日，他带着张海来到西安火车站，才交给张海一个电话号码，叫他打电话约林伯渠到车站会面。但当林伯渠赶到车站时，他却钻到国民党一列军用专车内，不肯下车。林伯渠对他说：“你先下车，有什么话，到办事处再谈。”双方争执了五、六分钟，他死活都不肯下车。最后当火车将要开动时，他还耍了一个花招说：“我要到武汉去找周副主席”。这个可耻的叛徒，就这样乘着这列火车，驶向了罪恶的深渊。林伯渠回到办事处，立即将事情的原委电告中共中央和在武汉的周恩来，并告知张国焘正在去武汉的途中。

张海到武汉后，坚持不随张国焘走，拿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返回了延安。

张海：《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叛逃的经过》，《楚晖》第3辑，1982年8月。

张国焘到武汉后，仍拒绝周恩来等对他的多方挽救。他在会见蒋介石时，说“在外糊涂多时”，表示要投靠国民党，并于四月十七日发表了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为维护党的纪律，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予以公布。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发布了命令，决定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兼代主席的一切职务。

大约在张国焘离开西安半个月后，他的妻子杨子烈，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也来到了办事处。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张国焘糊涂，声言要去劝说他回来。办事处的熊天荆表示要去好好做做杨的思想工作。林伯渠说，没什么可做的了，她连孩子、行李都带上了，要去武汉劝说，何必带这些呢？明摆着要走嘛！后来事实证明，她也是一去不复返，同张国焘一起当了可耻的叛徒。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随后又正式组织国民参政会，由汪精卫、张伯苓分别任正副议长，并以重要文化团体“著有信望”者的名义，聘请中共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七人为参政员，决定于七月六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因此，林伯渠在反对张国焘叛逃之后，很快又在参政会中参加了反对汪精卫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从七月六日开幕到十五日结束，共开了十天。政府指定的二百名参政员，除少数未能出席以外，其他人都到了会。会前，中共方面的七名参政员，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个进步，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愿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共同努力，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毛泽东在致会议请假的电报中还提出：“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关于这次会议的进行情况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中的活动，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林伯渠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曾做过详细的汇报，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国民参政会之观感》，在《解放》周刊第四十九期上发

表。

《新华日报》，1938年7月7。

这次会议开幕前，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邀请部分参政员聚餐时就公开表示，不同意汪精卫提出的“在朝在野党”的意见，说大敌当前，“不应有在朝在野的分别”，各党各派都应“捐弃成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会议开始后，汪精卫等提出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案时，林伯渠等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得到与会大多数参政员的支持，打消了“汪案”。在会议讨论外交提案时，他们还反对汪精卫等提出的实行“德意路线”，反对“英、美、法、苏路线”的提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应联合英、美、法、苏的提案。

为了团结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发动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会上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得到许多参政员的连署（共六十五人），为会议所通过。他们还积极支持沈钧儒等提出的，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切实保障人民权利，政府应决心保卫武汉，促进民众运动发展的提案。

尽管国民党拒绝承认其他党派，但一届一次参政会的举行，等于是公开承认了各党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把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区别开来，坚决反对汪精卫等对日妥协的投降派，拥护政府抗战，提倡精诚团结，提请政府改善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机构，开放民众运动等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许多国民党人也都表示赞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抗日战争时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着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主要代表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国后，就不断地宣传、推行投降主义。他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抗战。他的统一战线，就是上层拉拢，而看不到建立下层群众基础的重要。他不但轻视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还非常害怕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影响国共合作。起初，林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样多的马恩列斯的话，以及“洋钦差”的架式所蒙蔽，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前后，他就逐渐感到王明这一套不对头，而且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狂妄。当时，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汉写了有关全国性的东西，曾向他提出“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

林伯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竭诚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完全赞同会议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批评。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明确指出：我党不但已经能够自己纠正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没有犯党的路线的错误”，我党“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他在发言中还讲了“怎样认识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党与政权”的问题，汇报了他

在西安的工作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提出我党“因环境关系，采取一些分权”是必要的，同时又应“防止割据现象”，“各地方党组织要经常向党中央作报告”，党应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两面派应特别注意之。”林伯渠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期间，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至重庆。

国民参政会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所以，六中全会还未结束，林伯渠与吴玉章、陈绍禹便又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参政会（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已先期到达重庆）。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更加对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而企图对日妥协，甚至投降。因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这次会上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陈绍禹等六名中共参政员领衔提出，并得到张澜、史良、沈钧儒、邹韬奋等六十七人联署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还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会议召开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打来电报，向会议提出此案。因按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均须详具理由，并有参政员十二人联署才能成立，汪精卫等投降派便借此极力反对此案。他们甚至挖苦说：“照这样说来，我们的外交官都得辞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则积极支持陈案，其他许多参政员亦纷纷签字表示支持。邹韬奋就曾说，“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因为得到许多参政员的热烈支持，最后，会议虽将此案的文字改为《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还是通过了此案。

《韬奋文集》（3），三联书店1981年载，第186页。

为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还领衔提出《严惩汉奸傀儡案》，并得到大会通过。《提案》明确指出：

抗战年余，全国军民莫不忠勇奋发，前仆后继，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奋斗，不幸有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甘为日寇利用，粉墨登场，僭称政府。此辈民族叛徒，本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已明白申斥之为“敌阉之俘囚，民族之败类”。日前因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日寇阴谋更欲使南北傀儡合流，树立规模更大之傀儡政权，藉以蒙蔽世界，并假之以树立其在占领区域之统治。因之，必须对此辈甘心为虎作倀之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不仅为维持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敌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

《提案》提出的惩治汉奸傀儡的具体办法是：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参加南北及各省傀儡组织之民族败类，削除其国籍，并公告全国人民，人人得诛之。

（二）国民政府应明令没收此类傀儡之一切财产，以充抗经费。

（三）对被迫参加伪组织之人员，国民政府应明令劝告限期脱离伪组织，容其自新，否则，即依（一）（二）两项办法严惩之。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109页。

这一提案的提出和通过，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对一切傀儡汉奸也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汪精卫及其影响下的走卒，在这次会议上一无所获，反而进一步暴露了真面目，会议过后不久，他们即相继逃之夭夭，叛国降日。因此蒋介石便替代汪精卫成了参政会的议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林伯渠再次来到重庆出席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这时，由于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地抗日，逐渐转入消极抗战，对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不断进行挑衅。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给中共南方局并林伯渠发出指示，提出：“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根据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等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上的保障。同时，还团结其他进步参政员，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有效地实施以前参政会通过各案的提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南方局并伯渠电，1939年2月6日。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虽然也一般地表示要坚持抗战，如说“不战便会亡国，亡国便会灭种”等，但是他演说总的精神，却正如林伯渠三月二十二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所讲的，是“企图依靠英美力量压制日本，造成妥协局面”；他所说的抗战必有胜利把握，也主要是想“依靠英美取得胜利”。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说还大谈“军政时期的重要”，影射攻击董必武说，“有人盲目提倡民主是对抗战有害的”，企图用团结的名义来反对和限制中共。

为反对蒋介石妄图限制中共，依靠英美抗日的思想，促使蒋及国民党当局的反省，在这次会议后，林伯渠还著文指出：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只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抗战建国事业的胜利才有保证。”

“应该深信我们民族的伟大力量一定可以最后战胜敌人”，我们固然不放弃争取国际的援助，但“主要地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林伯渠：《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收获》，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4月7日。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中共同蒋介石集团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这次会议之后，这一斗争更加剧了。会议二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蒋介石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与此同时，他还指定陈立夫、徐恩曾、张冲、陈诚、康泽五人组成防共委员会，亲令河北、山西、陕西的国民党“于三个月内控制共党”。林伯渠不但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的投降派、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宣侠父，就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勒死，投入西安下马陵的枯井中。接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四位同志也先后“失踪”。林伯渠为此事，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多次与蒋鼎文进行交涉，要他负责把人交出来。他还将宣侠父“失踪”事件，报告了在武汉的周恩来，请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开始国民党矢口否认，后来，经周恩来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才只好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违反纪律，我自有权制裁。

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假造所谓陕北二十三县人民反对陕甘宁边区

政府的意见书，由孔祥熙转交给林伯渠。对此，林伯渠当即致书孔祥熙，痛加驳斥，指出这些依样葫芦的文电，纯系少数奸徒“借端挑拨破坏”。三月间，他还为此事著文，严正指出：一些不明大义、成见很深的顽固分子，始终抱着反共情绪，进行反对边区的各种阴谋活动，造谣中伤，伪造情报，借端生事，引起纠纷，甚至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取消边区。

这些就是发生磨擦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贻害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动，我们决不能不予以纠正。

林伯渠：《复孔院长书》，1939年2月25日。

林伯渠：《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3月28日。

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了扣押八路军人员的事件。例如，这年十二月，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六人赴前线，途经咸阳时被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同月，八路军教官苏克兰，被羁押西安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不予释放，至生病咯血，岌岌可危。一九三九年四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指出，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以后发生同样事件”。与此同时，他还将电报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这一卑劣行径。通过这一斗争，加上其他的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释放了被扣人员。

八路军的物资、车辆等，本来就非常有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采取非法手段进行侵占和偷窃。当时西安办事处有五辆卡车。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把车开到西郊疏散隐蔽，国民党特务乘机绑架我看守人员，然后告知胡宗南部汽车团，将车劫走。一个被绑架的同志逃了出来，报告办事处。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我们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

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大街上截住了被抢走的汽车，强令国民党特务将车开到七贤庄，夺回了全部汽车。

《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辅助陈列说明和访黄金友谈话记录。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八路军防地枸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亦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坚决主张给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还在九月间，他就向中央提出：“安边、神木等顽固县长之武力进扰，可以及时用加倍力量消灭或逮捕之，然后再与其当面讲道理较好。”十二月初，中共中央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区，林伯渠一方面在西安积极争取天水行营程潜准许“王旅过河”，同时还向中共中央建议，对“何绍南之造谣应尽量揭露，(由)肖(劲光)径报蒋(鼎文)程(潜)，并通知我处。”这时，林伯渠从天水行营觅得国民党

军委发出的《共党处置办法实施方案》后，他还以“万万火急”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南方局，提出应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严重交涉。

林伯渠致毛泽东、洛甫等电，1939年9月9日。

林伯渠致博古、叶剑英并报书记处电，1939年12月1日。

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林伯渠还与彭德怀一起向国民党当局进行过一次强有力的斗争。这时，彭德怀来到了西安。林伯渠与彭德怀公开向各界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进攻和封锁边区。他们还向各界和国民党行营主任程潜表示：我党除坚持抗战外，还要增调足够的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以防突然事变；揭露西安政治黑暗、汉奸刊物充斥市场，以及蒋鼎文一年半讨八个老婆、发国难财一万万元等贪污腐化的丑行。彭德怀还令战士将在检查站留难他的赵尔濬捆送行营，在行营，恰好遇见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彭当场历数了他破坏抗战、专事磨擦反共和贪污、贩鸦片烟等罪行，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给了他一个耳光。何绍南深知彭德怀的脾气，根本不敢吭声。

林伯渠、彭德怀给朱德和中央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12月13日。

林伯渠与彭德怀的这一场强硬斗争，使得进步分子异常兴奋，动摇分子同情我们，顽固分子非常惧怕。程潜挽留彭德怀多住一天，再次设宴招待，并且再三声明对边区不会有破坏行动，劝彭德怀宽慰，还开诚相见，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心情。随后，他命令发还了扣留八路军的五部机器，并允许加买子弹。

国民党顽固派经常破坏团结，制造磨擦，而又常把搞磨擦的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

有一次，林伯渠去国民党行营开会，会上有人攻击八路军搞磨擦。对此，他十分气愤，当即摆出国民党顽固派在邠州搞磨擦的种种事实，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是啊，搞磨擦实在不应该，我们八路军全体将士在前线英勇抗战，流血牺牲，后方却有人故意搞磨擦。

远在抗日后方的邠州，我们却有那么多伤员，实在叫人痛心，这说明谁在搞磨擦呢？！”顽固分子无言以对，转而指责我们随营学校办得不好，安吴堡青训班不好管理。林伯渠以诙谐的语言反驳说：“大家都说得很对。蒋委员长叫办随营学校，我们就照办，还有安吴堡的青训班，也是委员长批准的。既然大家嫌乱，又嫌办得不好，那就干脆搬到西安来办，这样大家来管理，岂不好吗？”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至于有人说八路军办事处人多了，这话也有道理。贵军不是每个师在西安都有办事处吗？那就让八路军的三个师也分别在西安设立个办事处吧，这样办事处的人就不多了。”一番话，说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胡宗南的副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他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胡说八路军“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不遵守三民主义，搞共产主义宣传”。

林伯渠严正批驳道：八路军在前方打了那么多胜仗，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八路军破坏抗战呢？你们把守卫河防的部队开到陕甘宁边区的周围，把枪口对准边区，这难道叫抗战吗？你们不打日本打友军，这难道是增强团结吗？我们宣传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有人却说我们是宣传共产主义，这是破坏两党的团结。一席话，说得那个副官哑口无言。然后，林伯渠半规

劝半警告地说：你我都是中国人，不要敌人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骂共产主义你们也骂共产主义。如果同敌人的言行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倒会使人怀疑你们和敌人一定有所勾结，或订立了某些默契。最后，林伯渠给了他一个下台阶，说：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的，最多是受了亲日派的挑拨，上了当。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 1979 年编印。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很快就被粉碎了。在这一斗争中，虽然国民党侵占边区五座县城，但三五九旅在绥德专区却消灭了何绍南的保安队，迫使何绍南逃离绥德，解放了五十万人民，取消了“统战区”，在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联成一片。林伯渠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地配合八路军的自卫反击，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边区、发展人民的进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

输送干部，转运物资

抗日战争的开展，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林伯渠领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运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威力，为中共八路军、新四军运送革命同志，招收进步青年，领取、购置和转运抗战物资和生活物品等，做了大量工作。

他到西安任驻陕党代表后不久，即营救了一千余红军失散人员返回了自己的部队。

那是一九三七年底，青海省的马步芳，准备将俘虏我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的“新兵团”，拨交河南国民党卫立煌部。当时，中共驻兰州的代表谢觉哉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派人与国民党军方交涉放人，一面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等到“新兵团”驻地，找他们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随时准备回到革命队伍。不料国民党军方佯称要请示军令部批准，暗地里却命令这个团偷偷地提前开拔了。谢觉哉立即将此事电告了林伯渠。林伯渠马上与办事处的同志研究，准备向有关方面交涉，并作好一切准备。当“新兵团”一到西安时，伍云南处长便前往驻地看望他们，并向他们发表了讲话，这些红军失散人员心情十分激动，纷纷要求归队。后来，经过林伯渠等同志的多方努力，这一千余人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开到三原县安吴堡，分别编入了八路军各部队。

《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18—119 页。

西安办事处既肩负着招收和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的任务，又担负着将延安的干部转送到全国各地的任务。仅据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统计，办事处为延安输送的青年就有二千二百八十八人。一九三九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说共产党、八路军活动得太厉害，提出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口号。中共在陕西有什么学校，他们也成

立什么学校。双方开展了对青年的争夺战。如中共有个抗大分校，他们就搞个中央军委第七分校；中共有个陕北公学，他们就有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中共有安吴堡青训班，他们就搞西北青年劳动营。林伯渠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他说：“青年是我们时代最优秀的力量，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然而在目前全世界已卷入了第二次大战残酷的屠杀浪潮里的时候，青年是首先感受痛苦遭到迫害的一群。”他号召：“中国的青年应当更紧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配合着全世界的弟兄，为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与人类幸福的将来，支持着艰苦英勇的斗争！”

林伯渠：《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新华日报》，1939年9月7日。

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亲切地接待过许多来访的青年，根据不同的情况，安排他们的去向，指导他们的工作。广东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方少逸等，热心救亡，曾募集药品给八路军，他们辗转来到西安后，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参观，并嘱延安有关部门好好招待。牺盟总会常委兼牺盟会宣传部长黄玠然，由于阎锡山反共，他跑到西安找林伯渠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曾是周恩来派去山西的，经与周商量后，安排他去重庆工作。

一九三九年，林伯渠派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王超北（庞智），去香港采购电台、医药、通讯器材及二十多辆汽车，并把华侨、港澳同胞、国际友人赠送给八路军的物资和救护车运回来。当王超北经过许多艰辛，取道越南、广西、贵阳、重庆将这些车辆和物资运抵宝鸡，到西安找林伯渠时，林伯渠一方面称赞他胜利完成了任务，同时又指示他暂时留在宝鸡，利用香港灿华公司代表的公开身份，掩护和处理这批车辆和物资，了解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不久这批车辆和物资终于运到了西安“八办”和延安。后来，王超北的父亲死了，留下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拟交给党作活动经费。林伯渠说他继母尚在，不便处理，但必要时可移作他的秘密活动经费。随后，王超北便利用这笔钱兴建了地下室，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向党中央提供了大量有关国民党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为党和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翁世武从山西到西安，要求去延安抗大学习，林伯渠得知他与国民党孔祥熙处有关系后，指示他运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久，翁世武与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服务团做赈济工作的丁毅忱，一道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开导丁毅忱说：“单纯救济工作是消极的，还要做政治宣传，作社会调查，做群众工作”。

张协和；《回忆宋绮云同志与难民服务团》（未刊稿）。

在此期间，林伯渠还安排过一个欧洲记者去延安。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为了去了解那时青年人十分向往的延安的真实情况，他特意结识了美国人艾格妮斯·史沫特莱，通过她见到了在汉口的周恩来，周恩来介绍他去见林伯渠。林伯渠在与延安联系以后，派了一名十八岁的战士为他作向导和警卫，前往延安。博斯哈德在延安访问了许多地方，专访了毛泽东，回国后写了许多报道，成了第一个报道延安情况的欧洲记者。抗战期间，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柯棣华、巴苏、马海德等去延安，林伯渠也都给予许多帮助。

李逵元摘译：《第一次出现在欧洲记者笔下的延安》，《新观察》，1983年第20期。

林伯渠对来访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帮助他们实现了奔赴延安的愿望。

望。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为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出力。一九三八年四月，岭南大学学生陈凌风、朱明凯这一对年轻夫妇，到西安办事处要求去延安。林伯渠得知他俩是农学系毕业的，异常高兴，把他们接到七贤庄说：我们边区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一个星期后，他亲自带他们到了延安，让他们去三十里铺办农场。以后，他还不断从外地给他们寄来农业科技书籍。他们是广东人，爱吃糖，林伯渠回延安时，还常给他们带些糖果，鼓励他们刻苦钻研，办好农场。

进步青年从西安前往延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林伯渠领导办事处的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留难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八年由重庆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已经参加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他们前往延安，途经离西安不远的草滩时被扣押。林伯渠与伍云甫立即派联络副官王荫圃挂起中校徽章，带上两个警卫，乘坐小汽车前往营救。王荫圃对国民党连长说：“他们是我们八路军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抓？现在我要把他们带走。”话声刚落，没等对方回答，转身对青年们下令说：“跑步！七贤庄办事处。”青年们跑走了。国民党连长见他是中校，不敢发火，只说他们回去不好交差。王副官说：“不要紧，我把你们送回西安行营，说明这事与弟兄们无关就是了”。后来这批青年终于安抵延安。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一号院旧址说明》。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领取、采购和运输抗战物资或生活用品到前线或陕甘宁边区。

当时，从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采购军用物资还是民用物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如购买棉纱，就很棘手。当时西安只有一个大华纱厂，老板是广东的一个大资本家，为了使日本飞机不轰炸他的工厂，每月给日本人交三万元的“保险费”。他不卖纱给延安，我们也拉不上关系，怎么办呢？林伯渠借重李敷仁在西安创办的《老百姓报》把这个资本家交“保险费”的事揭了出来，他再也不敢给日本人送钱了。后来他的纱厂被炸坏了一些机器，开工困难，工人们扬言要去延安种地。资本家慌了手脚，惶惶不安，找省政府，省政府也没法。最后请林伯渠去给工人做工作，纱厂才开了工。自此以后，老板也开始卖纱给延安了。后来王首道到西安，林伯渠请他给工人讲过一次话。王首道对办事处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就是有统有磨，纱厂事件，林老处理得很巧妙。

购得了物资，要将它运到目的地，在很多情况下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铁路。为了开辟这一交通渠道，林伯渠指示办事处的同志，要千方百计让铁路也能为我们服务。办事处的同志了解到西安铁路局不少人对陕北的羊毛筒子很感兴趣，林伯渠即从贸易处调来了一批给他们，以争取他们为办事处运送物资。铁路上有一个姓毕的运输科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为我们办了一些事情。他母亲去世，林伯渠亲自书写挽联，派处长伍云甫和副官王荫圃携往吊唁，这位科长十分感动。一次，朱德总司令要去太行山前线，毕给他安排了专车。八路军在洛阳买了一批土布，他让马上装车，安全运抵西安，连国民党控制得十分严格的汽油，他也为我们大量运来，因此办事处从未发生过油荒。

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未刊稿），1980年。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前，西安汽车只要三天即可到达延安，可是在这以后就不行了。

国民党顽固派在西安、咸阳等地设立的检查站，经常扣留到延安的车辆。为了突破这一封锁，林伯渠利用一切机会，接触那些主张抗日、同情革命的各界人士，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当时西北有个国际红十字会医疗大队，总部设在西安，队长万福恩是北京协和医院有名的外科医生，他不赞同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赞同共产党艰苦奋斗一心抗日的主张。林伯渠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登门拜访，并多次邀他至办事处作客。万福恩对此非常感动，曾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么可怕。林老德高望重，没有一点架子，我十分钦佩”。有一回，办事处在洛阳购得一批奶牛，费了许多周折运至临潼时，国民党武装特务捣乱，打伤了警卫排长白天顺，阻止通过。林伯渠请万福恩设法帮助，万立即与该大队延安医疗队队长薛培基商量，决定由医疗大队出面，给我们一个路条，说这批奶牛是英国大使馆给在延安工作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买的。这样，就顺利地通过了边卡。

王荫圃：《统战工作的模范》。

为了解决边区人民和军队的被服问题，边区政府决定发动农民广种棉花。为了解决购买、运送棉种的问题，林伯渠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去同国民党西北农本局局长杨亦周联系。杨亦周是武功农学院教务长，抗日战争一开始，林伯渠就同他交朋友，不断鼓励他，赞扬他团结抗日的精神。他每次到西安，林伯渠都盛情接待，促膝交谈。一次，他告诉林伯渠，说国民党委任他为西北三青团总干事长，他不大愿意担任这一专门同共产党作对的职务。林伯渠说：“人家跟共产党作对，你不作对就是了！”后来，国民党认为他反共不力，撤了总干事长职务，让他当了农本局局长。当他收到林伯渠要求在三原县购买三十大车棉种的书信后，就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一个正式报告，由他批复。

后来这批棉种购齐运到边卡时，国民党的检查人员也只好放行。

林伯渠在西安渡过了几个酷暑严冬，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在中国西北的这个大城市里，生活却是很俭朴的。他吃穿和大家一样。由于身材高大，公家发的军被盖上去短一截。冬天睡觉时，他使用麻绳将被头的一端捆起来，以便使脚不致露出被外。会计室按规定每月给他五元钱津贴费，他只签个字，就让把钱转到救亡室，买些书籍和文化用品。

他非常关心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学习，将全体同志分成两个班，初级班指定文化教员教学文化，他自己还动手制作看图识字教具，手把手地教战士们学习。高级班则由他亲自辅导学习《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当时，办事处的环境十分险恶，一个不到五十万人口的西安，竟有四千五百余国民党职业特务，他们监视办事处的活动和来往人员，经常跟踪盯梢。为了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革命警惕，林伯渠亲自给办事处的同志逐条讲解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他还针对国民党特务以金钱、地位、美女为诱饵，企图拉拢、腐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情况，给大家讲解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以及屈原的《桔颂》等，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以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建立三三制政权

林伯渠在西安期间，除同时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和次年一月，中共中央还任命他为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所以，他虽然经常在西安，但仍然经常关怀与过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一九四〇年十月，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最困难时期，他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由西安返回延安，又集中全力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

林伯渠回到延安之日，正是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之时。德、意法西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几乎吞并了整个欧洲。日本法西斯为了进行太平洋战争，把中国变成它的后方基地，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压在解放区战场，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停发八路军的军饷，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配合日寇不断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国民党还有大批军政要员率部投敌，充当伪军。在敌、伪、顽的夹击下，再加上华北各地连续几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这样就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统一领导、减租减息、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整顿三风、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审查干部。

林伯渠回到边区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他依据中共中央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首先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35、736页。

林伯渠认为搞好三三制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一九四一年一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规定了有关选举的各项重要事项。根据这一指示，结合前一年在陇东和绥德两个分区试点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开始了普选运动。在选举开始后出现了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赞成三三制，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部分反动地主则想乘机竞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则忧虑“咱们流血搞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就是党员和干部中，也有不少糊涂认识，比如，误以为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等。因此，在领导选举时便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二月，林伯渠在边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问题。他说：“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必须坚定的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不因时局的变化而迷失方向。”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叫做党的领导。他号召政权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风度，大公无私，容纳万有，诚恳说服，这才是搞好三三制政权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他还对绥德县县长说：“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分他们的地，打倒他们，都是对的。而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选举他们当参议员，也是对的。因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况且他们是拥护党的抗日

政策的。这些人在地主阶级中影响大，出来工作，能起到我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为了推动选举，建设三三制政权，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党委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月十八日，林伯渠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在它的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的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边区每一个政权工作者，必须根据新的施政纲领，检查我们以往的工作，……进行今后的工作，保证全部纲领正确而圆满的实现。”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未刊稿），1982年。

《林主席报告新施政纲领》，《解放日报》，1941年5月19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选举工作，全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不仅普遍建立起三三制县级政权，并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

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一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新选出的蒙、回、藏、汉等民族的一百九十三名正式参议员和十六名候补参议员，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的人民的意见、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参议员很坦率的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次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指出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以做政府今后工作的依据；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加强政府的力量，来适应目前新的形势。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要以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9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概况，指出：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多次炮击和轰炸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紧密配合，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是凭借着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紧密团结，才支持了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保卫了边区，进行了各种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成绩。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从边区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处在战争环境这个具体特点出发，指明了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

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参议员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会接受并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准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以及九名常驻参议员。林伯渠以一百八十四票，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毕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十六人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连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共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占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

一九四二年，根据林伯渠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各县，对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门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情况，也采用召开参议会的办法进行改选，或用共产党员退出增聘非

党人士的办法，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全边区县级以上的政权，都落实了三三制的政策。

在政权建设中，林伯渠既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又考虑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把县以上政权与乡政权作了适当区别。他说：“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久已分配的老区，中间分子的数量并不太多；在土地未经分配的新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在乡政权人员分配上，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却应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乡长中，共产党员可以占大多数。“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

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林伯渠还论述了“政体”问题。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他认为参议会和政府都应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委员会，就是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关于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的工作职能，林伯渠认为：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另一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政府提出的重要决议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

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因为，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在这方面，林伯渠堪称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范。

起初，一部分党员在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花瓶”摆设时，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情绪。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林伯渠虽每次都要主动问：“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划行，反映出他口称的“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说：“我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李维汉把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职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

大家认为，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执行政务中，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

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期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不但不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党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1）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2）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3）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4）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林伯渠首先带头执行党组关于改善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他经常亲自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

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

“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

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记者的来访。

《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在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们，又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有一次，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并且说：“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来投资。”贺连城主张“有限制的承认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林伯渠知道这件事后，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经过林伯渠做工作，李鼎铭也同意这个办法，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款。当时边区政府有一种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动员大家检查一次工作，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互相听取意见，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李鼎铭、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边区政府就采用了，并照他们说的办。但也有不正确的，有些是属于误会的意见，就向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做到互谅互勉，共同提高。有些明显错误的，就诚恳地指出他们不对。民主人士对这种真正能够以诚相待，很满意。林伯渠对这种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兴。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

发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常常还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先导。希望大家把这种好作风坚持下去，发扬光大。”有一次，林伯渠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也赞成这种方法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

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借鉴。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长期来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后，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他非常高兴。李鼎铭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激。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意。

蒙古族爱国民主人士那素滴勒盖，自二届参议会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后，在林伯渠的领导帮助下，为革命作了贡献，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林伯渠深为悲痛，他在追悼会上以主祭人身份致词说：那素先生曾说过，“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蒙族解放，今天已有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边府委员任内、他是生产与教育两大政策的实践者，他曾亲建农场，号召蒙胞生产，同时并亲自参加，身体力行。”‘他号

召蒙古青年来延安学习，并亲任教授”。林伯渠号召大家，学习那素委员一息尚存同恶势力斗争不止的革命精神。林伯渠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爱国民主人士的态度，影响很好。

《解放日报》，1943年8月9日。

李丹生是陕北的一位知名人士，八十高龄时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经常关照这位老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李丹生逝世后，林伯渠对李老先生的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在挽联中写道：

以吕尚之年，辅导建新基，方期大成百世留芳垂典范；
为边区所重，周详达民意，文星遽陨万人挥泪吊延川。

《解放日报》，1945年7月12日。

林伯渠并亲自率领延安各界五百余人，把李老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光华农场。因为李老先生家境贫寒，林伯渠还指示，对他住在延安的遗孀和两个女儿，一个孙女的生活，仍由政府照顾和供给读书。诸如此类，都使党外人士深受感动。

为了加强边区的三三制建设，林伯渠除注意团结政府中的党外人士一道工作外，还重视广交社会上有识之士，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他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就是明显的一例。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高自立等邀集宴请民间的诗人墨客，其中多系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前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林伯渠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定名为“怀安诗社”，并推举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荟集佳作。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会为“延水雅集”，以与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林伯渠致词，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诗；借古体诗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他并提出了两条希望：（1）不要咬文嚼字，文字力求通俗；（2）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

林伯渠还即席吟成《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

其一：

目送征鸿远，秋笼延水深。
朱颜何可驻，华发漫相侵。
寰宇风云会，高台长短吟。
会文信有托，今古事同钦。

其二：

十年挟策费调停，待整金瓯拱宿星。
抗敌计无分畛域，匡时论共契兰馨。
边城重寄期安堵，盛会嘉宾喜满庭。
田野风多秋气健，及时樽酒慰遐龄。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0、31页。

许多老人也即席唱和，当场就产生了不少佳作。自此以后，参加这一诗社的人员甚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安学习的各根据地的干部，有边区参议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诗友们以诗词为工具，披襟述怀，吮毫抒愤，交流感情，宣传政策，酬唱赠答，互相勉励，一时蔚成风气。诗社历时八年，收藏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同时也团结了许多党外人士。

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和青年干部。还在一九

四一年“三八”妇女节时，林伯渠就提出“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此后，他身体力行，推荐边区妇联二十三岁的邵清华为安塞县县长，并在边区政府民政厅和边区妇联举行的欢送会上，鼓励邵清华说：“你做妇女工作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县的‘父母官’，男的的女的各种人的工作都要做，这就要更广泛的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多做调查研究。到了新的岗位上，在各方面都要严格要求自己，特别要注意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才能担负起党交给你的重任。”在林伯渠的关怀教育下，邵清华在实践斗争中得到锻炼，成长很快，她至今还十分怀念和感激林老对自己的培养。

《解放日报》1941年7月10日。并参见《访邵清华谈话记录》（未刊稿），1984年。

对于青年干部，林伯渠非常注意让他们参加基层工作的锻炼。一九四二年的一天，他对边区政府秘书处青年干部陈昌林说：“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前线去，到基层去，到农村去。你是知识青年，缺乏实践斗争的经验，应该到基层去工作。”并且把他安排到绥德分区的农村。陈昌林到了绥德以后，专员袁任远要留他在专署当秘书，陈昌林把这一情况写信向林伯渠汇报。林伯渠马上回信说：“青年要深入实际，最好还是去乡政府当文书。因为乡政府是边区政府的缩影，工作千头万绪，会遇到许许多多头痛的事，才能真正受到锻炼……”。袁任远看了林伯渠这封信，也深受启发和教育，便让陈昌林到绥德分区最苦的佳县去工作。佳县安排陈昌林当了区长，林伯渠还经常给他写信，要求他多做具体工作，艰苦奋斗，少说大话空话。抗战胜利后，陈昌林被派往东北当县委书记，临行前林伯渠还对他说：“你姐姐、姐夫都是‘马日事变’中为党牺牲的烈士，你要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坚持革命到底。”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调动了积极因素，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党内外广大干部精诚团结，心情舒畅，尽职尽责地为抗日救国、建设边区而辛勤工作。当时毛泽东就赞扬说：“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搞得很好。”

《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1979年。

《访陈昌林谈话记录》（未刊稿），1979年6月。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实行精兵简政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另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行精兵简政。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一样，存在着“鱼大水小”的矛盾。陕甘宁边区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其脱产人员，到一九四一年，已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七万三千人。随着脱产人员逐年增加，群众的公粮负担自然也年年加重。一九三八年公粮仅为一万五千

石，一九三九年增至六万石，一九四一年上升为十万石，一九四一年则剧增到二十万石。这样，在群众中便产生了不满情绪，以至竟发生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轶闻。

1941年6月3日下午，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主持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电闪雷鸣，小礼堂一根柱子被雷击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荣触电殒命。与此同时，雷电还打死农民一头驴，这个农民借故发泄对负担过重的不满，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件事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下决心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的负担，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林伯渠在为《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法规》写的序言中，提出要“珍惜民力”。他说：“中国古时，楚国有个马夫百里奚，善于喂马，肥而不死。秦穆公闻其贤，以五张羊皮，换到秦国，问他喂马之道，他答曰：‘惜其力，食其时，心与马而为一’。又问他治国之道，他答曰：‘惜其力，用其时，心与民而为一’。他遂被拜为秦国宰相，秦国大治，以奠始皇统一六国之基。”林伯渠由此引申说：“今陕甘宁边区，即古秦国之地，当兹抗战建国之时，对于动员人力物力应加爱惜合理，不可过于疲竭，劳逸不均。”他借古喻今，颇多启发。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召开的边区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等十一人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议案。他们在议案中指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其理由是“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为此，他们还提出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规定供给标准，提倡节约，提高生产力，量入为出等五项具体实施办法。林伯渠、谢觉哉等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立即把参议会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李鼎铭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把它一字一句的抄在笔记本上，并批注道：“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毛泽东还亲自找李鼎铭谈话，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并告诉他，党中央对精兵简政问题要进行研究，作为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和各根据地实行。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案第八十一案。见《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边区参议会闭幕后第六天，林伯渠主持召开新选出的边区政府首次政务会议，又专题讨论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问题。会议根据边区各政府机构存在着“头重脚轻”，不够灵活，制度不健全，工作效能不高等现象，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首先调整各级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为此，林伯渠指示秘书处，通知各厅、院、处“造制在职人员花名册，于两日内造就送呈，以便实行简政时参考”。随后，他在边区政府的训令和给各县的信中又明确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各级机关过多的人员尽量缩编，边区一级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减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对被调整人员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得其所，大部用以加强区乡级行政机构，把多余的机关加以裁减或归并，做到精干、灵活。十二月中旬，编整委员会拟定出整编方案，林伯渠又亲自主持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县政府、区公署和乡市政府三个组织暂行条例，以便为进行精简和整编时所遵循。

经过一系列宣传和准备工作以后，陕甘宁边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

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计一千五百九十八人。

但是这次精简，只能说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而还未做到切实的“整”。不仅机构还未臻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工作还有许多繁琐的地方，公文仍然太多。

因此，五月初，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二次精简，邀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西北局各派一名代表，与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和各厅处院长等共同商讨成立了总编整委员会，由林伯渠、李鼎铭主持总编委会工作。同时决定，在总编委会领导下，各系统设立分会，要求在一个月內做出编整方案，交总编委会讨论。

五月二十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级干部动员大会上宣布：边府各厅处院的行政机构，均要以简单灵活为原则，重新进行调整，将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分配到县级、区级以及其它机关去工作。同日下午，他在边区一级千名青年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精兵简政决非只是“减兵裁员”。“精兵”乃使每一战士，以一当百，成为模范的抗日军队；“简政”乃使各级机关不致庞大复杂，要一人当十，十人当百。他号召青年干部，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去工作。说“知识分子干部，如多数均集中边府一级，不把县区的工作做得更好些，那实际上还是等于都空着一样。”他还向将要到基层工作的青年干部提出四点希望：（1）牢牢掌握政府的政策法规，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为群众排忧解难；（2）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学习他们的经验，提高他们的文化；（3）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4）勿做“钦差大臣”，要甘当“小学生”。

《解放日报》，1942年5月21日。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第二次精简取得了显著效果：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开了，行政领导机关和事务专管机关，明确任务，各负其责；边区政府秘书处和民政、财政、文教、建设四厅实行了合署办公；增加了县政府的权限。一县之内应兴应革、干部培养与配备、调支经费等，都由县政府决定。

陕甘宁边区的精简工作，为全国其它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月七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和当前抗战形势的关系，指出：“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这两个文件，为深入开展精兵简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央九一决定和九七社论的精神，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认为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对精简的认识不够，没有定出全面具体的方案，计划性差，领导抓的不紧，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今后简政的精神与内容，就是要求得精干、统一、效能、节约与反对官僚主义，以达到健全机构，建立制度，调整干部，改变作风，加强领导，精通业务，厉行节约，改善各方面关系之目的。他要求全体干部要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只顾布置，不去检查，有头无尾及文牍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的作风，真正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3页。

《简政不是“减政”，是提高工作效能，林主席对县区乡长谈话》，《解放日报》，1942年9月24日。

为了更好地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委托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这个纲要吸取了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和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除了提出具体的精简方案外，特别强调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性，经过边区党组多次讨论修改，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实施。随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制订和颁布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等一系列组织措施和条例，对许多具体问题在思想上求得了一致，在要求上达到了统一，保证了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次精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目的。总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工作人员由四百六十九人减至二百七十九人，减少百分之四十以上。边区政府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的精简，也取得了很大成绩，精减下来的人员，一是转入生产，充实下级机关；一是送往党校和各种干部学校，对他们继续培养提高。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经过三次精简，一方面，进一步地克服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改变了领导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彼此对立，互不相谋的各自为政的现象，使上下关系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都得到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节省了人力物力，减少经费开支和人民负担，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战胜严重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均起了巨大的作用。

领导边区大生产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林伯渠回到延安后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财政经济严重困难。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林伯渠在边区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报告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与封锁，断绝了边区和外面的一切经济往来，使边区遭到了抗战以来空前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急速实行“自给自足政策”，“用自己的力量去摆脱一切的困难与压迫”。他还说，过去在国内战争年代，我们经常被敌人的大军包围，经过开展经济建设，不但能冲破严密的经济封锁，而且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如今的情形无论如何比那时候好得多，因此更应该充满信心。只要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作出认真的努力，一定能实现财政经济上的完全自给。林伯渠宣布，军事机关，中央机关、边区机关成立财政经济组织，分别由叶季壮、邓洁、曹力如负责，以便加强对生产的组织领导。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朱德的讲话，提出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这次大会以后，边区的生产运动，便走上了发展自给自足经济的新阶段。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坚决贯彻党中央规定的应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土地宽阔，是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历史上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我们要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都得靠发展农业。财政经济困难，也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克服。工业、交通和商业虽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也只有农牧业生产发展起来之后，工业、商业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边区许多工业原料都是来源于农副产品，商业贸易也主要还是一些农、副、牧产品。

为了贯彻“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这主要是：

第一，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陕甘宁边区总的来说地广人稀，荒地很多。但人口分布却不平衡。绥德分区一些县，是人多地少，延属分区一些县又人少地多，历史上群众就有迁移的习惯。而且这时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也有许多老百姓为谋生路逃来边区。为了接纳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公布优待移民和难民条例，规定移民难民开荒者可以长期有使用权，三年内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并减轻其他负担，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林伯渠非常关怀移民和难民的生产。

一九四二年二月，米脂县马丕恩一家六口，背着一口铁锅、两个破被卷和仅有的半碗小米和半碗黑豆，来到延安南三十里铺边区农场。他和十七岁的女儿马杏儿，承包农场土地四十五垧（每垧三亩），开荒八垧。由于起早贪黑，辛勤劳动，加之耕锄得法，虽遭风灾，实收粗粮四十一石，除按合同交农场近一半外，分得粮食二十一石。林伯渠和李鼎铭得悉马氏父女的生产事迹后，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的称号。在边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还向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发了奖品，分别颁发了林伯渠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和“妇女光荣”的奖状。林伯渠在安塞农村调查时，发现移民们肯吃大苦，二区宝家湾有个好镢头手吴寿德，靠一把镢头掏了一百亩熟地和十亩生荒，他便在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吴寿德的“镢头精神”。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鼓励移民、难民生产的政策，这就为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争得了一支劳动大军。据统计，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安置移民难民七千八百五十五户，共二万零七百四十人；一九四二年又安置五千零五十六户，共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劳动力，如以每人开荒二十亩计算，他们一年即可开荒二十多万亩。这对发展边区农业生产，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贡献。

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吴满有 是当时最出名的一位。他原籍横山县，一九二八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仍难以为生，不得不卖掉两个女儿。一九三五年陕北“闹红” ，他分得了土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他辛勤劳动，努力开荒，改良农作方法，积极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加生产，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为了鼓励生产，开展劳动竞赛，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一九四三年二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作为和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

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这样，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

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吴满有，在1948年4月西府战役中被蒋军俘虏，因失节而被开除党籍。

指1931年以后陕北人民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第三，开展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土地政策，也是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为了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策的决定》，中共西北局也于同年十月间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林伯渠根据上述文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大约占边区土地面积一半的老区，已实行土地革命，废除了封建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一半是新区，土地革命尚未进行，广大农民仍受着地主的封建剥削。

减租减息就是在这些未经过分配土地的新区进行。抗战以来，这些地区虽然也开始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多数还停留在一般的宣传。有些虽进行了减租减息，但因发动群众不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还相当严重。为了做到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林伯渠依据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局的指示，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以及《地权条例草案》等，规定，出租人应按所定的减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承租人应按所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具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交之权。还规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出租人依法收回土地时，“须于本年作物收获后次年作物耕种前之时日为之，并须于收获后一月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仍须交纳本季地租。”这些规定，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又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 and 地主经营土地的积极性。米脂县印斗区八乡减租保佃后，大家就说：“生产的心有劲了”，修了水坝，利用兄弟亲属关系组织了四十九个变工小组，使生产计划得以顺利完成。葭县减租彻底，就多挖了水窖万余个，多开了数千亩荒地，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附说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1—232页。

第四，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垦这是朱德倡导的，其中也渗透着林伯渠的许多心血。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九十华里处，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百年前，曾经是人烟稠密，经济繁荣的地方。清朝同治年间，清政府镇压西北捻回起义，使这里人烟断绝，荆棘丛生，成了狐狼出没的地方。早在

一九四一年春，林伯渠利用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机，就曾亲自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去南泥湾进行过踏勘，认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场地。一九四一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把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林伯渠对三五九旅在一年之内开垦良田万顷，做到“禾黍盈野绿，瓜菜满阡斑”，十分喜悦。他在《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中写道：

农可属于兵，犹兵寓于农。
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陇。
兵农一身任，是为真英雄。
伊谁先示范，三五九旅功。
用知策群力，自不患困穷。
从来言兵者，粮秣预为充。
粮匮军亦匮，今古一例同。
谁能宏创造，自给谢民供。
不为环境苦，红军仍足风。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3页。

一九四三年春节，林伯渠亲率边区政府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视察驻军的生产情况后，向记者发表谈话，盛赞三五九旅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他说：“象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民负的军队，乃真正的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号召边区干部和人民，向军队学习，并在各方面给军队以具体的帮助。当时，边区留守部队除屯垦南泥湾外，还在槐树庄、大风川、豹子川、清泉沟、葫芦河等地屯垦，这些部队也都为保卫边区和大生产运动作出了贡献。

《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

第五，创办光华农场。林伯渠高瞻远瞩，为了发展边区的农业，他筹划创办了延安农业试验场——光华农场，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指导科学种田。在勘察农场场址时，他骑着毛驴带领着几位农学系毕业的科技人员，踏遍了延安杜甫川的山山水水。他拄根木棍，爬到高山之巅，俯视整个山川，最后选定一块背山面川，向阳临溪的有利地形，作为农场场址。几百亩川地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大片坡地栽培各种果树，山地植树造林，周围的荒山饲养牛羊，溪水饮畜和灌溉。在林伯渠的指导和支持下，光华农场很快修建起办公室、宿舍和简易实验室，以及做试验用的糖坊和烤烟房。他还特别批准建造一座酒坊，酿酒提炼酒精，保障延安卫生部门的需要，并用酒精喂养奶牛。

为了促进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林伯渠把延安许多有农科专业特长的人才都调到光华农场。人数虽然不多，但专业颇为齐全，搞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养蜂、养蚕、水利和农业经济的全有。林伯渠和边区政府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也非常重视。

一九四二年，甘泉等县牛瘟流行，给生产带来严重威胁，林伯渠立即指示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陈凌风等用土法研制的兽疫预防针和治疫血清，仅几个月时间，就扑灭了边区七个县的牛瘟。光华农场试种烤烟成功后，立即在边区得到推广，不久还在延安办起了卷烟厂，它出产的“曙光”牌香烟，成了当时边区受欢迎的畅销商品。

光华农场的许多图书资料以及种畜、粮食、蔬菜的优良籽种，也都是

林伯渠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光华农场引进和培育了适合陕北高原种植的狼尾谷、马齿玉米、春小麦、白皮马铃薯和甜菜等农作物；试种了卷心白菜、金皇后蕃茄、四季菜豆、露八分萝卜等一百八十多种蔬菜；试栽了梓树、大苹果、西洋梨、法国葡萄等十多种果树；培植了二十多种草木花卉；饲养了二百多头奶牛。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凝结着林伯渠的心血。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除采取了以上重大措施外，还有鼓励和推广植棉，发放农贷、改造二流子等措施，这些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伯渠对边区工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早在抗战初期，他就指示边区政府用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助的一笔款，办起了“难民工厂”，亲自选定当地干部吴生秀当厂长。以后又陆续办起了纺织、农具、皮革、化工、制药、造纸、火柴等工厂。为了解决技术力量问题，他从武汉、西安等地物色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送他们到边区来发展工业。他还指示民政厅和组织部把当过县长或建设科长的当地干部，如盐池县的金体元、米脂县的艾秉勤等派到工厂当管理干部，并要求他们注意招收本地工人，为陕甘宁培养技术人才。

在实际工作中，他尽力帮助工厂排忧解难。有一次，难民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亲自去找朱德总司令商量，为八路军预订五万条毛毯，签订合同，部队先付一部分贷款，解决了该厂资金周转不开的困难。但由于缺乏经营管理经验，签订合同时，没有把毛毯锁边的线钱写进去，工厂负责人又去找林伯渠，林借此机会教育他们说：“搞工厂工作一定要精心筹划，搞好经济核算。”他又去找朱总讲明情况。朱德体谅地说：“我们军队也不能让难民厂赔本。我让后勤部门在合同里把锁边的线加上，钱照付给他们。”

难民工厂在政府和部队的关怀和支持下越办越好。生产和加工出很多呢子、毛毯和皮货。林伯渠指示边区政府，让给搞外事工作和参加外事活动的同志，每人做一套呢子衣服，以后，又给科长以上的干部每人一套。一次，周恩来去重庆谈判时，带去了一些毛毯和皮货。联合国救济总署兰道尔看了，称赞难民工厂办得好。他曾多次对国民党官员说：给你们的钱，比他们多几倍，你们什么都干不出来。陕甘宁边区出的产品不错，有呢子、毛毯、皮坎肩。

为了保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还发展了商业贸易。咸盐、皮毛、甜甘草是边区的三宝，也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特别是食盐，它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在靖边、定边、盐池一带，取之不尽，多如泥土。要把这个死宝变成活宝，就要发展运盐事业，发展对外贸易。对此，林伯渠通过调查指出，边区周围有一千万以上的人口，每年需要六十万驮盐（每驮一百五十斤），这就是说，盐是有销路有市场的。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各县市组织了很多运盐队，进一步发展了运盐事业。一九四一年九月，《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克林写的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并为之作序，对边区运盐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九四一年外销食盐二十九万九千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对增加边区财政收入起了极大的作用。除此之外，为了筹集发展生产的资金，林伯渠发起组织劝储团，号召边区人民节约、储蓄，使老百姓生息取利，使银行集腋成裘，收到了利公利民的效果。他还积极主张在边区发行救国公债，向老百姓借钱，作为经济建设的资金。一九四一年全边区在经济建设上共投资七百万元，其中五百万元就是当年发

行公债的集资。所有这些，对边区的经济建设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鲁忠才是富县城关区副区长。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就是他领导进行的，故名曰《鲁忠才长征记》。

林伯渠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带头人。他政务繁忙，日理万机，还扛着锄头在延安南川开了一片荒地，种上谷物和蔬菜，经常挤时间锄草、浇水、施肥，管理得很精细，每年都获得好收成。有个叫惠疙瘩的农民，常看见林主席一大清早提着箩筐拣粪，非常感动，就领着儿子挑了两担粪要倒在他的粪堆上，说：“您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替您拾粪吧。”林伯渠笑着说：“你们的好意我领了。我虽然年纪大些，在政府里有工作，但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也要积极响应，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是咱边区一个普通老百姓嘛！”

边区政府号召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林伯渠以身作则带头响应。他首先在边区政府机关墙报上贴出了个人的生产节约计划，其内容是：（1）从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二石细粮的任务。（2）收集废纸交建设厅。（3）戒绝吸外来纸烟。（4）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给。以后，他还写了一首生产节约诗：

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贍。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林伯渠在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边区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打算时，也附了自己的生产节约计划。毛泽东看后甚表赞同，立即写回信说：“来信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73页。

《毛泽东书信集》，第226页。

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生产自给动员会以后，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在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向陕甘宁边区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一九四三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三月四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徐向前等领导同志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作动员报告，阐明了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针，规定了机关生产的总任务为一亿六千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元。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林伯渠针对有些单位一度把商业作为机关自给运动主要方向的偏向，着重指出：“农业生产是最可靠的。今天靠得住，明天也靠得住！”会上，还奖励了六十六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

这次大会，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林伯渠豪情满怀，呕心沥血，决心领导边区军民，向夺取丰衣足食的高度进军，

在全边区又掀起了更为壮观的大生产的新高潮。

参加延安整风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积极参与领导和投身于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1108页。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作出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提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任务。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总结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从思想根源上分清了路线是非。

九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肯定了一九三一年临时中央成立后党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以兴奋的心情发言说：毛主席的报告很好，我完全同意。在中央苏区时，表面上看组织生活很严，但都怕说话，因为说错了就要挨斗争，这实际上是组织生活中极不正常的现象。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扬了马列主义的优良传统，把党的路线端正过来了，有着重大的意义。一九三六年九月保安会议时，我感觉党更进步了。到西安事变时，便感觉到党更统一了。这次会议上，过去很少说话的同志都说话了，我非常高兴。林伯渠还借用历史上儒学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作比喻，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他说：汉学只片面强调实际调查，成了繁琐哲学；宋学忽视实际调查成为空想主义。他还作自我批评说：我在边区工作中，对盐的产、运、销及发行钞票问题上，都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马列主义的教条，而是老经验的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

九月会议上，中央决定编辑印刷《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组织在延安的一百二十多位高级干部进行理论学习，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所以，从这时开始，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一九四一年，林伯渠结合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六大以来》党内文件，还写了长达五千字的自传，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战斗历程。

在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期间，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增强党性”、“调查研究”等决定，提出各级领导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调查研究。林伯渠一贯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一九四一年冬，虽已年近花甲，仍然冒着风雪严寒，亲自率领一支二十多人组成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

林伯渠这次出巡，没有事先通知县政府。十二月二十日，当他们一行突然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几个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而

来，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长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了解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工作后，便深入到农村中去。他运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甘泉县三区二乡为对象，把二十多人分成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农村调查，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情况。

林伯渠手持拐杖，走家串户，亲自调查研究。一九四一年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他带着这个问题，了解群众的反映。一天，林伯渠和一位姓吴的农民攀谈起来。这位农民虽不认识他，但眼见这位老者和蔼可亲，于是无所顾忌地侃侃而谈，最后他说：“今年征收的公粮是比往年重些，但人民不是怕重，而是怕不公平。”他以反问的口气说：“老先生，你说重吗？日本鬼子打来了，老百姓睡觉都不得安宁，八路军拼着性命保卫我们，这样一想，还能说重吗？”

林伯渠每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群众就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许多人象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向林伯渠倾诉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徇私情的事实，对政府某些工作提出建议，甚至连两亲家之间的纠纷都告诉他。林伯渠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逢人便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

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

林伯渠不辞辛劳，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慰劳驻军、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参加新年庆祝会。他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往往刚一下马，就又被请去讲话了。有一天，他发高烧，驻军请求他去参加群众大会，他也毫不迟疑，带病前去参加。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当地军民对这位慈祥亲切的边区政府主席，倍加爱戴和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人们都争先打招呼，向他反映各种情况，许多老乡提着鸡蛋、面条、爆玉米花等物品，去慰劳他，以表他们的深情。

在甘泉县考察半月之后，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林伯渠率考察团离开高家哨，去富县继续考察。当天，林伯渠为沿途群众争交粮草的情景所感动，特赋《早发高家哨》诗一首：

骏马坚冰踏洛河，纷纷瑞雪舞婆娑。
载途公草驴争拥，觅食饥禽陇见多。
天意难知厄重耳，法轮无语笑荆轲。
群山皆冷心犹热，反著羔裘当薜萝。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4页。

一月七日，林伯渠一行抵达富县，受到富县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进行县政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富县参议会李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建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员赵晋卿谈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量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大家畅所欲言，有情况反映，有批评意见，有工作建议。

林伯渠倾听了每个人的发言，认为大家的意见对政府工作很有帮助。

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有拦马告状的事情发生。

有一个老乡听说林主席来了，连追四五个地方，一见林伯渠就跪下告

状。在富县短短十多天时间，拦马告状的案子有四十多起，大多是婚姻和土地等纠纷。

林伯渠对此非常重视，后来这些案件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在考察过程中，林伯渠始终和随行人员同甘共苦。同志们见他偌大年纪，工作又那样劳累，还和青年人一样吃着小米饭，实在有些不忍心，就悄悄地做些大米饭给他吃。

但他发现只是给他一人吃大米饭，却说自己肚子痛拒绝了，仍同大家吃一样的小米饭。

有时因工作要在机关吃饭，同志们借机多做几个菜，让他补补身体，也受到了他的批评。

他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要时刻想到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有小米饭吃就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搞那么多菜呢！”

林伯渠在甘泉、富县考察期间，访古寻胜，触景生情，还写下了《宝室寺铜钟》、《杜工部遗居羌村》、《茶坊新市场》、《军民晚会》、《太乐区》、《张村驿》途中即景诗六首。

一月下旬，林伯渠考察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在致词中，对“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的精神，备加称赞。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之后，用洪亮的声音，报告了考察富、甘两县的情况。续范亭将军用激动的口吻，雄浑诚朴的音调，朗诵了称赞林伯渠出巡归来的诗句：

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
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

《续范亭诗文集》，第30页。

二月九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报告了甘、富考察观感。他以亲自调查了解的具体情况，指出这两个县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太低等。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下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进行政策法规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讲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为改进政府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林伯渠的甘、富调查，为边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在即将全面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开展时期，由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体党员的整风学习，由以政治路线学习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

为加强对整风学习的统一领导，二月初，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边区一级的学习指导委员会，推定林伯渠为主任。四月十四日，

中共西北局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整风问题，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分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并决定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分别组织领导学习的委员会。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及学校的学习。

林伯渠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从党的几次路线斗争中认识到，党能发展壮大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实在来之不易。历史经验证明，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坚持正确的路线，必须不断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牢固掌握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他在《循范亭同志之约移住延园，诗以记之》中这样写道：

枯杨生稊满园中，活跃春情已不同。

性命如今能补益，稳撑立场整三风。

林伯渠对整风运动充满信心，热情很高。他认真精读中宣部所规定的每一个整风文件，联系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并写出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富有哲理的诗篇。他在《读文件》诗中写道：

欲将炉火炼纯青，克复功夫仔细寻。

待到肖妙真好处，态度辩证艺术心。

存在为主思维宾，由来认识重双映。

是非界限如何定，稳着立场结万人。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1页。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42页。

在深入学习文件的热潮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七月一日，中共西北局机关、边区政府机关、保安处、行政学院四个单位党的总支部，在延安大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林伯渠发表讲话，他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后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如此力量，原因在于它“已为马列主义理论所武装，它已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从来就有着不调和的革命态度及行动，这些表现在它的党员的奋斗精神上，党有自我批评的传统，党员坚守无产阶级立场。”他还说：中共所值得夸耀的，“乃是在它一开始成立时就懂得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动力，一开始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为民族事业武装奋斗的经验 and 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并由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里，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类型的生动具体的指导理论来。”他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切实地学好整风文件，以实际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

林伯渠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中，常常抽出时间，参加边区政府各厅、处的整风学习，直接了解情况，进行具体指导。为了搜集掌握基本情况，九月初，他还亲自到延安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刘秉温县长交谈了六、七个小时，详细地询问政府各项工作，并且直接参加延安县甲、乙两个整风学习小组漫谈会，就联系实际进行思想革命、新老干部在学习中要相互帮助、工作和学习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指导。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地方县级以上、部队团

级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三百多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经常到会作报告或讲话。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部分高级干部都到会旁听。这次大会以整风的精神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第一，对边区党历史上的路线争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从政治路线上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是非功过。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贺晋年等同志，都以亲身参加党内斗争的经历，批判了“左”倾错误执行者不懂中国和西北实际情况，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主观主义错误，清算了一九三五年错误肃反所产生的恶果。第二，批评了当前工作中的偏向，许多同志联系实际做了自我批评，揭露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第三，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的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任务。中共西北局高干会，是整风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

林伯渠在历时八十八天的会议上，先后作了多次发言。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时，林伯渠就政权工作中，部分党员存在着严重的闹独立性（特别在上层）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作了《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和《关于整党问题》的发言，摆了大量现象，并对某产生的根源，作了深刻的剖析。他说：对新民主主义如何认识，这是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只强调形式，忽视内容；只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强调团结，忽视必要的斗争。

这就从根本上违背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形成右倾危险。他还说：对环境与任务的认识，这是我们制定政策和掌握政策的出发点。现在有些同志却无视边区处在革命战争环境这一根本特点，忽视养活军队、拥护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边区关起门来，单独建设，搞所谓的正规化，主张“百端俱举”、“样样是中心”，忽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这些也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这些错误，有意无意的抵制中央与西北局的领导，“这就是政府工作中闹独立性与自由主义的主要根源。”

他号召从事政权工作的同志，特别是高级负责同志，要努力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反对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清算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贯彻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

《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1953年11月6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

会议在检查抗战以来的建设工作时，林伯渠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发言。他根据贺龙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精神，对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我们摸索着做了一些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只是零零碎碎的。检讨边区财经工作的缺点，总起来说有几个方面：第一，思想方面，存在着保守观念和教条主义。保守观念表现在单纯地为财政而财政，只看到有限的收入，而不想财政的来源。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自我批评说：我过去对财政工作做得不少，在辛亥革命后，办过地方财政，在国民党的中央做过财政工作，在南昌暴动时，做过财政工作，在中央苏区，也做过财政工作，老一套很多，这就容易产生保守思想。

“我这种保守的观念，表现出来的就是为财政而财政，”“不从经济上来解决财政来源，而只是在财政数目字上来打圈子。”“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

财经干部应该懂得，在经济财政上，这种保守的观念是要不得的，这对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财政是不适合的，我们的财政要从大量的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在谈到财经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他说：我们有些同志脱离抗日战争的时代，不顾边区的具体条件，作出了很大的计划，要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边区发展重工业，夸夸其谈空洞的理论和设想，一点问题也不能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教条主义思想，也是完全要不得的，必须彻底纠正。

第二，贯彻执行政策方面，如对减租减息、运盐等，许多同志也知道重要，但态度消极，听其自然，没有发动群众，没有把劳动力组织起来，因而未能很好贯彻。第三，工作作风方面，有官僚主义，不能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和总结经验。最后，他强调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建设问题，现在我们不仅要注意组织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把生产很好的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重要关键。（2）要把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联系起来。精兵简政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精兵简政目的中的统一与节约，更要把握住，因为它和经济工作、财政工作，关系极大。（3）要树立建立革命家务的思想，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漠不关心，不检查不总结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财政工作做好。

《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财经问题的发言》，1953年12月21日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翻印件。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还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对以下八个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一）目前政府工作要集中力量于生产和教育两大基本任务；（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三）改善领导作风，提高工作效能；（四）加强乡政权工作；（五）反对关门主义，巩固三三制政权；（六）开展拥军优抗运动；（七）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八）改造干部的思想作风。

林伯渠在高干会上的报告和发言，特别是关于三三制的论述，受到了与会者的共同赞许。

为加强中共西北中央局的领导，还在会议进行期间，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发出通知，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五人为西北局常委，林伯渠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

一九四三年三月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检查总结阶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林伯渠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批评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路线，提出应解决所谓“罗明路线”及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问题。这时，他又回忆起此事，并写了《偶忆》一诗，以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56页。

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规定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在实际工作中改善领导作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林伯渠又亲自深入安塞、志丹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在农村短短的十天，他耳闻目睹高干会后农村呈现出来的新气象，写下了《农村十日》一文。文章写道：

沿着延安到志丹的大道上，春雨润泽了肥沃的田野，路旁熟地大部已翻过下种，茁壮的麦苗向阳挺立着。显露在农民脸上的，是喜悦的颜色，他们一个个都赶牛到地里去了，家里只留下婆姨小娃。一路上运盐牲口络绎于途，南区合作社运盐队的小旗时常招展在人们的眼前，木板成了北上牲口主要驮运的货物。羊羔早下来了，随着大的羊群踟躅在青草葱茂的山坡上。

……

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吗，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

……

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了，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

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事实来。……

通过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中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调查，使他掌握了领导边区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干部的领导作风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

一九四二年，在中共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林伯渠发表了《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一文，他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与观点去继承我们民族一切最优秀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革命宝库中的珍品，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榜样。”他坚信：只要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在实践中加以发展，运用它去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解放日报》，1943年5月30日。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在整风运动中，林伯渠经常说：“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更决定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有这样一件事，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办公厅指定总务处科长廖德震料理冯的后事。在收殓时，廖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为了此事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批评廖的错误，林伯渠、谢觉哉等都参加了。会上，有的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要开除廖的党籍，一时持这种意见的还占了多数。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他冲锋在前和

敌人搏斗。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的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象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发言，使廖德震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作了深刻的检讨，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与会的年青党员也都明白了“治病救人”的深刻道理，大家一致同意免于对廖的处分。

林伯渠对老干部关怀备至。徐彬如是一位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大学做党的工作，曾和林伯渠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一年由于在上海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打成反党右派并被开除党籍。抗战开始后，徐彬如在林伯渠领导下，在西安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三九年调回延安。林伯渠考虑徐彬如的经历，在工作安排上注意从各方面使他得到锻炼和提高，曾先后建议让他担任边区参议会秘书长和留守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林伯渠对徐彬如在王明“左”倾错误统治时期被打击迫害的历史，深表同情。

在整风运动中，他曾向毛泽东汇报过这个情况，并且要亲自带徐彬如去见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谈清楚。后来，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打电话对林伯渠说：“毛主席的工作很忙，你们不必找了。徐彬如的历史问题可以解决。”此后，对徐的历史问题便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直到一九七九年，徐彬如回忆林伯渠关怀干部的情景时，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雷经天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多年，中央调他到南方去工作。但他在担任高等法院院长期间，有些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批评，思想上有些包袱，也对边区政府有些意见。林伯渠亲自找他谈话，主动承担责任，做他的思想工作，解除思想上的疙瘩。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工作关心不够，每年最多讨论一次司法工作，使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工作做好做坏凭自己，自觉性差的人就容易产生自流现象。近两年来，司法工作的任务比较明确，方法也比较对头，工作还是抓得紧的，成绩也很显著。你没有学过法律，对于搞司法工作，大家都经验不足，边府对法院工作也缺少经常检查，这在今后是应该加强和改进的。”林伯渠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雷经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王凌波是一九二五年入党的老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曾两次被捕入狱，均坚贞不屈。一九三七年九月被释放后，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一九四二年冬到延安，任行政学院副院长（林伯渠兼院长），为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王凌波工作非常刻苦，因劳累过度，于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突患脑溢血。正在延安县检查整风学习的林伯渠，闻讯急驰行政学院。当时，王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正在诊治，林伯渠对医生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要什么药，我们设法找”，并且一直守护在王凌波的身旁。王凌波终因病势严重，抢救无效而逝世。林伯渠非常悲痛，在延安各界代表举行的公祭会上，他流着泪报告王凌波战斗的一生和病殁的经过并执紼送葬。为悼念这位革命老战友，他在挽联中写道：

天胡为此醉兮，来从追捕，去若电火，
一片丹心报党国。

我实愧公多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万株桃李迎门墙。

林伯渠对干部既尊重，又信任。一九四二年九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

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了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有些会议也不能参加。林伯渠知道后很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并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同志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林伯渠时，他还经常询问：“罗秘书长 看过没有？”在林伯渠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凡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李维汉，别名罗迈。

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林伯渠反对康生等人搞“逼供信”，保护了不少干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的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陕北公学十九岁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十二月二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随意夸大敌情，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他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在延安逮捕了二百多名“特务”、“叛徒”、“反革命”和嫌疑分子。四月十二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他说：“这几个月我很忙，白天开会，晚上捉鬼。”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机关的审干工作也开始了。康生又直接插手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他认为边区政府不严密，要求研究审干的会议在保安处开，并亲自参加边府党组会议，这实际上是给林伯渠施加压力。

七月十五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宣布已有四百五十八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在康生报告后的短短十多天里，边区政府系统就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是以坦白号召坦白，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第三次是控告。一时，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抢救运动”愈演愈烈，冤屈了不少同志。

由于康生利用张克勤年幼无知，一手制造了“红旗”党假案，涉及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在“抢救运动”中，边区政府系统一百多人也被当做特务、特嫌、叛徒“抢救”。开始时，林伯渠不在延安，回来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站出来保护一些他了解情况的革命同志。比如，“红旗党”的火也烧到了张曙时的头上，林伯渠便说：“张老是我们党的老同志，参加过南昌起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不要乱加怀疑。”林伯渠还亲自去看望张曙时，对他说：“我们都是老同志，都尝过‘左’的滋味，连毛主席在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劝他要放宽心些。

林伯渠的秘书区棠亮，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因在广州时写过一些文章，也成为被“抢救”的对象。有人对她施以逼供信，甚至要进行捆绑吊打。从不发脾气的林伯渠，知道后拍着桌子说：“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有力地保护了区棠亮。

还在一九四三年六月间，毛泽东在一封电报的批示中就提出：对绝大多数轻重嫌疑分子不予逮捕，原则上不杀一人。但在“抢救运动”盛行的日子里，康生却想在延安开杀戒，要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公审枪毙人。林伯渠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不同意。十月九日，毛泽东在给绥德反奸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才免除了一场错误肃反。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71页。

鉴于“抢救运动”造成的恶果，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即通常所说的九条方针）和毛泽东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精神，曾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决定对所有的案子都要进行甄别。边区政府机关，在林伯渠领导下，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的甄别工作委员会，本着坚持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的精神，对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的案子，一一进行了甄别，许多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有少数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一时无法查证的，则先暂时挂起来待以后再作结论。

一九四三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十月十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林伯渠也随着整个运动转入了总结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直到七大前夕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建设模范边区

延安是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领导抗日，领导和指挥军队坚持敌后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所在地。以林伯渠为主席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坚持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到一九四三年便渡过难关，走上恢复发展生产的道路，以发展生产和教育培养干部两大基本任务为中心，开展了更有成效的建设。

一九四三年，边区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又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以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由于各项生产措施的进一步落实，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各条生产战线都获得了巨大成绩。为了检阅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同时举行了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二十六日下午，两个盛会在三万群众欢欣鼓舞的气氛中隆重开幕，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林伯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表演说。他说：“在这样一个战争环境又是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伟大力量的表现。”他在简述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以及边区生产运动的特点后指出：旧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创造新时代的时候，这个新时代的创造者，就是今天二百多个劳动英雄和成百万的边区革命人民。最后，他宣读了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计划：增加细粮二十万石，植棉二十万亩，运盐四十万驮。

号召边区军民，为普遍做到耕三余一而努力！

续范亭在会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生产的丰功伟绩。他说：“我五十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把共产党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是的，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

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能余一年的粮食。

《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

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总结交流了生产经验，明确了指导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的方针和办法，给劳动模范发了优厚的奖金，并颁发分别有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亲笔题字的奖状，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一步发展生产，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夺取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

生产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六千六百件展品，近两千张图表和照片，生动地显示了边区军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参观者达五万余人。

中共中央对边区“两大盛会”非常重视，十一月二十九日，把全体劳模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模。毛泽东还作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指出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林伯渠、陈云等陪同下，参观了展览会，找了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了解移民生产、变工扎工、部队生产、创办义仓和合作社等方面的情况，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5页。

十二月十六日两大盛会闭幕时，林伯渠致闭幕词，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号召，要求劳动英雄要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这两个大会使广大军民进一步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林伯渠邀请部分劳模漫谈明年生产具体办法。李鼎铭副主席和各厅、处、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座谈会。林伯渠和各负责人不断提出问题向劳动英雄们请教，要求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劳模们对开荒、变工、移民、畜牧、运输和合作等项工作都发表了意见。特别是对林主席在闭幕大会上提出的“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口号，充满着信心。他们认为要做到耕三余一，在种地上也要来个“三三制”，即揭（翻）地三次，锄草三次，每亩地上粪三十担。种地要贪好，不要贪多，把已有的地种好了再多开荒，熟地要好好保养，不要随便地把地搞坏就丢掉。谈到改造二流子，大家说，今年改造了四千五百多个二流子，多是用说服教育具体帮助的办法改造过来的，今后要坚持这个好办法。大家反映说，老百姓普遍要求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这对促进生产很有好处。座谈会开了一整天，劳模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对搞好边区的经济建设，谈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接着，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林伯渠总结了一年来的工作，要求一九四四年大力发展合作运动，发展植棉、打盐、运盐、畜牧和民间手工业；部队粮食和副食品做到多数完全自给，机关做到经费大部自给；要把物资贸易看作仅次于发展生产的重要工作。

从此以后，边区的生产出现了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

在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的文教建设在党中央、西北局及林伯渠的关怀和指导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许多新气象。

还在一九四二年，林伯渠就论述了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应该是：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儿童教育。”

《林伯渠同志在一九四二年高干会上关于政权工作中两个根本思想问题的发言大纲》。

干部教育，除了在职干部每天的政治或文化学习外，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曾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医科大学、民族学院等二十多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林伯渠不仅参与了一些学校的创办工作，还亲自兼任行政学院的院长。

边区的社会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一环。抗战初期，边区的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为了尽快扫除文盲，林伯渠除了提倡办识字班、识字组、夜校以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还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了新文字报刊和学校，“收到很大的成绩。”

吴玉章：《回忆伯渠同志》，《中国青年报》，1960年6月18日。

由于林伯渠的提倡和推动，边区的中小学教育和国民教育，也不断进行了改革，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一九四三年，边区有中学、师范八所，完小、初小四百四十四所。特别是边区政府制定了“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还创办了五百七十多所村学，一百五十多所私立小学，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和二百三十多所夜校或半日校。

在林伯渠领导下，边区医药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打水井，修厕所，建猪圈，消灭虱子，取缔巫神，大力培养医护人员，实行新法接生，建立医药卫生合作社，实行中西医合作，严禁幼女缠足等，这些都有力地改变了边区卫生落后面貌，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林伯渠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还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斗争，和工农兵相结合，为广大群众服务，创作、演出了许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大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边区“民众剧团”的方向和道路，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总之，在林伯渠的关怀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建设的阵容，也为之一新。”

《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解放日报》，1944年12月8日。

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边区广大军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个阶层之间，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空前团结的局面。一九四三年春节的拥军优抗与拥政爱民运动，就充分地反映了这种状况。春节前，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并拨款六万二千多元，由林伯渠等亲率慰问团慰劳延安附近的驻军和抗属。南泥湾等地驻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在驻地修筑道路，平整场地，扎搭彩门，张灯结彩，准备热烈欢迎慰问团。

二月十七日，林伯渠在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肖劲光、延安警备区政委张邦英、慰劳团团团长杨清、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等人陪同下，乘车来到南泥湾、金盆湾，对连队、部队工厂、家属合作社进行慰问。他们走到那里，那

里顿时就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二十日，南泥湾举行阅兵式，慰劳活动出现了更加热烈的场面。这一天，灿烂的阳光照射着这块沉睡百余年而复苏的土地，数十里外的垦区部队，全副武装赶到阅兵场；李区长带领着披着羊皮袄的男人，穿着大红大绿的姑娘，发髻上插着针簪的婆姨和欢腾雀跃儿童的群众队伍，每人手持一支小旗，也浩浩荡荡来接受林主席检阅。十点，林伯渠身着蓝布大衣，头戴黑呢子帽，精神矍铄，迈着稳健的步子，由王震旅长陪同，进入阅兵场，登上检阅台。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了整个山谷。手持日本造的武器的年轻战士，端着枪、跨着正步，在庄严宏亮的军号声中，雄纠纠地通过检阅台。是日，部队还进行了精彩的刺枪、投弹、过天桥、越障碍等表演。林伯渠看到“执枪杀贼寇，释枪事田陇”的英雄部队，脸上挂着无比欢欣的笑容。

当日下午，南泥湾驻军还举行了拥政爱民大会，王震旅长在五千多军民参加的大会上致词，讲述了这个盛会的意义。接着，神采奕奕的林伯渠主席讲话。他说：这次我们带来的慰劳品很少，然而我们带来了延安及边区人民对于自己的军队无限的爱护热忱和关心。你们是八路军最优秀的一部分，你们是广大人民的军队，是有战斗力有创造性的军队，八路军的创造精神在你们身上光辉地表现出来。你们是艰苦耐劳的军队，是生产的模范，你们已把生产知识和斗争知识结合起来，因此你们又是无敌的军队。林伯渠的讲话，不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会上还给优秀“贺龙投弹手”每人奖励一条有林伯渠亲笔题字的毛巾，部队集体进行了拥政爱民宣誓。

二十三日，林伯渠离开时，在给驻军全体指战员的留别信中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荒地变成了良田，梢林开辟为公路，新窑新屋一排排建立起来，木工厂、纸厂、榨油厂、鞋厂已在工作，南泥湾、金盆湾的自然面貌大为改观，移民日益增加，军民生活向丰衣足食之途迈进，而这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现象，是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展生产开辟南泥湾政策的结果。”“希望你们在党中央、西北局、边府、留守兵团司令部领导下，及王旅长、张政委直接领导下，更加团结一致，努力生产，加紧学习。”

《解放日报》，1943年2月26日。

在林伯渠的带动下，整个边区的拥军优抗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与此同时，军队也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而且自此以后，“双拥”活动即成了根据地的各级政府与军民的光荣传统。不仅平时拥政爱民、优军优抗，每逢节日，彼此还要举行热烈的慰问活动。

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中，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及党中央与西北局的一系列指示，不仅使边区军民渡过了难关，而且做到了丰衣足食，使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把边区建设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因此，他也更加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在陕甘宁边区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境日益明显好转，出现欣欣向荣的情况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再次出现了大溃退，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近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就失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横征暴敛，这时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扶摇直上，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局面。

在国民党统治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急剧加深，英美开始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的情况下，美国这时也希望中国能够更多的给日本以牵制，配合它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在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共产党的促使下，又恢复了国共两党的谈判。

还在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就提出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不过，当时他是想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妄图通过谈判“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所以中共中央根本未予理睬。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和国民党统治区内部的变化，为了团结和集中全国力量粉碎日军的新进攻，“拉蒋抗日”，准备对日反攻，才又重新提起与国民党谈判之事。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告诉他中共拟在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中择一人或三人同行，到重庆去见蒋介石并希望能与国民党重开谈判。

二月二日，国民党复电延安，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同去重庆。为试探国民党的态度，十七日，毛泽东告知郭仲容，我党决定先派林伯渠去重庆谈判。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林伯渠就开始转入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

从二月中旬至三月期间，国民党为准备与中共进行谈判，也多次在嘉陵新村四号召集梁寒操、吴铁城、张厉生、陈布雷、陈立夫、潘公展、何应钦、徐恩曾等军政要员开会，商讨“关于林伯渠来渝对策”和“对中共政治解决方案”。他们在“极机密”用后“收回焚毁”的“应付对策”中，对林伯渠来渝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分析，并对林“本人之应付”作了周密的安排。要求下属：“注意林氏到西安之活动，并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之动态与表现，随时电报中央”；“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两统局（指军统和中统）密切注意其活动，尤其对外人之来往，与各党派之来往”；“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等等。三月十五日，蒋介石还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发表训词说：“此次林祖涵之来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国民党对林伯渠赴渝谈判如临大敌，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迫于形势只想做做样子。在林去重庆前，他们在内部还提出：谈判的“根本态度”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之成功”；在谈判时，“先以试探方式行之”；“在谈商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

“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

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但以不露痕迹为原则”。

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国民党：《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及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等离开延安，途经茶坊、洛川、耀县于五月二日抵达西安。同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由重庆到达西安。五月四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林伯渠首先提出：请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我党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究竟如何解决法？张、王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却一再要求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当即提出，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意见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消包围边区之五十万军队。张治中、王世杰则提议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可以。在谈军事问题时，他说：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现在请国民党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张治中、王世杰认为太多，只允许四个军十二个师。这天的谈判无结果，接着又谈了三次。在第五次谈判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表签字后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五月十一日，当双方谈判记录按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和其它等四项十八条整理出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王世杰竟不顾事实，把综合双方意见整理出来的记录说成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而拒绝签字。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等，从宝鸡乘飞机到达重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章汉夫和国民党邵力子、康泽等到珊瑚坝机场迎接。苏联、美国、英国的记者和中国《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的记者也到机场欢迎和采访。在机场，林伯渠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林伯渠在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十九日下午，他会见了蒋介石。

二十一日，林伯渠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明确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

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中共提出的《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张、王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们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这二十条与在西安商谈的内容不符；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正在令有关部门研究西安会谈的材料，准备提出一个提示案；希望你能考虑修改二十条的内容和词句。

林伯渠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他说：我方二十条意见，全文都是实事求是的；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当时就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定；我们只是为了真心诚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才出来谈判，根本说不上欺人；二十条意见就是我党中央对西安商谈材料的答复，在这里没有修改的余地。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张、王托词打电话，到内室密商了半个小时，回到会议室后，将二十条意见交还林伯渠，坚决拒收和转交蒋介石。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23日。

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中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过去提案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渠等，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及所提出的谈判方针，同时将原提案的二十条修改成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1942年、1943年林彪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抗战建国纲领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将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原则上接受将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往黄河以北。

六月四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有利于谈判，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党中央已复电，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十二条，而把一些次要问题改为备忘录。

五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张治中、王世杰把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在军事问题上，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关于党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对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都只字未提。林伯渠把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意见也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我党十二条意见的主要内容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数，应请政府将中共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陈潭秋）、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郃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张治中、

王世杰看了我方的十二条意见后说：“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不能接受”。林伯渠据理相争，一定要他们转报国民党中央，张、王争辩不过，只好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呈”。

六月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对国民党《提示案》提出两点声明：第一，《提示案》与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将我党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中央；第二，指出《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与西安谈判的经过事实不符。八日，张、王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西安所提“出入太大”，未便转呈；西安商谈记录，“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也签了字，“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希望能够完全接受。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八日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十二条与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十八个师，你们只允四军十二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十八个师，而是五军十六个师。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十二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十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出的十二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十二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30—31页。

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八年谈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

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七、八月间，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情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于七月二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

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声明阻碍谈判进行的责任，不在我方而在国民党。即使这样，中共中央仍希望谈判能有结果，并电请张治中、王世杰能去延安继续谈判。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3日。

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争取国内外舆论对中共的同情和支持，林伯渠在谈判的同时，还冲破国民党宪兵的监视，广泛结交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利用出席宴会、参加集会、接见来访、拜会友好等各种机会，和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爱国人士；郭沫若、茅盾、杜国庠、冯乃超、阳翰笙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青年党的左舜生、国社党的张君勱等，以及爱泼斯坦、邱玛丽、斯坦因等外国进步记者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民主建政和经济、文化建设情况。

他还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举办边区工农业产品展览，使许多爱国人士和外国记者看了都很感兴趣。他们说：“农业上的扎工队、变工队，军队又打仗又生产，这些都是从所未闻的”；“兰州的毛线没有边区的好，重庆的火柴不如延安的丰足火柴好。”当时林伯渠等用边区难民厂出的毛呢子，给斯坦因和爱泼斯坦每人做了一身衣服，他们非常高兴，到处宣传说，“只有英国苏格兰两家工厂才出这样的呢子，但是现在已改成弹药厂了”。这个展览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实际上取得的结果，对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与前途。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和教职人员，给林伯渠写了一百多封信。有的在信中说：“亲爱的林主席，我们知道您没有和我们说话的机会，只有写信来表达我们对您的崇敬之情。我们知道敌后有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浴血奋战，把国土从日寇手里夺回来。中国还是存在着。”有的信说：“我们这些人很穷苦，钱不多，寄去三十元（也有寄五十元、八十元、一百元的不等），请转给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军队，略表我们的心意。”

《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未刊稿），1944年12月30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coc2 为了联合中间人士和各党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林伯渠向他们反复陈述中共的抗日主张，及这次来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目的，对他们平等相待，积极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并表示希望能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主的实现。许多民主人士都深为感动，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坚持斗争的信心，认识到要能够站得住脚，就必须在政治上争取合法的地位，而要争得合法的地位，就必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后来，在国民参政会上各党派支持中共的主张，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入空前的孤立，就是同林伯渠这时对中间人士和各党派的争取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大溃败，当时美国和英国都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说“国民党九百万军队只打败仗，共产党几十万军队却不断打胜仗”。根据美英态度的变化，林伯渠在重庆积极开展了外交工作，他招待和拜访美英

驻华使节和知名人士，向他们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战情况，介绍中共对国共谈判的原则立场，代表中共中央欢迎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去进行考察。美国特使赫尔利到达重庆后，林伯渠几次同他会谈，向他介绍中国抗战情况，连赫尔利也不得不说：“我是代表罗斯福总统来的，要中国团结，实行民主。”他对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作了比较实际的析分后，又说：“八路军、新四军是能打日本的，本质是很好的，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边区参政会的筹备问题》。

九月五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十五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报告。他在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首先是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和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国家民族的灾难。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其次，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发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

林伯渠在报告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军队，近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的。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后又提出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十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的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

报告的最后部分，林伯渠还代表中国共产党论述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郑重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了这次国共谈判的真象，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表这一报告时，却把内容删改得面目全非，其中关于召开国事会议，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一段，则全部删掉。对此，林伯渠又致函国

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林伯渠的报告。林的这一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争购《新华日报》，曾使该报的销售量突然猛增。

在国民参政会前后，林伯渠多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一再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党愿意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立场，谈判终无结果。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却有利于“拉蒋抗日”，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使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功绩，特别是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由于谈判搁浅，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配合美军作战。十一月初，中共中央电邀赫尔利赴延安，而他也愿意前往。这样，十一月七日林伯渠便同赫尔利乘飞机由重庆回到延安。

六十寿辰

林伯渠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对秘书王恩惠说：“我今年的生产任务没有完成，请你把我在重庆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上交，当作我今年的生产任务。”他在向党中央汇报了赴渝谈判的情况之后，又投入了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

当时，边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旱灾，秋田无法下种，为了抗旱备荒，林伯渠多次发出训令，提出：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局部的和轻微的干旱，年年都有。据府志记载，每隔数年或十数年，即发生大旱一次，河川断流，田禾枯死，颗粒不收，造成严重的饥荒，继之以瘟疫，加之旧时政府坐视不理，成千上万的人死在饥荒和瘟疫之中，或则流离失所，饿殍载道。所以边区政府历年来再三再四地号召军民努力生产，争取余粮，以备荒年。近年来，我们虽然发展了生产，军民开始有了余粮，但基础仍然不厚，倘若我们不亟为谋虑，到灾荒发生时，势必束手待毙，甚至要重复历史上的惨祸。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1日和6月13日。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林伯渠还以边区政府的名义向全体军民发出如下号召：

（1）想尽一切办法，立即进行干耕干种，找寻下湿地带、河边和近水地方，发动军民男女老幼担水浇灌，种各种蔬菜，尤其是洋芋、南瓜、萝卜，搜集和调剂各种小日月庄稼种籽，以便遇雨时赶种。

（2）切实开展节约运动，军民要珍惜每一颗粮食，节衣缩食，度过难关。

（3）严格保护粮食，绝对禁止蒸酒熬糖，绝对禁止粮食出口，无论何人违犯，一律依法究办，决不宽贷。

《解放日报》，1945年5月21日。

六月下旬，林伯渠、李鼎铭、高岗、谢觉哉又联名写信给各级参议员、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和小学教员，指出“今年的年成是跌定了”，号召他们起带头作用，开展宣传工作，反对侥幸心理，带动大家一起动手，把抗旱备荒落实到边区的每个角落。

根据历史上大灾之年一般会伴随瘟疫发生的教训，六月三十日，林伯渠在延安各界备荒防疫动员大会上提出，教育厅要有计划地宣传医疗卫生常识，建设厅要想办法尽快救治边区羊子的大量死亡。会后，他又主持政务会议，决定再派出二十个医疗队，下乡进行巡回医疗。

在抗旱备荒的日子里，为了厉行节约，边区政府机关食堂每天由三餐减为两餐，供给标准也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格外关心大家的生活，他经常把管理员找去，叮嘱要想办法让同志们吃饱吃好。有时他还亲自到厨房和食堂去察看，鼓励炊事员给大家把饭菜做好，而他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坚持每天只吃两餐饭。和备荒任务相随而来的是热烈的生产运动，林伯渠经常去经营他开垦的那块土地，挑水灌溉，施肥锄草。大旱之年，他地里结出的大南瓜却重达四十多斤。

由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对备荒防疫抓得早，措施得力，一九四五年边区虽遭了罕见的大旱灾，但在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抗灾自救，战胜了灾荒，这年的公粮仅比上年减少了四万石。

林伯渠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对自己的生活却很少注意。一九三七年他同李俊在延安结婚，后因李俊坚持离婚，从一九四一年起他便单独生活，好长一段时间，他系的裤带是根麻绳子，睡觉没有枕头，枕着自己的衣服。

林伯渠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尽管工作十分繁忙，边区政府开会，他几乎每次都是最先签到的一位。有一次，办公厅党支部开会讨论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会前没有通知他，会刚开始他走进了会场，微笑着说：“支部书记同志，我来晚了。”便坐下来，认真听完了大家的评议，并和全体党员一块举手表决。最后，主持会议的同志请他讲话。他站起来说：“我今天讲两点，一是检讨，二是请求。我所检讨的是，过党日是每个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当主席的人可以特殊，无人管，天下第一，那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我所请求的是，支部书记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支书急忙站起来说：“林老，你工作那么忙，我们不愿打搅你，所以没有通知。”林伯渠说：“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的，你要记住，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他又笑着对大家说：“还要请诸位监督执行哟。”林伯渠严于律己的作风堪称典范。

林伯渠十分重视学习，在他简朴的住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用木板钉起的简陋书橱，装满了书籍和报刊杂志。他非常博学，除马列主义著作外，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歌也是他最喜爱的书籍。如果时间允许，他可以整天的看书。他每天必读报纸，但不是泛泛地阅读，而是把报纸上提出的问题和工作实际联系起来。林伯渠对边区政府机关内部的墙报也很关心和重视。墙报曾因故三次停办，每次都是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又复刊的。

林伯渠对工作一向十分严肃认真，但对下级特别是普通工作人员却又

十分关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初，他建议边区政府办公厅，为机关食堂的宋泽宽、左土木、禅怀新三位六十岁以上的老炊事员祝寿，并亲自致了祝寿词，对三位寿翁在大灶食堂中所起的带头作用，在节约、卫生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对炊事工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备加赞扬。

三位老同志非常高兴，十分感激，更加感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中的温暖。还有一次，林伯渠发现一个孤寡老太婆经常提着筐子到厨房去拣蓝炭（未烧尽的煤核），因她是小脚，提着筐子走山路实在艰难。一天，他对王定国（谢觉哉夫人）说：“那个老太婆太苦了，拣点炭也拿不回去，你叫高世文（谢觉哉警卫员）给他送回去吧。”他把群众生活里许多细小的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林伯渠在理发的时候，从言谈中发现理发员不安心自己的工作，就用机器和螺丝钉的关系作比喻，说明每一项工作都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在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每个人搞好了自己的工作，都是对革命的贡献。经过他几次的谈话，这个同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表示再也不会不安心的思想了。

林伯渠热爱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更爱戴自己的主席。每年新春佳节，各处的秧歌队和群众，都要敲锣打鼓去给他拜年。如一九四五年春节，延安市民代表和三百多人的大型秧歌队，热火朝天地前去拜年，并献了上面写着“人民政府”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的红旗。这年，七十四岁高龄的李全海老人，带着陕北的土特产和两只大公鸡，不远百里从临镇来延安，看望使他过上幸福生活的林主席。一九四五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在延安市南关选区以占绝对多数的一万零八百五十七张票当选，也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和信赖。

为了表彰林伯渠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学习他高尚的革命品德，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当他虚龄六十寿辰时，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并致函祝贺。全文如下：

林伯渠同志：

欣逢你六十寿辰，谨致热烈的祝贺！你是我国革命

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农工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你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三月二十八日

林伯渠的生日是1886年阴历2月15日（公历为3月20日）。

1945年3月28日是阴历的2月15日。

《解放日报》，1945年3月28日。

当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均亲临祝贺。会场里悬挂着各种祝词和贺联。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的贺联为“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

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中央管理局贺联称林伯渠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

林伯渠精神矍铄，他在致词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六十年的征程之后说：“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在它的浩瀚的事业中，积累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诚的努力与果敢的自我牺牲。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的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他兴奋地说：“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林伯渠在中共中央祝寿会上的答词（未刊稿）。

当天，林伯渠复函中共中央，感谢党对他寿辰的祝贺和对他的勉励与关怀。他说：在这六十年的途中，正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多的年头。经过了多年的磨难和变化，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舵手。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我自己也在这大时代中发觉自己鬓发虽然白了，却不缺少青年人的热情。“这个时代使我年青了，我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林伯渠还作了《六十自寿》诗一首。诗云：

我惭祖逊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等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林伯渠同志于六十寿辰日，覆函党中央致谢》，《解放日报》，1945年3月29日。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76页。

边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林伯渠主席的敬意，在他六十寿辰之日，也举行了一个小型祝寿会，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和延安县、市的领导同志参加。会上，大家请林伯渠讲讲革命斗争经验。他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说他在三个关键时刻没有走错路：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分裂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是经李大钊等朋友的宣传，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入了党；第三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林伯渠还讲到，他在六十岁生日的前几天，去看望毛泽东，在谈话时，他问道：“象我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笑着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象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的讲话，给与会同志以深刻的启发，使大家进一步懂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不能步错路；要搞好革命工作，就要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狠下功夫。

《访金城同志谈话记录》，1980年9月20日。

在党的七大和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举行祝寿活动，对他为中国革命所作的巨大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仅是对他本人的关怀和激励，同时也是号召大家学习林伯渠那种只知耕耘，不知劳瘁的革命老黄牛精神，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对广大党员和全体军民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出席党的七大

林伯渠从重庆回到延安后，继续参加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整风运动。为了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一九三一年初至一九三四年底党的路线作出总结，还在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就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采取大小会结合的形式，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共进行了十一个月之久。林伯渠回到延安后出席了党的扩大的七中全会。他非常同意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解决党的历史问题所采取的方针，在会上说：我的想法，算账是为了推广生意。我们的生意已做了这么多年，究竟盈亏如何？很有必要算一下。但是算一下，是为了好扩大发展，而不要多去争论。他还提出，这个道理各代表团都应讲一讲。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反复的研究，基本上通过了著名历史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解决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作了肯定；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作出了基本的结论。这一《决议》分清了路线是非，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它既是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又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为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极重要的准备。

在把党的历史问题理清之后，紧接着在延安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的中心任务，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革命处在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总结经验，正确地制定党的纲领路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并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为人民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出席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余万中共党员。大会选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陈云、彭真等十五人组成主席团。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林伯渠作了重要发言。他首先指出：“我们党这次大会，是在首席解放区——陕甘宁边区举行的。这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解放区人民已经翻了身；同样地在我党领导之下，全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够翻身。”他回顾自己四十年来参加中国革命的经历时说：“我前十五年，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后二十五年，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回忆过去的经历，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而新民主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热情赞

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表现。”

“这个学说是我们党和全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最锐利的武器。”最后，他用宏亮的声音振臂高呼：“高举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解放日报》，1945年5月1日。

七大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和通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三个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的新鲜经验，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确定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时局转折的关键时刻，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明了方向。

六月九日至十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周恩来、陈云等四十四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廖承志、王稼祥等三十三人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六月十一日，七大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

六月十七日，七大代表暨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布满七大代表、各解放区及延安各界的挽联、哀词和花圈。七大全体代表的挽联是：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

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

毛泽东主祭并致悼词。林伯渠在追悼会上讲话说：“死不会吓倒革命者，一个人倒下了，有更多的人起来代替他，站在他的岗位上继续战斗，直达胜利。”他高度赞扬死难烈士的伟大业绩，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党同志，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奋斗。

《解放日报》，1945年6月19日。

七大闭幕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和参议会常驻参议员，于六月二十一日召开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商讨发起筹备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林伯渠致词说：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曾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的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及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建立。此项提议已获得边区与各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边区人民对这一会议将在延安召开，尤感兴奋。会议经过充分协商后，决定向各解放区发通电。通电发出后，各解放区纷纷来电赞同，并在短短二十余天时间里，即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抵达延安。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3日。

七月十三日，筹备委员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的代表，还有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和华侨、基督教、天主教、沦陷区、国统区人士及苏、美、英、朝鲜等国际友人列席会议。谢觉哉主持会议，林伯渠代表筹备小组长联席会议报告筹备经过，着重说明了筹备会是为适应人民要求、抗战需要而组成的，在筹备工作中注意贯彻了民主的原则，发挥了对人民负责的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与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伪造的“国民大会”有本质的不同。会议经过充分的协商和讨论，通过了《关

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选举周恩来为筹委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续范亭（晋西北）、邢肇棠（晋冀鲁豫）、李鼎铭为副主任，乌兰夫、蔡畅、谢觉哉等二十五人为常务委员。

七月十五日，筹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出代表，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到达延安，正式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后来，由于抗战很快胜利，而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积极挑动内战，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未能如期召开。

各解放区军民在七大路线指引下，继春季攻势之后，对日本侵略者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八月八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第二天，苏联红军从海陆两个方面分四路进入中国东北，解放区军民立即举行对日军的全面反攻。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八月十五日，消息传到延安后，霎时，山城延安，万众欢腾，鼓乐喧天。晚上，举行盛大火炬游行，灯火辉煌，彻夜未熄。

八月二十四日，延安文艺界欢送延安文艺工作团赴各解放区进行文艺宣传，周恩来、林伯渠到会勉励。林伯渠代表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文艺工作者数年来的努力和成绩，表示感谢。他恳切嘱咐大家说：“抗战结束后艰难困苦会更多，因此我们的工作任务也更重，要兢兢业业，迎接新形势，争取和平、民主、团结。”

九月二日，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九月五日，延安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在南门外广场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会场四周张贴着各色标语，人群中彩旗迎风飘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着经过八年苦斗换来的欣愉，高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荡着山谷。大会开始后，朱德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发表演说，指出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接着，林伯渠讲话，他在略述半个世纪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血泪史以后指出，抗战最后胜利，乃是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今后中国人民要在和平、团结、民主的大纛下，努力保持和发扬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成果。林伯渠列举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的建设成绩，证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是今后全国和平建设的关键。

他兴奋地说：“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必须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建设的模范。”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5日。

《解放日报》，1945年9月6日。

争取和平民主，准备自卫反击

抗战胜利后，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当时政治的基本形势，制定了以革命两手反对国民党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在领导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的內战阴谋，积极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林伯渠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之后，多次发表演说或谈话，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号召人民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民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林伯渠在延安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群众集会上，详细揭露了蒋介石调集一百多万军队进犯解放区的事实，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撤退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人民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地区，立即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履行“双十协定”。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和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后，二月三日，林伯渠在延安两万多群众参加的和平民主大会上讲话说：“中国无数先烈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了一百年，和平民主的婴儿到现在诞生了，我是多么高兴啊！”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曲折历史，用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说明争取和平民主的重要性之后指出，我们经过了十年内战，又经过了八年艰苦抗战，在边区及解放区实现了民主政治，鼓励了全国同胞赢得胜利，赢得民主的信心。它象催生婆似的，促使中国和平民主的婴儿早日诞生。

“今后全国人民更要加倍努力，保护这个经过千辛万苦诞生的婴儿，使他不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好好成长起来。这就是说，要努力实现政协会议决议，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改革。”

蒋介石虽然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但他根本不打算执行，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三月十二日，林伯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接见记者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破坏和平，反对民主，仍想坚持其独裁统治的险恶用心。他说：

三个协定完全符合中山先生晚年重订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精神，全国人民也都希望尽快实行这三个协定。但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却千方百计企图修改和推翻三个协定，拒绝或阻挠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以便继续其专制统治。他深有体会地说：“依照我多年革命的经验，我敢十分肯定的说：狂妄的反动派，最后还是要碰破自己的头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的力量都更为强大，又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加上世界民主运动潮流的空前高涨，三个协定一定会实现，中国人民的革命一定成功，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一定会在我们的努力斗争下出现。”

《解放日报》，1946年2月4日、3月13日。

四月二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界各阶层及少数民族的参议员一百三十九人，还有来宾、旁听和中外记者共一千多人。林伯渠向大会作了题为《边区建设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八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了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继续发展经济，是一切建设的根本；继续发展文化，是一切建设的重要条件；在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扬人民的政治民主。他指出：进行建设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全国和平要有确切的保障，就是要有全国的政治民主化以保障全国的永久和平。但是，我请求大会注意，到今天为止，反动派仍在公开地和秘密地扩大内战，坚持专制独裁。

“我建议大会向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人士表示，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共同反对这种反动的勾当，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林伯渠的政府工

作报告，在参议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参议员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表示赞同这个报告。

《解放日报》，1946年4月9日。

这次大会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再次当选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刘景范为副主席。贺连城、马济川、王世泰、霍子乐等十九人为政府委员。马锡五当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当大会宣布林伯渠以最高选票当选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参议员高兴得流出了激动的热泪。士兵参议员张治国说：“咱们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军队，还有人民的主席来领导，军政民合作，一定会把咱边区建设得更好！”女参议员刘凤舞手舞足蹈地说：“我高兴得连话也说不成了，你看他那么大年纪，辛辛苦苦的就是为了老百姓，现在边区连婆姨、娃娃也解开林主席的功劳了。”

林伯渠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大会发表施政演说，他兴奋地说：“我已是三届连任，我很感谢边区人民对我的完全信赖！”“边区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抗战中曾起过先锋作用，今后在和平民主建设时期，更要起带头作用，我要继续和边区人民一起，努力实现边参会所通过的一切决议案。”“边区政府过去是实行各阶级团结合作的方针，今后还是继续坚持贯彻这个方针。”“全国虽已走向和平民主，但还有反动派天天想打内战，天天想破坏边区。为了保卫边区，团结全国，一方面要加紧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人民自卫力量。”“边区人民有责任 and 全国人民一起，力争三大协定的完全实现！”在会议闭幕时，他豪情满怀地说：“全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要成为一个融洽和睦的大家庭，要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与解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全国和平民主而奋斗！”

《解放日报》，1946年4月26、28日。

在边区举行参议会期间，林伯渠还参加了追悼“四八烈士”的活动。四月十二日，林伯渠拭去眼泪缓步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报告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及黄齐生先生等十三人因飞机失事遇难的噩耗，全场闻之黯然，不少参议员泣不成声。他代表大会主席团提议，通知全边区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一月。当王若飞等烈士的遗体运抵延安时，他亲往机场接灵。在延安各界三万多人追悼“四八”遇难烈士大会及安葬仪式上，他报告诸烈士生平及重要事迹，并执紼送葬。四月二十日，他还发表了催人泪下的文章——《悲痛的悼念》，以深厚的阶级感情，铮铮有声的文字，回顾了他与王、秦、叶、邓、黄五位烈士的战友关系以及他们对革命的卓越贡献。悼文指出：“谁迫使你们冒恶劣的气候长途奔波？谁实际杀害了你们？边区人民从心底里知道的清清楚楚。你们是被破坏和平民主的反动派迫害而死的，是为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而死的，是为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死的，边区人民也从心底里知道应该怎样来哀悼你们，纪念你们，弥补这一无可计数的损失。”“边区人民从你们身上，取得了更大的力量，不管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都将坚持斗争，完成革命的共同事业！”

由于蒋介石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不断扩大内战，引起国民党中央航空第八大队三十五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和同伴的不满，决心退出内战漩涡，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驾驶B 24式战斗机，由四川成都飞抵延安，宣布起义。七月五日，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刘景范副主席代表边区人民致书刘善本和他的同事，表示祝贺与慰勉。信中说：“你们退出内战，驾机飞延

的义举，对国民党当局违背人民公意，依仗外国援助进行内战，屠杀同胞的罪行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中国独立和平民主事业的推进，有很大的帮助。”七月十日，林伯渠还特地设宴招待刘善本等，勉励他们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进行斗争。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等由重庆飞返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因气候恶劣，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故称“四八烈士”。

《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7月8日。

在刘善本等架机起义飞抵延安后不久，一九四四年率部南下的王震和长期被新疆盛世才囚禁的一百三十一名共产党员也相继回到延安。林伯渠还为他们举行宴会，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国民党反动派在把内战规模逐步升级的同时，还指使大批特务，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连串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疯狂的迫害。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东北抗联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被暗杀；四月二十三日，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领袖、律师王任在西安被非法枪杀；五月五日，民盟西北总支部负责人之一、西安《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绑架枪击于咸阳（未死遇救，后转送延安）；七月十一日，民盟中委、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之一李公朴在昆明遇害；七月十五日，民盟中委、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又在昆明遭毒手。七月二十六日，延安各界举行大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王任等烈士。林伯渠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血战，终于将日寇打垮。现在中国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勾结起来，扩大内战，企图奴役中国人民，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忍受的。中国人民有大无畏的精神，并且有力量打垮他们的进攻！”

毛泽东早就指出：“全国性的内战不论那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

。林伯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积极领导边区政府进行自卫战争准备，领导边区人民进行生产、减租和加强武装建设。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召集的生产、供给、经济工作人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今后的第一位工作，就是继续发展生产建设”。在春耕到来之际，他及时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使当年的大生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他还在延安各界妇女纪念“三八”节大会上，号召边区妇女发展纺线织布。在延安职工纪念“五一”大会上，号召边区工人发展工业生产，“用我们建设的模范成绩，来影响和推动全中国。”在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开学典礼上，他还号召边区广大医务人员做好医药卫生工作，尽快培养更多的医药专门人才，以适应备战的需要。

《解放日报》，1946年7月27日、2月26日、5月2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4页。

为了指导边区的农业生产运动，林伯渠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联名写信给志丹县县委书记王耀华和县长赵玉文，表彰他们的生产工作。信中说：你们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上半年度的生产任务，许多干部努力为人民服务，深入农村，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与作风，为今年生产“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兹特向你们致贺。同时也指出了他们在领导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要求他们力戒骄傲，更虚心的检查工作和纠正缺点。他们表彰志丹县干部的信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对全边区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推动边区工业的发展，林伯渠认为关键在于资本和技术，为此，他建议：在资本方面，继续帮助民间游资转入有利可图的私营或合营企业，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资本来从事有利可图的工业建设，他们可以单独经营或与政府合作经营，都给以法律的保障与可能的协作；在技术方面，继续发扬职工的创造性与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尽可能争取边区外面的各种科学技术人员到边区来参加工业建设，并给以优待。他的这一倡议是很有远见的。

《边区建设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1页。

在生产运动中，林伯渠和以往一样，他不但号召群众发展生产，而且自己参加生产。

夏季割马草时，他头顶烈日，手持镰刀，带头割草，夏收、秋收和大家一起参加收割。

由于领导的带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一九四六年边区的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部队做到了完全自给，机关、学校达到部分自给，老百姓家家户户有余粮，为自卫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根据一九四五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问题的指示，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先后派出三个工作组，分赴绥德、陇东、安边等地帮助复查减租工作。绥德分区过去减租比较彻底，但在查租过程中，仍发现佳县车会区某些村竟有七年从未减租的死角；陇东分区过去减租不够彻底，有的恶霸仍在欺压群众，横行不法。根据边区的特点和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边区政府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复查减租减息上，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斗争。经过这场斗争，安边的农民收回了被三边天主教堂强占的长三百六十里、宽七十二里的大块土地，洗刷了四十六年来的国耻，使一万三千农民每人分得约三十五亩耕地。在已经分配土地的地区，有些被地主非法夺去的土地，也都退还给了农民。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之后，林伯渠又领导边区政府开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九月间，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主动献地三百垧（一垧三亩），并致书林伯渠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地主操纵，佃户受困，诚可痛也。今我边府见及于此，实行耕者有其田，意至美而法至善；尤宜审慎周详，务使地主不得隐瞒，贫农得沾实惠。国家富强，人民丰足，庶有豸乎！现在反动分子，藉外力进攻解放区，以致国家危亡，人民涂炭；凡有血气者，应团结一致，捍卫家乡，巩固边区，决不松懈，决不退让，总期达到目的而后已！”此后，还有绥德分区的张哲卿，三边分区的李有竹、高昆山等，也都自动献地给政府，要求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后来，林伯渠回信安文钦说：“得悉先生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慷慨献地三百垧，义举所昭，不仅造福地方人民，亦足表率社会贤达，边府同仁，深为钦迟。”“为了捍卫乡土，永固边区，切盼一本同仇敌忾之大智大勇，倡导团结自卫，加紧备战动员，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以争取自卫战争之胜利，是所至感！”

《解放日报》，1946年12月3日。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为了加强人民的自卫力量，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许多有效的措施，

如加紧民兵动员，实行劳武结合，大量制造地雷，加强民兵训练，学习投弹、射击、埋地雷三大技术，广泛开展民兵英雄运动等，并先后动员六千二百人参加了地方部队，充实了边区武装力量。

一九四六年夏，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

八月，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延安。在边区的北线、西线和南线的敌军亦蠢蠢欲动，不断进行袭扰，陕甘宁边区同样被迫进入战时状态。林伯渠号召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保卫边区。他告诫说：“我们要充分的准备，不应有丝毫骄傲自大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因为我们是从长期相对和平环境中骤然转入战时状态，这决不是容易的事，因此不论在思想方面，军事方面，经济财政方面，工作机构、制度和作风方面等，都要有准备。因此我们今后唯一中心任务，就是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准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三届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3日。

十月十日，林伯渠在新华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愤怒地揭露美蒋反动派的罪行。他说：蒋介石敢于如此猖狂，敢于向中国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进攻，他所恃而无恐的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有美国反动派的接济。美国的反动派，企图独霸世界，他口里讲“和平”、“调解”，却尽力援助蒋介石进行独裁内战。“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现在为美国反动派所代替起来了。而蒋介石的本领，就是出卖祖国，他把中国的领空权、领海权、内河航行权、财政经济权等等都出卖给美国帝国主义，一任美军横行无忌，一任美货滚滚而来。同胞们，我们想想，蒋介石这些作为，有那一点对得住孙中山先生，有那一点对得住辛亥革命志士们所流的鲜血，而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又有那一项是平等待我的政策，又有那一项是对于中美两国人民有好处的？！”他向全国发出呼吁：“我们全国同胞必须一致起来，要求美国立即停止援蒋政策，要求美国军队立即退出中国，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先烈们的奋斗精神，继承和完成缔造民国的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1日。

在蒋军准备大举进攻边区的严重威胁下，林伯渠主持召开边区政府会议，讨论如何使政府的一切工作适合战争的需要，提出我们的工作机构、制度以至作风等，都必须加以迅速的转变。战争必然是残酷的和持久的，只要我们有准备，有坚强的武装力量，充足的物质力量，严密的内部团结，就一定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十一月十四日，林伯渠还发布命令，决定成立边区政府总动员委员会，委任刘景范为主任，贾拓夫、方仲儒为副主任。

十二月九日，林伯渠在为蒋胡军队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还指出：“胡宗南大举进攻关中，是蒋胡布置已久之进攻陕甘宁边区计划的开始。”他号召边区军民立即从备战动员进入战斗动员，搞好参军、参战、劳军、防奸、担架、运输、救护、后勤和坚壁工作。

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人民决心以战斗的精神，保卫自己民主幸福的生活，他们实行坚壁清野，不给胡军留一粒粮、一寸布，让敌人饥不得食，渴不能饮。他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参战热潮，出现了很多父子、兄弟相争，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一九四七年元旦、春节期间，出现了群众性的拥军优属高潮，整个边区充满了高度团结、同心协力消灭敌人的战斗气氛。

转战陕北

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作战，被歼灭六十七个旅，七十万余人，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九四七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北线的邓宝珊，共二十多个旅二十多万兵力，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五十余架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在撤离前夕，林伯渠告诉大家说：“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京、北平，解放全中国。延安的天时地利都对敌人不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之日，也是他走向彻底失败之时，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搞好坚壁清野，发动人民打好游击战、运动战，敌人就会陷在陕北的山区里，被我们消灭掉。”他对战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访问卢可、姚安吉等同志谈话记录》，1979年。

三月十三日，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二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十九日清晨，彭德怀亦随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四十多天里，彭德怀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各解放区战场的配合和边区居民的支持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对此，林伯渠十分高兴，立即拨款六亿元，送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并派出劳军慰问团去前线慰问。

五月十四日，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在真武洞（安塞）举行祝捷大会，林伯渠因病未能参加，他特意致函彭德怀、习仲勋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函称：“敌胡宗南倾巢犯边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英明指挥下英勇战斗，于青化砭、于羊马河、于蟠龙，连战皆捷，不仅挫敌锐气，丧敌鼠胆，而且奠定了发展边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值兹祝捷大会，本拟亲来参加，借致敬慰之忱。乃以痔疮久发，便后出血，至今未愈，医生嘱咐不能远出，以此行而未果，实觉歉疚！”他还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充分发动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竭尽全力，并作长期打算，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

当时，林伯渠的痔疾十分严重，甚至坐褥常被脓血所染，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又把林伯渠夫人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朱明（1919—1961），原名王钧璧，安徽定远县人，1945年5月和林伯渠结婚。她曾于1954年3月22日亲自书写、投寄给江青一封匿名信，批评江青。“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对林伯渠散布一些流言蜚语。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为了便于统一军事指挥，做好后勤支援，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西北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后委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十一人组成。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马蹄沟，在这里住了五十天。

这时，胡宗南军队虽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重创，但仍气焰嚣张，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为鼓舞士气，帮助同志们认识战争形势，在七月一日庆祝党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林伯渠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开心。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同志们看到林老已白发苍苍，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而且是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也都更加坚定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访问张养吾谈话记录》，1979年。

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使政府工作适应战争环境，更好地为战争服务，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他在《发刊词》中说：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

《边区政报》创刊号，1947年7月15日。

撤出延安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一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

北，后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为了商讨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这时正遇上他辛亥革命时的老友、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不幸病逝。林伯渠回忆续范亭当年率部反清、反袁，在寇深祸亟之时，为反对南京政府腼颜事仇，竟不惜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看到续范亭在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仍至诚地留下遗书，请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不觉潸然泪下，写挽诗一首：

一柱撑西北，范亭自始终。
覆清摧帝孽，倒袁奏奇功。
长恨法西士，不惯客里空。
睿思早入党，人民爱如兄。
品概清泉洁，言行万众宗。
如何病不起，老泪洒秋风。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89—90页。

九月二十六日，林伯渠在临县还主持了西北各界一千八百多人追悼续范亭的大会。

杨明轩诵读祭文，谢觉哉报告生平，贺龙、林伯渠、吴玉章等均讲了话。大家都一致颂扬续范亭的高洁品质、秋水襟怀和松柏气节，决心继承他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九月下旬，西北局在山西兴县沙原召开财经会议，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贾拓夫就半年来财经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进行了检讨，林伯渠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认为财经工作的主要缺点是思想跟不上变化了的形势，工作迟缓赶不上需要，缺乏群众观点。他说：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需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但我们工作的同志却没有牢固地树立这个思想，在工作中仍然受旧的经济理论的束缚，跳不出旧的货币论范畴的圈子，在金融上未能摆脱法币的影响；在贸易上，对群众合作事业的发展帮助很少；在财政上，只注意紧缩，没有注意发展；在建设上，重视公营工厂的生产，忽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最后，他要求财办处的同志本着为党为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财经工作搞好。

一九四七年双十节，林伯渠以同盟会老人的资格，接受了《大众报》记者的采访，再次愤怒地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出卖中华，集中地权，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明确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继承了孙中山的未竟革命事业。他说：“我们边区与兄弟解放区所进行的爱国自卫战争，和平分土地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正是最彻底的‘恢复中华’与‘平均地权’吗？”在人民已经奠定了胜利基础的今天，我们纪念双十节，就是要“充分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积极进行收复区工作，彻底平分土地，组织与积蓄力量，努力支援前线，彻底消灭蒋胡匪帮，解放大西北，配合各解放区全面反攻，争取新的辛亥革命之全国性革命形势的早日到来。”

《新的辛亥革命将到来》，《大众全报》，1947年10月11日。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十月中旬，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人在山西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地讨论了两区的财经统一问题。林伯渠、贺龙、陈希云、贾拓夫等出席了这次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详细讲述了两个边区财经工作的历史，并对过去财经工作的成绩与缺点作了认真的总

结。他指出：“财经工作的重要关节是生产和贸易。”

过去两个边区在工作上都有偏差，因而都吃了些亏。我们检讨过去的工作，是为了总结得出经验，把今后的财经工作搞好。”“发展生产，一方面有个组织问题，一方面有个贷款问题，我们要尽其努力多给老百姓贷出一些款。”“贸易除供给二十五万公家人以外，更应为四百万老百姓解决问题，其比例应是百分之六十五与百分之三十五。”这次会议以后，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即实行财经统一，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革命战争。十月二十日，林伯渠在沙原还主持召开了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如何贯彻两区财经统一会议的决议，研究边区政府当前的工作。他指出：“政府工作应以土地改革为中心”，“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十月二十四日，林伯渠由晋绥回到陕北绥德县雷家沟。不久，出席了西北局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全国土地会议精神的义合会议。这次会议，是边区自卫战争八个月以来空前的一次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八百多人。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了全面反攻，各个解放区都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十一月一日会议开幕时，林伯渠作了长篇讲话，他按捺不住全国即将解放的喜悦心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任务是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要在全国消灭封建。”

林伯渠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针。他说，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翻身，“百年来，从太平天国到大革命，都没有搞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贯彻中央土地法大纲，进行边区的土地改革，我们的干部“就必须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正派的作风。”所谓坚定的阶级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广大人民翻身的立场，一切要从贫苦农民设身处地的去想。几千年来地主压在农民的身上，现在农民要转过来，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我们的党、政府，不是站在旁边，而是站在他们中间领导他们去做。”所谓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就是实事求是，就是阶级分析，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

林伯渠也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结合土改进行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我们的队伍从这中间来，就难免有坏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坏东西洗刷出去，整顿好队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懂得：“我们都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为群众所喜欢的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正派作风。不整顿好队伍，不具备这三点，就不能担负起我们党的责任。”

就不能“浩浩荡荡的向光明的道路前进。”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

林伯渠还对边区政府过去财经、教育、保安、司法、三三制等方面的工作，从思想作风的高度，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号召大家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完成土地革命的伟大事业！

义合会议，依照李卓然传达的全国土地会议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定了在边区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的任务、政策和路线，

最后，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作了总结报告。林伯渠在会议闭幕的讲话中，又着重讲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

他说：“放手发动群众，是哪些群众呢？这是阶级观点、阶级立场问题。因此，一开始就须深切注意，把群众的阶级界线划清楚。所谓查阶级、评成分，就是划清农民与地主富农的阶级界线，提高贫雇农的威信和阶级觉悟的问题。这是放手的重要关键。所谓放手，是对贫雇农放手，只有对他们放手，他们才能形成核心，才能取得与巩固领导权，才能团结中农，起骨干作用。”他还提出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一是立场先要坚定正确；二是要有事和群众商量；三要善于启发和等待群众；四要把群众自发的运动提高为自觉的运动。“放手不是放任，手越放得开，组织工作就更应细致周密。胆越放得大，领导就更须加强注意，研究掌握其规律，指导其前进。”

《林伯渠同志在边区一级党员干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未刊稿）。

但是，由于义合会议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时，没有把边区里老区（占三分之二）和新区（占三分之一）的不同情况区分开来，没有划清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的界限，没有对中农、工商业和三三制等政策解释清楚，片面的强调“依靠贫农”和“平分土地”，在反对右倾时对防止“左”倾注意不够，因此，会后在边区也一度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翻底财，“搬石头”，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对地主富农和基层干部乱斗乱杀等过左的作法。

对于上述这些“左”的现象，林伯渠是有自己的不同看法的，他说“有些话只能等到中央会议上谈，当前战争环境必须首先注意党内团结和群众斗争情绪。”对这些“左”的错误，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的进行纠正。比如，绥德县在土改中斗争了安文钦，没收了他的浮财，并把他“扫地出门”，林伯渠就曾提出批评，指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十二月十日，李鼎铭先生逝世，林伯渠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要为李鼎铭开追悼会，还提出要党外人士参加，请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毛泽东非常同意这一意见，并且对他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

下级党政干部做法过火了，伤及了开明士绅，还是要保护他们。安文钦、霍子乐等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是要你去做，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毛泽东还风趣地说：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访问时曾讲过，共产党真厉害，把地主、开明士绅请出来当了副主席、副议长。现在一搞土改，又把他们的浮财分了，赶出他们自己的家，有朝一日这位记者再来访问，问起安文钦先生时，你们怎么交待？林伯渠遵照毛泽东的嘱托，亲自找安文钦谈话，向他当面赔礼道歉，并把没收的东西发还给他。经过林伯渠做工作，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主席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的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他就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致了悼词。以后，林伯渠又为李鼎铭先生的墓碑写了“爱国典范”四个大字，对他为革命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访问常黎夫谈话记录》，1979年。

十二月三日，林伯渠由绥德雷家沟去米脂杨家沟，因交通不便，黄昏时赶到雷家坪，当晚就住在这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山村。他一到村，就找农会干部和贫雇农谈话。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全村，老乡们纷纷前来看望林主席，把窑洞挤得满满的。

大家见到林主席，犹如见到亲人一般。林伯渠和他们倾心交谈，询问

土改、生产和生活情况，征求对政府的意见。老乡们一一作了回答，还反映了个别区乡干部以权谋私，以及负担不合理、买卖不公平等方面的事实。林伯渠不时拿出笔把重要的问题记下来。他告诉村干部和老乡们说：陕北战场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打了很多胜仗，蒋介石已经走下坡路了，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要求大家在土改中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要搞好明春的生产准备工作，要积极支援前线。谈话一直到深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林伯渠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土改座谈会。据林的日记记载，在此期间，他提出过许多问题，诸如“贫雇农路线与对中农政策”，“贫雇农应掌握领导权，但如何团结中农？”“怎样划分阶级？”“不可以生活状态划分阶级。

地富分界以劳动为主要标准。”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写道：“十股涛头一股差，须有除一股之决心”，等等。虽然文字极简，但言简意赅，态度明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林伯渠出席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的“十二月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谢觉哉、李维汉等十九人。这次会议批评了土改中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纲领，在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为夺取全国胜利作了重要准备。林伯渠在会议上发言说：“中央土地会议后，我们在兴县开了会，以后又在义合开了会。河东河西工作，大体上前者有些‘左’，后者有些右。但这是有原因的。晋绥在对化形地主、中农问题上，在群众发动后有些因不易掌握而发生偏差，但其工作方向我认为是很对的。”“团结中农的问题，在义合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因而“发生偏向”。在谈到三三制政策时，他说“李鼎铭参加边区政府还是对的。关中的党外人士在这次战争中也表现很好。”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由杨家沟又返回绥德县雷家沟。一九四八年二月间，他在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上，作了《革命战争中一年来的政府工作》的报告，总结了一年来政府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如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地方游击队发展三倍以上，动员和组织六千六百三十三副担架，五千四百四十头牲口随军出征。还组织临时担架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二副，缝制军鞋五十八万四千余双，运送大量军粮和马草，保证了前线的需要。他根据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兵团，经过两个多月的政治军事训练后，已经转入外线作战的大好形势，特别提出了“恢复经济，解放大西北”的新的战斗任务。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的形势下，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由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林伯渠于十八日，专程前往送行。毛泽东就领导者如何掌握工作的主动性问题、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城市问题、工商业问题等，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在送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离开陕北以后，西北局、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许多领导同志又都前来雷家沟祝贺林伯渠六十二岁生日。刚从陇东回来的谢怀德先到，林伯渠一见到他就说：“我想给你谈件事。一九四

二年我在甘泉、富县检查工作时，说你们富县的群众工作不如甘泉的群众工作做得好，这个批评错了。实践证明，工作好不好，在去年到今年的自卫战争中得到了考验，富县是个半老区，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说明我当时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请你一定向秦力生和县里全体干部、群众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事隔六年了，林伯渠还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谢怀德听了非常感动，急忙说：“林老，今天您过生日，咱们不谈这个。再说，我们的工作也确实有缺点。”林伯渠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林伯渠这种严以律己的崇高品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曾传为佳话。

《访问谢怀德谈话记录》，1979年。

四月上旬，林伯渠赴绥德分区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发现绥德分区在救灾中，为不饿死人，已经移民近四万人，而移往河东的万余人中，有一部分已经难以安置；延川县因安置了绥德县的二百户移民，使该县永坪等地灾民约六十户又不得不另移他地。在佳北及镇川、横山，米脂等县灾情严重的地区，由于灾民移走过多，劳力大减，已发生土地荒芜现象。根据不移走没饭吃、移走又荒芜土地这一具体矛盾，以及河东、延川等地不能再去移民的情况，林伯渠当即指示绥德分区不应再向外移民，各级领导要把力量放在组织群众生产上，依据灾区具体情况，有计划地组织劳动力，解决灾民吃粮、籽种等困难，完成春耕任务，生产自救，缩短灾荒时间。

为克服把救灾工作的重心转入组织生产可能遇到的困难，林伯渠指示各级领导一定要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他向专署的领导同志说，我们的任何工作如果不是为群众着想，就会引起群众不满。他说：“昨天下午我在街上看到贸易公司的营业部，那时街上还有很多人赶集做买卖，它却早早关了门。贸易公司廉价出售各种必需品，原是为了便利群众，就应该多开几个钟头的门，让群众多买一些，多给群众以方便才对，否则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

《林主席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群众日报》，1948年4月22日。

西北野战军在转入外线作战以后，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宜川、瓦子街一举歼敌两万八千五百多人，迫使延安守敌弃城南逃。四月二十二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经过一年一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林伯渠十分高兴，他立即发表谈话，指出民主圣地延安之收复，是西北军民力量空前强大与宜瓦战役的直接结果，它标志着整个大西北全部的彻底的胜利已为时不远了。五月十一日，林伯渠率领边区政府胜利返回延安城。

延安收复以后

林伯渠回到延安后，除继续领导边区政府支援战争以外，积极领导恢复经济和生产救灾工作。当时边区经过蒋胡匪军蹂躏之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被敌拉走和杀害的在四千人以上，粮食、牲畜、窑房、农具、家具及被服的损失甚巨。一九四七年因损害青苗五十万亩，荒

荒耕地三百六十余万亩，再加上旱、涝、雹、霜等天灾，耕种失时，误锄误收，边区粮食大幅度减产，以致到延安收复时，全边区即有四十万以上的饥民，佳县、子长的局部地区还发生了瘟疫。

为了恢复边区经济，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土改中某些“左”的错误。还在回延安前，他即发出布告，郑重宣布：坚决贯彻保护工商业政策，凡遭受蒋胡匪军重大破坏的工商业，无论属公属私，均应本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方针，鼓励与扶助其恢复营业；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受到保护。曾因订错成分受到侵犯尚未纠正者，应一律迅速改正，退偿损失。他还提出，对尚有顾忌窖藏货物不敢营业者，应宣传解释鼓励其恢复营业。工商业的借贷和来往账债，应予保护。

凡依“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不论合伙或个人经营的工厂作坊，均应保护和奖励，并免征本年度营业税。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者，在征收公粮时，只计算其农业收入，其工商业部分，不得计为副业征收公粮。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受边区法律的保护。

林伯渠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九四八年五月下旬，他在去洛川参加前委扩大会议返回延安后，六月六日延安降了一场透雨。七日他给甘泉县县长写信说：“前日路经甘泉，得悉你们在生产救灾中已从事安置移民工作，殊为欣慰！延安六日通宵大雨，想甘泉亦会普降甘霖，这对于安置移民发展生产极有帮助。望即抓紧时机加强组织领导，并将安置移民步骤办法，安置的户口人数等具体情况及典型材料早日汇集告我为盼。”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林伯渠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新区不马上平分土地的指示，尽量减少新区的社会震动，以便增产粮食，支援战争。此后，他连续发出了几个有关农业生产的布告，宣布边区的基本区经过土地改革封建制度已经或者基本消灭，已不再是平分土地问题，“而是普遍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并保障其不受侵犯，使人人安心生产，发家致富”的问题。允许基本区在一定的条件下继续存在租佃关系和雇长工、揽短工、包月工、安庄稼、调份子等雇佣关系，以便调节劳动力，避免荒芜土地。

边区政府还决定在废止高利贷的前提下，允许私人借贷，提倡农民在生产中相互借贷，利息由双方自由议定。提倡组织合作互助，研究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边区很快又出现了生产热潮。

《陕甘宁边区政府、晋绥行署布告》第9号，1948年12月。

林伯渠在领导边区恢复生产从事经济建设的同时，对边区的文化事业也给予了很大关怀。一九四八年六月，边区文协的《群众文艺》创刊前夕，他致函编辑部，积极支持该刊创刊。他说：“从边区军民丰富的斗争生活和我们文艺界活动的广度与深度的相互比较来看，后者显然是稍嫌落后稍感贫乏的”，很有必要出版这样一个刊物。他在信中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三条意见和建议：第一，我认为还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虽已体验和了解了一些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但体验和了解不足，或仅限于体验和了解，还不能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思想感情，真正结合起来。

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健全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作风，参加并深入实际斗争，去发掘创作的源泉，把伟大革命运动中的边区人民生活，即

边区工农兵生活，特别是革命战争中，在攻坚或运动战的范例里，指战士们无比英勇的革命英雄主义，加以深刻理解和体会，踏实的反映出来，并普及起来。把党的各项政策（战争、土改、新区工作、生产救灾、城市工商业、知识分子、宽大政策等）的具体实施，通过文艺的形式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二，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经常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未能使文艺作品更切合部队和边区的实际，更为群众喜闻乐见。希望我们的文艺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鞭策边区文艺工作者，扩大和整肃文艺阵容，普及与提高文艺作品，使文艺战线更加活跃起来。第三，我认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不善于耐心地坚持地团结和改造各种旧剧班和旧艺人。而在新区，这一工作更较落后，但却更为需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总结民众剧团等对团结和改造旧剧班、旧艺人成功的经验，加以研究，指导其他，使旧的剧班、艺人，能推陈出新，转向为人民服务。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林伯渠书信（未刊稿）。

后来，林伯渠在记者节纪念会上讲话时，对边区新闻工作的方针、任务也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说：新闻战线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要歪曲事实，更不能吹牛撒谎。在当前要注意战争、生产和土改三件事情的报道。

“不仅要宣传每一个战斗、战役，还要宣传士兵的每一个勇敢的故事。”

“生产很重要，不论支前、改善人民生活都基于生产的发展，所以对生产不仅要介绍经验教训，而且要发扬好的，批评坏的。”“过去是分散的农业生产，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城市工业生产更重要了。”土改问题在我们这里已基本解决了，现在应将这一运动推向生产运动。他告诫大家：“只要把我们的思想作风改造好，报纸就能办好。”

《林主席在九一记者节会议上的讲话》（未刊稿），1948年9月1日。

林伯渠回到延安，在领导边区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还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他就预感到全国革命胜利即将来临，提出应特别加强对党的土改与城市政策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政策是我们的关键所在。稍后，在延安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七周年干部党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现在全国已出现“以直接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政权、建立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的全国性的大革命了”，“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必然的和为期不远的了”。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正确的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他说：“党的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了，毛主席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根据我多年的体会，“我认为有两点可以说明而且必须说明的，这就是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决定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的群众需要和觉悟程度决定工作的任务与执行任务的步骤与方法。”而为此“就必须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充分的阶级觉悟，有全面观察分析与综合问题的能力，……有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性指导之下的高度的无产阶级的灵活性，就必须客观的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的夸夸其谈。”

为了做好迎接全国胜利的思想准备，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讲了遵守纪律、

民主与集中、研究理论和掌握政策、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特别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应该了解，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领导，学习好坏就是工作和领导好坏的关键……学习是无止境的，学习是不可中断的，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应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认真确实坚持地学下去。为了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学好本领，迎接胜利，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坚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胜利的前进！”

《学习毛主席思想执行党的路线与政策》，《群众日报》，1948年8月7日。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西北局召开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林伯渠还着重总结了政权工作的经验。他说：“革命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一个政权问题，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就是要把旧的统治阶级推翻，联合各个革命阶层，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党如何领导政权，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工作，过去有四条正确的经验，现在还需要坚持，这就是：（1）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不应干涉和包办代替；（2）党团（党组）是说服而不是强制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执行工作，如果说服通不过，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超过民主集中制原则；（3）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干部，必须服从党团决定的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4）调动党员时，必须经过党向政权机关取得辞职的手续。”

林伯渠在这次联席会议的报告中还说：“政权工作要做好，必须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私的现象打倒，真正的联系群众，要有民主的作风，建立民主制度，提高工作效率，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发展生产，更好的支援前线。”在人事工作中，“干部的任用应与培养教育结合起来，只有培养与教育干部，才能使干部来源不绝，才能提高干部，适合开展大西北的局面”。“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必须重视团结党外人士，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对他们的团结，一方面政治上的提高，另一方面适当的进行原则的批评与斗争，纠正过去某些过左过右的偏向。”“特别是在今后，我们党要领导全国政权工作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些。”

《林主席在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关于政权工作的报告》（未刊稿），1948年7月29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下旬，林伯渠在合阳雷家庄出席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时，再次讲了纪律和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他说：纪律问题很重要。我军在初创时期，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说明我党的建军思想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我西北野战军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半年来，又推广于全国各野战军，收效很大。

过去，打一仗后，要整顿一次纪律，但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今年不同了，其原因即经过了新式整军运动，依靠群众把纪律整好了。所以，整顿纪律的基础，必须是发动军队的民主。关于自由问题，林伯渠说：只有阶级的自由，而无超阶级的自由。我们的各种政策，即是革命阶级的自由，而不给反革命阶级以自由。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得遵守纪律才有自由。从哲学上说，即懂得了必然，才有自由。比如，我们懂得了电，就可以利用它，就有了自由，不懂得即无自由。人类社会有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才有自由。机器发明了，商品产生了，私有制度成了法律上的规定。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知道生产是社会性的，而所有制是私有的，这是个大矛盾，于是得出了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所代替的结论。我们说改造思想，即是要改

造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好方法。

《林伯渠同志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未刊稿），1948年9月17日。

林伯渠这些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论述，许多都是发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对当时人们认识形势，坚定革命信念，更自觉地了解和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帮助很大。有的即使到今天，也还值得人们思考、借鉴。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克服党内军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中共中央反复强调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各战略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必须经常就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一九四八年十月下旬，林伯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恢复老区，发展新区”工作问题，给中共西北局、党中央写了一个系统翔实的报告。他以详细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报告了延安收复后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群众负担、防疫救灾和教育工作方面的情况与问题，边区政府已经或者准备采取的措施。他在报告中分析了城市工商业的状况，说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商缩小、停闭以至外走，小商贩增多，以零购本销为主。”如绥德、米脂、镇川等地，战争以来大商外走者有一百二十余人。延安市商业和手工业现只恢复到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七。其原因除交通外汇困难、过去负担过重、土改中“左”倾影响外，还由于战争和灾荒造成资金不足、商品缺乏、工业品产量减少、购买力降低所致。报告还提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各县党和政府对于市镇工作的重视和具体领导不够”。边区政府“已开始注意研究市镇工作，并加强领导，有计划的帮助手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求得发展。”

同时适当组织必需品的进口和土产的外销，以扶助商业之恢复和发展”。这是林伯渠在延安所写的最后一个报告，他不仅如实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宁的情况，其所提出的问题和措施也是切中要害的，对边区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

《恢复老区开展新区的工作方针》，1948年11月1日。

由于全国胜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回中央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提出：“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是否可行盼覆。”西北局本想挽留林，但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同意中央的决定，并于十一月七日电告党中央：林伯渠在年前赶到中央。

林伯渠临行前，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为他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作了情谊深长的讲话。他分析了全国和西北地区的大好形势后，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四点殷切希望：（1）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2）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要继续为将来的工作奋斗；（3）要把眼光放远大些，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民主人士；（4）要站稳脚跟，发挥共产党的先锋作用。这既是同志、战友临别赠言，也是革命老前辈对后辈的衷心嘱托，与会同志听后都深为感动。

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林伯渠在陕北已经十四个年头了，对陕北的人民和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无限的深情，现在因工作的需要马

上就要离开了，他心潮起伏，很不平静。十四日，在临行的前两天，他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前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拜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曾经住过的地方，并在中央大礼堂、中央办公厅楼和毛泽东、朱德住的窑洞前留影，以寄托对延安的怀念。

十二月十六日，林伯渠告别了他的亲密的战友和同志，离开了延安。习仲勋、贺龙以及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司令部的许多同志都来送行，祝他一路顺风，健康长寿，为党和中国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他转达陕北人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衷心问候。

到中央工作

林伯渠乘汽车离开延安，一路上风尘仆仆，他不顾旅途劳累，每到一地都要找负责人交谈，了解当地政权建设、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和部队后勤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详尽地记在日记上。经过十一天的奔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林伯渠抵达西柏坡。在这里，他又见到了阔别数月乃至多年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杨尚昆、陆定一、李维汉、李克农、王明，以及从东北等地前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高岗、罗荣桓、刘伯承、饶漱石等人。战友重逢，欣慰无量，彼此交流情况，研究工作，畅谈终日，乃至夜阑。

林伯渠此次调来中央，主要任务是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在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又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说明目前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合作、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要实现这个步骤，首先必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希望共策进行。中共的这一号召，产生了巨大反响，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纷起响应。从八月开始，各界代表人物接受中共的邀请，即陆续到达我东北、华北解放区，与我党共同研究召开政协的有关问题。林伯渠抵西柏坡后，一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出席政治局会议；一面即与在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田汉、周建人、符定一、张东荪等分别进行会晤，商谈国家大事。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派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民主人士进北平。临行前，林伯渠曾多次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进行商谈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方针、原则以及赴东北迎接民主人士的一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指示：“朋友们如有所问，找高岗把情形查清楚后商答”；“要诚恳坦白地相谈，为的是要把共同的事业搞好”；今后政府成立，“在政府中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对此要有足够认识”。毛泽东还与林伯渠谈了接民主人士到北平时，中共应派哪些人到车站迎接，以及邀请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来西柏坡等问题。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2月13日。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四日，林伯渠离开西柏坡，两天后到达沈阳。当时在沈阳的民主人士，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朱学范、

梅龚彬、赖亚力，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李文宜，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谭平山、丘哲、沙千里、沈志远、曹孟君、彭泽民、王昆仑、许宝驹、吴茂荪、蔡廷锴、李民欣、林一元、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陈其尤、罗叔章、茅盾、邓初民、侯外卢、洪深、胡子婴、郭沫若等三十多人。他们都是响应中共的号召，先后由香港、上海和国外许多地方陆续来到我东北解放区的。林伯渠到沈阳的当天晚上，与东北局的陈云、高岗、李富春等人研究了日程安排后，就去大和饭店看望旅居那里的民主人士。

十九日，李富春召集在沈民主人士全体会议，林伯渠在会上讲话，代表党中央欢迎他们到北平共商大事，并征询了大家对行期等方面的意见。李济深代表全体民主人士致答词，表示对中共中央的衷心的感谢。会上并商定于二十三日启程赴北平。

在沈阳的几天里，林伯渠与民主人士频繁接触，“不是他们来看林老，就是林老去看望他们”。林伯渠在交谈中，获知民主人士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原则，拥护毛泽东主席在元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谈条件，对于召开新政协，成立共和国政府，在原则上也表示赞同。但他们在新政府的产生方法、新政协组织与人事配备、今后各党派存在与否、他们的发展前途以及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疑虑。林伯渠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明，希望他们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创建新中国，许多民主人士都感到很受鼓舞。

于刚：《赶沈迎接民主人士经过》（未刊稿），1949年2月26日。

二月二十三日午后，林伯渠陪同民主人士乘火车离沈，翌日晚抵天津时，市长黄敬设宴招待。二十五日抵达北平。到车站欢迎的有中共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薄一波、叶剑英、彭真，各界民主人士中有张东荪、胡愈之、楚图南、千家驹、雷洁琼、费孝通等及全国学代会代表、铁路工人代表共百余人。在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住地。二十六日，林伯渠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并讲了话。由于要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林伯渠不能久羁北平，便同北平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面商，请他对民主人士“政治生活的充实问题多加关注”。二十七日，林伯渠离开北平，前往西柏坡。

三月五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全国胜利后，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论述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

林伯渠在二中全会上也作了发言，他完全同意和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并对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党“前十四年的‘八七’与六大，后十四年的三个会议（遵义、七大、此次），非常伟大。毛主席思想被全党了解后，党的事业就不同了。遵义会议转变危机。七大意义更大，党空前团结，能掌握全国形势，《论联合政府》及军事报告，完满的指出了方向。这次会议由量变到了质变：军事上很明显，现有三百多万军队，打这么多大胜仗；政治上，先有分散政权，现在统一起来；经济上，多年乡村经

济，现在接收城市。”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历史转折点”，也可以说“是城市工作会议”。

林伯渠完全赞同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观点。他说：“革命只是开幕，以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还对今后的工作谈了三点意见。关于军事，他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诉苦、三查、政治工作，都有经验，但要注意胜利以后不要骄傲。”关于经济，他强调指出：“经济建设，要避免急性病，如停止纸烟生产，可能是一种损失。”搞经济必须有“计划性”，只有“一年的计划是不够的”，应成立一个专门负责计划工作的机构。关于统战工作，他指出：党要“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使其在岗位上在职有权”，要准备做更复杂的工作，只要我们好好做，就可以团结他们。我们“要经过他们中的进步分子，领导落后分子。”今后做统战工作要注意“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不要迁就。”

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林伯渠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分乘汽车驶离西柏坡，于二十五日下午抵达北平。他们在西苑机场受到北平的党、政、军、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阅兵式。

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正企图通过和谈实现其“划江而治”的阴谋。为了揭露这一阴谋，争取签定一个以八项和谈条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进城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组成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于四月一日派遣代表团前来北平谈判。

四月一日下午，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等飞抵北平，下榻六国饭店。当晚，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饭后，周恩来和林伯渠邀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周恩来在谈话中，一方面质问张治中，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强调“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但同时也和他们商订了有关谈判的一些技术问题。

四月二日到十二日，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林伯渠同南京的每个代表和顾问均分别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他本着八项条件，逐个地征求南京代表们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的有关问题上。邵力子说：“第一条不提为好。”黄绍竑则说：“对第一条签字办不到。”其理由是他们“自己不好确定谁是战犯（如蒋），谁不是（如李、白）”。个别代表甚至还高谈蒋介石的“功劳”，林伯渠以铁的事实，严辞驳斥，使得对方“面红耳赤，流汗”。林伯渠在与南京代表交谈时，有的代表还谈到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说“顽固派亦反对他们”，希望我方体谅他们代表团的处境，在谈判过程中“示以宽大”。林伯渠及时将他们的意见，一一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李宗仁代总统在四月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中，也表示希望我方在战犯问题上采取宽大政策。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八日给李的复电中遂指出，在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

解决国内问题的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随后，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促进谈判取得成功，中共代表团在以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为基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中，也体现了这种宽大的精神。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4月1日。

四月十三日晚，林伯渠出席了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第一次和谈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简要说明，张治中对“草案”提出了四十余处修改意见，会议于午夜结束。

十四日，双方首席代表就“草案”的全部内容要点再度交换意见。这天，林伯渠就南京政府领导机构名称和我军渡江时间两个问题，与南京代表进行了交谈。十五日晚九时，林伯渠出席了第二次和谈会议。会上，周恩来提交《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对修正要点作了说明。最后正式提出渡江时间问题：如果南京政府在本月二十日以前不在“协定”上签字，我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会议于十时二十分结束。

我方提出的“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既坚持了彻底消灭反动势力的基本原则，又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对南京代表团所提的四十余处修改意见，有半数以上予以接受，表示了对战犯等问题的宽大处理。南京代表团经过研究，决定接受这个“协定”，十六日派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文件返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等予以接受。四月二十日，南京政府表示拒绝签字。当天午夜，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二十三日占领南京。至此，林伯渠参与的“和谈”也就宣告结束了，他又转入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筹备新政协，出席开国大典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覆灭，加快了新政协筹备工作的进程。在此之后，为尽快召开新政协，征求各方面对新政协的意见，林伯渠曾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还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请示并商讨有关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林伯渠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并作了多次发言。他在小组会上说：“新民主主义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领导不是包办，而是能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欧美民主政治都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我们政权组织应是一元化的，是民主集中制。”他还谈了政协、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三者的关系：“政协是协商的机关，协商好了之后，交政府去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其所选出之政府是权力机关也是执行机关，另外有政协来帮助政府。”对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问题，他说：“可以用合作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员“给以前途，使之事业有发展，儿女生活有保障；将来有朝一日，其工业工厂收归国家所有，亦使之有前途，总之就是合作的前途。”最后，他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现在如此：

政权组织是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合作的，不经过许多痛苦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条例中，应注意到这几点”。

林伯渠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无党派民主人士符定一根据自己多年经历，深有体会地说：“无产阶级领导实在有必要，别的阶级都靠不住。”

“林老讲的新民主主义对资本家采取合作渐进的办法，不采取激烈的办法，这是很好的”。组长谭平山在总结发言时也说：“大家的意见可以说是一致，特别是林老的意见，我们是很同意的”。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小组会议发言记录》，1949年6月18日。

会议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和林伯渠等二十一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筹备会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由常务委员会负责进行，工作重心是：一、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文件；二、推进并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新闻等人民团体的筹备工作，并协助成立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三、根据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会后，林伯渠全力投入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八月下旬，筹备会常委会秘书长李维汉跌伤住院，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后，他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为了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科技文化界的人士，林伯渠在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群众团体的成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他在一些团体召开的会议上发表的讲话，提出了许多非常精辟的见解，具有深远意义。

就在新政协筹备会闭幕的那天上午，他即出席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这是中国科学家大团结的开始，是科学史上的大事情。”他分析了旧中国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发展科学的前提条件时说：“中国是个落后的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曾受到长期的压迫和损害，而同时，改善与提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科学，也受到严重的限制和摧残。因此，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人民的民主与和平；只有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才能使反映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不断前进，充分应用。”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的统治基础已被打垮，全国胜利指日可待，这就为我们发展科学进行生产扫除了主要障碍。希望科学工作者在新中国的制度下，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都发挥出来，献给人民，做我们多年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他赞扬了科学工作者“埋头苦干，坚持真理”的精神，同时又指出：“今天到会的虽有一百多位专家，但就我们的需要来说，实在太少了。因此，中国科学工作者，不论理、工、农、医等各行专家，必须团结起来，在进步、统一的道路上，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

林伯渠还是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发起人之一。七月十四日下午，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到会的有全国各地哲学、经济、政治、法律、史学等部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一百四十余人，在郭沫若致开幕词后，林伯渠作报告。他说：这次会议“是革命的文化战线在社会学方面的一件盛事，一件巨大的学术建设工程的开始。”在新政协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的“这种新形势下，新的任务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

者民主统一地组织起来，作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坚强的单位，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团结起来，成为建设新中国文化学习工作的一支有力的军队。”他殷切地希望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之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事求是地来研究与解决社会科学各部门的理论与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以此贡献给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给新中国的人民。” 这些话语今天阅读起来，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林伯渠：《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9日。

林伯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代表会议发起人会议的筹备经过》，1949年7月14日。

会议的第二天，选出王昆仑、史良、艾思奇、李达、何思敬、沈钧儒、沈志远、周恩来、林伯渠、范文澜、郭沫若、董必武、翦伯赞、谢觉哉等二十九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沈钧儒、郭沫若、李达等为副主席。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在中法大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林伯渠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党的、非党的，老解放区的、新解放区的与待解放区的，城市的、乡村的各方面的文学工作者，要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之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之下，结成坚强而广大的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适当的批评与教育”，“‘文人相轻’是要不得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林伯渠：《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7月23日。

他分析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现状，强调了联系群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当前“表现与教育群众的作品，还远远落后在革命形势发展与群众需要的后面。因此，我们的文学工作者，进一步的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中去，真正与工农兵打成一片，参加并深刻体会阶级斗争，全面真实地反映出来，这不仅是未接触过工农兵生活的朋友，应当去实践去锻炼，同样，已经接触过工农兵生活的朋友，也应当再实践、再体会。”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作品普及起来，并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起来。”他认为文学工作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正确的确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丰富的思想内容，有高度的政治性和高度政治指导下的高度的艺术性。”在组织工作方面，他提出，必须加强领导，“有步骤有计划的采取交流经验、展开文艺批评、培养新作家、改造旧艺人、指导与组织工农兵自己创作等等方法，发展人民的文化事业，服从并结合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伟大建设，发展文学艺术在新中国建设中的力量。”

林伯渠：《在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林伯渠在这次会上的讲话，对文学工作者增强团结，改变作风，提高理论水平，开展文艺批评，改进和加强组织领导，都起了很大作用。

林伯渠还是新政治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九月十八日上午，他出席了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成立会。这次会议宣布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出席成立会的发起人还有周恩来、董必武、彭真、陈绍禹、王昆仑、张奚若、赖亚力、王炳南、谭平山、吴茂荪、许宝驹、阎宝航等近一百二十人，大家推选林伯渠为大会主席。他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

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分清敌、友、我，依靠人民群众的雄伟力量，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然后提出了新政治学研究会的目的与任务。他说：“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要团结全国从事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的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和努力参加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会上，他被推选为新政治学研究会主任，张奚若、陆定一、王昆仑、高崇民被推选为副主任。

林伯渠：《在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上的开会词》。

此外，林伯渠还多次出席了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成立会，同胡乔木、胡绳等研究社会科学、政治、法律等学会的领导与工作问题。

林伯渠在召开新政协前，推进和促成全国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术团体的成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些团体大部分是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它们的成立直接促进了新政协的召开；同时，这些团体的成立，将学术界各个方面的人士组织起来，也有利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林伯渠此时已是六十三岁高龄，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兢兢业业，不辞劳瘁，有时竟连续工作二十来个小时。为了勉励自己，他在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49年9月1日。

筹备新政协的各项工作，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到九月间已基本完成。在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时，为了搞好大会的宣传工作，九月十九日下午，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关于人民政协三个文件基本精神的报告》。他说：“三个文件，尤其是共同纲领的产生，是经过许多次反复磋商的。共同纲领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纲领，关系重大，第三组（按：分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决定由中共起草。”他在介绍中共起草的共同纲领，经各代表小组、第三组、常委会反复讨论和修改的过程后继续说：“六百多位代表都很谨慎的讨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在纲领的各部分内，如文教政策、政权机关，尤其是经济政策上，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协商后，大家都一致同意中共毛主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总的建国方针。”

林伯渠：《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人民政协三个文件基本精神的报告》，1949年9月19日。

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人民政协组织法也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对这三个文件“好好研究一下”在正式公布以后，做好“足够的宣传与解释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代表共六百多人。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告：“占人

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会，并被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在以后的几天里，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和修改，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三十日下午，大会选举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十月一日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一致决议：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会议决定接受政协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宏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军乐声中，毛主席亲自开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接着，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朱德总司令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军迅速解放全国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林伯渠站在毛主席身旁，心情非常激动。他从参加同盟会至今，度过了四十四个春秋，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一直为中国的民主、独立奋斗着。今天，新中国终于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来得多么不易啊！望着迎风飘舞的五星国旗，他知道夺取政权是艰难的，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更为艰难。他观看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和五彩缤纷的节日焰火，直到晚八时半才离开天安门，去参加九时举行的欢迎苏联代表团的宴会。

第二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沉浸于欢乐中的新中国首都北京举行。设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场，布置得庄严朴实。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毕加索的名画象征世界和平的鸽子，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保卫人民民主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大字标语。林伯渠在这个有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和国际友人共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这个大会会有苏联、朝鲜、意大利等国的人民代表团体参加，说明我们已经同国际和平民主运动汇合起来了。接着他说，“我们中国人民经历过长期的战争，深知战争的残酷，所以我们是战争的坚决反对者，也是和平的坚决的拥护者。但是，中国人民绝不是单纯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战争贩子和帝国主义决心冒险强迫我们作战，那么，中国人民凭着二十二年来从军事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力量，以及从这样长期斗争中所得到的宝贵

经验，也将不惜与他们相周旋。中国人民深信有充分把握，可以在反帝斗争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上林伯渠开幕词》，《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日。

新中国已在万众欢腾声中诞生，但是几天以后，中华民国的国庆十月十日即将来临，如何对待这一节日的问题，已经迫切地提到日程上来。林伯渠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又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十月八日，他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十月十日是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的纪念日。但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成果，迅速地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这个革命本身是失败了。……三十八年以来的所谓‘中华民国’，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的，也是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意志的。我们过去纪念十月十日，是因为我们要唤起全国人民，继承孙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先烈的遗志，推翻内外压迫者，建立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已经获得成功，旧中国已死亡，新中国已诞生，应当有新的国庆日。全国国民及国外华侨，如有在十月十日开纪念会的，应当允许，但不应当以这一天当做国庆日来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规定新的国庆日，这将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最近规定”。

《十月十日已不能为国庆日》，《人民日报》，1949年10月9日。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规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做了许多工作，而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就责成政府六个首要人员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沈钧儒、罗荣桓，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十一”过后，林伯渠即同各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连续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常委会和政府各部门汇报会，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委员和中央其他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之后，林伯渠与周恩来、沈钧儒、罗荣桓等，又先后出席了各部门的成立会。

建国初期，林伯渠对各地方的政权建设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我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行政人员都要“依据政务院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或批准任免”。林伯渠除出席中央召开的讨论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人选的会议以外，还同各民主党派和各有关部门进行过许多协商，将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并参与制订了有关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通则与地

方政府的各种条例。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直接领导的部门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为加强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筹备和组织各种会议，林伯渠经常出席办公厅的厅务会议，审阅和批改大量文件。由于办公厅在缮正会议记录时，漏掉一位委员的名字，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林伯渠对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加认真了，对同志们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有时一个稿件，常常要阅改几次才能发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要使“上下内外底于融洽的秘诀”是：一、务使各种有关情况都知道；二、使其参与指示、命令等之决定。林伯渠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他不但指示办公厅将有关文件及时送给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审阅，还指示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分工负责同政府主席和各委员及所属各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分别审阅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和中央直属华北五省二市、中央直属各部门的文件，要办公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邀集三、五个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将一些主要问题和有关材料，摘编印发，供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参阅。

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除承办文牍工作以外，还担负着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如安排接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组织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等。有些看来是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却有很强的政治性。林伯渠对此也十分认真，他要求办公厅对每一个步骤、细节都要准确无误，而且经常亲自审查与会者的名单，到现场察看是否有遗漏或不妥之处。当时办公厅初建，工作千头万绪，经验和人手都不够，但在这方面却很少发生差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区、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事，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彻底摧毁旧的政权，巩固和完善新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政权建设工作搞得更好，一九五一年七月，林伯渠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民政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了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农业地区实行了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和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还有三万万多人口的地区尚未实行土改，在那些地区的乡村，旧的保甲制度有些地区虽已废除，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其残余势力并未廓清，因此，还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结合土改加强那些地区的建政工作。”

其次，他在报告中提出：“应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检讨与研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体……在人民政权工作中，其表现的形式，在目前，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将来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它的会议与工作方法，也就是在各级政权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统一于中央的原则。现在全国已有一千多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各地反映，只要开得好，就解决问题，人民政府的政策就获得人民的拥护。人民代表会议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予注意。”第三，他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多年来的经验，干部关系很大。因此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决定一切。政权建设中，这方面工作的干部有很大的

成绩，但作风方面，不少干部则是有缺点的……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纠正他们的不良作风。”

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5日。

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5日。

林伯渠针对建国初期建政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的这三条意见，既中肯也非常及时，对于彻底摧毁旧的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的政权建设，林伯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

号召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两条经验，分清敌友，团结朋友，战胜敌人，继续巩固我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林伯渠：《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广东政报》第1期第5期，1950年10月15日。

林伯渠根据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号召，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的一些起义将领，担任了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把林伯渠视作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谈，而林伯渠对他们也总是十分尊重，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陈明仁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率部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被任命为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工作很多，理不出头绪，不知从何下手，写信将这一情况告知林伯渠。林立即给他回信，写道：“湖南素称富饶，人民觉悟程度亦高，际兹新近全部解放，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征粮支前等当急要政，自应端赖领导进行。而为要提高干部，俾能贯彻政策于不同情况的各地具体工作中，必须组织干部学习。为此，至希得闲给干部多多解释共同纲领，使之领会纲领的精神与实质，作为执行政策的思想依据。如此，则工作的推进，自然蒸蒸日上也。”程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湖南，未能参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会后不久，林伯渠即亲自写信给他，告知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同时，对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说：“湖南全境解放后，建立革命

秩序以安定社会，筹粮支前以协助解放西南，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耑赖主持。湘西游离散匪较多，素系难治之区，近来情形如何？”信中还提到，希望程潜在“春和佳日，即行来京”。

林伯渠致陈明仁，1949年11月11日。

林伯渠致程潜信，1949年12月14日。

林伯渠对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总是设法给予适当的安置和关照。贵州毕节周素园，民国初年曾任过众议院的秘书长，是位知名人士，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毕节时，经任弼时、贺龙等研究，曾请他担任黔滇川边的民军司令，他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家乡从事统战工作，还给八路军买过大批的云南白药。贵州解放后，当地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他写信给林伯渠“请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将此告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请他“转告贵州党的统战部须予照顾为要！”这类的事还有很多，例如他曾给邵式平写信，推荐黄介民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省政协委员；请徐冰商同李维汉，设法安置湖南邵阳李剑农的工作；给王首道、袁任远写信，证明于若愚之子于忠迪确系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八年牺牲，请他们转告地方政府，按优待烈属的办法，对其家中酌予适当照顾。

林伯渠致徐冰信，1950年3月8日。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林伯渠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尽量设法帮助解决。章士钊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失败，他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将在香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并望政府能帮助他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并告知章士钊，大函已转周总理阅过，“先生住港眷属北来首都事，已由港方负责人员照办，并嘱其帮助旅途事务，赵堂子胡同房屋，已由周总理令申伯纯同志前往接洽矣。”

林伯渠致章行严信，1949年11月5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九四九年底在给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中今年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来信要他设法接济。林伯渠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将翦伯赞的来信转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请他查明情况处理。同时，写信告知翦伯赞：“关于你的家中征粮超过租谷收入一事，我已将来信转给黄克诚同志，请他查明情形，酌予适当处理。”林伯渠在回信中，还给翦伯赞做工作，说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况所应贯彻执行的政策，则以帮助政府对家中很委婉的解释政策为妥。”

除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以外，林伯渠对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进步也十分关心。就在上述给翦伯赞的回信中，林伯渠还对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并提出诚挚的希望。信中写道：“能于功课之余，集中精力于中国历史之科学地研究工作，这是极有意义的，望努力！不过关于写作，部门不宜太多，而应首先着重于当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正确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学界所迫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更好一些。”

林伯渠致翦伯赞信，1949年12月16日。

黄右昌是林伯渠少年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湖南大学执教，林伯渠去信鼓励说：“先生以革命观点，研著法律书籍，讲学湖大，教育青年，实际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今后希望抽暇熟读毛主席的著作，以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阶级分析的方法，继续研究新中国的法律。如此，则以先生

才学与努力，对于新中国的法学界，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一九五 年春，何思诚编辑了一本《唐宋元明清农工生活诗选》，托其兄何思敬送给林伯渠征求意见。林伯渠在回信中称赞何思诚辑此诗选很有意义，同时，对该书的出版时间，也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目前除老解放区外，土改尚未进行，加以有些地区灾荒严重，农民生活还未得到改善，又由于革命战争及国家建设的需要，农民还负担着较重的公粮任务，因此，建议这部诗选的出版，似以推迟到全国土改完成、农村经济恢复、农民生活改善的时候。那时诗中所写过去农民的痛苦与现实对照起来，就更有积极的意义了。”

林伯渠致黄右昌信，1949年11月18日。

林伯渠复何思敬信，1950年3月15日。

建国初期，为了满足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京的高级人员的学习要求，由政协全国委员会提议并组织了学习委员会。参加者共二百多人，分为六个大组，以自学为主，每逢双周即举行分组座谈或请人作报告。林伯渠德高望重，党中央请他出来主持学委会工作，担任学委会主任。林伯渠经常参加学习会，和许多人倾心交谈，启发诱导他们了解党的政策，自觉的改造世界观。

抗美援朝时，当他了解到许多民主人士害怕、担心我国抗美援朝将会“引火烧身”，一些资本家准备抽出资金去国外时，他不但在座谈会上反复讲敌必败我必胜的道理，还提出必须“扫除一部分人民（主要是城市人民）心理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确立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立场。” 他批评新闻宣传部门过分地“强调帝国主义的战争叫嚣和英、美、法的一致，以致吓倒了自己，这种宣传方针是不对的，应予坚决的纠正”。为了增强民主人士对抗美援朝的信心，林伯渠还请周总理到学习座谈会上作报告，请志愿军代表介绍情况。后来，为了帮助民主人士了解土改和镇反的意义，消除某些人的抵触情绪，林伯渠还积极支持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民主人士学习有关文件，提倡和支持民主人士下乡调查，以提高他们的觉悟，促进他们的进步。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1年1月6日。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1年1月6日。

搞好各民族的团结，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林伯渠也很注意。一九五 年初，他积极支持和指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杨静仁等在北京创办藏族干部训练班，并亲自到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他还多次在中南海接见各地的民族代表团，鼓励他们搞好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

林伯渠不但身体力行地从事统战工作，还经常教育干部和政府各部门应当重视统战工作。一九五 年国庆节过后，他在陪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到东北视察的过程中，就多次以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宋庆龄副主席光辉的斗争经历，教育东北各地干部应该尊重民主人士，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后来，他还在北京饭店东厅约集各省主席和市长，专门座谈过加强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问题，并根据他多年的亲身体会，着重讲了应使民主人士有职有权。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林伯渠工作过于紧张、劳累，还在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赴东北视察前几个月，他就带病坚持工作，再加上这次到东北，为时

一个月行程数千里视察的旅途劳顿，到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便病倒了，直到次年春节才出门参加活动。一九五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率领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赴苏参加庆祝活动，经中共中央批准，留在苏联进行了几个月的医治和疗养，身体状况虽略有好转，然而已不如从前。

为了避免工作重复，提高工作效率，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于一九五 年底与政务院办公厅合并，许多具体的日常行政事务都转到政务院。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之后，林伯渠的工作虽不象从前那样繁忙了，但他仍然是白首壮心，“抑己为人”之愿未磨。他除了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从事外事活动，参与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以外，并且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和其他书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用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例如，在他的日记中就记有这样的话：

密切联系实际建设工作，全面研究马克思列宁理论问题。革命的理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座不灭的明灯，照耀着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走向共产主义完全胜利的道路。

社会政治活动家，就应该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善于将这些规律应用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

我国经济的领导者们对于新事物的感觉，分析我国经济的各种现象，注意新的进步的东西并在工作中指靠这些东西的本领，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拉纤或把舵的好办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践，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2年10月19日、21日，11月5日，9月15日。

林伯渠是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他历来对文艺十分关注，一九五一年患病之后，他仍然对这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如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再没有比害怕生活的真实、逃避生活矛盾的描写更大的罪过了。

写真实——这就是说观察并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发展，反映它的各种矛盾，反映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

林伯渠曾经长期从事财政和经济工作，他在一九五 年以后的日记中，记有许多有关增产节约、精减机构、三反五反、工农业生产、全国各大区的土地、耕地面积，全国及主要城市人口、行政区划分、城市农村税收、国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支出、预决算、全国大中小学在校人数、职工业余学校、农民业余学校人数、全国每人购买力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户等的情况和数字，对许多问题还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

如：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发动一个群众运动，在反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可以得到相当的收获，不过要看到运动的将来，还在加强监委工作，并使之成为一固定的制度，才可望久 。

财经工作的三个基本教训：一、努力发展经济的潜在力量，反对保守倾向；二、树立财政监督制度，反对本位主义；三、加强基本建设的领导。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 1952年5月8日, 1951年12月7日, 1952年9月7日。

集资方法, 一税、二贸、三工业利润……说目前手工业已能满足需要, 是不实际的。

应该就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有一个计划。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 1951年2月26日。

市场社会公私关系须加调整。……究竟本质所在, 即商品的生产与流转, 商品的价值与价格

农业税: 查田定产, 依率计征, 依法减免, 逐步实现统一累进, 并取消一切附加。

林伯渠的上述观点和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有的即使是今日看来, 也还能给人以启迪。

在林伯渠的日记中, 还记有许多劳动英雄和先进工作者的名字和事迹。关于工交战线的有: “工业中的著名劳动英雄赵国有、潘长有、马恒昌、马六孩、苏长有、郝建秀”。“天津出现了可看一千锭子的细纱工人(原看五百锭左右)。青岛有可看四十台自动换梭布机的织布工人(原看十八台到二十四台)”。“铁道上要以大力开展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推行乔玉岩、郑锡坤、李锡奎、杨茂林的先进工作方法”。关于农业水利战线的有: “任贵芳互助组(湖南汉寿县福和乡)种水稻, 李顺达、李承桂水稻丰产, 出一千三百斤, 曲耀离棉花丰产, 陈永康水稻一千四百斤。”“治淮第二年工程所用民工总数仅比去年多二十万人(第二年上堤民工二百四十万人), 而多做了将近一倍的工程, 平均劳动效率提高了将近一倍”。这些都说明他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 他的心紧紧地和人民群众连在一起。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 1952年11月3日, 7月14日, 10月5日、19日, 6月17日, 5月25日, 9月13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 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 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这重要时刻, 林伯渠全面地思考着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林伯渠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必须使整个国民经济“和谐地发展”, “关于建设, 需以重工业为重点, 是自然的。但为巩固工农联盟, 亦需轻工业(不能如有些人主张, 目前只要重工业)”。“如果对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工业和基本建设、商品生产计划和商品周转计划以及运输计划等彼此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 不能正确地加以规定, 那么, 就不可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按一定比例和谐地发展”。他还提出: “农村应适应工业发展, 须作全盘打算”

。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细节，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认为进行工业建设，必须对“一、资源；二、现有设备及其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三、建设能力（包括地质勘探能力、设计能力和建筑安装能力）；四、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包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等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一切重要工程，必须按正常程序办事：没有设计任务书，不许进行初步设计；没有初步设计，不许进行技术设计；没有批准技术设计，不准交付施工图，重大的改建工程必须先有总体设计”。

他主张要正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回避矛盾和困难，因而提出：

“在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胜利时，不能讳疾忌医与因噎废食”。这些意见的提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九五四年九月，林伯渠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大会的议程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以及成立人大常委会的机构。在此以前，林伯渠多次参加了政治局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他对草案的每一条款，都字斟句酌地仔细推敲。直至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下午，中央召开的临时会议上提出：“序言第三项第一段的年月日上加‘第一次会议’；又该段中‘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林伯渠将这些改动认真地抄写在日记中。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3年1月16日，4月13日，1954年5月18日。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3年7月10日，7月17日，3月19日，1954年9月14日。

九月五日，人代会开始举行预备会议，林伯渠代表中央向到会的一千一百多位代表，说明了预备会议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大会的注意事项。十五日大会开幕。十六日他在发言中说：“这个宪法，是一百多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胜利的总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国的经验的总结，是我国通过和平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保证”。“宪法草案指明了我国正处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在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他指出：“发展经济建设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当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赶不上广大人民生活需要”，“只有由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加强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扩大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

《林伯渠代表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汇刊》第85—87页。

在这次会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为了使计划更加符合实际，中央曾对计划做过多次补充和修正。全国人大闭幕后一个多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一五”计划草案。在两周时间内，先后举行了九次会议，且经常开至深夜。林伯渠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就“一五”计划的基本指标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邮电、商业、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一五”计划时，林伯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问题，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他说：“在以重工业是我们经济建设的重点的前提下，不仅在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与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的相应发展，要有适当的比例，而且要使建设计划和资金的积累程度、技术力量、设备供应等建设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有周密的研究和计算；不仅要加强各有关部门的相互配合和协作，而且要使中央部门的计划与地方的计划更好地结合起来，使旧工业的利用和新工业的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

他针对当时某些操之过急的思想指出：“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必须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来加以安排。这是由于某些建设事业，有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源，如石油，所以在整个工业中的比例，就不能不显得过小；有的因为受到自然灾害、社会改造程度和技术改进条件的限制，在增产中还不能操之过急，如粮食、棉花等，所以在五年增产的指标中，就不能不比原拟的计划暂时加以适当的降低，而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保证完成计划。其它如因资源调查、勘探、设计等技术力量的不够，在某些基本建设项目中，（也要）使规定的计划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他根据长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提醒全党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要从实际出发。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当我们党正在紧张地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时刻，高岗、饶漱石分裂党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阴谋活动暴露了。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林伯渠因病在广州休养，经中央同意未参加这次会议，但他高度重视党内出现的这一严重事件，认真学习和研究了中央的文件。他曾在一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关于《决议》的六个问题，并在前面加重点号标上了“注意”二字。这些问题是：“一、利于党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团结的事就做，否则不做。二、任何地区、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是党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三、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的原则，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四、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经常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否则（个人或小组进行……）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五、全党高干应根据增强党的团结的原则来检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凡是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改正。六、对于任何有损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应当进行批评和斗争。”林伯渠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彻底清算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林伯渠在发言中说：“我们党内发生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有些同志感觉

突然。对于我自己来说，作为中央委员之一，这样大的危害党的阴谋活动，揭露前毫未察觉，政治嗅觉不灵，这是值得严重警惕、引为教训的。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则不是不能理解的。”接着，他进一步分析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内外敌人也决不会不进行破坏。在这阶级斗争极为复杂尖锐的时候，堕落成党的叛徒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就乘机阴谋活动起来了。”他深刻地批判了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指出：一九五三年夏季，中央举行全国财经会议，“高岗、饶漱石之流，却别有用心，进行反中央的阴谋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说，这次财经会议上，似乎有点歪风。这样提醒政治局注意。当时中央虽然对于高、饶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还不完全了解，但已经开始感到他们有些反常状态了。我们党原是团结而健全的，其肌体内部那里能容许有病毒的微生物附着呢？所以经过一个相当期间，中央书记处采取适当措施，得到充分证据，高、饶反党联盟的罪恶阴谋，就完全弄明白了。七届四中全会证明党是正确的，证明党是团结的，也证明了党有力量能够及时揭发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正是党在前进路上克服障碍的伟大胜利。”他最后指出：“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时刻记在心里，这不仅使我们在工作中可以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而且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胜利的 necessary 保证”。会议结束后，为了牢记和贯彻这次党代会的精神，他在四月十日的日记中，用红铅笔醒目地写下了如下四条：

- 一、遵守党章党纪。
- 二、戒骄傲自满。
- 三、必须有系统（的）进行监督。
-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林伯渠：《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3月。

林伯渠不仅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遵守党章党纪，就是在所谓生活小节问题上，也是一丝不苟，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纪、政纪。一九五三年底他去广东休假并视察，省里一些负责同志前往车站迎接时，他诚恳地对他们说，政务院有规定，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以后我们大家按规定办事。后来离开广州时，广东的负责人也就不去送行了。

此后，他每次外出，总是先与地方联系，说明一不要组织迎送，二不要影响工作，三不要宴请送礼，四不能生活特殊。有时当地的同志送给他一点土特产品，他都婉言拒绝，派人立即送回。有一次，他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参观民主德国工业展览，讲解员见他中央领导人，且年迈体弱，所以单独引导他走近道行进。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由两个引导说明员走简捷路径，虽然便利，觉与众不同，不妥。”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虽然工作很忙，却经常参加党小组的生活会。一九五六年，他的故乡临澧县有两位同志来看望他，他热情地招待他们在北京参观和休息，同他们长谈，了解家乡近况。当他们提出想请林老帮助买两部汽车时，林说：“汽车是国家计划分配物资，不顾国家计划，乱批条子，这个权我不能用，请你们向乡亲们解释清楚。”县里的同志感到很受教育。

林伯渠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后，主张人大代表要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了解当地的实际工作状况，以便推动和鼓励各级政府正确地及时地解决一些重要问题。他倡导把定期视察工作，作为

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旬，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七月间召开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要求人大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到原选举单位地区视察工作。在讨论视察问题时，意见不太一致，林伯渠从国家政权建设的高度，从多方面论述了人大代表视察工作“容易使我们集中地了解各阶层人民的动向和意见，及时地抓住问题正确加以处理”的重要意义。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5年5月19日。

林伯渠是湖南选区的代表，五月下旬，他率先去湖南视察。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先后视察了益阳、常德、临澧等县的许多单位，找了不少基层干部交谈，六月一日一整天，约集三十三位县人大代表及县干部，座谈了统购统销、生产和治安等问题。

他的视察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将获得的材料，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两个笔记本。其中有肥料来源、耕牛情况、副业生产、开荒、灾情、生产救灾以及市场情况等等。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上，详细地记载了他亲自访问的王姓农民的情况：“有两个劳动力，兄二十六岁，弟二十四岁（哑子），都未娶妻，有一妹子上中学，母五十几，祖母七十几，共五口人。有田八亩，菜园六分，还编草席出售。田的出产，据称每亩不够四百斤，因近城，鸟雀多，又树荫重掩，所以出产不丰。去年因水灾未交农业税。购粮麦、米各半。半劳力（口粮每天）十二两，全劳力加半斤。每年配植物油三斤（须种油菜的）。布十二尺，不够穿。猪肉与盐，只要有钱尽量买。糖只许买一角钱的。”

通过视察，他获得了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了发言权。当时湖南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提出了“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口号，他认为这一口号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确的办法应当是“依率统购，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

林伯渠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后来，在湖南省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他还对湖南的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他说：“今年湖南曾有过水灾。秋后三个月来，没有下雨，又造成旱灾。这不仅影响冬种冬收，并且影响明春的农业生产。人民要求我们重视这一严重情况。我们应当一刻也不放松地抓紧救灾工作的领导，在贯彻生产自救的方针下，依靠群众组织起来，及时帮助灾民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解决开展副业生产和准备明春耕种的困难，并且作好必要的救济工作。”在谈到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时，他还正确地指出：“既要保证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又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渐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些只顾增产不顾人民生活改善的作法是不对的。人民群众中的过高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群众作公开地反复地解释，使人民清楚了解。”

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急，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强迫命令，违反自愿互利原则的现象，有些政策措施规定过死，妨碍了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也影响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针对这一现象，林伯渠在湖南人大一届四次会上指出：“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贯彻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方针，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切实有效的办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凡是不适于合作社搞的副业，就允许农民自己来搞；凡是不利于互利政策的措施和在分配方面不利于农民的作法，要适当地加以纠正；同时整顿组织，加强领导。”

林伯渠：《在湖南省人大一届四次会上的发言》（未刊稿），1956年12月。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旬，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林伯渠未能参加这次全会，当时他住院做前列腺手术，手术后引起呃逆，呕吐不止，五十多天内程度不同地不能睡眠，体力消耗很大，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但他从先后来探视他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和彭德怀等同志那里得知全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时，非常高兴。病愈后就积极地参与了八大的筹备工作。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开幕。党的八大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根据这一情况，林伯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首先，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中国人民自辛亥革命以来寻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又总结了自己参加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宝贵经验，然后指出：“在没有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中国革命不能免于失败；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还是不能免于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则无往而不胜。”

同时，林伯渠分析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

“左”倾错误的实质，将其违反实事求是这一点作为最要害的问题和共同特征提出来。他说：“三次‘左’倾路线的内容尽管各有不同，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主观主义，不尊重事实，不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而从武断和教条出发来确定革命的路线。机会主义者他们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是科学，当我们具体运用它来确定革命路线的时候，同样应当以科学的论据，即具体的客观的事实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如果这个基础不是可靠的，那么，所确定的路线当然只能引导革命走到失败，而不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7页。

他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以后，语重心长地提醒人们：“我们要继续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就应当记得我们付出了无数代价得来的教训。”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而主观主义，在过去曾经使得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遭到失败，而现在也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他最后指出：“只有在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他的发言虽然只有三

千多字，却是他半个世纪革命心血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377—378页。

在党的八大及其一中全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同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参加了纪念大会。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多位来宾和四十多位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也参加了大会。林伯渠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民主主义纲领来号召革命的民族英雄。”“中山先生在他一生致力革命的四十年间，不断因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终于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他科学地评价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并深刻地指明了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他说：“中山先生无条件地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不顾一切压力和诱惑而同帝国主义势力坚决对立。始终不懈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斗争，这就是他所以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的根本所在。我们应当积极发扬中山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把它当作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纪念孙中山先生九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发展。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3日。

鞠躬尽瘁，晚节弥坚

一九五七年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林伯渠虽已年逾古稀，体力进一步衰弱，但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不避辛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发奋工作。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去广东考察，从化县明星高级农业社的农民和干部向他反映：“上面技术指导太机械；双铧犁太笨，不能下水田；五一犁咀不好；播种太早，秧老了，肥料和劳力不够。”三月初，他又到杭州考察，龙井乡的农民反映，茶叶收购单位压级压价，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林伯渠倾听农民对政府工作的批评，一条一条郑重地写在日记上，并及时向有关省、县领导同志，提出注意保护农民利益和改进工作的意见。

三月下旬和四月上旬，他又去上海、南京视察了一些工厂，并和地方领导同志进行了交谈，于四月十一日回到北京。这时中央正在讨论在全党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林伯渠参加了这一讨论。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但是当各地党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乘机向党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六月以后，党中央对右派的进攻给予了回击。但是由于对当时的阶

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致使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

林伯渠非常重视整风运动，他认为整风应“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他强调领导者必须“自觉而正确地以身作则”。他对反右派斗争也十分关注，曾将北京及全国有关右派人数的统计、比例详细地记录在笔记本中。

林伯渠的笔记本（未刊稿），第2108页。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7年6月6日。

继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之后，我们党在经济工作中也发生了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严重错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林伯渠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他对毛泽东在党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上轻率地肯定“大跃进”、“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是赞成的。在《日记》中曾写道：“结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在“大跃进”开始时，林伯渠为亿万人民群众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所鼓舞，也说过赞扬“大跃进”的过头话。但经过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不辞劳苦地到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各省、区视察之后，他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如大炼钢铁用劳力过多，运输困难，某省百万人缺粮等等，因而在日记中写下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8年5月31日。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8年7月26日，1959年5月1日。

在“大跃进”的年月，林伯渠对于我国民族问题和统战工作仍非常重视。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就曾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庆祝活动。与他同去前往祝贺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杨静仁以及各省市的代表。林伯渠一行二十二日抵达银川时，在车站受到了各族群众五千多人的热烈欢迎。

二十五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林伯渠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宁夏回族自治区经过将近两年的酝酿、协商和筹备，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回族人民和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共同的喜事。”接着，他深刻地论述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和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各民族共同愿望，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回族中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个政策的巨大优越性。由于在各地回民聚居的地方依据聚居地方的大小分别建立了大小不同的回族自治地方，不但保障了回族人民在管理本民族内部事物上当家作主的权利，大大激发了他们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而且迅速消除了历史上残留下来的回族和汉族及其他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毫无疑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一定会鼓舞起自治区内各民族人民更大的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团结的事业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宁夏日报》，1958年10月26日。

在银川短短的几天里，林伯渠参观了一些工厂和村庄，他和工人、干部亲切交谈，到农民家里作客，把党的关怀和温暖，带给了宁夏人民。他顾

及地方上的困难，指示秘书等人，不许随便要汽车。开会时，要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坐大汽车去。晚上参加庆祝活动，他要求将代表团的坐票前后搭配，以便代表们分散到群众中去，扩大接触面，了解更多的情况。当地的办事人员特意加工了一些质量上乘的毛毯，赠给每位代表一条，林伯渠获知后，指出这是违反党纪、政纪的，结果全部退回。这些看来似乎是些“小事”，却体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优良作风，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银川回到北京后，十一月十二日，林伯渠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二周年纪念仪式。他曾二十年赞襄孙先生的革命事业，对孙先生始终非常崇敬，每逢先生诞辰，总要与老同志、老朋友一起缅怀孙先生的革命事迹。这次在碧云寺参加纪念仪式后，他与何香凝、李济深等诸老回忆和交谈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时，有人谈到这样一件事：香港《晶报》报道，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儿子从一老友家中，发现了三十年前由何香凝、经亨颐、陈树人三人合作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上有于右任的题诗，便携回家中。

于右任见后，发现诗中漏落一字，随即挥毫补上。他在欣赏诗画之余，追怀往事，感慨万千，遂再题诗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破碎山河期再造，凋零诗友记同游。
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林伯渠对于右任怀念大陆和旧友的心思，深表同情，只是觉得于先生诗的后面两句，未免过于没落伤感，当即步于诗原韵，口占一首，并挥笔亲书：

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
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5页。

这首诗，表达了林伯渠希冀云散在台湾或者异域的旧友们，能够深明大义，和祖国人民一起，团结在枝繁叶茂的中山陵树之下的殷切希望。

“大跃进”造成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很快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起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开始纠正当时已觉察的某些“左”的作法。次年六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以及整个工业生产问题，通过认真分析原材料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把钢的生产指标由一千八百万吨降到一千三百万吨。林伯渠对这一决定极表赞同，他主张根据客观条件确定生产指标，编制计划“不从指标讲起，要从材料分配提出问题，先保证生产，后安排基建”。

《林伯渠日记》（未刊稿），1959年6月8日。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林伯渠赴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初确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指出，“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综合平衡。林伯渠在发言提纲中，虽然在全局上和路线上，仍然是肯定“大跃进”的，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们的不足”，问题在于：“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有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关于经验教训，他提出两条，一是“应该掌握客观规律”，二是“全面执行党的政策”。他明确指出：“过去成功了革命，经过多少周折！现在向自然

开火，已遇到和将遇到的困难，不会比以往革命少些。”因此，共产党人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需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在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林伯渠心事浩茫，写了不少充满哲理、寓意深刻的诗句。七月十二日是星期天，会议休息，他夜不能寐，经反复思考，于次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云：

五老峰头气象新，居高临下一身轻。
空中蝴蝶迷茫梦，大计熟筹问耦耕。
花木怡然属自我，阴阳终古影乾坤。
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做结论。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7页。

“空中蝴蝶迷茫梦”一句用了《庄子》庄周梦为蝴蝶的典故，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现象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大计熟筹问耦耕”是指决定国家大计，应当多多听取群众意见。他强调客观规律是不可忽视的，对“大跃进”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归根到底，只能由人民群众作结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又错误地认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反党集团。林伯渠在八届八中全会小组会的发言中，也讲了一些违心之言，说了错话。但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他把发言记录改了又改，涂了又涂，最后还是决定将发言记录稿压下，不登简报。

庐山会议的日程排得很满，会议时间很长，许多年轻的同志都感到非常疲劳，有些吃不消。林伯渠虽然坚持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身体很虚弱，下山就病了，发高烧。中央原定八月中旬由他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因此不得不推迟至下旬。

他在京稍事休息治疗后，就投入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临行前，林伯渠身体并未痊愈，但他坚持出访，并一再说不敢再次延期。

八月二十四日，林伯渠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后，与周恩来总理同行回家。他同周恩来谈起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事，并询问有什么指示。周恩来亲切地说：“那里，那里！林老，你是党的一位老同志，我还有什么指示呢？按照党的对外政策做就是了。”二十五日晚，因林老一再请示，周总理准备找他谈一谈，并亲自打电话问林老是否在家，休息了没有？秘书把总理要来的事报告了他，他考虑总理太忙，着急地说，不能让总理到我这里来，我到 he 那里去。这时已经是晚十点半了，他立刻起身前往，到总理办公室与总理进一步商谈了访问事宜。

二十六日午前，林伯渠召集代表团成员会议，晚八时后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曾德、代理部长会议主席莫洛姆扎木茨、大人民呼拉尔主席贾尔卡赛汗等党政负责同志在车站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会。在访问期间，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和曾德、莫洛姆扎木茨等党政负责人，接见了代表团全体同志，并同林伯渠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林伯渠在乌兰巴托参观了苏赫巴托尔乔巴山博物馆，并到工厂、少年宫、商店和农村参观。代表团受到了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只要在街头一出现，蒙古的男女老少都热情地向中国同志挥手致意。林伯渠在乌兰巴托中蒙人民友谊集会上，在大呼拉尔欢迎宴会上，在将巴彦朝克特农牧业合作社命

名为蒙中友谊社的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他赞扬中蒙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祝愿中蒙友谊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九月二日午后七时，大人民呼拉尔举行欢送宴会，桑布主席亲自主持仪式，向林伯渠赠送蒙古民族服装、弓、矢、马头琴等礼物。九月三日，林伯渠满载蒙古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离开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了这次出访的情况。

自从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工作的劳累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忧虑，林老明显地消瘦和衰老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继续“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又提出了钢产量的高指标，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更加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出现困难的局面。会议结束后，他去广州休养治疗。

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回答“大跃进”以来经济发展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林老抓紧了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深刻思考。三月初在杭州时，江华和霍士廉来访，林老同他们讨论了工业建设缺煤、缺电和缺设备的情况，研究了学习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直到四月中旬，他还在继续认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三月下旬，林老回到北京后，出席了人大常委扩大会议和人大二届二次大会。四月八日以后的十来天，参加了接待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的全过程。他紧张地工作，没能好好休息，患了感冒，可没等病愈，又参加了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及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过度的劳累，导致病情加重。五月，林老病危。医生诊断为严重的心肌梗塞，他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住院治疗。临行前，一再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还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政治局开会要通知我，文件要送给我，该交办的事情就办。在住院期间，他对前去探望的人说：我再住一、两天就回去工作。

林老一生爱读诗，爱写诗。五月六日住进北京医院的第一天，就写了《题北京医院三三一病室壁画》一诗，诗云：

清新壁画活生生，猫蝶同春是象征。

赢得年华归大有，好用火箭取长庚。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27页。

“猫蝶”谐音是“耄耋”，象征着人的长寿。林老对生活和工作充满着热情和希望，他渴望赢得更多的年华为人民多做工作。

五月二十五日，林老写下了他数十年来最后一页日记。他病情严重恶化，已经没有气力再写下去了。二十九日上午十时三十四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党和国家的重要的领导人林伯渠同志与世长辞了，享年七十四岁。

林老的逝世，使全党全国人民陷入了悲痛之中。

数以万计的首都工人、农民、士兵、学生、机关干部，络绎不绝地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默默地从林老的遗像前走过，表示深切悼念。在银川，市农具机械厂老工人李金山的眼里满含着泪水，他忘不了林老在看了他的操作后，一把握住他那沾满油污的手，亲切地鼓励他搞好生产的情景。在邯郸，东风剧团的一群小演员放声痛哭。他们曾几次到林老家里作客，忘不了林老要他们学习向秀丽、刘文学，学好业务和文化，继承革命事业的教诲。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纷纷打来唁电，沉痛悼念林伯渠同志。

林老是延安“五老”之一，徐老、吴老、董老、谢老都为失去了最亲密的战友而悲痛万分。五月三十日，董必武在大同准备游云岗石窟，噩耗传来，当即返京，在车中悲痛地吟咏道：

大同闻耗若惊雷，星殒长空剧可哀。

五老以君为最少，百年何事早相催。

吴玉章和谢觉哉也都写了悼诗。徐特立抄录了他十五年前贺林老六十寿辰的诗篇以志哀感。

六月一日中午，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归来的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不顾旅途劳累，由首都机场径来劳动人民文化宫，向林老遗像致哀，并参加守灵。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也发来电报表示吊唁。

六月二日，首都各界人民群众一万多人隆重举行公祭。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敬献了花圈，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致悼词，他说：“林伯渠同志，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伯渠同志，从来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对于革命胜利具有无限的信心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他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粉碎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斗争的那些最艰苦的年月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艰苦奋斗，勇往直前，不怕任何困难，不计个人安危，表现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高贵品质。”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人民日报》，1960年6月3日。

林伯渠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和崇高品质教育着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

他为中国人民和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一生，将永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怀念，鼓舞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

后 记

《林伯渠传》，是为了纪念林伯渠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一九八六年），在中共中央党校王震、蒋南翔同志领导下，由《林伯渠传》编写组的同志集体撰写，最后由王震同志审定的。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陕西、上海、江苏、江西、福建、广东、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市的档案馆、党史办、纪念馆、图书馆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很多老同志和林伯渠同志的亲属，也为本书提供了大量情况和珍贵史料。

本书初稿在送审过程中，马文瑞和刘景范同志，红旗杂志社熊复、中

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黎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李新、刘经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杨瑞广、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马齐彬、马鸿模、王仲清、中央档案馆张景堂、曹雁行、黄启约等专家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及有关同志致以谢意。

参加本书撰写的同志有：王渔（中共中央党校）、宋斐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李坚（广东中山大学）、阎树声（延安革命纪念馆）、沈克家（湖南省中医学院）、李敏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参加本书资料收集工作的同志有：林秉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涂绍钧（湖南临澧县文化馆）、隋学斌、曹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渔同志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宋斐夫同志也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统稿。

本书虽然得到各方面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但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加上时间比较仓促，其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本书得以在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前夕出版，还应当感谢红旗出版社和天津新华印刷一厂领导、编辑和工人同志。他们许多人为编辑出版此书，放弃了假日休息。

在此亦谨致谢意。

《林伯渠传》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一月

